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双月刊)

2019年第4期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王国聘

副 主 编:钟玖英(常务)

编委会委员:

于松明	王本余	王国聘	任其平
华 春	刘光祥	刘维周	江 宇
许承明	李生峰	李朝晖	杨学民
杨种学	吴 翔	吴晓勇	张相学
陈爱民	周 红	赵 彤	段继业
秦林芳	袁宗金	顾维勇	曹慧英
蒋良军	窦 瑾		

学术顾问:

龙协涛

【陶行知研究】(特约主持人周洪宇教授)

陶行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接纳与改造 曲曼鑫 1

构建普适开放与人事兼容的陶研谱系

——《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简评 潘 标 7

【六朝研究】(特约主持人胡阿祥教授,六朝博物馆协办)

南朝的“士庶天隔”新探 杨恩玉 10

移民、城人与侨州郡县

——北魏时期特殊的统治政策 颜岸青 17

【小学教育研究】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英语复习作业优化设计 张丽宁 24

小学生在口述和写作中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特点 陈友庆,余 姚 30

家庭教育对农村儿童自我概念影响的个案研究 吕 林,陈学军 35

【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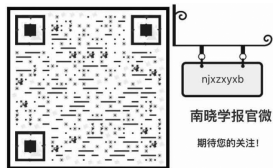
兼性共生:苏轼诗、佛关系新论 关鹏飞 41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

——论入宋文士南唐历史笔记的撰作 胡 鹏 48

【南京研究】

国家公祭、和平文化与南京和平城市建设探讨 卢立菊,付启元 54



2019 年第 4 期(总第 162 期)
7 月 20 日出版

民国时期私立南京孤儿院的个案研究…………… 蒋 静 58

【外语研究】

句法变异:生成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的交汇点…………… 方小兵 67

大学英语水平考试写作提示语可比性研究…………… 姜子芸 73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习语性特征探析…………… 苏妮娜 78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的自我指称与身份建构…………… 戴俊红 83

【旅游研究】

兼顾人居环境的古村落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评价

——以南京漆桥村为例…………… 徐 菁 89

酒店业正反向电子商务融合应用研究…………… 王小波 95

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魏洁云,刘桐彤,陈 夏,赵节昌,杨 琳 100

【新闻传播学研究】

实践与创新: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转型取向…………… 熊忠辉 107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实践的“变”与“不变”

——兼谈新闻教育的坚守与变革…………… 蔡之国,张盼盼 112

新闻传播本科教育教学体系的变革与创新…………… 初滢滢 117

【书评】

在文本细读中重塑清代《论语》学研究新格局…………… 宋 钢 122

JOURNAL OF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AIN CONTENTS

(NO. 4 2019)

Tao Xingzhi's Accep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Wang Yangming's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QU Man-xin(1)
Constructing a Genealogy of Tao Xingzhi Research with Universality, Openness and Compatibility of Persons and Events—A Review of <i>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The Academic Pedigree of Tao Xingzhi Research</i>	PAN Biao(7)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Gulf between Scholars and Commoners"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YANG En-yu(10)
Immigrants, Urban Dwellers and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of Migrants: Special Governing Policie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YAN An-qing(17)
An Optimized Design of Primary School English Revision Homework Based on Core Attainments	ZHANG Li-ning(24)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Using Mental Terms in Speech and Writing	CHEN You-qing, YU Yao(30)
A Case Study on 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Education on Rural Children's Self-Concept	LYU Lin, CHEN Xue-jun(35)
A New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 Shi's Poetry and Buddhism	GUAN Peng-fei(41)
Historical Mem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A Study of Historical Notes about Southern Tang Dynasty Written by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HU Peng(48)
National Memorial Ceremony, Peace Culture and Peace City Construction in Nanjing	LU Li-ju, FU Qi-yuan(54)
A Case Study of Private Nanjing Orphanag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Jing(58)
Syntactic Variation: An Intersection of Generative Linguistics and Sociolinguistics	FANG Xiao-bing(67)
Comparability of the Writing Prompts of a Large-Scale Computer-Based English Writing Test	JIANG Zi-yun(73)
A Corpus-Based Study on Idiomaticity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Spoken Discourse	SU Ni-na(78)
Self-Address Forms and Identity Types in English Majors' Graduation Thesis	DAI Jun-hong(83)
Sustainability Evaluation of Ancient Village Tourism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Qiqiao Village	XU Jing(89)
Research on the Fusion of Positive and Reverse E-Commerce in Hotel Industry	WANG Xiao-bo(95)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in Jiangsu Province	WEI Jie-yun, LIU Tong-tong, CHEN Xia, ZHAO Jie-chang, YANG Lin(100)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Orientation of Undergraduat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XIONG Zhong-hui(107)
On the Change and Changelessness of News Production Practice 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Persistence and Reform of the Course Setting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CAI Zhi-guo, ZHANG Pan-pan(112)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ystem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U Ying-ying(117)
Re-Constructing the New Pattern of the Study of <i>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i> in Qing Dynasty through Fine Reading of the Text	SONG Gang(122)

陶行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接纳与改造

曲曼鑫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陶行知生活在新旧时代交替阶段,既接受了旧时代的儒学育化,也受到了新时代的知识涵养。作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陶行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接纳和改造主要体现在思想、实验和精神方面,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提炼出“生活教育”学说,彰显出实践性、创造性和平民性三个特点,推进了教育平民化的进程,丰富了教育改革的实践经历。同时,为当前教育改革提供了智慧启迪与变革经验,继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知行观。

关键词:“知行合一”;陶行知;王阳明;知行观

中图分类号:G40-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01-06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在教育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学说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接纳与改造。陶行知基于当时的中国教育实际情况和他自身的学习经验,在思想与实践层面和王阳明进行了一次超时空对话。其中的过程值得玩味,进而体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当前教育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需要结合教育需求和现实情况,创建有效的实践育人机制,深入挖掘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宝贵智慧和经验。

一、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哲学基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和国际声望的人民教育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本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目的,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生活教育学说。生活教育学说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个方面。关于生活教育之理论阐述,陶行知发表了《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陶行知在文中指出,“我们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基于当时的教育境况,他指出,中国教育普遍存在“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的通病,使培养出来的人一无所能。毛泽东在评价陶行知时说道:“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①可见,“知行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重要哲学基础,然而这一思想并不是他凭空提出的,而是对明朝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进行的一系列接纳与改造。可以说,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体系尤其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提出以及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实践有着导向性作用。

“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语出《尚书》,其后“知”与“行”的关系便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知行先后、知行高低、知行难易等论争。明朝自武宗后便陷入了国贫民困之境,忧时之士对于亡国之音颇为不解,找不到世风下滑的根源,于是便归之于人心之不正,而人心之不正又归之于圣学之不明。此时,思想界的巨擘——阳明先生便应运而生。

收稿日期:2019-04-0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中国教育学者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COA1601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曲曼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

① 毛泽东:《抗战教育的“知行合一”》,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明武宗正德三年,王阳明针对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论以及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言行脱节的弊端,首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知行合一”学说。知,即道德意识;行,即道德行为。他认为,知行虽可二分,却不可将其“分为两截”去做,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他在对“知行合一”进行阐述时,列举的大多也都是与道德有关的例子,如忠君、孝亲等活动。他提出:“某尝说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①他也曾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王阳明尤其强调“知行本体”,即“真知”,他认为真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知必能行,另一个是知道如何去行。知道就必须要去付诸实施,否则就不是真知,而是一种无用之知,就好比有的人读了很多书,完全不去行动,既不能提升自己,也无益于他人和社会,读书再多也不是真知。而“真知”最终也要知道该如何去行,有些人读了很多书也希望能够付诸行动,却不知该如何去行,即存在知识论与方法论不能实现有机结合的问题。

王阳明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于平定宁王叛乱后正式提出了“致良知”。所谓良知,在王阳明看来即为“心之本体”。他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定盘针,它能够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为我们指导方向。我们只要按定盘针的指引去做事,就不会迷失方向。“定盘针”在王阳明这里叫作“本心”,又叫作“良知”。在此基础上,“致良知”是将“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教育的作用于是也就显现出来:经由教育所揭示的良知功夫就是要让“愚夫愚妇”也能体察本然之良知,向内心寻求德性修炼之道,而这个德行践履的方法就是“知行合一”。王阳明指出当时社会言行相诡的弊端并加以纠治,正是其儒家担当精神的一种表现,应合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代境况,在新旧时代交替中唤起对良知与行动的渴望。陶行知在这一背景下接纳了王阳明的思想学说,并逐步加以改造,焕发出新的生机。

二、陶行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接纳与改造

任何历史时代,社会的革新与改造都要求改造与发展故有文化。因此,任何一种历史文化之开合演进,都必须以满足当时社会或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为目的。变革时代,这种客观需要作为社会进步的要求必然要促成形成时代思潮,使原有学术思想体系发生解体,并通过广泛而深刻地对社会群体批判意识的历史反思,进行革新性的调整、改造与发展,以至形成一种能够满足客观需要的新文化体系。处于中西方文化碰撞时期的陶行知,便深受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和实践的影响,结合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教育发展要求对其进行了接纳与改造,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知行观。

(一) 思想学说,强调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思想时至今日已有500年之久,其当时的历史境遇和现在的社会实际已有霄壤之别,然其教育思想仍可为现代教育所借鉴。陶行知是新旧时代交替的人物,可谓是王阳明思想学说的重要继承者和发展者,尤其是王阳明的知行观对陶行知的思想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从信仰“知行合一”的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将王阳明的知行观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陶行知的知行观经历了由“知行”到“行知”再到“行知行”的过程。

陶行知对王阳明思想的接纳更多地来自于传统与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吸收过程。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强调希望通过“知”与“行”的统一,注重道德行为与道德活动,纠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知行脱节”的弊端,即只知不行或只行不知,以拯救日趋衰落的明封建王朝。他强调摆脱日常生活中各种私心、私利、私欲的束缚,从而“发明本心”,按照“良知”的教导去做事,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在当时的传统封建社会具有反教条、反权威的积极意义。而陶行知正处于近代社会的转折时期,传统的中国与新兴的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冲突与交融,人们高度颂扬主体意识,蔑视正统主流思想,强调自我解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刚进入金陵大学求学的陶行知便接触到了王阳明的思想,无疑为他冲破传统思想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寻求救国之道提供了武器,指明了方向。“从戊戌到辛亥,思想政治界的一部分先行者,无论是较为温和或较为激进者,都极其推崇王学。”^②

1910年,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校长亨克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开始了对王阳明思想学说的认真学习与研究。

^①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② 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1911年,陶行知将自己的名字由“文濬”改为“知行”,表明了自己对于“知行合一”学说的坚定信仰。他还曾在1934年发表了《行知行》一文,其中讲道:“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他认为,认知在先,实践在后,先知后行,知行并重。这种观点虽然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的色彩,但也是陶行知确立哲学观的开始,对陶行知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4年,陶行知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正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日趋成熟及其影响逐渐达到高峰之时。他对陆王心学的皈依,牵引着他与杜威的实验主义产生共振。杜威和王阳明都通过把思想与社会活动必然地联系起来,给思想注入了道德的目的。就王阳明和杜威两人而言,思而无行便毫无意义,既缺乏目的又缺乏结果,两人或多或少有着知识的工具主义色彩。陶行知并不排斥这一观点,知识与教育本就不可分割。杜威教育学说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注重行动的哲学观,与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期间学习的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观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相通或相似之处。“中国王学甚好,在美国亦有相似之哲学,杜威一派的实验主义,即注重实行之哲学,与王学知行合一之说相同。”^①这使得陶行知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创造性吸收,强调“做”与“行”的重要性,注重理论同实践的联系,注重科学实验,以科学方法办教育。1927年,陶行知在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并对前一阶段的知行关系作了一个颠倒,将“行”置于“知”之先,提出“行先知后”的观点。陶行知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表明,“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②。为此,他在1934年7月将自己的名字从“知行”改为“行知”,表示自己对于“知行”的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

王阳明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有着直接影响。1930年,陶行知在《生活即教育》一文中认为,中国遗留下来的旧文化与生活教育是有冲突的,“是上了脚镣手铐的”,而这些“脚镣手铐”就是“以天理压迫人欲”,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天理为第一要件。陶行知认为“以天理压迫人欲”的原因在于把天理看成一件事,把人欲看成另一件事。在他看来,“欲”并不是坏的东西,通过教育可以将天理和人欲打成一片。^③当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学说时获得了很多好评,同时也遭到了众多质疑。陶行知写了很多文章来解释生活教育学说的合理性,其中很多文章都采用了王阳明《传习录》中“问答”的方式,如《湘湖教学做讨论会记》《答操震球之问》《答朱端琰并致一般怀疑教学做合一者》等。

从陶行知解释其“教学做合一”的文字中,也能看出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本体”的影响。从语言表达形式上说,“教学做合一”借用了“知行合一”的形式;从内容上说,“教学做合一”更是“知行合一”教育中的翻版。他认为“初生的小孩子便是教学做合一。做的意义,比平常用法要广得多,这是对的。但是,‘学也是做’‘教也是做’‘教育就是做’的三句结论,殊有语病。我们可以说‘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我们也可以说‘教学做合一便是生活’”^④。陶行知立足于“知行合一”来解释“教学做合一”,强调王阳明心学所提倡的在“做事”上下功夫。他说:“我们的一条鞭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即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⑤

陶行知认为仅仅读书是不够的,书里介绍的是古人的行、今人的行、外国人的行和中国人的行,“如果有所知,也不过是知人之所知,不是我之所谓知”。造成这个的原因,也正如陶行知所说:“中国学子被先知后行的学说所麻痹,习惯成了自然,平日不肯行,不敢行,终于不能行,也就一无所知。”陶行知敬告国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先知后行的土壤里,长不出科学的树,开不出科学的花,结不出科学的果。”他还以法拉第、爱迪生的发明过程,来说明他们获得知识的进程是“行知行”,由知识做根、做指导,再去有计划地行动,从而获得更多、更高一级的知识,一切发明创造都遵循这个认识过程。

作为一名新事物、新事业的开创者,陶行知必须为他的这种开创寻找合理性依据,才能号召当时有激情有理想的年轻人来到晓庄,和他一起奋斗,因此,在当时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科学主义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下,陶行知也写过批评王阳明的文章。“知行合一”不是说任何时候都必须“言行一致”,成大事者要有大德,同时也必须要有智慧,做事也必须讲策略。王阳明本人做事就很讲策略,战场上没有与敌人讲《论语》的正道,

① 王卓然:《中国教育一瞥录》,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45页。

②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③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493页。

④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27页。

⑤ 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而是讲《孙子兵法》的诡道。“知行合一”不排除运用策略去对抗小人和坏人,以完成自己有利于“天下苍生”的使命。陶行知做事效率高,处事机智灵活,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人际关系都很融洽,这就是他对“知行合一”的灵活运用。他结合时代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并以此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成功地找到了完善个人品格和寻求救亡图存之道。

(二) 躬行实践,主张身体力行

王阳明的一生戎马倥偬、披坚执锐,扶危定乱、躬先士卒,他最后病逝在征战而返的归途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是“知行合一”的最佳注脚。诚如宋佩章所言,王学在社会中得以存亡接续、得以风靡一时、得以在思想界领军,其根本原因在于王学的实践品格。^① 邓艾民先生也认为:“他的主要功绩并不在于一时一地‘破心中贼’,而在于为更困难、更重要的‘破心中贼’创造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型塑了更为完善的榜样。他不仅创造了致良知的学说,更是用他的一生践行了致良知的学说,成为了封建主义的圣人。”^②

王阳明在给罗整庵的信中也说道:世上有两种讲学,一种用口耳,一种用身心。前一种人,嘴上说得天花乱坠,随意地揣测经典的涵义,只求一时的名声;后一种人,讲求个人的精神修养,并在日常生活中用生命去践履,这才能有得于心,才是真正的儒家学者。王阳明当是后者,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内外兼修。在教育方面,王阳明用他的一生践行了“知行合一”这四个字。李国钧认为美国著名学者狄百瑞对阳明学的研究堪称得其三昧,狄百瑞对王阳明的教育实践极为佩服,对王阳明曾有过一段持平之论:“最大的才干与其说是个哲学家、学者或官吏,不如说一直是教员。作为教员,就其学生的数目之多、师生建立的学派之众和当时教育思想的广泛影响来讲,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比得上他具有如此直接的个人影响。”^③王阳明一生均以弘扬“圣学”为己任,34岁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之时,便开始讲学授徒,直至57岁病逝。在他23年的讲学生涯中,6年在家讲学,17年在朝中、军中讲学,无间冬夏、始终若一。办学校、立书院成为他每到一地的“规定动作”,他的一生与若干书院和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被贬于贵州龙场,他先创建龙冈书院,后受聘为贵阳文明书院主讲;任江西巡抚时,他建立社学,大修濂溪书院;在绍兴、余姚,他先后承建稽山书院、阳明书院,并在龙泉山寺授课,可谓名噪一时;晚年被派到广西平定战乱,他创办思田学校、南宁学校、敷文书院,又可谓造福一方。王阳明的教育实践,不仅表明他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他措置裕如的办学经验和别具只眼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学知识的蕴蓄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陶行知在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一生中“所做”大于“所说”,更加认识到“行”的重要性,他的行动与文字相比蕴含着更深刻的智慧。按照当时对留学生的一种分类,一为文士派,只知读书,不管其他;二为尚外派,以为外国的一切皆好,中国的一切皆不足;三为流学派,随波逐流,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四为名誉派,沽名钓誉,滥竽充数,以为留学镀金,即可身价十倍;五为求学派,具改良之思,抱救国之念,专心向学,务求实得。按照这种分类,陶行知则属于最后一类人。他的大多数理论写作和公开言谈,都是为其行为作合理性解释与说明的。他并没有像鲁迅、胡适那样去全面深入地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而是凭着多年来积累的组织活动的经验以及他所体悟到的“知行合一”的智慧,进行了快速而准确的改革行动。

陶行知于1927年3月在南京郊外的乡村开办晓庄师范,在此期间,陶行知对他的生活教育思想进行了实践。晓庄学校的教学活动非常独特,实施的是真正的生活教育,是一种建立在儒家心学“知行合一”原则上的生活实践。在晓庄,没有专门的教师负责分门别类的课堂教学,只有指导员;没有呆板的上课制度,也不完全按照书本去讲课,而是把教学活动分成文学、教育、农艺、美术、科学、政治、乡村建设、医药卫生等各种小组,根据各组的研究需要,有的科目讲几个小时,有的讲两三周,有的讲三四个月或一学期。没有寒暑假,大家以校为家过一种集体生活,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一种新的乡村文化。经常有特约的校外专家、教授来晓庄指导学员们的“教学做”活动。在“教学做”活动中,学员们办公的办公,自学的自学,分管校务的处理日常工作。晓庄的大小校务都由学生轮流担任,从煮饭烧菜、买菜洗菜、担水劈柴,到收发文件、会计出纳、仪器保管、图书管理、农具整理、接待来宾等等,都分别实际练习。陶行知如果在晓庄,也一样会参加买菜烧饭、洒扫庭院。他经常在烧饭这件事情上,讲他“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这样,晓庄的学生都锻炼出很强的生活能力、

① 宋佩章:《王守仁与明理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7页。

② 邓艾民:《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110页。

③ 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91页。

自学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将教育与生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劳力上劳心,知行合一、知行本体,于行为的细小处见深刻的大义,在具体的事情中,做到“心中有理”“行中有道”。

(三) 传承精神,追求思想自由

在陶行知、胡适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眼中,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是自由。其最基本的自由观是“自由的目的在于使人自知本性,不受制于他人,同时又必须尊重异己者的自由,能容忍异己的意见”^①,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所说的“侵人自由与放弃自由,同为天下第一大罪”。陶行知在其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强调,真正的自由贵在自制自克,贵在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进化,这明显带有王阳明儒家心学的色彩。后来经过美国进步主义思想的洗涤,“五四”之后,陶行知高度推崇思想独立、个性自主和人格精神。产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包括自由、宽松的氛围,独立的人格精神,必要的生存凭借。在一次论《学生的精神》的演讲中,陶行知把“科学的精神”“改造社会必备的委婉的精神”和“坚强的人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并称为学生在新时代应当具有的精神。在另一次题为《学做一个人》的演讲中,陶行知把具有“健康的身体”“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职业”并称为一个完整而健康的人所必备的条件。

自由主义的批判态度是陶行知恪守的思想原则。从他对待孙中山的态度上,我们就能看出他所坚持的思想自由。陶行知钦佩孙中山,却并不因此迷信他。1924年8月,孙中山与广州商团发生冲突,下令扣压商团军械并通缉其首领,商团则以组织罢市的形式进行反抗。陶行知将自己的同情放在商团一方,肯定国民商团组织的合法性,希望以“提倡民生主义”为己任的孙中山能“爱护广州的商团”。随后,陈炯明在广东逼走孙中山,陶行知委婉而不指名地批评孙中山:“刚性的领袖,缺少度量,自取失败,丧失国家元气,至为可惜。”在教育领域,陶行知也推崇独立自主精神,主张教育应超然独立于党派之外,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对此,当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人鼓吹“党化教育”时,陶行知对这一行径予以了正面驳斥。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与进步主义有着密切关联,进步主义强调的教育的社会渊源和社会责任的思想,可能是推动陶行知前进的一个动力,并从知识根据上肯定了晓庄实验的正确与热情。但真正起核心作用的,可能还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儒家心学。儒家心学与陶行知所具有的基督教的救世情怀相结合,成为陶行知晓庄实验更为根本的推动力。^②陶行知开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意图不仅是办一所培养乡村教师的学校,而且是要通过办学解决祸害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的一整套问题。晓庄师范不仅成为传统的书本学习中心,而且也成为乡村管理、防止盗匪、农业研究、文化更新、经济复苏等中心。在陶行知的计划中,晓庄实验是把教育扩展为包罗一切生活,也就是作为“整体生活”的文化,使教育等同于生活,使生活等同于文化。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行动准则便成为了晓庄实验的核心和根基,同时以杜威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作为其知识依据,以基督教救世情怀作为推动力。陶行知最终将这三种不同的文化融会贯通于乡村生活之中,因地制宜地开创了晓庄师范这一新天地。

陶行知通过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接纳与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对当时社会发展与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作出了教育家的判断与实践。既是对教育理念的创新,也是为数不多的教育对“人”的成长的思考,知行合一,力做真人。陶行知的“知行观”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智慧结晶,应在还原其历史时空的基础上,探寻其时代特点。

三、陶行知“知行观”的时代特点

陶行知生活在新旧时代交替阶段,既接受了旧时代的儒学育化,也受到了新时代的知识涵养。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对陶行知影响颇深,他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结合时代背景与自己的教学经历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其过程与影响有着实践性、创造性和平民性的特点。

第一,实践性。陶行知的“知行观”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中国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着深刻体察,在研究和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因素和借鉴西方现代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其以实践为核心的观点。陶行知认为,“须将一个现代社会的生活或该有的力量,一样一样的列举,归类组成一个整个的生活系统,即组成一个

^① 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第176-184页。

^② 休伯特·布朗:《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载许美德、巴斯蒂等著,朱维铮等译:《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页。

用书系统”^①。陶行知将实践作为生活与教育之间的桥梁,基于生活教育提出“育才二十三常能”,包括洗衣做饭、种菜种花、打字开车等,这些都属于实践性活动。陶行知深受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提出“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的断语,又指出“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②的科学生活步骤,论证了“劳力”和“劳心”、“知”和“行”、“教”与“学”等矛盾关系的对立统一。在此基础上,他特别注重做,做就是“必有事焉”,要参加实际活动,在实际活动中做到思想和生活、理论与实践相联系。陶行知认为,教与学要真正地发挥实际效用,就要使其在生活实践中得到统一。陶行知是一个毕生注重实践的教育家,“极端重视实践。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精神,是使他的事业与思想不断往前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他坚决反对教条,反对束缚人们头脑的腐朽东西,他的战斗口号是‘打倒裹头巾’”^③。所以,实践性是陶行知知行观的首要特点。

第二,创造性。创造性是陶行知思想体系的一大特点,不仅体现在教育方面,也体现在其知行观的形成上。陶行知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批判性地吸收了西方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等思想。他说:“‘教育即生活’这句话,是从杜威(John Dewey)先生那里来的,我们在过去是常常用他,但是,从来没有问过这里边有什么用意,现在,我把他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④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生活力、自动力和创造力,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知行观,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学说。同时,他提倡“创造新自己,创造新中国,创造新世界”。在践行自己的知行观的过程中,他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如1927年3月开办了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主张。创造性的思想和实践奠定了陶行知“知行观”的创造性。

第三,平民性。《易·系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陶行知一生都在用他所体悟的“道”,为中国社会下层民众和乡村农民谋福利,推动教育下移,解决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生存问题,这是陶行知的伟大之处。陶行知除了有为天下人谋福利的志向,还将进步主义所倡导的科学、民主作为切实可行的工具,而其核心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陶行知所体悟的“道”是为人民服务的“道”,用陶行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大道”上,武训的为人及做事,可能是一个更具体、更生动地影响陶行知行动的焦点,这一焦点汇聚了基督教、儒家心学和进步主义的因素。深入探讨陶行知和武训的关系,可能会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陶行知的“平民性”。陶行知在《生存圈边》一文中提出,“人类的社会好比是一个圆圈,这圆圈我称它为生存圈。有些人是安安稳稳的住在圆圈的中心,叫做生存圈心的人;其余的是人山人海的拥挤在圆圈的边沿,叫做生存圈边的人”^⑤。陶行知作为一个生活在生存圈心的人,他没有向胡适那样,指望能够在乱世找到一扇可以逃逸的门,进入一间高高在上的安宁的房间,像上帝那样眺望那些在没有方向的围城中挣扎的男男女女。所以,平民性的陶行知“知行观”的基础特性,是其思想存在的土壤。

当前中国教育处在转型期,面临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建设教育强国、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时代任务,需要一批知行合一的务实理想者与实干家。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更加注重知行合一”。陶行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接纳与改造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自己的“知行观”,对当今教育和生活仍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从改革观念层面看,教育要符合人民大众的需求,坚定以人为本的教育改革方向;从改革实践层面看,教育改革需要敢于打破传统思维,勇于尝试,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从教育思想看,陶行知的“知行观”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相呼应,教育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继续产生引领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思潮,如实践育人、劳动教育等;从教学层面看,陶行知所主张的“教学做合一”“艺友制”等仍有继续存在的教学空间,用实践驱动知识,用行动革新教学。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需要继续加深对“知行合一”的认识、对生活教育理论的理解,学习陶行知探索、求真的精神,构建具有包容性的知行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直面真实的生活世界。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对:刘倩)

①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7-178页。

②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40页。

③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纪念陶行知》,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④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⑤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构建普适开放与人事兼容的陶研谱系

——《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简评

潘 标

(浙江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陶行知研究”是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成果纷呈,力作迭出。经“学术谱系”钩连,学界可见灿烂的学术图景与其外的学术空地。围绕2018年底出版的《承继与嬗变》,分别讨论其作为“研究的研究”之若干独到史学方法与学科关联意识,烛幽索隐之学术功力,及内在的指引后续研究之学术特质。在学术谱系研究中,学者应自觉避免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作简单粗暴的封闭式研究,而应从历史深层的社会脉络出发,更加有效地寻求不同群体之间的承继关系。

关键词:陶行知研究;学术谱系;人事兼容

中图分类号:G40-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07-03

陶行知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开创性研究和伟大贡献。又因其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进行大量教育实践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被后人不断研究。由于陶行知本人涉及领域甚广,因此,陶行知研究也吸引了历史学、哲学、教育学、文学以及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迭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陶行知研究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它所经过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同时代的其他教育家研究中是比较突出的”^①。

陶行知研究学者群规模庞大,涉及面甚广,却未经学界梳理与阐释,其内在机理与核心学术理念的传承脉络不被外界所知晓。换言之,陶行知研究的繁荣与不断向纵深延拓亟须呼唤“研究之研究”。以此而言,刘大伟的《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②对学界,尤其对陶行知研究学者群而言,无疑如春霖润田般必需与及时。

由于《承继与嬗变》一书为陶行知研究学术谱系中的拓荒之作,无法进行横向之比较。因此,本文拟分三个部分仅就此书内容和方法展开分析,分别讨论“人”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及“人事”在此书中的有机融合,此书的主题开放性与广阔的再研究空间,及由此而来的想象与求证史学方法在书中的充分体现。

一、人即是事:人与事的高度融合

中国传统史学是人的历史,非常注重人的因素。如以“六经皆史”观点看,则从《尚书》到《左传》,中国的历史叙事完成了从事到人的转变。《史记》以后,更可以认为是人的传记,《史记》即有所谓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之说。但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史学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即所谓人的消失。布罗代尔认为“个人是命运的囚徒,他们试图影响事件发展进程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在他的著作中的‘主角’菲利普二世更多的是一个‘反主角’,完全无力改变历史的进程”^③。福柯认为“上帝之死与人之消灭

收稿日期:2019-02-24

作者简介:潘标,历史学博士,浙江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

① 李庚靖:《中国陶行知研究80年概述》,《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74页。

② 刘大伟:《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③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77页。

并无区别”^①。受此影响,梁启超批评了以个人为单位的二十四史,他认为,叙述、褒贬都应该以团体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公理公例之所在”^②。

当然,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史学,虽然排斥人的因素,尤其是个人因素,但是其分析历史的走向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如何将人与事很好地结合起来,运用于历史研究中,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既不是要回到《史记》去,研究纯粹的人的历史,但也不能只讲事件,忽略人的因素。而是如何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论证历史才能显得更加科学与深入,而目前史学界恰恰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缺乏这样的力作。《承继与嬗变》则是近年来鲜见的这方面的佳作。甚或可以说,此书是人事高度融合的作品。作者自己在绪论里所说,他的写作方法是“摒弃中国传统史学中‘见事不见人’的研究思路”^③,这当然是对的。但同时必须指出,此书的价值并非仅限于此,作者有意自我掩盖了此书的另一突出特点,即在重视人之外,此书将人与事高度融合在了一起。随意翻开此书,到处可见陶行知研究学术谱系中一个个鲜活的“人”,这些“人”的学术活动与背景,也成为作者重要的研究对象。作者正是在这些人与这些事的交融研究中,书写了一部具有高价值与开创性的佳作。这既是学术谱系这一特殊研究对象所决定,也是作者的学术自觉所致。

二、主题的开放性:广阔的再研究空间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论及什么是经典的文学作品时说:“经典作品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能带来发现的书籍;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④因此,所谓文学经典应当具备两个明显特质:一是普适性,即能够揭示出人类共通与恒久的本性,所以不因时间所限,初见如重温;二是广阔的再创造空间,因此之故,再读也能激发读者之新想象、新思想。历史研究也是,选题的普适性才能造就后学的广阔再创造空间,研究才具有深厚的价值基础。

英国著名的晶体物理学家、当代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认为,“课题的形成和选择,无论作为外部的经济技术要求,抑或作为科学本身的要求,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复杂的一个阶段。一般说来,提出课题比解决课题更困难,所以评价和选择课题,便成了研究战略的起点”^⑤。陶行知的伟大造就了璀璨的学术群体,这个学术群体的研究成果又催生了《承继与嬗变》的问世。因此,选择陶行知研究学术谱系作为研究对象,是有着深厚基础与学术前提的。换言之,《承继与嬗变》是陶研学人学术自觉共同推动的成果。

就学理层面而言,所谓广阔的再研究空间是一个个不断连续的节点。作为“研究之研究”,本书很好地将陶研学人按谱系进行编排论证,呈现了前期学术研究再研究的广阔空间,是前期陶研学人的一个后置节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厘清了陶研历史脉络。作者为我们呈现了陶行知身前身后不同陶研学人对陶不同的看法,并分析这种不同看法的政治社会因素,使得学术的视野从单个零碎的研究中跳出,整合梳理后形成系统性的结论,陶行知的研究与陶研学人也得以多维度立体式展现。二是钩沉陶研成果,谱就学人谱系。在西方,“谱系”本是生物学专有名词,随着近代社会科学的发展,逐渐被社会科学学者所借用,进而形成一种学术门类。《承继与嬗变》一书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在梳理陶研学人谱系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证了谱系之间的嬗变逻辑发展脉络,以及这种脉络与逻辑的社会与政治原因。而作为后续陶研学人的前置节点,《承继与嬗变》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主题。大到国家民族,小至家庭个人,教育是永恒的命题。陶行知又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的研究必然是一个无法休止的研究乐章。《承继与嬗变》作为学术谱系研究的开拓性著作,必将随着陶研的不断深入而为后贤赓续,烛照陶研前行之路。

三、大胆想象与小心求证:口述与文本的逻辑关联

在史料充分的基础上,历史的研究无法离开大胆地想象。余英时认为,“历史想象实为历史家不可或缺

① 王明辉:《何谓哲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②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8页。

③ 此处作者所说的中国传统史学,笔者认为近代新史学以来倡导传统史学一派,而非近代以前之传统史学。

④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上海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⑤ [英]贝尔纳:《科学的科学》,《研究》1955年第12期。转引自林定夷:《问题学之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页。

的要素。盖历史材料无论其为器物或文字都是有限的,其本身不能单独地显现出历史全貌,而史家之所以能在有限的遗迹中讲出古史之大体情形者,端在其具有此种想象力”^①。意大利历史学家沙耳非米尼也认为,“史家有一个曲折的迷津,在他的前面,有许多断片,已经消失殆尽了。这些缺陷,仅能借他的想象去填补”^②。虽然这种合理的想象遭到后现代主义的大力抨击,作为回应,历史的研究毕竟还有小心求证,即文本史料的运用与考证。所以说,历史的研究依靠史料的小心求证与历史学者的大胆想象。而这两点,在《承继与嬗变》中体现得非常充分。

关于大胆想象,比如在研究开拓期的华东学人时,对于张文郁有如下描述,“尽管并非陶门弟子,但张文郁对陶行知的尊崇之心却丝毫没有减弱,矢志不渝地保持着对陶氏教育理论的信服”^③。作者并没有对张文郁做过访谈,以上描述显然为基于相关史料所作的大胆而合理的想象。寥寥平常数语的印象,并非多余闲散之笔,而是作者刻意之布局,即通过文本证据外的想象,“刻画”陶研学人对陶行知爱之切,而唯有爱之切,方能以同情之想象实现知之深,知之深,则研究自然直透陶行知本真,这对研究陶研学术谱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深化作用。

小心求证方面,尤显出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求证主要基于史料而言。史料种类很多,诸如器物遗存、档案碑刻、书信日记、口述史料等,而“史料鉴别又必是精华所在”^④。所谓史料鉴别,即是史料求证之硬功夫,这在《承继与嬗变》中也是俯拾皆是。

体现之一,就是口述与文本的互证。

如在研究陶研学人章开沅时,作者对其进行采访,以其口述史料表明,陶行知是章开沅的两个榜样之一。那么,有没有别的文本史料作为旁证,说明章开沅确实是倾慕陶行知,从而走上陶行知研究之路?作者在一处用了章开沅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章开沅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发表《陶行知与武训》一文,批评学校电化教育馆只制作关于武训的幻灯片而忽略了功绩更大的陶行知”^⑤。此外,作者在另一处用了另一陶研学人余子侠的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论文详细阐述了余子侠在章开沅的影响下,如何走上陶行知研究之路的情况。“自留华中师大任教后,我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第一个学术领域,就是恩师(章开沅)牵头的陶行知系列研究,所以我平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陶研’方面的文章。”^⑥以上史学方法与论证思路,充分体现了作者以多种史料互证,以达信史目标的学术素养。

体现之二,就是将文本史料与口述史料作了有机融合。

口述史料属于三亲史料,有着文本史料不可替代的鲜活性。加之《承继与嬗变》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作者又基于锐意打破当代人不写当代人之禁锢,口述采访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根据笔者统计,全书进行过口述采访的陶研人群体中,有章开沅、胡国枢、童富勇、金祥林、董宝良、李刚、储朝晖、夏德清、周洪宇、喻本伐、熊贤君、胡克坚、蔡幸福、姚渝生 14 位之多。这 14 位陶研学人遍及各个谱系,甚至遍及海外。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将口述史料与文本史料有机融合,在采用口述史料基础之上,辅以太陶研学人本人的研究成果,两方面论证作者的相关观点。这种史学方法得出的结论,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在陶研学人学术谱系研究中,并未将各谱系作割裂封闭式考察,而是基于某些共同的学术脉络与发展逻辑,在分析不同时期学术环境的基础上,将各谱系按照一定的学术传承进行互为论证式的分析,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璀璨的陶研人群体图景。

虽然学术谱系的研究并非学术界新鲜事物,在目前可见的出版物中,就有医学、农学、哲学、文学等成果,但教育学领域的谱系研究不多。通观《承继与嬗变》,可以得出一个中肯的结论,此书已为陶研学术谱系作了很好的开拓性研究,也必将给后续研究形成深远的影响与提供广阔的主题;而其具有的多方面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以及实现创新的路径选择,也为学界提供了有益的学术思考。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对:刘倩)

①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6 年版,第 244 页。

② [意]沙耳非米尼著,周谦冲译:《史学家与科学家》,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29-30 页。

③ 刘大伟:《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第 131 页。

④ 王尔敏:《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7 页。

⑤ 刘大伟:《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第 197 页。

⑥ 刘大伟:《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第 231 页。

南朝的“士庶天隔”新探

杨恩玉

(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南朝社会“士庶天隔”的“士庶”,应指士族与庶民,而不是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士庶之别体现在士族享有任官、就学、免役、免商税、荫客、占田、占山、免肉刑,以及士庶不婚和车服异制等方面。西晋以来士庶之别逐步形成,东晋时“士庶天隔”的局面基本定型。士族的占田、荫客、免役、免商税等特权从经济上,九品官人法在政治上,士庶车服异制和互不通婚从社会生活上,这诸多因素造成“士庶天隔”。南朝时由于士族的衰败和庶民的崛起,策试入仕制度和官班制的实施,庶民通过窜改户籍、与士族婚媾、建立军功、经济实力的增长、文化修养的提高等途径,导致士庶的界限日益消解。

关键词:“士庶天隔”;士庶;特权;形成;消解

中图分类号:K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10-07

南朝社会阶层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士庶天隔”。对于这一社会现象,学者主要从士庶交往和士庶政治势力的消长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①但“士庶”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对这个基本问题学术界还存在很大分歧。“士庶天隔”的表现有哪些?这一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逐步消解的?对于这些重要问题,学者们虽然有所论及,但还未见到系统的专题研究,本文拟就以上四个问题略作探讨。

一、“士庶”的含义辨析

对于“士庶天隔”的“士庶”,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见解。1. 学者普遍认为是指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例如,何兹全先生说:“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最足以反映这时期门阀地主和一般地主在身份上的划分。‘士’是指门阀世族,‘庶’是非门阀地主。”^②刘静夫先生将士族与庶族对举,认为“庶族主要是指无特权的的地主和商人。”^③《词源》“士庶”的第二个含义是:“士族与庶族。从东汉开始,在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的世家大族叫士族,不属于士族的地主阶级叫庶族。”^④2. 祝总斌先生认为:“士庶之‘庶’,即庶人、寒人、小人”^⑤。汪征鲁先生也认为,“庶是指庶民,是指寒门、单家”^⑥。李琼英先生说:“所谓士庶,士是指士族、世族,是当时的特权阶层;庶是指庶民,又称寒人,家世无官宦……在政治经济上不享有任何免役免税特权。”^⑦3. 陈琳国先生认为,“‘士庶’连称,在当时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士大夫与庶民,即官吏与百姓……第

收稿日期:2019-03-25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古社会阶层变迁研究”(15BLSJ01),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社会阶层研究”(17BZS009)。

作者简介:杨恩玉,青岛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① 如王铿和李琼英两位先生的研究,否定了士庶之间不交往、不同坐的认识(参见王铿:《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士庶天隔”》,《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李琼英:《两晋南北朝时期士庶关系考察》,《社会科学家》2003年第3期)。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士庶之间的区别还有哪些?这些差异是怎样形成的?又是如何逐步消解的?这些问题尚需探讨。

② 白寿彝总主编,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③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0页。

④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6页。

⑤ 祝总斌:《秦族、庶族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⑥ 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⑦ 李琼英:《两晋南北朝时期士庶关系考察》。

二种含义是指士族和寒门”^①。4. 韩雪先生提出:“所谓‘士庶之际’,是士族与士族以外的人的区别,也是士族内部高门与寒门的贵贱之别。”^②详加考察,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现对此略作考证。

“士庶天隔”出自《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要探究“士庶”的含义需要从此入手。在一次朝会上,六位官员讨论小人犯罪同符伍的士人是否连坐,以及是否需要将“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改为“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降以补兵”。尚书左丞江奥说:“士人……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尚书右丞孔默之则认为:“君子小人,既杂为符伍,不得不以相检为义。士庶虽殊,而理有闻察……”显而易见,“士庶”指“君子”与“小人”。由于“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就指统治人民的统治阶层,“小人”则指从事生产劳动、被统治的平民百姓。卫将军王弘议论说:“诸议云士庶緦绝,不相参知,则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许不知,何许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简独,永绝尘秕者,比门接栋,小以为意,终自闻知,不必须日夕来往也。”^③这里更明确说明,“士庶”分别指“士人”与“庶民”“小民”,即平民百姓。所以“士庶”又可以称为“士民”^④。正因为如此,当时人经常将士大夫与庶民对举。建平王刘宏的中军录事参军周朗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⑤

“士庶”的“士”所指的士人、君子,是不是所谓的士族呢? 回答是肯定的。“士人”又被称之为“士大夫”“士流”,即士族。宋孝武帝“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士人怨之。”^⑥“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⑦士族可以荫佃客和衣食客,享有免役特权。因此,这里的“人士”“士人”,都指士族。会稽名门孔觊,其弟道存、从弟徽,借作地方官之机经营商业,孔觊责备他们说:“汝辈忝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⑧“士流”即士人、士大夫。北齐的郑州刺史库狄伏连,“专事聚敛。性又严酷,不识士流。开府参军多是衣冠士族,伏连加以捶撻,逼遣筑墙。”^⑨此处的“士流”与“衣冠士族”相一致,这更明确说明史书所说的士人、士流就指士族。因而当时的“士庶”指士族与庶民。

朱大渭先生提出:“魏晋以来常讲的‘士庶之别’,是指士族地主和庶民(不单指庶民地主)的区别……因为庶民中既有地主,也有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从国家法权上讲,士族与庶民地主的界限是极为严格的,所谓:‘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士庶天隔’,实际上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⑩朱先生对士庶的两个诠释,前者是正确的,后者似乎不妥。魏晋南北朝史书所说的“士庶”,其含义是一致的,都指士族与庶民。魏明帝“舍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⑪这里的“吏”指官吏,“士庶”与“吏民”对举,含义基本一致,泛指士人(包括官吏)与庶民,是全国人口的统称。普通庶民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所以上书“文辞鄙陋”。都督兖青等六州晋陵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王恭,“不闲用兵,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⑫此处“士庶”的“庶”就指上文的“百姓”,他们是服徭役的人,即需要服役的庶民,包括没有免役特权的庶民地主。《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建元元年(479)十月辛巳诏中说:“末路屯夷,戎车岁驾,减藉时来之运,实资士民之力……若四州士庶,本乡沦陷,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可听州郡保押,从实除奏。”这里的“士庶”与“士民”含义完全相同。“士庶”指所有在籍人口,包括士族与平民百姓即庶民。士庶的含义直到唐代依然如此。《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记刘芳曰:“(隋)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此处的“庶人”即庶民,士族与庶人对举,统称士庶。唐长孺先生说:“门阀贵族被称为士族,此外便都是寒门或庶族。因而士庶之别一方面是阶级区分的等级形式,所有一切被压迫阶级都是庶族、寒人;另一

① 陈琳国:《庶族、素族和寒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② 韩雪:《略述南朝士庶政治势力之消长》,《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③ 《宋书》卷四二《王弘传》。

④ 《宋书》卷七四《鲁爽传》,“士民皆为尽力”。同卷《沈攸之传》曰:“士民畏惮,人莫敢欺”“诸葛诞矜其待士爱民之德”。又卷九二《陆徽传》,为广州刺史,“为士民所爱咏”。此例甚多,不胜枚举。

⑤ 《宋书》卷八二《周朗传》。

⑥ 《南齐书》卷二七《刘怀珍传》。

⑦ 《南史》卷五《东昏侯纪》。

⑧ 《宋书》卷八四《孔觊传》。

⑨ 《北齐书》二〇《慕容俨传附库狄伏连传》。

⑩ 朱大渭:《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3-115页。

⑪ 《三国志》卷三《魏明帝纪》裴注引《魏书》。

⑫ 《晋书》卷八四《王恭传》。

方面又是统治阶级内部上下层的等级区分,不管是原有的地方豪强,新兴的各样地主在他们没有取得士族称号以前也只能是庶族、寒人。”^①唐先生的观点如实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只是将庶民称为庶族似乎不妥,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庶族的基本含义是庶姓,而不能等同于寒门”^②;即“与宗室对举之庶族,指的是异姓大臣或高门”^③。

二、“士庶天隔”的表现

南朝时期“士庶天隔”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通常认为的士庶之间不交往、不同坐,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不能成立。^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指出:“在六朝时代,社会划分为士和庶两大阶级。士族的特权……第一是任官权,第二是就学权,第三是免役权。”西晋设置太学与国子学,国子学招收士族,太学招收庶人。^⑤萧梁在国子学与太学之外设置了五馆,“国子学招收贵族与上层士族子弟,太学生局限于下层士族子弟”,五馆招收“寒庶子弟”^⑥。士庶之间在入学资格上泾渭分明。众所周知,汉代最基本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被荐举者需要通过策试才能正式任官。汉魏之际吏部尚书陈群创立的九品官人法,则让官僚子弟和士人通过中正的品评后就可直接入仕,不需要考试。久而久之,士族子弟仅凭借门第、血统就能入仕,而且他们“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从而形成了任官权。也就是说,士族世代做官,而庶民世代从事体力劳动,形成等级森严的身份性社会,即“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⑦。这样庶民就丧失了入仕的权利,所以赵翼评论说:“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⑧即使庶民要担任卑微的胥吏,在年龄上也受到严厉限制和严重歧视。萧齐时“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⑨。庶民担任卑贱的胥吏,年龄要比士族大10岁。

士族的免役权分为免劳役和兵役两项内容,这在南朝都有明确的记载。萧齐的东中郎长史、行会稽郡事顾宪之说:山阴县“凡有贵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⑩即士族享有免除劳役的特权,只有庶民才负担徭役。士族官僚公然宣称:“士人既终不为兵革”,因为“士人,可杀不可谪”^⑪。政府如果强制他们服兵役,就会遭到他们的激烈反抗。《宋书》卷八二《沈怀文传》:宋孝武帝“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制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莫不奔窜山湖,聚为盗贼。”士族免役的特权根深蒂固,朝廷无力扭转乾坤。《梁书》卷五十一《沈颀传》:“天监四年,大举北伐,订民丁,吴兴太守柳恽以(吴兴武康人沈)颀从役,扬州别驾陆任以书责之,恽大惭,厚礼而遣之。”沈颀本人并没有官位,其父沈坦之仅官至都官郎,但他属于士族,虽然门第并不高,却享有不服兵役的特权。由于朝廷要大举北伐,太守柳恽要征发沈颀服兵役,受到陆任的责备后,“厚礼”送沈颀回家,乃由于士族免役的特权不能违背。士族的这一特权由来已久。《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后赵“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戎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作为旧族的士族,原来就享有这项特权,由于政局的动荡暂时丧失了,现在是恢复其免役权和入仕权。

士族除了以上三项特权外,士庶之间的差别还有如下几项。士族与庶民在制度上有明确的分界线,即“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⑫由此可知,士族与庶民的分界线是乡品二品,二品以上都属于士族,三品以下则属于庶民。汪征鲁先生认为:“将低级士族、平民知识分子称为寒微士人、寒素,其分别具有乡品三品至九品的品级。”^⑬这一观点可能不妥当。官班制的流外七班是“位不登二品者”担任的官职,即

① 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

② 陈琳国:《庶族、素族和寒门》。

③ 祝总斌:《素族、庶族解》。

④ 王铿:《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士庶天隔”》;李琼英:《两晋南朝时期士庶关系考察》。

⑤ [日]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0-151页。

⑥ 杨恩玉:《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1页。

⑦ 《晋书》卷九二《王沈传》。

⑧ 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卷八“九品中正”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⑨ 《梁书》卷一《武帝纪上》。

⑩ 《南齐书》卷四六《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⑪ 《宋书》卷四二《王弘传》。

⑫ 《宋书》卷九四《恩倖传》。

⑬ 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第416页。

“寒微士人”^①。因而“寒微士人”属于二品以下的庶民知识分子,不包括低级士族在内。南朝时的低级士族,例如上文所述的沈顗,其乡品也应是二品,庶民知识分子的乡品才是二品以下。

占田权和荫客权。据《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西晋规定:“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命中武贲武骑一人。”由“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可知,不仅是品官,所有的士族都可以依据乡品的高低占田和荫客。东晋继承西晋的制度,继续推行荫客制。《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第四品三十户。第五品二十五户。第六品二十户。第七品十五户。第八品十户。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其典计,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参军、殿中监、监军、长史、司马、部曲督、关外侯、材官、议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数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举辇……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客皆注家籍。”士族庇荫的佃客、典计和衣食客,为士族耕田种地、奔走效劳,他们的户口登记在士族家的户籍上,享受与士族一样的特权,即不服徭役。士族占有众多的田地,就需要大量的佃客来耕种,因而其占田权和荫客权密切相关。这两项制度在南朝继续实施。士族拥有荫客权就享有剥削他人的权利。萧齐的黄门郎虞玩之在上表中说:庶民“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②。这就深刻揭示了士族与庶民在阶级性质上的本质差异。庶民地主依靠其经济势力占有的佃客,是非法的,史书称之为“隐客”,与士族合法的“荫客”不同。

占山泽权。《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附兄子希传》:刘宋时,“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事实上,高门士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和人力占山钶泽没有限制,庶民只能望洋兴叹。《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谢)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会稽太守孟)顗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峒崕湖为田,顗又固执。”陈郡谢灵运父祖留下来的产业已经很丰厚了,但他仍然欲壑难平,到处“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他的行为不仅没有遭到宋文帝的阻止,反而得到他的支持。这个事例突出反映了门阀士族的贪婪和封山占水的猖狂。

免商业税权。《南史》卷七七《沈客卿传》:“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由于士族没有商业税,所以纷纷召集人手,从事商贩活动。刘宋初的太子左卫率“(向)弥治身俭约,不营室宇,无园田商货之业,时人称之。”^③向弥不经营商业,是凤毛麟角者,所以受到史家的称赞。

士庶不婚。由于士族和庶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士族内心产生一种优越性,将庶民视为卑贱的群体。即“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④士族为了划清与庶民的等级界限,为了保持贵族身份和地位,拒绝和庶民联姻,而只与门第相当的士族通婚。即士庶之间“秦晋有匹,泾渭无舛”。出身士族的王源与庶民满氏通婚,被视为“姻娅沦杂”“实骇物听”,因而被御史中丞沈约弹奏,“免所居官,禁锢终身”^⑤。

士庶车服异制。《晋书》卷九〇《王宏传》:“太康中,代刘毅为司隶校尉,于是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纈。”这是早在西晋时的制度,东晋南朝无疑更为严厉。萧齐时,“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皆簪白笔。”^⑥“二品文官”指出身士族的官员,他们“皆簪白笔”,是为了与出身庶民的官员相区别。

士族在刑罚上享有诸多特权。1. 士族在同伍连坐上享有特权。卫将军王弘说:“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谪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有,故不尽亲谪耳。”这就造成“今谓之士人,便无小人之坐;署

① 《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

② 《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

③ 《宋书》卷四五《向靖传》。

④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六〇引《寒素论》,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987页下栏。

⑤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朝注文选》卷四〇沈约《奏弹王源》,中华书局2012年影印版,第745页上栏-747页上栏。

⑥ 《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

为小民,谪受士人之罚”的不合理的状况。因而在王弘的建议下改为庶民犯罪,同伍的士人“罪其奴客……无奴客,可令输赎”^①。在元嘉前期之前,同伍犯罪律令并没有士人不连坐的规定;但事实上士族的连坐罪常为朝廷豁免,从而造成庶民犯罪同伍的士族不连坐,而士族犯罪同伍的庶民要连坐。这种状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惯例,士族获得了连坐的豁免权,例如在山阴县,《王弘传》:“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修改后的律令规定,庶民犯罪同伍的士族由其奴客承担连坐罪,没有奴客者缴纳赎金。而士族犯罪,同伍的庶民仍要连坐。士族仍然享有特权。2. 士族享有免肉刑权。宫崎市定先生指出:“大夫以下的士阶层如果有过失,理应受到杖罚,杖罚之后便一笔勾销,这大概是汉代一般的观念。随着贵族主义的发达,这种做法被取消了。但是,对令史的杖罚却一直保留下来。”^②对令史要执行杖罚,是因为令史出身庶民。而士族的肉刑一般得到豁免。《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陆)澄在官积前后罚,一日并受千杖。”陆澄一天之内被处罚一千杖,丝毫不担心,因为这徒有虚名,事实上并不执行。偶尔有严明的皇帝对士族官僚执行肉刑,就会遭到官员的反对而被迫停止。《南史》卷一八《萧思话传附萧琛传》:“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萧)琛乃密启曰:‘……从来弹奏,虽在空文,而许以推迁。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停息……其应行罚,可特赐输赎,使与令史有异,以彰优缓之泽。’帝纳之。自是应受罚者,依旧不行。”3. 犯同样的罪,对士庶的处罚迥然不同。《南齐书》卷五六《吕文度传》:“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昭明太子萧统,“见后阁小儿摊戏,后属有狱牒摊者法,士人结流徙,庶人结徒。太子……令注(庶人)刑止三岁,士人免官。”^③相同的罪行,对士族的处罚远远轻于庶民,无论是在职官员,还是未入仕者。在刑罚上士族享有的诸多特权,其理论依据就是先秦的“刑不上大夫”这一思想的复活,是魏晋以来贵族制的必然产物。

由上文所述可知,士庶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区别。在律令上起初并没有士庶之别,但在事实上士族享有豁免权;后来士族在刑罚方面的特权合法化、制度化。

三、“士庶天隔”的形成

萧梁的尚书左仆射沈约认为,在“汉代,本无士庶之别”^④;《宋书》卷九四《恩倖传》曰:“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在汉代,士人的子孙没有文化修养和才干,不能入仕为官就沦落为庶民,庶民的子孙勤奋好学就上升为士人,二者之间是流通的,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按照沈约的观点,士庶之别是魏晋以来逐步形成的。萧梁的鸿胪卿裴子野说:“迄于二汉,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士庶虽分,而无华素之隔。有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高士,犹侧清涂,降及季年,专称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所论必门户,所议莫贤能。”^⑤按照裴子野的看法,士庶之别是西晋以来逐步形成的,西晋末年形成门阀社会。详加考察,裴子野的观点可能更符合实际。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六月的诏书中说:“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⑥。这说明西晋初期,出身庶民者只要道德操行优异,仍然可以入仕为官。“左思父雍,起卑吏,晋武以为能,擢为殿中侍御史。”^⑦左思妹“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武帝闻而纳之。泰始八年,拜修仪。……后为贵嫔,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⑧左思的父亲原来是卑微的小吏,因为才能突出,晋武帝直接提拔他为殿中侍御史。左思之妹左芬因为文才出众,被晋武帝娶进后宫,后来晋升为贵嫔。这些事例足以说明,西晋前期士庶之别虽然逐步形成,但二者之间的分野还没有固化。西晋末年,特别是东晋以来,才形成注重门第、忽视贤能的社会风气,门阀社会基本确立。

要分析士庶界限扩大的制度原因,九品官人法首当其冲。州郡中正都由高门士族担任,因而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晋书》卷四八《段灼传》:“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即“应该根据各人才德

① 《宋书》卷四二《王弘传》。

② 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第177页。

③ 《南史》卷五三《昭明太子萧统传》,第1312页。

④ 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六《选举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8页。

⑤ 《通典》卷一六《选举四》,第389页。

⑥ 《晋书》卷三《武帝纪》。

⑦ 《北堂书钞》卷一〇二《赋》引王隐《晋书》,学苑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2册第145页下栏。

⑧ 《晋书》卷三一《左贵嫔传》。

授予的乡品,由于贵族主义的盛行而变成根据门第的高下授予。”^①高官显宦的子孙获得较高的乡品,低级官吏和没有官位的士人,其乡品总是较低,从而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在西晋前期遭到官员们的大力谴责,说明它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曹魏和西晋初期,“乡品二品不容易取得,一般为乡品三品”;后来由于贵族主义盛行,出现“乡品膨胀的倾向……东晋时代,来自北方的流寓贵族和土著贵族的子弟,似乎一概授予乡品二品”^②。即东晋时期就形成了“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的局面。士庶之间的鸿沟固定下来。

西晋以来,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制度,士族官员依法享有占田、荫客、免役、免商税等特权,这些特权在经济上造成“士庶天隔”的局面;而士族的受教育权和九品官人法的入仕权,在政治上造成“士庶天隔”的形势;士庶车服异制和互不通婚等制度从社会生活方面扩大了二者之间的分野。虽然“士庶天隔”的记载出现于刘宋,但这种局面应该在东晋就基本定型。

四、“士庶天隔”的消解

从西晋以来“士庶天隔”的局面逐步形成,这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消解过程更加漫长而艰难,其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其根本原因则是门阀士族的日趋衰败与寒庶阶层的日益崛起。

由于士族凭借九品官人法和门第就可轻易入仕,并且“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由于玄学思潮的深刻影响,官员崇尚“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这种放达、无为的社会风尚导致政治日趋腐败。《梁书》卷三七《何敬容传》:“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士族由于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的诸多特权,养尊处优,日益堕落,东晋末年就丧失了军事指挥权,刘宋时开始逐步丧失政治才干,于是皇帝不得不起用寒庶阶层的人。萧齐的寒人“(刘)系宗久在朝省,闲于职事。明帝曰:‘学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③齐明帝的话突出反映了士族的腐败无能与庶民兴起的社会现实。

由于“士庶天隔”,士族又称“仕流”,他们世代为官是天经地义的,庶民则从事劳动,供养士族。如果偶尔有几个出身庶民的人因缘际会跻身仕途,就会被视为另类而被称之为“恩倖”,意思是他们获得了非分的职位,这不合乎朝廷的典章。庶民获取官位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军功,其次是个人才干与皇帝的恩宠。根据天监四年(505)正月梁武帝的诏令,“士族子弟要想在三十岁之前入仕,必须精通一门儒家经典,办法自然是通过考试及第;如果要按照原来的老办法凭借九品官人法与门第直接入仕,需要年满三十岁方可。”^④这有力抑制了士族的直接入仕,同时寒庶子弟也可以通过经学策试入仕。当时,“士族从流内十八班起家,寒微士人即具备了士人条件的庶民从流外七班起家,寒人即一般庶民则从三品蕴位与勋位起家”^⑤。在起家制度上,虽然士族享有优越性,寒士和普通庶民处于劣势。但制度规定,“寒庶人士不仅可以从流外七班升至流内,而且可以从低微的胥吏升迁至流内”,官班制从而“为寒庶阶层的入仕与升迁打开了通道”^⑥。通过策试入仕制度和官班制,寒庶阶层的人获得了入仕权,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士族和庶民在入仕制度上由原来的天壤之别,日益拉近了距离。

由于门阀士族享有诸多特权,引起庶民的羡慕和嫉妒,富裕的庶民特别是一些富商、土豪,通过贿赂官员,将户籍上的庶民改为士族。即“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⑦大量的庶民通过窜改户籍变为士族,导致国家服役人口大量减少,为此政府不断“检定簿籍”。查出的伪造户籍者,政府责令限期改回原来的户籍,百姓怨声载道,从而导致了萧齐时的唐寓之农民暴动。在农民武装斗争的强大压力下,政府被迫承认,“自

① 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第154页。

② 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第142-143页。

③ 《南齐书》卷五六《刘系宗传》,第976页。

④ 杨恩玉:《萧梁经学生策试制度考辨》,《东岳论丛》2014年第9期。

⑤ 杨恩玉:《萧梁官班制的形成考论——以流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为中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第197页。

⑥ 杨恩玉:《官班制的性质、编制标准与作用考论》,《史学月刊》2012年第10期;《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第152-153页。

⑦ 《通典》卷三《食货志三》,第59-60页。

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①。庶民窜改的户籍获得政府的认可。通过窜改户籍,相当一部分庶民在户籍上变成了士族。

本来士庶不婚,但有些士族由于政治上落魄或在经济上拮据,为了谋生或贪图钱财而主动与庶民联姻。《陈书》卷三三《王元规传》:太原晋阳人“(王)元规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元规泣请曰:‘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辄婚非类!’母感其言而止。”在婚姻关系上,士族将庶民视为“非类”,二者联姻士族视为奇耻大辱。但士族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类似王元规固守士庶不婚的人固然存在,但已经是凤毛麟角,所以受到史家的表彰而载入史册。有些士族则是因为贪图权势,与身居高位的庶民高官联姻,这种现象开始于刘宋时期。出身寒庶的沈庆之凭借军功在刘宋时位至司空、受封郡公,王导的七世孙王锡将女儿嫁给沈庆之的儿子沈文季,是显著的事例。萧齐时士庶联姻的事例进一步增多。庶民张敬儿依靠军功在萧齐时官至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谢玄的玄孙“(谢)超宗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②。出身行伍的王敬则,官至大司马,“敬则女为(陈郡谢)朓妻”^③。江左第一高门的琅邪王氏与陈郡谢氏尚且如此,其他家族可以想见。士庶不婚的禁锢日益解体。

门阀士族凌驾于庶民之上,必然引起庶民的不满和怨恨。和平时期,他们享尽荣华富贵;天下动乱时,他们就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百姓镇压和打击的对象。《南史》卷八〇《侯景传》:侯景叛军围攻建康,“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哀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又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捶,疲羸者因杀以填山,号哭之声动天地”;经过侯景之乱,“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这次动乱消灭了一大部分士族,幸存下来的士族,其往日的权势和气焰也受到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在侯景之乱和梁陈交替之际,一部分土豪凭借武功崛起。例如,“侯景之乱,(熊)昙朗稍聚少年,据丰城县为栅,桀黠劫盗多附之。梁元帝以为巴山太守。荆州陷,昙朗兵力稍强,劫掠邻县,缚卖居民,山谷之中,最为巨患”,最后官至平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史家称:“梁末之灾沴,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④

江南经过多年的开发,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经济的繁荣,庶民中的地主和商人积累起大量的物质财富,他们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例如,宗慔的“乡人庾业,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宾客”^⑤。《宋书》卷九四《戴法兴传》:“山阴有陈载者,家富,有钱三千万”。而有些士族如同前述王元规一类的家族由于衰败,则食不果腹。《南齐书》卷三二《王延之传》:琅邪人“(王)延之清贫,居宇穿漏。褚渊往候之,见其如此,具启(宋)明帝,帝即敕材官为起三间宅室。”东海人“(王)湛少贫,尝自纺绩”^⑥。在经济状况方面,部分士族贫困潦倒,而地主与商人则成为富豪,士庶有混同的趋势。

士族区别于庶民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拥有文化和礼法修养。在南朝一些庶民出身的人,依靠勤奋好学也具备了士人的资格,这就是所谓的寒士。吴均“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他的文章得到高门士族、著名文学家沈约的赞赏,吴兴太守柳恽召为主簿,扬州刺史、建安王萧伟任命为记室参军,“掌文翰”^⑦。出身庶民的吴均因为才华出众,不仅得到士族的赏识,从而入仕为官,而且还得到宗王的提拔。这种现象在宋齐时代是难以想象的。《梁书》卷四八《沈峻传》:沈峻“家世农夫,至峻好学……昼夜自课,时或睡寐,辄以杖自击,其笃志如此……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初为王国中郎,稍迁侍郎,并兼国子助教”,官至武康令。这些拥有才学的庶民,不仅跻身仕途,而且得到士族和皇族的赏识,士庶的界限日趋消融。

综上所述,“士庶天隔”是东晋南朝特有的历史现象,是门阀社会的产物。士庶之别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都有体现。这种差别是政府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造就的。由于士族的衰败和庶民的崛起,士庶之间的分野日益消解,所以在士族大肆宣扬“士庶天隔”的同时,开始出现“士庶不分”^⑧的局面。

(责任编辑:胡晓明)

① 《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

② 《南史》卷一九《谢灵运传附孙超宗传》。

③ 《南齐书》卷四七《谢朓传》,第827页。

④ 《陈书》卷三五《熊昙朗传》及“史臣曰”。

⑤ 《宋书》卷七六《宗慔传》。

⑥ 《南齐书》卷三四《王湛传》。

⑦ 《梁书》卷四九《吴均传》。

⑧ 《通典》卷三《食货志三》,第60页。

移民、城人与侨州郡县

——北魏时期特殊的统治政策

颜岸青

(安徽省委办公厅 法规室,安徽 合肥 230091)

摘 要:北魏时期施行过一些特殊的统治政策,例如频繁的人口迁移,设置侨州郡县,以及对城人阶层的治理等。北魏政府依据移民之民族、阶层、地位的不同,采取实京师、实内地、实边疆等不同政策进行有效管控;相较于东晋南朝,北魏设置侨州郡县则多有强调正统在北不在南的意味;城人是北魏一朝存在的特定社会阶层,除了军事意义外,北魏政府对城人的政策变迁对六镇问题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这些政策总体反映出北魏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并存的时代特征,以及“因时而异、因人而变”的统治特色。

关键词:北魏;移民;城人;侨州郡县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17-07

一、特殊的移民政策:三个地区、四种政策

北魏时期的移民问题,前辈学者研究成果较多,例如唐长孺先生《北魏的青齐土民》、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操晓理《北魏移民初论》、李凭《北魏平城时代》、胡阿祥师《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等分别从移民的数量、民族的构成、迁徙的时间等多个方面对北魏一朝的移民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回顾。^①笔者综合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政策”的角度分析北魏移民的形式以及背后的政治考量,作为北魏时期统治政策的重要补充。

业师胡阿祥先生所总结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五大历史特征:深层的分裂局面、复杂的民族关系、频繁的人口迁移、特殊的社会结构、变动的典章制度。^②这五大历史特征相互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例如深层的分裂局面以及复杂的民族关系造成了这一时期人口的大迁徙、大流动。陈寅恪先生亦曾指出“永嘉之乱以来,胡族统治这往往将其武力所到地域的各族居民,迁往政治中心地带,以便奴役并控制。而当这个胡族政权发生混乱,失去控制力,或者灭亡的时候,被迁徙的人民往往回迁。这一往一返,影响极大”。^③梳理十六国北朝的历史,各胡族政权之间的兴衰起灭,无不伴随着人口的频繁流动迁徙,北魏立国之后,伴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以及后期孝文帝的迁都政策,人口迁移的实施、特点都较十六国时期有很大不同。

北魏人口大规模迁徙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为北魏立国至439年统一黄河流域,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伴

收稿日期:2019-01-12

作者简介:颜岸青,历史学博士,安徽省委办公厅法规室主任科员,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历史地理学。

① 有关北魏移民问题的相关研究参见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收入《唐长孺文集》第二册《魏晋南北朝史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3-123页;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七章《北朝的政治与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5-521页;葛剑雄著:《中国移民史》第二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第十三章《十六国与北朝的移民》第二节《北魏前期的移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3-597页;操晓理:《北魏移民初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五章《京畿概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282页,以及《北魏天兴元年的高句丽移民及其状况》,收入李凭著《北朝研究存稿》,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3-72页;胡阿祥:《十六国北朝时期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辑。

② 胡阿祥等著:《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③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随着北魏统一战争的逐步推进,被征服地区的人口大规模迁徙至平城近畿;二为493年北魏迁都洛阳,迁洛前后的系列汉化政策的推进,原集中在平城地区的人口大量南迁至中原腹地。根据葛剑雄、操晓理、胡阿祥师的相关研究,北魏移民政策可以归纳为“三个地区、四种政策”,简述如下:

(一) 三个地区

主要指北魏时期人口的三大迁入地。一为“移民实京师”,北魏建都平城后,为充实京畿地区的人口,增强中央的力量,在历次战争中大量迁徙各族人口至平城地区,迁徙至平城地区的总人数,李凭先生估计为一百五十万,^①胡阿祥师统计为一百五十至两百万。^②

二为“移民实内地”,由于平城地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特别是气候、水土条件较差,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人口,因此从明元帝时期起,每逢天灾平城地区出现粮食物资供应不足的情况时,北魏政府会组织平城近畿的人口迁徙至山东地区“就食”,按葛剑雄等归纳,北魏一朝大规模移民山东的次数有5次之多,其中最多的一次发生在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6),《魏书·食货志》(下文均简称《食货志》)统计此次外迁的人口占平城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行者十五六”,移民实内地的总人口规模没有准确数据,仅就太和十一年外迁情况统计,北魏平城时期京都人口在一百五十万左右,此次外迁即便以一半计算,也有七十多万人,结合明元帝、太武帝时期几次迁徙,移民实内地的人数应在一百万人左右。

三为“移民实边疆”,主要为北部防御柔然的六镇一线,安置大量的高车人、中原强宗子弟、鲜卑武人为驻防兵,六镇军人的总数不可考,操晓理统计约有两百万人,而根据《魏书·拓跋渊传》记载,正光六年(525)破六韩拔陵败后,六镇叛军“前后降附二十万人”,此后这支力量经过葛荣、尔朱荣两次转手,至高欢控制时,所谓“六镇反残”仍有二十余万人,这二十万人按一户出一丁,一户五口人算,六镇的人口规模应在一百万人左右。

(二) 四种移民政策

根据操晓理、胡阿祥师的研究,北魏时期移民依据其民族、阶层、地域的不同,北魏政府一般有四种对待政策:其一,笼络移民中的上层分子;其二,对京畿移民“计口授田”;其三,自发性移民纳入郡县管理体系;其四,对北部边镇移民编为镇户,笔者综合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对这四种移民政策归纳如下:

1. 笼络移民中上层分子

北魏时期“笼络胡汉上层分子”是其一贯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体现在对胡人贵族以及汉人士族的笼络,还表现为对移民中上层分子的优待与重用。道武帝天兴元年(398)迁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两千家于代郡”,北魏初定中原,天兴元年末对山东上层势力尚属于强制迁徙。明元帝之后,就变成了有计划的征召中原汉人上层分子至平城,例如太武帝神䴥四年(431)就下诏征召数百名中原汉人大族至平城为官,此次被征的高允曾撰有《征士颂》,其中所列征召的汉人大族(含高允在内)一共三十五人,并指出此次征召的规模:

魏自神䴥以后,宇内平定……梦想贤哲,思遇其人,访诸有司,以求名士。咸称范阳卢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闻州邦,有羽仪之用。亲发明诏,以征玄等。乃旷官以待之,悬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余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称记。^③

此外,北魏在兼并战争中也注意将俘虏中的上层分子迁徙至平城,遴选之后加以任用。例如始光四年(427),北魏攻克赫连夏都城统万“虜昌君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擒昌尚书王买、薛超等及司马德宗将毛修之、秦雍人士数千人”,^④此次俘虏的数千名秦雍大族以及南朝降将陆续都得到了重用,例如毛修之、毛法仁父子,以及赵逸、胡方回等士人后来都在北魏朝廷中出任官职。平定青齐地区后,迁徙历城、梁邹、东阳三城的士民百姓至平城为“平齐民”,虽然大部分平民或为奴婢,或计口授田成为农户,但上层分子还是受到了优待,平齐民中有“上客”“次客”“下客”之分“及历城、梁邹降,法寿、崇吉等与崔道固、刘修宾俱至京师。以法寿为上客,崇吉为次客,崔刘为下客”,虽然三种“客”是以投降北魏的先后为划分标准,但是列为“客”的青齐豪族还是避免了被充作奴婢或者编为农户的命运,根据唐长孺先生的考证“上客作大官,赏赐田宅、奴婢自不需论,就是当下客的也可以获得一官半职”。而且很快这些被迁徙

①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五章《京畿概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282页。

② 胡阿祥:《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辑,第34页。

③ 《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

④ 《魏书》卷四《世祖纪》。

的青齐大族就摆脱了各自俘虏的身份“在孝文帝统治时,连翩登朝,很多当了大官。他们中间大都又还到了青齐,仍然是当地最有实力的豪强”。^①可见北魏对移民中的上层分子是优待和重用的,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周一良先生提出的北魏用人“兼容并包”的观点。

2. 对京畿移民“计口授田”

北魏移民实京师一直是北朝史研究的重点,迁徙的时间、人数、民族葛剑雄、李凭、操晓理等学者已经研究的非常深入,本文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北魏以鲜卑本族集中平城近畿,以大量迁徙的汉人、高车人及其他胡族为中央直接控制的民户,使得平城畿内地区得以迅速发展,从而成为北魏中央直接控制的核心力量。

3. 将自发性移民纳入郡县管理体系

北魏时期的移民并不全是强制性移民,也有自发性移民,自发性移民的类型,胡阿祥师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迫于政治压力或军事形势而降附,如在与东晋南朝交争地带,此类降附的地方军政官员与兵士民户颇多;其二,周边民族慑于大国声威而降附,如南朝汉水流域的群蛮;其三,招怀政策下的归顺流民,这也以南北交争地带的民户为主。”^②而这些自发性的移民迁入北魏境内后,其待遇不同于强制移民,编入郡县为国家编户,这种管理机制,按照操晓理的研究,或者编入旧有郡县,或者新设一批郡县统辖新归附的人民。^③而很多新设的郡县则属于侨州郡县。

4. 对北部边镇移民编为镇户

北魏在北部边境设置了一系列军镇作为防御体系,六镇只是其中最重要的六个军镇,此外还有东部的御夷镇,西北部的高平、薄骨律、统万、敦煌等军镇。这些军镇“镇人”(或称镇户、府户、城人)的来源主要为四类移民:一为鲜卑人,魏初拓跋鲜卑号为“国人”,在孝文帝改族姓之前,鲜卑不分贵族平民一律服兵役,而且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二为迁徙征发至北镇的“中原强宗子弟”,魏初重视军功,相当数量的中原地区的汉人强宗子弟将卫戍北镇作为仕进之途;三为有罪流徙戍边之人;四为强制迁徙的高车、丁零等胡族,高车在北镇的大量分布以及在魏军中的地位作用,例如魏末六镇叛军领袖鲜于修礼就是丁零族人。

北魏对这三类移民的统治方式是一律编为镇户,拥有军籍,而且根据《魏书·高祖纪》中孝文帝在太和十二年(488)和太和十八年(494)颁布的诏令可以看出,北镇移民一旦被编为“镇户”就拥有了军籍,成为“城人”后必须固定居住在戍所,承担繁重的兵役,而且子孙沿袭,不许自由迁徙。

(太和十二年)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本。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

(太和十八年)丙寅,诏六镇及御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无子孙兄弟,终身给其廩粟;七十以上家贫者,各赐粟十斛。又诏诸北城人,年满七十以上及废疾之徒,校其元犯,以准新律。事当从坐者,听一身还乡,又令一子抚养,终命之后,乃遣归边;自余之处,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听还。^④

分析此两条史料,虽然是孝文帝对北镇镇戍军人的优待政策,但是亦可见北镇“镇户”待遇之严苛,流徙的罪犯年满七十而且孤身一人才可以离开戍所,卫戍的军人则要满八十岁以上,还得符合一些条件才可以返回原籍,符合这两项政策的镇人寥寥,大部分镇人是无法离开卫戍的军镇,直至北魏正光五年(525)六镇尽叛,北方已全面陷入动乱之际,孝明帝才下诏“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⑤即全面罢废军镇制度,镇户改为相对自由的民籍,但为时已晚。

二、特殊的政区制度:侨州郡县的设立

侨州郡县的设立与侨流人口的治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特殊的政策,侨州郡县因侨流人口而设立,侨流人口因这一时期深层的分裂局面、复杂的民族关系、频繁的人口迁移而大量出现,相较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制度的长期性与典型性,北魏时期的侨州郡县制度则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对此胡阿祥师在《十六国北

① 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唐长孺文集》第二册,第105、108页。

② 胡阿祥:《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

③ 操晓理:《北魏移民问题初论》。

④ 《魏书》卷七《高祖纪》。

⑤ 《魏书》卷九《肃宗纪》。

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引论》一文中总结为四个方面:因招抚或安置流民而置,为安置特殊性质的移民而设,备职方而立,务广虚名,以及承东晋南朝之侨置而不废者。^① 对十六国北朝的侨州郡县研究,清人胡孔福,以及王仲荦、胡阿祥师、牟发松、毋有江、仇鹿鸣等学者研究的已经较为全面,^②笔者无需重复相关研究成果,这里仅从政策的角度,对北魏时期侨州郡县的类型,及其政治意义进行总结归纳。

(一) 北魏侨州郡县的类型

胡老师所归纳的四种类型,在北魏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史实:

1. 因招抚或安置流民而设的郡县

《魏书》《通鉴》对这一类政区的记载屡见不鲜,例如《魏书·司马楚之传》载:“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户民分置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以益豫州”,汝南等四郡的侨置,是为了安置江淮民户而设置。再如《魏书·蛮传》记载“景明初,大阳蛮酋田育丘等二万八千户内附,诏置四郡十八县”等,这些主动归附的移民,北魏通过侨置州郡的政策进行管理。

2. 因安置特殊移民而设置侨州郡县

北魏天安元年至皇兴四年(466—469)取刘宋淮北四州之后,将青齐地区梁邹、历城、东阳三城的民户全部迁徙至平城近畿,是为“平齐民”,为了安置这批特殊的移民,北魏于北新城(后迁至下馆)侨置平齐郡,辖怀宁、归安二县,^③用于安置迁徙至平城的“平齐民”。

3. 备职方而设置侨州郡县

所谓“备职方而立”,主要指北魏后期兵锋四起,疆域政区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特别是后期东西魏对峙局面的出现,使得“实地常有得失,然而每每丧州失郡,辄画地立名者,也是出于职方不可不备的考虑”^④。有的政区实土虽然不再控制,但是出于标榜正统的需要,还是需要在新的地区进行侨置,以备职方。

4. 为广务虚名而设置侨州郡县

这一方面主要指北魏控制原属于南朝的政区后,沿袭了东晋南朝侨置郡县的政区建置,胡阿祥师引《地形志》中北魏之青州、齐州、徐州中沿袭的若干刘宋时期的侨置郡县记载,认为北魏对东晋南朝侨置政区的沿袭“名目纷然,考证亦难”,对下一步研究提出了更多颇具探幽的空间。

操晓理《北魏移民初论》中曾在附表中对北魏一朝因移民而新设郡县的情况进行总结,但操晓理之表格有几处错误,例如《李孝伯传》是《魏书》卷 53 而非卷 52,又如《魏书》卷 45 没有“阎珍传”而应为“韦珍传”等,^⑤而且没有区分“侨州郡县”与“新设郡县”的情况。为了更清晰地梳理北魏一朝侨置郡县的沿革,笔者重新梳理史料,按照时间顺序将北魏一朝历次侨州郡县(含新设郡县)的设置情况整理成表:

表 1 北魏时期侨州郡县设置情况表

侨州郡县名称	设立时间	建置规模	设置原因
北魏于河南、荥阳、河内范围内侨置南雍州	北魏泰常二年(417 年)	初置南雍州时秦雍流民有万户,经过寇赞的招抚“三倍其初”,因此民户约有 30000 户。	
汝南郡、南阳郡、南顿郡、新蔡郡	北魏泰常八年(423 年)	司马楚之所将户口侨置四郡,民户规模不详。	侨置郡县 安置主动归附流民而设
谯郡、梁郡、彭郡、沛郡	北魏延和二年(432 年)	北魏立徐州于外黄城,置谯、梁、彭、沛四郡九县,规模约 5000 家。	
淮阳郡	北魏正平元年(451 年)	北魏于豫兖之南侨置淮阳郡,初有民户 7000 户,后增置 17000 户。	侨置郡县 安置主动归附的移民

① 胡阿祥:《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
② 北魏时期侨州郡县的研究成果,参看(清)胡孔福:《南北朝侨置州郡考》,1912 年刊行;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 1980 年版;胡阿祥:《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毋有江:《北魏政区地理研究》,复旦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
③ 平齐郡有关史料,见《魏书》卷二十四《崔道固传》、卷四十三《刘文晔传》、卷五十《慕容白曜传》。
④ 胡阿祥:《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
⑤ 操晓理:《北魏移民初论》。

侨州郡县名称	设立时间	建置规模	设置原因
平齐郡(怀宁县、归安县)	北魏皇兴三年(469年)	平齐郡约领青齐移民24000户、132000余口。	侨置郡县 南北战争中掳掠民众而设
城阳郡、刚陵郡、义阳郡	北魏太和三年(479年)	侨置三郡领有荆襄流民约7000户。	
四郡十八县	北魏景明元年(500年)	大阳蛮首领田育丘率28000户归附北魏,北魏置四郡十八县,郡县名称不详。	新设郡县 安置归附流民
十六郡五十县	北魏永平元年(508年)	大阳蛮17000户内附,请置郡16、县50,北魏朝廷以镇东府长史郢道元“检行置之”。	新设郡县 安置归附流民
侨置巴州,新设隆城镇	北魏永安二年(529)	獠人200000户内附,侨置巴州,新立隆城镇以安置归附獠人。	侨置郡、新设军镇,安置归附流民

通过上表统计可以看出,北魏时期一共9次设置侨州郡县,次数与规模都较东晋南朝为少,这自然有北魏占有地理上的正统,因此无需通过刻意侨置郡县的方式受揽人心。但是北魏所侨置的州郡基本都以东晋南朝或者其他敌对政权的政区为准,例如泰常八年(423)所置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实土均在刘宋境内;再如泰常二年(417)所侨置南雍州,而彼时雍州实土尚为东晋刘裕所控制。北魏侨置政区主要目的是安置流民,但是所侨置的多为东晋南朝以及其他敌对政权的政区,这无疑是北魏彰显正统的一种体现。

(二) 政治意义:强调正统在北不在南

侨州郡县制度南北均有,东晋南朝设置侨州郡县的政治目的,除了安置侨流人口,便于治理以外,还有标榜正统,提振民心士气的作用,侨州郡县的常设不废,时刻提醒南迁之北人正统在东南,收复中原仍是长久的目标。由此再联系东晋南朝政权不断的北伐,侨州郡县的设置,对侨流人口的治理以及利用(北府兵、雍州武力集团)就可以更深入的理解东晋南朝的政治史。反观北朝,十六国时期尚无彰显正统的需要,而北魏建立后形势则起了变化,439年和493年是北魏历史两个重要的时间点。43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南北朝时代,493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及一系列汉化改革的推进,北魏统治者以及部分南朝士人就认为正统已经转移到北方,北魏已经成为一个正统的华夏中原王朝。完成这一转变的北魏树立了文化自信,开始与南朝争夺正统,《洛阳伽蓝记》中陈庆之与杨元慎之间关于南北谁为正统的对话就可见一斑:

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垫,攒育虫蚁,疆土瘠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加以山阴请壻卖夫,朋淫于家,不顾讥笑。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嫫母之为丑。我魏膺策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于此?”庆之等见元慎清词雅句,纵横奔发,杜口流汗,合声不言。^①

这段对话发生的背景,是北魏迁洛之后,伴随着一系列汉化改革树立起对南朝文化上的自信,加之拥有地理的正统,使得北魏上下均认为已将地理、文化正统战合二为一,是华夏文明的当然继承人。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北魏设立侨州郡县,除了加强对归附人口以及特殊移民的统治以外,更多是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例如前文所引《魏书·司马楚之传》的史料,北魏安置江淮流民设置了“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个郡,而这四个郡的实土当时都在刘宋的控制之下,北魏侨置刘宋的政区,无疑是对新民彰显正统在北不在南,更多是一种政治的考量,否则完全可以迁徙至平城或者分散在临近郡县,无需大费周章新设一批政区。

三、特殊的社会人群:城人阶层及其治理方式

城人(亦称城民、镇人、府户、营户)是北魏时期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关于城人的性质,前辈学者唐长孺、谷霁光、朱大渭以及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窪添庆文多有研究,一般认为北魏的城人是一种寓军于民的“军户”阶层,“城人”属于军人,与“郡国之民”之“州人”是相对应的,州人一般为从事农耕的汉人、鲜卑人,城人则为驻守军

^① 杨衒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6-107页。

镇的驻防兵,城人阶层具有相对固定性、世袭性,成为城人后一般不允许离开戍所。^①此外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对“城人”为军户的观点提出质疑,例如范兆飞在《魏末城民新考》一文中认为:城民只是在特定的情形下属于“军户”,具有军人身份,北魏大多数“城民”只是“城内居民”的简称,并进一步认为城民有阶层、民族上的区分。^②对此笔者以为城民的性质还是应该属于军户,是一种耕战结合的依附民,战时为兵,平时戍守与农耕相结合,属于北魏时期特殊的社会阶层。本节将围绕城人阶层的诸多特征,讨论北魏政府对这一阶层的统治政策。

(一) 城人的分布及其特征

需要明确的是,北魏“城人”虽有军籍但不等同于兵。综合前辈学者的研究,城人的组成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其一,鲜卑人,即前文反复讨论之“国人”,魏初鲜卑为镇人不分贵族、平民,都有为国戍守的义务;其二,胡汉移民,即“中原强宗子弟”,有部分强制迁徙,但也有部分主动从军,魏初重军功,可能想借此提升地位,因为魏初镇民地位颇高,正所谓“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其三,流徙的罪犯,如“镇戍流徙之人”“诸犯死刑者”等。这三类人是镇人主要的组成部分。^③

北魏镇人的分布与北魏的军事防御体系密切相关,大体分布在三大区域:其一,北部边疆之军镇,主要以“六镇”为主;其二,胡族聚居区域之军镇,以高平、薄骨律、统万、离石诸镇为主;其三,各州所辖的地方部队。梳理《魏书》中有关记载,北魏境内城人似乎普遍存在,地处边疆的州有城人自不必说,例如西北边境的秦州“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杀刺史李彦据州为逆”^④,再如南部边境的徐州“永平初,徐州城人成景儒以宿预叛,诏椿率众四万讨之,不克而返”;^⑤而处于北魏腹地的州也分布有城人,例如青齐地区的齐州“齐州城人赵洛周据西城反,应尔朱兆”^⑥,河北中心地带的相州“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诸城人,鼓噪而入,杀熙左右四十余人,执熙,置之高楼,并其子弟”^⑦。由此可见城人广泛分布在北魏境内军镇、州郡城戍,是北魏整体军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北魏对待城人阶层的政策

北魏对待城人阶层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 城人身份是国家牢固控制的依附民

城人的身份具有终身性、世袭性,未有特殊诏令,城人不得离开戍所。前文已详,孝文帝曾在太和十二年、十八年下过两道诏书,这两道诏书间接确认了城人身份的终身性、世袭性和固定性。例如流徙的罪犯要“年满七十”“孤单穷独”“无子孙”才可以解除城人身份返回故里,其他城人“年八十以上”才有可能返乡,其余则必须继续戍守。

2. 城人是具有军籍城居的耕战一体的自耕农

城人拥有国家配给的土地。无战事时需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战时则从军作战。唐长孺先生曾指出“总之那里(指北镇)有一种土地配给制度……可能在均田令颁布前早就有土地配给、调整的制度”^⑧,唐先生认为镇人拥有国家配给的土地。何德章先生在唐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城人需要农耕“他们(指城人)平时要劳动,准确的说要进行农耕便毫无疑问”,并进一步认为北魏时期的城人是隶属于军府,城居而且耕战结合的国家依附民。^⑨由此可见城人确实具有耕战结合的身份属性。

① 关于北魏城人的有关研究,参见[日]谷川道雄著,夏日新译:《北魏末的内乱与城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0-170页,以及马彪翻译之谷氏《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日]窪添庆文著,赵立新、涂宗呈、胡云薇等翻译:《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台湾大学出版社中心2015年版;唐长孺:《二秦城民暴动的性质和特点——北魏末期人民大起义研究之三》,收入《山居存稿·续编》,《唐长孺文集》第六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4-93页;《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山居存稿》,《唐长孺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0-113页;朱大渭:《北魏末军户制的衰落》,收入《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8-192页;何德章:《北魏的城人与农耕》,收入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46-354页。

② 范兆飞:《魏末城民新考》,《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1期,第149页。

③ 窪添庆文在《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第八章《北魏的地方军(特别是州军)》中认为北镇与地方的州军应区分看待,他指出“城人”应主要为“州军”(不含北镇),据此他提出“城人”应由四类人群构成:1.鲜卑系族人;2.异民族兵户(包含一部分的汉人组成);3.服义务兵役的汉人编户;4.兵户以外异民族兵也存在,但稍具特殊性。窪添氏对“城人”成分的分析甚有道理,但是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笔者以为北镇的“镇人”与内地州的“城人”属于统一阶层,应统一看待,窪添之观点备为一说。

④ 《魏书》卷五十七《崔游传》。

⑤ 《魏书》卷五十八《杨椿传》。

⑥ 《魏书》卷十《孝庄纪》。

⑦ 《魏书》卷十九《拓跋熙传》。

⑧ 《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唐长孺文集》第三册《山居存稿》,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页。

⑨ 何德章:《北魏的城人与农耕》,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丛稿》,第350-353页。

3. 城人在北魏时期地位的升降

城人在北魏前期地位较高,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地位急转直下,这是魏末城人阶层反叛的根本原因。六镇问题其实是因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中央与地方、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城人阶层在北魏一朝地位的升降,《北齐书·魏兰根传》中魏兰根总结得非常精到:

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感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①

魏兰根这段话的背景,应为正光五年六镇尽叛之后,他以当时人说当时事,可谓切中要害。城人阶层本是北魏政权的“国之肺腑”,特别是六镇城人在血统和出身上大多具有贵族性,孝文帝推行门阀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选官制度改革,导致北魏整体政策开始向重文抑武转变。^②到了孝明帝时期,洛阳朝廷重文抑武的政策达到高峰,不仅城人阶层的利益被漠视,连北魏宫廷的警卫力量:羽林、武贲都被斥为“下品”,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神龟二年(519)洛阳禁军暴动,《北史·张彝传》详细记载了此次兵变的经过:

(张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杀其家。彝殊无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龟二年二月,羽林武贲将几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慑惧,莫敢讨抑。^③

洛阳禁军暴乱的根本原因是张彝及其子张仲瑀推行“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的选官政策,如果此条政策实施,那么连属于中央禁军的羽林、武贲将士都将无缘“清品”,按照北魏此前的门阀制度,无疑彻底断绝了仕进之路,因此起而反叛。陈寅恪先生对此指出:“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在洛阳如此,平城就可想而知了……洛阳羽林武贲起来发难,实际是六镇起兵的前奏”。^④此次军变对北魏整体军人阶层影响甚大,军变发生时,北齐奠基人高欢还是低级军官,当时正在洛阳送信,目睹了经过后他感慨:“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⑤可见张彝推行的“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的政策彻底激化了北魏军人阶层(羽林、武贲、城人)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暴乱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北魏不仅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中造成改革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还在后期将军民整体排斥在国家上层阶级之外,这不能不说是汉化改革的矫枉过正。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李崇、元渊等人屡次要求“改镇为州”,即解放城人为民户,但是孝明帝却以“旧典难革,不许其请”,一再拖延,一方面是孝明帝没有进行改革的魄力与勇气,另一方面则是对洛阳时期北魏过度重视阶层之分,“重文抑武”风气的反映。

4. 北魏对城人实行军事化管理体制

城人不同于民户,由镇将、戍主、刺史、太守直接管理,是一种军事管理体制。北魏时期的多数城邑是由十六国时期的坞堡演化而来,大多是作为战略要地的军事据点存在,除了洛阳、平城、邺城等少数大城市有部分工商业以外,其他州城、郡城以及军镇都是散布在广大区域内的大小据点。根据朱大渭先生的研究,北魏时期的城邑规模较大,一般有数重城墙,即所谓“套城”,而这一时期城市“政治和军事特征显著增强,而经济和文化两方面则相对地减弱了”,^⑥亦可佐证北魏时期城市功能侧重于政治上的统治控制力和军事上的防御性的特征。因此城人居于城内,和平时耕作城外的配给农田,一旦有战事则由镇将、戍主、太守组织,自备粮廩作战。城人阶层负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条件艰苦,地位日益低下,仕进之途阻隔,加之孝文帝改革对这一阶层政策失当,因此北魏末以六镇城人为中心,北方鲜卑下层分子与反对北魏统治的诸胡族合流,共同成为北魏末北方大动乱的主导力量,为北魏的分裂埋下伏笔。

(责任编辑:胡晓明)

① 《北齐书》卷二十三《魏兰根传》。

② 关于北魏洛阳时期“重文抑武”风气的形成,见颜岸青:《关于六镇问题的几点新思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③ 《北史》卷四十三《张彝传》。

④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页。

⑤ 《北齐书》卷一《神武纪》。

⑥ 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齐鲁学刊》1987年第4期。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英语复习作业优化设计

张丽宁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属小学,江苏 南京 210019)

摘 要:复习作业是掌握巩固和深化课堂知识的手段,也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言能力的有效途径。但目前小学英语复习作业存在观念陈旧、形式单一、内容枯燥等问题,如何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让小学英语复习作业更好地服务于小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培养,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难题。该文结合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涵盖的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品格和学习能力四个层面,提出了小学英语复习作业有效性设计的层次性、主体性、趣味性和实践性原则,同时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开展了小学英语复习作业设计的探索,通过丰富作业的形式,加强作业实践性的训练,让学生在完成作业时提升语言运用能力,形成英语核心素养,得到全面而有个性化的发展。

关键词:核心素养;复习作业;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品格;学习能力

中图分类号:G62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24-06

一、引言

目前,小学英语复习作业的情况不容乐观,复习作业形式单一、难度一致,机械操练的作业占了绝大多数。教师在设计复习作业时,多为背诵、抄写、做题等类型,这类作业对于复习巩固课堂知识是行之有效的,但容易让学生陷入机械化的学习,忽视了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与提升,不利于课堂的延伸。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提出:“英语课程应根据教和学的需求,提供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英语学习资源。”^①复习作业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续,是一种掌握巩固和深化课堂知识的手段,同时也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小学英语复习作业的设计,不仅要巩固和操练知识与技能,而且要锻炼和培养文化品格和思维能力。高效有趣的作业,可以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化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锻炼思维品质,发展跨文化意识。

本研究通过分析小学英语复习作业设计的现状,发现作业设计的弊端,同时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视角,寻求以培养小学英语核心素养为目标的复习作业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设计思路,以期为一线小学英语教师在复习作业的设计环节中达到最优化提供探索途径,帮助小学生形成英语核心素养,培养其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二、小学英语核心素养的内涵及要求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英语学科的教育目的是促进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随着核心素养的提出与实施,新的英语教学理念推动了教学实践的发展。王蔷^②提出,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品格和学习能力构成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旨在通过语言学习促进学生知识、文化、思维、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的相互融合,进而让学生形成自己对事情的认识、观念和态度。

(一) 语言能力的内涵及要求

语言能力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最基础和最首要的能力,它包含听、说、读、写四项语言技能,也包含理解

收稿日期:2019-01-20

作者简介:张丽宁,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第一附属小学副校长,中教高级,南京市小学英语学科带头人,教育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小学英语教学法。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 页。

② 王蔷:《关于当前英语教育政策调整的思考》,《课程·教材·教法》2016 年第 5 期,第 34-36 页。

和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① 语言能力是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在语言有效输入后,准确地语言输出及运用语言沟通和表达的能力。

通过教学实践,鼓励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语言开展真实、有意义的交流,在交流中加强对语言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在体验、感悟、探究中,不断提升语言的运用能力和语言素养。

(二) 思维品质的内涵及要求

思维品质是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将思维品质定义为思维在逻辑性、批判性、创新性等方面所表现的能力和水平。^② 思维品质包括学生分析、综合、批判、逻辑等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促进学生深度思维能力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英语教学中,要求学生对于英语学科相关知识点、相关技能进行辩证分析,用批判性的眼光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进行思维逻辑性和创新性的培养,从而促进其思维能力的深度发展。

(三) 文化品格的内涵及要求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水乳交融,十分密切,没有语言的传递就没有文化的传播。英语学习,不仅是语言的学习,也是文化的学习,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要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文化品格体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价值取向,它的培育有助于学生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国家认同感和家国情怀,学会做人做事,成长为有文化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③

在英语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文化知识的渗透,引导学生关注中外文化的差异,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能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拓宽文化视野,形成跨文化意识,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四) 学习能力的内涵及要求

学习能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形成策略、自我调节从而不断提升的能力,学习能力的培养旨在让学生成为能够独立思考、学会终身学习的人。学习能力也影响着学生获取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质量,它是学生进步和成长的重要指标。

在教学实践中,应培养学生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身的技能,有积极主动的学习动机,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以及主动参与的学习意识,同时,能运用策略和监控方法,适时调整自身的学习方法和策略。

基于上述核心素养培养的要求,教师在设计复习作业时,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品格和学习能力等核心素养,激发学生感官体验,在真实、有趣的情境中获取知识,积累愉悦、丰富的经历,把知识的掌握、技能的训练、能力的培养、智力的开发与复习作业联系起来,从而让学生的核心素养得到充分提高。

三、小学英语复习作业设计的原则

鉴于作业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学生的个体差异,教师在设计作业时应充分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总结有效设计的基本原则。

(一) 层次性原则

多元智能理论提倡区别对待不同智力水平的学生,因此,在小学英语复习作业的设计上,应体现出作业类型和难易程度的不同,以适应不同层次学生发展的需求。鼓励学生选择能力范围之类的作业,让不同层次水平的孩子,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能力强的孩子在巩固知识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提升思维品质;能力一般的孩子可以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力有所提升;能力较弱的孩子可以掌握最基础的知识,同时保持学习英语的热情和兴趣。作业的分层,让每个孩子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从而让英语课外作业设计得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二) 主体性原则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的知识迁移,而是主动建构的过程,因此,教师在设计作业时,要考虑学生现有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设计学生可以“跳一跳”能达到高度的作业;同时,让学生有充分自主权,鼓励其参与到作业设计中来,成为作业的设计者和完成者,最大化发挥学生主体地位。作为作业设计的主体,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有利于他们自主建构知识、内化知识和锻炼能力。

① 程晓堂,赵思奇:《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质内涵》,《课程·教材·教法》2016年第5期,第79-86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③ 任丽燕:《浅谈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下的文化意识素养》,《海外英语》2017年第5期,第9页。

（三）趣味性原则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作业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设计,应符合学生年龄特征,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在设计作业时应尽量避免机械抄写、死记硬背的作业,注意形式多样化,设计联系生活实际、寓教于乐的作业形式,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保持持久的兴趣。作业的趣味设计,要始终以轻松、实践、愉悦为主,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为他们今后学习英语奠定自信心和良好的基础。

（四）实践性原则

杜威的“从做中学”理论,鼓励儿童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在设计复习作业时,不应局限于文本型的机械作业,应该多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型作业,内容可以涉及学生的生活领域,体现“用英语做事情”。让学生在实践中思考、总结、发现规律,从而不断提升思维品质和语言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目的。作业的实践性可以有效连接书本和实际,由课内延展到课外,从而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四、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英语复习作业的设计思路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与深化,下文将围绕核心素养的理念,结合译林版《英语》的教学实践,具体阐述小学英语复习作业的设计思路。

（一）关注表达,培养语言能力

英语核心素养中语言能力的培养强调听、说、读、写技能的灵活掌握和运用。在设计复习作业时,要关注这四项技能的培养,统筹兼顾,体现“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的原则,综合发展学生语言运用能力。

1. 听说领先 趣味配音

从语言技能训练上来说,小学英语教学强调听说领先,这符合学生学习语言的认知规律。在有效提高学生听说能力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展其他的语言技能。

具有纯正英语表达的原版英语动画片,是学生学习英语的鲜活资源。针对不同的单元主题,笔者选取了《迪士尼神奇英语》《玩具总动员》《功夫熊猫》《飞屋环游记》《艾尔文与花栗鼠》等多部动画片里的片段,让学生在熟悉内容的基础上,用简单的英语复述动画片情节和故事梗概。同时,截取其中的精彩片段,让学生观看后,熟记台词,模仿原声,进行操练。

语言来源于生活,原版动画片不仅趣味性浓,而且通俗易懂。枯燥的单词和句子,有了故事情节,立刻生动起来。学生赏析后,跟读模仿,并进行配音。这种形式的复习作业,让学生沉浸在浓厚的英语学习氛围中,模仿语音语调,直到惟妙惟肖的状态。在潜移默化中,学生既练习了地道的英语表达,又提高了视听能力和语言交流能力,可谓一举多得。

2. 读写跟上 藏头小诗

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是交际功能,小学英语教学通过对学生听、说、读、写的训练,使学生获得语言的基础知识和初步运用语言交际的能力。在“听说领先”的基础上,应“读写跟上”,对学生语言技能进行全面训练。

当学生学完关于天气及季节的内容,便尝试编写季节类的藏头诗,让学生互动起来,实现语言的理解与运用。

笔者通过一个藏有 Spring 单词的藏头诗来引导学生创作小诗:

Sun is shining,
People go outing,
Running, jumping and singing,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Now the fine weather it's going to bring,
Going to bring.

学生纷纷效仿,创作了关于四季的藏头诗(见图1)。学生在创作藏头诗的过程中,遇到不会的单词或不知道如何表达想法时,就会积极主动地向老师、同学、家长或网络寻求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培养。这种形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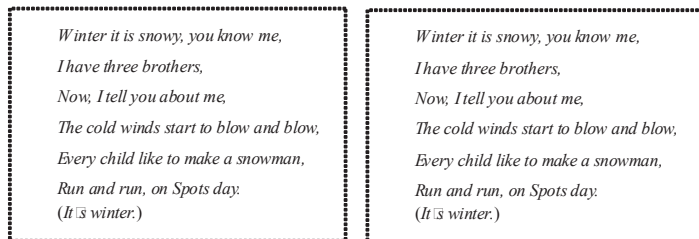


图1 学生创作的藏头诗

复习作业,不仅帮助学生积累大量词汇,丰富语言的素材,还能锻炼其创造力和语言组织能力。

(二) 灵活运用,促进思维发展

思维与语言密不可分、相互依存。语言的学习需要借助思维,思维的发展促进语言的灵活运用。实践型、开放探究型的复习作业,可以激励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其多样化的思维,促进逻辑思维和批判思维的形成。

1. 思维导图 发散思维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思维工具,主要使用颜色、线条、符号、词汇和图像等直观形象的方式来呈现思维过程,表达知识结构和知识信息,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高级思维技能和知识建构能力。^① 小学高年级英语教材虽然篇幅长、内容多,但基本都是围绕一定主题展开,利用思维导图能更好地掌握单元内容。结合译林版《英语》六上 Unit 8 Chinese New Year 的内容,鼓励学生从 when、what、how、where 等方面,利用思维导图,



图2 Chinese New Year 和 Birthday 的思维导图

完成对春节相关知识的理解;在讲授完“Birthday”的相关主题后,鼓励孩子从 where、when、activity、food、clothes 等方面,加深对 birthday 的理解(见图2)。

思维导图让学生体会知识间的关系,对课文和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在前期语言输入的基础上,运用思维导图,将语言有效输出,实现新旧知识的整合,在知识之间搭建有意义的链接,从而提高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2. 连环漫画 创新文本

呈现连环漫画是贴近学生生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有效方式。连环漫画往往有一条故事主线贯穿其中,学生可以通过阅读图片的意思理解文本含义。色彩丰富的图片,在吸引学生注意的同时,可以帮助其进行深度思考,培养语言输出的能力。

在学习完购物和衣服类用语之后,笔者呈现了一组连环漫画(见图3),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想象给漫画配上英语对话和说明。



图3 与购物相关的连环漫画

一个学生的作业如下:

- P1: Tina doesn't like her black umbrellas. She would like to buy a brown one.
- P2: The yellow coat is too big. Tina wants a gray coat.
- P3: Tina doesn't like her wool sweater. She likes the cotton one.
- P4: Tina is looking for an inexpensive bracelet for her sister.
- P5: All of Tina's purses are vinyl. She wants a leather purse.
- P6: Tina's father's birthday is coming. She wants to buy a dot tie for her father.

该复习作业形式贴近生活,学生通过理解、操练、记忆,发挥想象,灵活运用语言,重新创造文本,有利于学生深挖文本信息,锻炼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发散性和创造性,培养多元化的思维品质。

(三) 理解鉴别,孕育文化意识

核心素养中的文化意识要求学生通过语言学习,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别,拓宽文化视野,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跨文化意识。通过设计复习作业,让学生体会文化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化内涵,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

1. 文化卡片 拓宽视野

在译林版《英语》五六年级的教材中,出现了 Culture time 环节,通过图片和简单的文字介绍,呈现中外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拓展视野。

^① 陈香春:《浅谈高中英语词法教学中思维导图的运用策略》,《快乐阅读》2013 年第 36 期,第 89 页。

译林版《英语》六上 Unit 5 Signs 单元呈现了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对同一事物不同的表达,如地铁这个单词,英式英语称为 underground,美式英语称为 subway。在生活中,这类单词有很多,如糖果

sweet/candy,橡皮 eraser/rubber 等,笔者引导学生通过书籍、网络等多种途径,搜集整理这类单词,并制作成单词卡片,让学生亲身体验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激发学生学习语言和文化的兴趣(见图4)。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学好语言。通过完成这样的作业,学生对英语国家的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融合文化的多元性,有益于培养学生跨文化和多元文化意识,从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2. 随身小本 生活积累

在信息化社会,身边的英语随处可见。地铁站出口的 A、B、C、D 四个出口,停车场的标志牌 P,公共厕所 WC,安全出口 Exit,商场玻璃门上面的 push 和 pull 等等,这些简单的字母和单词,其实就是学生学习英语的最佳“读物”,利用随身小本可以随时记录下生活中所见所闻。

利用随身小本记录单词的时候,引导学生理解单词的文化背景。如 black,中文理解为黑色,而在英语中,由于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原因,black 有不同的内涵,如 black sheep 指害群之马,black tea 指红茶等。

这类复习作业源于生活,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活英语,学生参与积极性较高。这不仅是一项作业,也是培养学生观察、记录、发现身边英语的习惯,同时,通过语言的积累,感受不同文化的独特魅力,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和乐于分享的习惯。

(四) 自主探索,提升学习能力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学习能力,不仅包括学习方法与学习策略,而且还包括鼓励学生学会用语言进行沟通 and 交际的能力,主动运用语言交际的意识和习惯。设计复习作业,应给予学生自主探索、灵活运用的空间,提高学生主动学习、主动进取的意识。

1. 套餐作业 分层设计

学生学习英语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存在差异性,“一刀切”的作业不利于每个孩子的发展。过于简单或过于难的作业,都会削减学生完成作业的积极性和自信心。遵循学生个体差异的事实,在充分考虑学生自身特点的基础上,笔者设计了“套餐作业”。以译林版《英语》四下 Unit 5 Seasons 为例,根据学生特点,制定了三个套餐作业(见表1):

表 1 套餐作业

A 套餐作业	B 套餐作业	C 套餐作业
熟练阅读 Story time,能和同伴合作表演小诗。制作你所喜欢的季节的单词卡片。	熟练背诵 Story time,能和同伴合作表演小诗。能以自己喜欢的季节,制作一张季节卡。	熟练背诵 Story time,能根据 Story time 的内容,描述自己喜欢的季节信息,并制作一张相关的季节海报。

这种分层设计的“套餐作业”,有利于促进不同水平的孩子有效地完成作业,使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发展。学有余力的孩子,在巩固基础知识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能力;学习有困难的孩子,在完成基础作业的同时,增加了作业的趣味性,学习劲头也比较足。“套餐作业”的实施,重视了学生个体及个性的发展,体现了因材施教的理念,在巩固学生语言知识的同时,提升了语言技能,增强了学生语言运用的能力。

2. 制作达人 实践创新

小学生思维活跃,动手能力较强。利用小学生这一特点,笔者设计了“制作小达人”的一系列作业。

①设计英文菜单。译林版《英语》四上 Unit 6 At the snack bar 单元需要学生掌握食物的英文单词和点餐的句型。为了创设较为真实的语言环境,笔者模拟餐馆点餐环节,请学生制作英文菜单等道具,图5是一名学生制作的英文菜单:

Food	Drinks
Hot dog-----¥4	orange juice-----¥3
Hamburger-----¥5	milk-----¥3
Chicken-----¥10	cola-----¥3
Fish-----¥15	tea-----¥2

图 5 学生制作的英文菜单

学生制作菜单时,首先对食物和饮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对这些食品进行定价,最后制作相应的菜单。比起古板的死记硬背单词和句子,更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在巩固和复习旧知的同时,也为新授课服务,体现了新课标倡导的“用英语做事情”的理念。

②制定购物单。译林版《英语》五下 Unit 6 In the kitchen 单元围绕“晚饭吃什么”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学习了蔬菜、水果、肉类的单词,使用现在进行时的一般疑问句和 There be 结构进行讨论。作业设计见图 6:

在完成这份作业的时候,学生首先需要将自己想买的东西罗列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单词拼写的练习),而后需要运用学过的购物用语,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语言来购买东西,最后运用句型 I want to cookwith.....将词句结合,使英语表达生活化。

英语是实践性和生活化紧密结合的一门学科,学生可以从实践和生活中获取英语知识和信息。在英语学习中感知生活、体验生活,将真实的生活情境作为作业设计的背景,有效地引导学生注重生活经验的积累,丰富语言和生活的联系,把学到的英语运用到生活中,锻炼和提高学生运用知识和实践的能力。

3. 与时俱进 强化语用

译林版《英语》四下 Unit 8 How are you? 以打电话的形式,呈现了 Miss Li 对 Yang Ling 健康状况的询问和关心。在学习完课文之后,笔者设计了一个“微信朋友圈”关心 Yang Ling 的情景,鼓励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对 Yang Ling 的朋友圈进行更新,同时对 Yang Ling 的身体状况表示关心,在朋友圈里给她留言(见图 7)。

这种复习作业具有时代特征,大大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很多学生绘声绘色地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 Yang Ling 的身体状况,同时,又给予自己对她的关心,如“I will visit you after class.” “I will bring some fruit for you.” “Take care. Drink more water and have a rest.”

该复习作业形式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不仅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同时将所学知识整合和内化,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使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和工具性得到完美的统一。



图 6 “小小采购员”复习作业设计



图 7 微信朋友圈情境

(责任编辑:魏 静)

小学生在口述和写作中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特点

陈友庆, 余 姚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为了深入考察儿童心理理论使用能力的发展特点,对 153 名一至五年级的小学生在口述和写作两种不同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情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小学生在口述和写作两种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皆在二至三年级时出现发展的加速期;(2)各年龄段的小学生在写作中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能力都要高于在口述中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3)小学生对于情绪术语使用得最频繁,而对于肯定程度词汇使用得较少。结论是:小学生的心理理论使用能力在不断发展,存在着发展加速期。

关键词:口述;写作;心理状态术语;心理理论;情绪术语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30-05

一、引言

一些研究者提出,学龄后期心理理论的发展是逐步由“获得”心理理论转变为“使用”心理理论,^①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儿童使用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情况。^{②③④}由于对心理理论使用的考察比较复杂,涉及的面很广,至今尚未形成较为合适的研究范式。一些研究者认为,个体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情况可以反映出他们心理理论使用能力的发展状况。例如,Furrow 等人^⑤考察了母亲使用心理状态术语和孩子使用心理状态术语之间的关系,发现母亲在儿童 2 岁时使用心理状态术语和儿童 3 岁时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频率相关。Ruffman 等人^⑥采用纵向研究方法来考察母亲使用心理状态术语和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发现母亲在较早时间点上使用心理状态术语和之后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有稳定相关。母亲较多使用心理状态术语与孩子谈话,她们的孩子心理理论能力提高也更快。此外,Peterson 和 Slaughter^⑦报告说,母亲在谈话中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控制了孩子的语言能力,这些差异与孩子的错误信念成绩仍然显著相关。母

收稿日期:2019-05-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19000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SJBFDY206)。

作者简介:陈友庆,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应用发展心理学;余姚,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应用发展心理学。

① 赵红梅,苏彦捷:《学龄后心理理论的持续发展》,《心理学探新》2006 年第 2 期,第 22-25 页。

② Bartsch K., London K., Campbell M D., Children's Attention to Beliefs in Interactive Persuasion Task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1), 2007, pp. 111-120.

③ 陈健芷,李巍巍:《5—9 岁儿童在说服行为中使用心理理论能力状况的研究》,《心理科学》2009 年第 2 期,第 375-377 页。

④ 陈友庆,马晓璐:《7—11 岁儿童心理状态信息理解与使用的发展特点及关系》,《心理与行为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81-85 页。

⑤ Furrow D., Moore C., Davidge J., Chiasson L., Mental Terms in Mothers' and Children's Speech: Similarities and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9(3), 1992, pp. 617-631.

⑥ Ruffman T., Slade L., Crowe E.,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and Mothers' Mental State Language and Theory-of-mind Understanding, *Child Development*, 73(3), 2002, pp. 734-751.

⑦ Peterson C., Slaughter V., Opening Windows into the Mind: Mothers' Preferences for Mental State Explanations and Children's Theory of Mi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18(3), 2003, pp. 399-429.

亲对心理状态进行详细的、解释性的谈论有利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Meins 等人^①发现,在婴儿 6 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对于心理状态的评论与她们的孩子在 4 岁时的心理理论水平相关。Ruffman、Perner 和 Parkin^②通过父母的自我报告来分析他们是如何使用口头语言管教孩子的,发现父母对心理状态的提及与儿童心理理论水平呈正相关。桑标和李燕燕^③通过观察亲子互动游戏来考查亲子间心理状态术语、非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了年龄因素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和母亲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存在显著相关,且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与其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也存在显著相关。他们认为,儿童将心理理论任务中涉及的表征问题与信念词所隐含的表征属性相联系是形成心理理论、正确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前提。

回顾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儿童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心理理论使用能力的发展状况。但是,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通过收集儿童口头表述的内容来探讨其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情况,当然,这可能是受到低龄儿童语言发展水平的限制导致的。我们知道,儿童在进入小学后书面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他们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已经不局限于通过口头叙述,而可以越来越频繁和复杂地写出他们的想法、情绪、愿望等心理状态。因此,本研究通过口头叙述和书面写作两种方式考察儿童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情况,试图分析不同年龄段儿童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发展特点,以及不同表述方式中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差异。

二、研究方法

(一) 被试

选取小学一至五年级 153 名儿童作为被试(六年级因有升学任务,学习负担重,本研究没有调查),皆无身体残障或智能发育问题。各年级的具体分布是:一年级 30 人(男 16/女 14, $M = 7.09$ 岁, $SD = 0.34$),二年级 31 人(男 16/女 15, $M = 8.14$ 岁, $SD = 0.28$),三年级 31 人(男 16/女 15, $M = 9.06$ 岁, $SD = 0.33$),四年级 31 人(男 15/女 16, $M = 10.18$ 岁, $SD = 0.29$),五年级 30 人(男 15/女 15, $M = 11.19$ 岁, $SD = 0.34$)。

(二) 实验程序

本研究考察在口述和写作两种不同方式下儿童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情况。首先主试要求被试回想最近发生的难忘的一件事或印象深刻的一个人,并尽可能详细地介绍为什么这件事令其难忘或者这个人让其印象深刻。

预测实验的结果显示,被试在描述难忘的一件事或印象深刻的一个人时所包含的心理状态信息量基本等同。主试对被试的口述内容进行录音,而后对口述中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情况进行编码。如果被试口述故事存在困难,主试就加以引导,例如:“随便讲讲,没关系的。”或者“前面的小朋友讲得都很好,有人讲的是外出玩得很开心,也有人讲的是被妈妈骂得很难过,都可以啊。”并在被试口述的过程中不断给予积极的回应。

之后,另行安排时间要求被试写一篇文章。若被试口述的是最近发生的难忘的一件事,就要求其写令其印象深刻的一个人,反之亦然。文章字数根据各年级的能力进行要求。

参考有关研究对心理状态术语的分类以及根据对本研究预测样本录音材料的分析,将本研究涉及的心理状态术语分为五类:(1)想法术语:认为、想、知道。例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知道事情马上要发生了。”“他们正在苦思冥想。”“让我们想一想。”“我认为它很可爱。”(2)情绪术语:快乐、悲伤、不幸、不快、同情、发怒、生气、暴躁。(3)愿望术语:想要、喜欢、喜爱、希望、需要、梦想、渴望、宁愿。(4)肯定程度词:可能、或许、大概、大多、必须、当然、假想、肯定的、估计、确定。(5)其他心理状态术语:记忆、忘记、理解等。例如,“我们去过高医院,记得吗?”“我理解你的话。”

主试使用录音器材对被试的口述过程进行录音,大多数被试在 5 分钟左右可以口述完毕;写作过程约为 30 分钟,统一发放作文纸。

对被试口述和写作内容的编码原则是,每出现一个心理状态术语记 1 分并归入相应类别中,在同类别里

① Meins E., Fernyhough C., Wainwright R., Gupta M D., Fradley E., Tuckey M., Maternal Mind-mindedness and Attachment Security as Predictors of Theory of Mind Understanding, *Child Development*, 73(6), 2002, pp. 1715 - 1726.

② Ruffman T., Perner J., Parkin L., How Parenting Style Affects False Belief Understanding, *Social Development*, 8(3), 1999, pp. 395 - 411.

③ 桑标,李燕燕:《亲子间心理状态术语、非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心理科学》2006 年第 3 期,第 553 - 557 页。

重复使用同一个心理状态术语不重复记分。若使用同一心理状态术语但代表不同的类别,则分别计分。例如,“我想:‘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孝顺妈妈。’”和“长大以后,我想好好孝敬妈妈”应该区别:第一个“想”是想法术语,第二个“想”则是愿望术语。总分最低为0分,分数不设上限。

三、结果

(一) 评分者一致性情况

本研究记录使用统一的编码纸,编码者为两位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编码前经过严格培训。二人在整个研究中的评分一致性 Kappa 系数为 0.87—0.96,符合研究要求。对二者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讨论后将统一的意见记录下来。

(二) 小学生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特点

各年级儿童在口述和写作两种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成绩见表 1。

表 1 各年级儿童在不同使用方式下心理状态术语的成绩 ($M \pm SD$)

类别	<i>n</i>	口述	写作
一年级	30	1.50 ± 1.04	2.40 ± 1.00
二年级	31	1.65 ± 1.11	2.94 ± 1.44
三年级	31	3.00 ± 1.41	5.74 ± 2.32
四年级	31	3.71 ± 1.62	6.29 ± 1.72
五年级	30	4.20 ± 1.71	6.97 ± 2.51
男生	78	2.55 ± 1.64	4.77 ± 2.38
女生	75	3.08 ± 1.84	4.97 ± 2.85

在本研究中,以年级、性别为自变量,以被试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总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F(1,143) = 2.56, p > 0.05, \eta_p^2 = 0.02$),并且性别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F(4,143) = 0.98, p > 0.05, \eta_p^2 = 0.03$),故而在后面的分析中将男女的数据合并使用。

以年级为自变量,以被试在口述和写作两种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总分为因变量,分别做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在口述方式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总分而言,年级的主效应显著 ($F(4,148) = 22.54, p < 0.01, \eta_p^2 = 0.38$)。事后检验 (*LSD*) 表明,一、二年级的成绩显著低于三至五年级 ($p < 0.01$),三年级又显著低于四、五年级 ($p < 0.05$),但是一、二年级之间以及四、五年级之间皆没有显著差异 ($p > 0.05$)。这说明口述方式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在二至三年级是发展的加速期,到四年级以后趋于稳定。对于在写作方式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总分而言,年龄的主效应显著 ($F(4,148) = 36.48, p < 0.01, \eta_p^2 = 0.50$)。事后检验 (*Tamhane's T2*) 表明,一、二年级的成绩显著低于三至五年级 ($p < 0.01$),三至五年级间没有显著差异 ($p > 0.05$)。这说明写作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在二至三年级是发展的加速期,三年级以后趋于稳定。

对口述和写作两种使用方式的差异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年级内的趋势一致:使用方式的主效应均显著,皆是写作成绩显著高于口述成绩。一至五年级分别是: $F(1,29) = 9.97, p < 0.01, \eta_p^2 = 0.26$; $F(1,30) = 14.29, p < 0.01, \eta_p^2 = 0.32$; $F(1,30) = 29.14, p < 0.01, \eta_p^2 = 0.49$; $F(1,30) = 40.87, p < 0.01, \eta_p^2 = 0.58$; $F(1,29) = 20.22, p < 0.01, \eta_p^2 = 0.41$ 。这说明小学生在写作方式下比在口述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更强。

将各年级儿童在两种方式下使用的同一类型成绩相加,汇总后的结果见表 2。

以年级为自变量,以被试在两种方式下对五种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成绩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级的主效应显著 ($F(4,148) = 65.32, p < 0.01, \eta_p^2 = 0.64$),五种使用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4,592) = 36.20, p < 0.01, \eta_p^2 = 0.20$),年级和使用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6,592) = 1.56, p > 0.05, \eta_p^2 = 0.04$),使用方式和使用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4,592) = 1.80, p > 0.05, \eta_p^2 = 0.01$)。事后检验 (*Tamhane's T2*) 表明:针对各年级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总分来说,一、二年级间差异不显著 ($p > 0.05$),但

它们皆显著低于三至五年级($p < 0.01$),三、四年级间以及四、五年级间皆没有显著差异($p > 0.05$),但是三年级显著低于五年级($p < 0.01$)。说明自三年级开始,儿童使用五种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仍在增长。针对五种心理状态术语使用成绩进行的差异比较,使用情绪术语的成绩皆显著高于其他四种术语的成绩($p < 0.01$),使用肯定程度词的成绩皆显著低于其他四种术语的成绩($p < 0.01$),想法术语、愿望术语和其他术语间皆差异不显著($p > 0.05$)。这说明小学生对于情绪术语使用得最频繁,而对于肯定程度词使用得较少。这一趋势在图1中更加明显。

表2 各年级儿童对不同类型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成绩 ($M \pm SD$)

年级	<i>n</i>	想法术语	情绪术语	愿望术语	肯定程度词	其他心理状态术语
一	30	0.93 ± 0.74	1.40 ± 1.19	0.83 ± 0.79	0.20 ± 0.48	0.53 ± 0.86
二	31	0.77 ± 0.72	1.32 ± 1.01	1.29 ± 0.94	0.29 ± 0.53	0.90 ± 0.87
三	31	1.94 ± 1.12	2.94 ± 1.21	1.74 ± 1.09	0.74 ± 0.82	1.39 ± 1.26
四	31	2.23 ± 1.33	2.87 ± 1.43	2.00 ± 1.00	0.90 ± 0.91	2.00 ± 1.61
五	30	2.20 ± 1.52	2.97 ± 1.73	2.07 ± 1.34	1.33 ± 1.18	2.60 ± 1.61

针对每种术语使用的年龄发展趋势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想法术语的年级主效应显著 ($F(4,148) = 11.89, p < 0.01, \eta_p^2 = 0.24$);情绪术语的年级主效应显著 ($F(4,148) = 12.58, p < 0.01, \eta_p^2 = 0.25$);愿望术语的年级主效应显著 ($F(4,148) = 7.45, p < 0.01, \eta_p^2 = 0.17$);肯定程度词的年级主效应显著 ($F(4,148) = 9.60, p < 0.01, \eta_p^2 = 0.21$);其他术语的年级主效应显著 ($F(4,148) = 12.62, p < 0.01, \eta_p^2 = 0.25$)。对上述五个主效应的事后检验(LSD),总体

情况是:一、二年级间差异不显著($p > 0.05$),但它们皆显著低于三至五年级,三至五年级间有些内容(想法术语、情绪术语、愿望术语)差异也不显著,有些内容(肯定程度词和其他心理状态术语)是三、四年级间不显著,但都低于五年级。这说明了一个总趋势,即:二至三年级是五种心理状态术语使用能力的发展加速期,而四至五年级则是一些术语使用能力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加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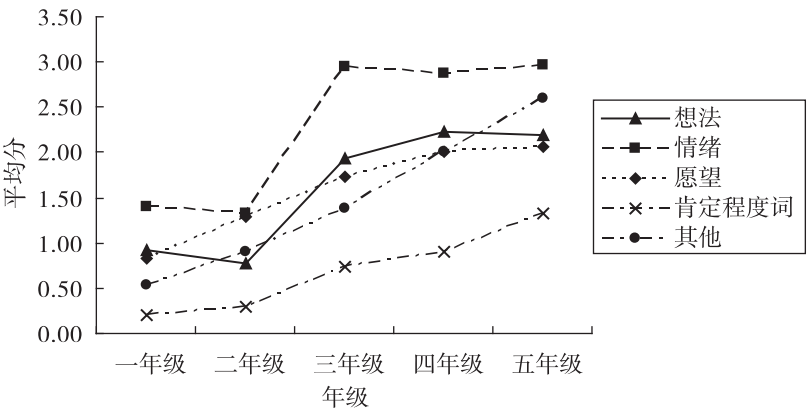


图1 各年级被试对不同类型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成绩

四、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小学生在口述和写作两种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的,而且在两种方式下发展的趋势较为一致。对于一至五年级的儿童来说,在写作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都要高于在口述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桑标等人^①曾考察过幼儿在口述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是不断提高的。本研究将被试变成了小学生,但结果与他们相一致。本研究还发现小学生在写作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同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二至三年级是儿童在写作方式下心理状态术语使用能力开始发展的重要转折期。结合与实验同时开展的调查,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学校从二年级开始对小学生进行写作训练有关。一年级学生写作框架单一、内容简单,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写作入门,所以基本上是通过看图写话来帮助学生进行写作,而教师指导也只是帮助学生理解图画的意思即可,很少对作文的内容和思想进行分析。此外,一年级学生在写作文章时,受限于他们对文字的认识,很多时候是会说不会写,有时连相对复杂一点的汉语拼音表达

① 桑标,马丽霞:《幼儿心理状态术语的运用与心理理论的发展》,《心理科学》2004年第3期,第584-589页。

都存在困难,所以容易出现“写不出”的情况,这将直接影响他们使用心理状态术语。到二年级,这样的情况开始好转,随着会写的汉字越来越多,他们可以更好地用文字表达对一件事或者一个人的理解,所以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也在不断提高,迅速发展。

本研究还发现,每个年级在写作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成绩都要高于在口述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成绩。我们认为可以从说和写的区别上寻找解释。一般认为,写作是说话的高级加工形式,内容更简洁和完善。写作可以反复斟酌和思考,在写作过程中可以反复改动字词、变换句子、调整段落,甚至修改全篇布局。而说话就不能这样。说话是随想随说,一般不用过多地去注意词句、组织思想,所以较写作容易。就小学生而言,在说之前组织语言、整理思维的能力较差,基本上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他们说话的质量较差,自然在说话中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也较贫乏。相比写作就要好多了,同样是描述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写作可以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创作,而且字词变化也丰富多彩。比如对情绪术语的表达,在口述方式下,学生使用“高兴”“开心”的频率最高,而在写作方式下,使用形式多种多样,“欣喜若狂”“兴高采烈”“心满意足”等等,所以在写作方式下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也较好。

本研究还发现,儿童使用情绪术语的成绩显著高于使用其他所有术语的成绩,使用肯定程度词的成绩显著低于使用其他所有术语的成绩,信念术语、意图术语和其他术语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儿童对于情绪术语使用得最频繁,而对于肯定程度词使用得较少。大量研究表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遵循一个从“愿望心理学”到“信念心理学”的过程,即儿童首先依据简单的愿望和需要来理解他人的行为动机,然后才开始逐渐懂得他人也可能拥有与自己不同的信念,并据此而不是依据现实世界的状况采取某种相应的行动。^{①②} Bartsch 和 Wellman^③ 通过观察儿童的日常言语发现,在与抚养者的日常言语交流中,起初儿童没有出现任何涉及心理状态的术语,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大量使用有关愿望和情绪的动词,后来逐渐产生用来表达想法和信念的术语。桑标等人^④的研究发现,3岁儿童倾向于使用所谓的“其他用法”和愿望动词,或者没有使用,4岁儿童则较多使用习惯用语和愿望动词,5岁儿童的应用可能较多涉及真正的心理状态。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本研究中,儿童在一年级时已经基本获得了简单的愿望术语的使用能力,其后一直保持缓慢发展。而对于想法术语和情绪术语的使用,发展趋势较为一致,一至二年级时基本可以简单使用,之后发展迅速,三年级是儿童大量使用想法术语和情绪术语的关键年龄。虽然本研究的发现仅仅是横向比较的结果,并不能完全说明儿童对心理状态术语使用的特点,即具有指向愿望到指向信念的发展模式,但仍具有重要价值。

五、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果:(1)小学生在口述和写作两种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都随着年龄的增長而不断提高,都在二至三年级时出现发展的加速期;(2)一至五年级小学生在写作方式下对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能力都要高于在口述方式下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能力;(3)小学生对于情绪术语使用得最频繁,而对于肯定程度词使用得较少。本研究的结论是:小学生的心理理论使用能力在不断发展,存在着发展加速期。

(责任编辑:魏 静)

① Flavell J H, Miller P H, Social Cognition. In D. Kuhn & R. Siegler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2. Cognition,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New York: Wiley, 1998, pp. 851-898.

② Ruffman T., Slade L., Crowe E.,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and mothers' mental state language and theory-of-mind understanding, *Child Development*, 73(3), 2002, pp. 734-751.

③ Bartsch K., Wellman H M., *Children Talk about the Mi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Y, US, 1995.

④ 桑标,马丽霞:《幼儿心理状态术语的运用与心理理论的发展》,《心理科学》2004年第3期,第584-589页。

家庭教育对农村儿童自我概念影响的个案研究

吕林, 陈学军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自我概念是指个人对自身多方面行为的评价,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起着定向、调节的作用。在影响自我概念认知的多方面因素中,家庭教育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农村的发展,农村的家庭教育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该研究选取农村儿童L为被试,通过访谈及自我描述问卷,了解其对自我概念的认知。并通过观察及对父母的多次访谈探讨家庭教育隐性因素和显性因素各方面的特点。研究发现,儿童对一般自我概念、学业自我概念以及非学业自我概念三个层次的认知均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家庭教育的隐性因素和显性因素对儿童各层次的自我概念认知都有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儿童;自我概念;家庭教育;学业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35-06

一、研究背景

自我概念是个性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是自我意识的具体体现,是自我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自我概念作为自我的主要成分,反映个体自我意识现有的发展水平,同时体现为自我的体验和对自我的调节水平。^①

西方最早系统研究自我概念的心理学家是詹姆士。^②他把自我概念分为四个成分,即身体和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和纯粹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结构模型的研究经历了由单维到多维,由多阶段到多层次的发展过程。塞弗森^③提出了自我概念的等级模型,最高的层次是自我概念;第二层分为学业概念和非学业概念两个维度;第三层又将学业自我概念区分为在语文、数学、历史、英语等具体学科上的自我概念,将非学业自我概念分为社会、感情、身体三个方面的自我概念。这是第一个用学业、非学业的标准划分自我概念的模型,把自我概念与学业成绩联系起来,这种划分标准为后续自我概念的分类方式提供了良好的参考价值。^④

国内学者大都倾向于从自我意识与自我概念两者的关系上进行研究,认为自我概念作为自我的主要成分,在人格类型中处于核心地位,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身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状态的感知和主观评价,它是自我意识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集中反映着自我意识发展水平的高低。^⑤卢蜀萍^⑥曾研究了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各个阶段学生的自我概念结构,分别从身体特征、具体行为和人格特质三个维度来划分自我概念。郭晓娜^⑦将自我概念分为生理自我、能力自我、情绪自我、道德自我、学业自我和社会自我等。本研究的自我概念主要是儿童根据自己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与经验的累积,对自我的评价,借鉴塞弗森的理论,包含学业概念即数学、语文、英语等具体学科的自我概念,以及非学业概念即社会、情绪和身体的概念。

在新课改“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理念中,提出要重视对学生自我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提高儿童对自我

收稿日期:2019-03-28

作者简介:吕林,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领导与管理;陈学军,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with 政策。

① 殷绪群:《父母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心理健康及自我概念发展的相关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刘萍,王振宏:《国外自我概念研究中的理论模型建构述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③ 童宁:《农村小学生自我概念发展及其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 袁玫,黄鸥,王敏,黄婷婷:《shavelson自我概念模型中国化所引发的思考》,《学理论》2013年第21期,第250-252页。

⑤ 王宇:《农村初中留守儿童母亲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⑥ 卢蜀萍:《从认知发展的观点来看自我意识的发展》,《心理发展与教育》1985年第10期。

⑦ 郭晓娜:《中学生自我概念与行为困扰探究》,《教学与管理》2016年第30期,第73-75页。

概念的认识。对于同样处于新课改浪潮中的农村儿童来说,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非常重要。影响自我概念的诸因素,主要集中在年龄、性别、学业成就、家庭等方面,其中家庭因素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家庭教育主要指父辈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对孩子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家庭教育分为显性家庭教育和隐性家庭教育。^①显性家庭教育因素包括家长教育观念、家庭教育内容、家庭教育方式和家庭教育策略等体现家庭教育方向的因素,这些因素直接制约着家长教育子女的活动;隐性家庭教育因素包括家庭人际关系、家长道德素质、家长文化素质、家庭生活条件和家庭生活方式等影响家庭教育质量的因素。

有关研究表明,家庭是青少年自我概念形成与提升的重要场所,父母的教养风格、亲子互动模式等均影响着青少年自我概念的发展。^②

国外学者 Cooley 的镜像自我理论认为,他人的态度影响着儿童的镜像自我,并进一步提出重要他人的思想,认为儿童的镜像自我受重要他人的影响。^③康格尔等人的研究表明,那些能有效约束和监控孩子的父母可以创造更为稳定安全的环境,从而使孩子培养自信和正向的自我概念和学业自我概念。布瑞和穆勒、谢尔顿^④的研究均证明子女的自我概念和自尊等都与父母教养方式有关。

国内对于农村家庭教育与儿童自我概念的研究稍显薄弱,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是王玲凤等人^⑤的研究,即在家庭教育方式中,父母的情感温暖及理解与小学儿童的自我概念呈现显著正相关;而父母的拒绝否认、严厉与惩罚、父亲的过度保护等与小学儿童的自我概念呈现显著负相关。孙浩^⑥等人认为,自我概念主要包括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学业自我概念不仅与个体学业发展水平有关,也受他人对其学业水平及相应学习状态评价的影响,尤其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重要他人”的评价更可能为个体贴上“标签”。对于小学儿童来说,父母是他们非常关键的“重要他人”,会对其自我概念产生重大影响。

总之,在国内现有的研究中,涉及家庭教育与儿童自我概念的关系研究不多,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父母的教养方式方面,且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法,深度不足。本研究关注农村儿童自我概念及家庭教育各影响因素的特点。因为现有的针对儿童的自我概念的个案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深入解释农村家庭教育对于儿童自我概念产生的影响及其原因,从而促进其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农村儿童 L 作为研究对象,L 为女生,独生子女,2005 年出生于苏北农村。在开展研究时,L 正在读小学六年级。其家庭情况是:父亲常年在外打工,L 由母亲和祖辈共同抚养,祖辈过世后,她在一段时间内由母亲一人边工作边抚养,并且一直在农村生活。在开展研究前一年,L 与母亲一起搬至城市,和父亲共同生活。选择 L 家庭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该家庭具备了目前农村家庭的一些典型特征,如父亲在外务工,L 由祖辈和母亲照顾;二是笔者和该家庭的关系比较亲密,L 愿意吐露心声,其父母有时也会和笔者讨论一些教育的方法,有助于研究进行。

(二) 研究方法

1. 问卷法

采用自我描述问卷(SDQII)量表初步了解儿童自我概念各个层次的特征。该量表由 Mash 等人于 1984 年编制,并由陈国鹏等人修订而成。该量表适用于我国六年级至高一年级的学生,内在稳定性较好,并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向两端延伸。^⑦该量表共有 11 个分量表,共 102 项测试题,其中三个分量表涉及学业自我概念:语文、数学和一般学校情况;七个分量表涉及非学业自我概念:体能、外貌、与异性关系、与同性关系、与父母关系、诚

① 骆风:《论建立我国家庭教育的指标体系》,《学术研究》2005 年第 6 期。

② 郭晓娜:《中学生自我概念与行为困扰探究》,第 73-75 页。

③ 张景焕,满达呼,刘桂荣,张舜,窦菲菲,林崇德:《父母教养方式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社会创造力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 年第 29 期,第 595-603 页。

④ 王宇:《农村初中留守儿童母亲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 王玲凤,嵇宇虹:《小学儿童的自我概念及其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4 年第 12 期。

⑥ 孙浩,徐夫真,刘宇鹏,崔伟:《父母期望与早中青少年期内化问题的关系:有差异的中介模型》,《心理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556-562 页。

⑦ 陈国鹏,崔丽娟:《自我描述问卷II型在中国的试用报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7 年第 2 期,第 16-20 页。

实—可信赖和情绪稳定性等方面;还有一个分量表涉及一般自我概念。每一题都有 6 种答案供选择,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为“1—6”分,对 53 个项目进行反向计分后,得分越高,则自我概念水平越高。

2. 观察法

为了深入地了解 L 的家庭教育情况,笔者对该家庭多个方面进行客观观察,包括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L 的行为等,以求呈现出 L 最真实的家庭生活。

3. 访谈法

为了弥补观察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对家长及 L 都实施正式和非正式的访谈,旨在了解家长的教养方式、教育理念、文化素质、职位高低及 L 对于自己的看法、评价,使研究更加详细周全。

4. 文本分析法

搜集 L 的日记以及在社交网络发布的动态、言语记录等,加深对 L 成长过程中自我概念发展的了解。

三、研究结果

通过自我描述问卷对 L 的自我概念有一个初步了解。由于一般自我概念的题目涉及的内容较为零散,因此本研究中一般自我概念的研究结果主要以访谈的形式呈现,表 1 主要统计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各项目得分:

表 1 L 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情况

		学业自我概念得分					
		语文		数学		一般学校情况	
L 常模 对比		33		23		30	
		28.68		27.62		25.81	
		+4.32		-4.62		+4.19	
		非学业自我概念得分					
	体能	外貌	与异性关系	与同性关系	与父母关系	诚实—可信赖性	情绪稳定性
L 常模 对比	31	30	33	46	24	21	24
	23.87	23.62	26.06	23.94	29.68	24.63	30.37
	+7.13	+6.38	+6.94	+22.06	-5.68	-3.63	-6.37

陈国鹏和崔丽娟等人在《自我描述问卷Ⅱ型在中国的试用报告》中统计了中国女童各个项目的得分。通过对比常模数据,我们对 L 的自我概念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同时,依据自我描述问卷所得出的结果,笔者又对 L 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以求进一步了解其自我概念。

(一) 一般自我概念

1. 目标自我概念

L 的目标自我概念较低,表现在对于自己的各科成绩没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对以后的发展没有标准定位。研究表明,积极的自我概念与学习成绩产生良性循环,反之则学习成绩差导致消极自我概念,进而带来消极自我期望。可能正是因为一些学科成绩差,所以 L 对自己期望较低,导致目标自我概念较低。^①

这一表现与家长的教育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骆风认为,教育观念的核心是教育目标。在长时间的观察中发现,L 父母对于孩子之前的成绩表现不太满意,所以时常怀疑孩子未来的发展。父母不经意间开玩笑常说的那句“你能考上护校就不错了”的话,对 L 的自身目标定位产生了消极影响,以至于 L 在访谈时谈到自己的目标时一直犹犹豫豫,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位。

2. 兴趣自我概念

观察和访谈的结果显示,L 的兴趣自我概念比较低,具体表现在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没有明确的认识,且对曾经的兴趣爱好没有足够的坚持。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从家庭教育内容来看,父母干预过多,重文化轻兴趣。家长限制了 L 的兴趣爱好,他们过度强调文化教育,轻视兴趣开发,当 L 表现出想学画画的意愿时,父母认为画画是在浪费时间,致使 L 将“画画是没用的”这一观点内化,从而把提高学习成绩当作宗旨。已有研究表明,父母的过分干涉与小学儿童的自我概

① 郭晓娜:《中学生自我概念与行为困扰探究》,第 73-75 页。

念的发展呈显著负相关。^①

其次,从家庭教育观念来看,家长认为L的目标是好好学习,能够获取高学历,而不是学习画画。正是因为这种观念让L觉得学画画不是她的目标,好成绩才是目标,为了获取好成绩放弃画画,从而造成兴趣自我概念偏低。

最后,从家庭水平来看,该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不富裕,而家长的收入及家庭的物质生活,都与他们的价值观密切相关,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发展。^② L父母的大部分积蓄都投资在L的课后辅导上,没有多余的钱支撑L的兴趣班费用。L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她认为自己既然不能专业学画画,肯定没有其他人画得好,于是对自己的兴趣概念降低,逐渐就放弃画画了。

3. 自控能力自我概念

L在学习方面的自我控制能力较低,在访谈的时候,她承认自己有时也会受母亲的影响边看电视边写作业,或者边听歌边写作业。

这一结果跟家长的教育方式有一定的关联。鲍姆林特将家庭教育方式分为四类,分别是:溺爱型、民主型、专制型和放任型。专制型的教育方式,体现为孩子受父母过多的支配,从而被动性强,易服从;放任型的教育方式,易导致孩子缺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较差。^③ 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L的父亲都是在外地打工,母亲承担了更多的家庭重担以及教养子女的责任,不论是在陪伴子女的时间上还是面对子女的问题上,投入的精力都相对不足。^④ 所以L母亲有时采取放任型的教育方式,忙于干自己的事情,稍有闲暇便用来看电视娱乐消遣,并不顾及对孩子的影响,所以导致L自控能力较差。

(二) 学业自我概念

1. 语文自我概念

L语文成绩较好,对于语文成绩的自我概念较高。研究表明,当一门成绩非常优秀时,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克服学习困难的动力。^⑤ 虽然L知道自己在语文学习上有相对优势,但她不清楚哪些是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如她不能很好地选择适合自己年龄的读物。其原因可能是母亲没有甄选适合孩子的书籍。母亲给L挑选的课外读物,大多来源于L读高中的表姐,书籍与L的年龄匹配度不高。同时,在L阅读这类“高深”的课外书时,因其母亲文化水平的限制,所以没有能力给其提供指导。

2. 数学自我概念

L数学成绩的自我概念较低。在访谈中,她甚至说自己的数学是“怎么都学不好了”。研究发现,学生的学习成绩与学业自我概念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且数学自我概念与数学成绩的相关性高于其他自我概念。正是因为数学成绩长期较差,所以L数学自我概念较低,甚至对数学学习,已经形成了习得性无助。L数学自我概念低下,与家庭策略调整和家长文化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从家庭策略调整来看,L的父亲为了让L接受良好的教育,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所以费尽心思接孩子来城里读书。但进城后,L数学下滑了不少。对此,L表示自己很难跟上城里的讲课进度,导致成绩落后,自信心受挫。

其次,从家长文化素质来看,L的父母是初中文化,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教育孩子,从而将L的教育完全依赖于学校教育和辅导班的老师,家庭教育意识不强。但同时对孩子的期望却很高,他们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将来跳出“农门”,对于孩子的学习成绩抱有较高的期望。正是因为过高的期待与孩子的现状存在矛盾,数学成绩的下滑,使L有了极大的挫败感,因此导致自我概念低下。

3. 一般学校情况的自我概念

L一般学校情况的自我概念偏低。观察发现,L对学习已经产生了倦怠心理,只要提到与学习相关的内容,她常常会表现出不耐烦,并且在写作业的时候会找很多理由推脱。

研究表明,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倦怠显著正相关。具体表现为,体验到越多父母情感温暖的学生

① 殷绪群:《父母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心理健康及自我概念发展的相关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 洪校玲:《家庭教育模式与小学儿童自我概念发展的相互关系》,《科教导刊(上旬刊)》2010年第2期,第12-13页。

③ 黎利:《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的个案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 王宇:《农村初中留守儿童母亲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 王宇:《农村初中留守儿童母亲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习成绩的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越不易出现学业倦怠,而父母更多使用拒绝与惩罚教养方式的学生更易产生学业倦怠。^① 在本研究中,父母只要感觉 L 的学习成绩或作业情况等表现不好时,就会大声训斥 L,有时父亲甚至会动手,正是因为这种严格、惩罚式的教养方式,导致 L 的一般学校情况的自我概念偏低。

(三) 非学业自我概念

1. 异性关系、同性关系自我概念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L 在同性关系自我概念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异性关系的自我概念得分,访谈也显示 L 的女性朋友多于男性。

这一结果与家庭教育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关鸿羽在其 1995 年出版的《家庭教育学》中指出,家庭教育的内容包含人际交往指导。L 父亲在平时的交谈中常常有意无意地引导孩子多和女生交朋友,并且曾因为 L 和男生在网络上聊天而训斥了她。

2. 亲子关系自我概念

L 表现出亲子关系的自我概念偏消极,有时候宁愿一人独处也不愿和父母在一起,甚至有时父亲打电话,L 都不愿去接。

研究发现,父母如果对孩子的日常活动、学习及交友情况进行过多的限制和干涉,就会导致儿童做事过分小心翼翼,害怕自己的行为不符合父母的要求而过分紧张,这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更不利于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② L 父亲重视惩罚,对 L 成绩不满时,就会大声呵斥她,甚至动手。即使平时通电话,也只是询问成绩,所以 L 不愿意接他的电话。

3. 诚实—可依赖性自我概念

L 诚实—可依赖性自我概念得分偏低,在研究过程中 L 承认自己有时会撒谎。

从家庭教育内容来看,L 父母极少对 L 进行道德教育,因此难以起到预防作用。有时母亲对 L 撒的一些小谎的忽视,纵容了 L 的撒谎行为;同时父母在发现 L 撒谎后采取的呵斥、惩罚等严厉手段也不利于孩子撒谎行为的改善。

从家长道德素质来看,家长自身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撒谎,忽视了儿童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模仿,所以在不经意间使孩子形成了较低的诚实—可依赖性自我概念。

4. 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

L 的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较低,具体表现为在家的時候她时而情绪紧张,时而心情放松。

这一结果与家庭教养方式有较大的关系。研究表明,父母的严厉惩罚、过分干涉和过分保护以及拒绝否认不利于儿童自我概念的形成,儿童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会更多地形成对自己负面的自我认识和评价,长期下去则很可能产生其他的行为和情绪问题。^③

L 表示,父母有时对自己不错,会与她开玩笑,在这种状态下,她是放松的。但是由于 L 的数学成绩太差,如果不小心谈及数学方面的话题,父母可能会突然发脾气,父亲会大声呵斥甚至动手打她。正是因为这种严厉的教养方式,使得 L 情绪时常有较大的波动,这也是其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发展偏消极的原因之一。

四、研究结论

(一) 家庭教育中,显性因素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影响较大,且主要影响学业自我概念

儿童的学业自我概念中,受家庭教育影响较多的是目标、兴趣、数学等自我概念。显性家庭教育因素直接制约着家长教育子女的活动,对于儿童上述自我概念的影响较大。在显性因素中,受影响最多的是家长的教育观念(教育目标)、家长的教育内容以及家长的教养方式。

教育观念影响着孩子对于自己的期望,并进而影响孩子对自身的目标定位。家长的教育内容包括学习和道德品质方面等,都对儿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对于自己“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很大程度上会参考父母的行为。

^① 罗云,陈爱红,王振宏:《父母教养方式与中学生学业倦怠的关系: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 年第 1 期,第 65-72 页。

^② 郎茜玥,褊诗韵:《父亲教养方式对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求知导刊》2015 年第 22 期,第 37-39 页。

^③ 殷绪群:《父母教养方式与小学生心理健康及自我概念发展的相关研究》,河北师范大学 2012 年硕士学位论文。

家长的教养方式对于儿童自我概念的重要性,在诸多文献中均有阐述。在本研究中,母亲放任型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自控能力产生了消极影响,而父亲专制型的教养方式又使得 L 的一般学校情况的自我概念偏低。

(二) 家庭教育中,隐性因素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影响较少,且主要影响非学业自我概念

儿童的非学业自我概念主要受隐性因素影响,且影响最多的是亲子关系、异性—同性关系、诚实—可信赖性这几个人格品质。隐性家庭教育因素包括家庭人际关系、家长道德素质、家长文化素质、家长生活水平等制约家庭教育质量的因素。

家长的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常常会影响其价值观,儿童的亲子关系、异性—同性关系、情绪稳定性等的自我概念有很大一部分受家长的人际关系影响;儿童的诚实—可信赖性则受家长道德素质影响较多。

对于十几岁的儿童来说,他们的人际交往方式以及大多数道德品质的习得往往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所以家庭的隐性教育因素对儿童的非学业自我概念,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五、建议

(一) 一般自我概念方面

家长只有建立合理的期望,才能促进儿童形成积极的目标自我概念。Jeynes 和 Hattie 都得出这样的结论:父母高度且合理的期望是家庭中父母参与最强大的组成部分。过高的期望以及过于严格的表达方式会导致儿童对自己失去信心,甚至形成习得性无助。L 父母应正确认识孩子的学业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提出合理的期望,并给 L 更多的理解和鼓励,让 L 重新燃起学习的信心。

(二) 学业自我概念方面

1. 陪伴孩子学习,加强家长参与,提高儿童的学业自我概念

Risley 和 Hart 认为,与孩子一起的早期言语交流和阅读,会比那些没有早期刺激的孩子更早习得阅读能力。L 父母几乎从来没有陪孩子一起学习,所以不了解 L 的学习情况,不知道给孩子挑选合适的阅读书目。建议家长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增加在孩子学习中的参与程度,给孩子提供适当、良性的指导。

2. 了解儿童身心发展特点,采取适合的教育方法,提高儿童各科学业自我概念

家长参与孩子的学习,要采用合适的教育方法。首先不能一味地进行打骂或横加干涉,更不能“不懂”孩子,应弄清孩子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掌握孩子的个性特点。家长的教育方法要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如选择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文学读物,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学业自我概念。

其次,切忌盲目跟风,应采取合适的家庭策略帮助孩子提高学业成就。本研究中,父母为了让 L 接受更优质的教育,举家从农村迁至城市。L 在接受优质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不耐受”的现象,无法跟上课堂的上课节奏,从而出现了数学成绩的大倒退。因此,家长在为孩子选择教育环境的时候,应该选择适合的教育。即使要选择“优质教育”,也应该给孩子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并帮助孩子进行合理的调整,防止适得其反。

(三) 非学业自我概念方面

1. 采用民主型的教养方式,与儿童平等沟通,促进儿童对人际交往关系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

本研究表明,父亲过于严厉的教养方式使得 L 即使“有苦”也“不敢言”,从而使父女关系疏远,L 的亲子关系自我概念偏向消极。而母亲放任式的教养方式,使其对 L 的了解较少,进而致使母女关系越来越疏离。建议父母采取民主型的教养方式,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需要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互相支持;需要家长与孩子之间形成民主平等的关系,让孩子在轻松有爱的氛围中形成积极向上的人际交往关系。

2. 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鼓励儿童形成良好的道德自我概念

人的最初道德观念、是非标准、为人处世的准则是从家庭中得到的。孩子出生后最先接触的人就是家长,家长的言行举止时刻都会影响着孩子以后的为人处世,尤其在道德品质方面,父母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道德教育要从小事做起,父母作为对儿童影响最大的“重要他人”,应该避免撒谎行为,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做个诚实守信、文明高尚的人,才能成为子女的一面“明镜”。

(责任编辑:魏 静)

兼性共生:苏轼诗、佛关系新论

关鹏飞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 要:诗佛关系由兼性共生转向专性共生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苏轼的诗佛关系研究,经王文诰辩驳才得以重新纳入研究视野。这种兼性共生关系极其复杂:一方面,它体现在佛学作为思想资源之一对诗观与诗风的影响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诗论与佛理二者对阐释策略的需求上。前者是诗佛关系中先天存在的,后者则是经过作者创造性关联阐释后才新建起来的。通过对苏轼诗佛关系的重新审视,可对诗佛关系研究的错误认知有所廓清。

关键词:诗佛关系;兼性共生;苏轼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41-07

诗学与佛学的关系(尤其是诗禅关系),历来受到诗人、诗僧、诗论家和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在具体问题与理论阐释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果。但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不健康的倾向,即把诗、佛的先天关系与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后天关系混为一谈,从而造成诗、佛关系研究的失序。诗学与佛学本身拥有很多共同之处,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诗佛关系获得历史发展的起点。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传播环境、接受身份、使用语境发生巨变,诗佛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忽略这种复杂性而笼统地加以研究,得出的结论难免偏颇。历史地看,诗佛关系呈现出由“兼性共生”向“专性共生”^①发展的趋势,即诗佛(主要表现为诗禅)的紧密度不断加强。由于诗佛分属艺术与宗教的不同门类,“专性共生”始终没有成为普遍的历史事实,而“兼性共生”则成为诗佛关系中的主流。这一方面揭示出诗、佛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为重新反思佛学影响诗学提供新的角度。本文即通过“兼性共生”视角,廓清苏轼诗佛关系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从而推动苏轼研究乃至整个诗佛关系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重回兼性共生:查慎行、王文诰之争的实质

北宋到南宋,诗佛关系尤其是诗禅关系越来越紧密,呈现出由兼性共生向专性共生转向的趋势。苏轼虽提出“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但只把诗中的好诗(尤其是佳处)跟参禅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拿诗中的极小部分跟禅结合。而到严羽以禅喻诗^②，“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③(但严羽并没有证明这一点)，通过禅道、诗道之妙悟，把诗与禅紧密捆绑，在禅中分其高低(临济宗、曹洞宗)，并以禅派之高低来取舍诗艺之上下，不仅诗之全体与禅对应，而且不符合诗道的诗歌被剔除出去。这实际上已经是以前禅道来规范诗道，严羽是在以前禅道(他所认为的诗道)来评鹭诗歌，诗歌成为禅道的体现者，诗歌已很难离开禅。这种倾向到王士禛手中发展为以禅论诗，达

收稿日期:2019-01-15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北宋士人画与诗学研究”(19YJC751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关鹏飞,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与文献。

① 所谓“兼性共生”(facultative symbiosis)与“专性共生”(obligate symbiosis),是笔者借用生态学概念,二者同属于共生关系(mutualism),即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互依赖,长期共存。有的共生关系只是提高共生生物的生存几率,但并不是必须的,叫做兼性共生;有的共生生物需要借助共生关系来维系生命,这属于专性共生。诗佛关系,从皎然、齐己、王维、苏轼、参寥等诗人、诗僧身上来看,主要呈现出兼性共生的互惠关系,后严羽等开始以禅喻诗,诗佛关系渐渐呈现出严重的依赖现象,有专性共生的倾向。

② 可参看拙稿:《严羽的诗学批评方法及其原因——以辨体与以禅喻诗为中心》,《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③ 张健:《沧浪诗话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到顶点。

诗禅关系中的兼性共生与专性共生倾向,在后世分别得到继承与发展,在宗宋的清代诗人、学者面前更加凸显^①。体现在苏轼研究中,主要以查慎行、王文诰对苏轼“雪泥鸿爪”的争论上。嘉祐六年(1061),苏轼26岁,出任签署凤翔府判官。苏辙虽被任为商州推官,但因苏洵在京编修《太常因革礼》,无人照料,故留京侍奉。苏辙送苏轼赴职,在郑州分开后,折返汴京,并创作《怀渑池寄子瞻兄》。苏轼路上经过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写有一首回答苏辙的和诗,即《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创造出“雪泥鸿爪”的有名比喻:“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②这个比喻的独创性原无可怀疑,直到查慎行指出苏轼引用天衣义怀禅语,问题才复杂起来。

查慎行在《补注东坡编年诗》卷三中解释“飞鸿留爪”时云:“《传灯录》:天衣义怀禅师云:‘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迹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异类中行。’先生此诗,前四句暗用此话。”^③对于查慎行的看法,后人或赞同,或反驳。赞同者,如冯应榴虽然指出天衣义怀禅语出自《五灯会元》而非《传灯录》,但在《苏轼诗集合注》中加以引用,且云:“陈溪云:‘雪泥鸿爪当出佛经。’马含中《雪》诗:‘不注飞鸿注蹇驴。’盖讥坡诗注之陋也。俟再考。”^④冯应榴比较倾向于认可查慎行的观点。反驳者,主要以王文诰为代表。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三中说:“公后与王彭遇,始闻释氏之说,本案已立专条,非比往时注家指东画西皆可附会也。查注引《传灯录》义怀语,谓此四句本诸义怀,诬枉已极。凡此类诗,皆性灵所发,实以禅语,则诗为糟粕,句非语录,况公是时并未闻语录乎?《敬业堂集》清通幽秀之句不乏,今概以禅语实之,如初白有知,能不奋然怒骂以头抢地下乎?合注不知删驳,反谓义怀语出《五灯会元》,不出《传灯录》,可谓以五十步笑百步矣。”^⑤对于前人争论,后世学者在论述佛学影响苏轼时依然多赞同查慎行的观点。比较而言,王水照之说较为通脱:“苏辙原诗开头两句云:‘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苏轼从‘雪泥’引发,变实写为虚拟,创造出‘雪泥鸿爪’的有名比喻,喻指往事所留痕迹,以表示人生的偶然、无定之慨,不必拘泥佛典。”^⑥

综合以上说法,争论的核心在于苏轼“雪泥鸿爪”的灵感来源究竟是禅语还是诗语。就该问题本身来看,答案是难以确定的,因为存在诸多情况。王文诰反驳的最重要的证据,是苏轼在写这首诗之后才接触佛书(尤其是语录),其荐引人为王彭(大年)。苏轼《王大年哀词》云:“君博学精练,书无所不通。尤喜予文,每为出一篇,辄抚掌欢然终日。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⑦既然苏轼自己承认接触佛法、佛书是“盖自君发之”,那在遇见王彭之前不知道天衣义怀禅语也极为正常。但问题在于,苏轼母亲信奉佛法,且诗中已说“老僧已死成新塔”,苏轼在遇见王彭之前也与僧人有交往,而王彭对苏轼的影响,在于告诉他佛法“大略”,并佐以自身体验,从而使他“喜”佛书,并不意味着苏轼之前就肯定没有接触过。再者,苏轼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回忆王彭事迹,从而体现出对他的赞美和哀悼,因此行文之中,难免不夹杂夸张。从这种种因素考虑,要断定苏轼诗中灵感一定跟天衣义怀禅语无关,王文诰给出的证据还很难成立。

且王文诰对查慎行的反驳也颇为武断。查慎行是清初著名诗人,其《敬业堂集》中有很多好诗,王文诰想让查慎行自相矛盾,故拿其诗作中近于禅意者调侃。但是仔细分析查慎行原意,在于指出苏轼诗句有所来源,而并没有否定苏轼此诗的“性灵所发”。因为宋诗尤其是苏诗的很大特点,在于诗有所本而又为其所用,指出苏诗的语料来源,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否定其伟大。查慎行如有此目的,何必浪费大量时间、精力为苏诗作注?而王文诰仅仅因为查慎行指出语典,便说“实以禅语,则诗为糟粕”,实在反应过激。王文诰拿查慎行创作的“清通幽秀”之诗与禅语相比,但苏轼“雪泥鸿爪”之喻,“清通”之处或有,“幽秀”之意实无,二者不可

① 这里略作统计。坚持专性共生倾向者,如王世懋《艺圃撷余》、安磐《颐山诗话》、张以宁《翠屏集》卷三《李明举诗集序》等;批评严羽之论中,也有主张诗禅关系密切者,如冯班《钝吟杂录·严氏纠缪》,虽然指出严羽不懂禅,但言下之意仍然没有对诗禅关系的专性共生倾向有所怀疑。坚持兼性共生者,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全宋诗话》等。

②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页。

③ 查慎行著,王友胜点校:《苏诗补注》,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④ 冯应榴著,黄任轲、朱怀春校:《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⑤ 王文诰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7页。

⑥ 王水照:《苏轼选集》修订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页。

⑦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65页。

相提并论。因此,王文诰之语或别有用意。

其关键看法在“凡此类诗,皆性灵所发,实以禅语,则诗为糟粕”一句。与查慎行从诗歌用典创作角度出发不同,王文诰从诗歌鉴赏的角度出发,认为此类性灵所发之诗,如果用禅语坐实,则有损诗艺,使诗歌成为糟粕。王文诰的担忧自有历史依据,其讨论的核心问题并非苏轼是否运用禅语入诗,而在于是否要用禅语才能解释诗中妙处。为证明诗中妙处实为性灵所发,而非禅意,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截断诗句与禅语的联系,一旦诗句与禅语无关,从禅意角度鉴赏诗歌的途径也就不复存在。

以严羽以禅喻诗和王士禛以禅论诗为标志,诗与禅的关系倾向于专性共生,即诗日渐趋向于离不开禅。这种过度忽略诗歌本身特点而与禅捆绑的做法,不仅使诗歌受到损害,更对诗佛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王文诰的做法,是对这种专性共生倾向的反动,虽然矫枉过正,其重回兼性共生的客观价值却不容否定。他提醒人们拨开禅之迷雾,直接欣赏诗之妙处,无疑扩大了诗之境界,丰富了诗之内涵,而这正与苏诗的特点一致。虽然苏轼主张“诗法不相妨”,即佛学与诗学不是互相妨碍,而是彼此助益,但以苏轼海纳百川的气概,他是把佛学作为诗歌资源之一和阐释资源之一而加以吸收的。那些看似继承苏轼诗佛观点的诗论家^①,实际上却是背离;王文诰看似矛盾,却真正契合。下文从诗歌资源和阐释资源两方面论述苏轼诗、佛关系的兼性共生特点。

二、从诗观到诗风:诗学思想来源层面的兼性共生

在苏轼诗佛关系研究中,学者喜欢把苏轼的某些诗学特点归结于佛学修养。如前文所述,这是颇为片面的观点。为更好地加以证明,不妨对苏诗从诗观到诗风的各方面分别论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佛学作为思想资源,其根本影响所在,表现在诗学上,是针对诗学思想发生效果的,即佛学扮演着思想来源的作用,这在诗人的诗歌观念和作品体现出来的诗歌风格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需要强调的是,佛学尽管在文本层面也对苏轼作品存在一定影响,如贬谪黄州后创作一些类似佛语的作品,《与滕达道五首》其二云:“自得罪以来,不敢作诗文字。近有成都僧惟简者,本一族兄,甚有道行,坚来要作《经藏碑》,却之不可。遂与变格都作迦语,贵无可笺注。”^②又如苏轼创作的大量偈语作品。但它们都不是常识意义上的诗歌,因此不纳入诗佛关系的考察之中。

苏轼的诗观极为复杂,其中与佛学关系最密切的是空静诗观。空静诗观出自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所作《送参寥师》:“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③从这首诗的诗题及其诗意来看,空静观来自佛学是毫无疑问的。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佛学思想,苏轼是否就缺失这一诗观?这就需要先揭示这首诗的写作目的,其次对涉及到的观念追本溯源。

该诗是送给参寥(即释道潜)的,诗中说“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联系到全诗对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表达的“僧人达不到艺术高境”观点的否定,则该诗是对作为僧人的参寥写诗的支持。无独有偶,两年之后,苏轼又在书信中更加明确地表达对参寥写诗的支持,元丰三年(1080)《与参寥子》其二云:“笔力愈老健清熟,过于向之所见,此于至道,殊不相妨,何为废之耶?”^④既然全诗的目的,是为鼓励写诗的僧人朋友,那么在诗中阐发僧人易懂的佛理,针对朋友的困惑而有的放矢地表达诗观,就再正常不过了。且作为苏轼的好朋友,参寥在《再哭东坡》四首其四中也说:“当年吴会友名缙(自注:大觉,海月,辩才),尽是人天大导师。拔俗高标元自悟,妙明真觉本何疑。”^⑤参寥认为,苏轼在大觉、海月、辩才这些“人天大导师”面前,也是“自悟”到“妙明真觉”,而非受佛学影响,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因为苏轼该诗涉及佛理,而认为他诗中的空静观便完全源于佛学呢?

其实,苏轼不止一次表达类似观点。早在“喜”佛书之前就表达过,嘉祐六年(1061)《上曾丞相书》云:“轼不佞,自为学至今,十有五年。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

① 如严羽,这就难怪严羽吸收苏轼观点却反而批评苏轼,详见《沧浪诗话》。

②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20册,第8586页。

③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3册,第1892-1893页。

④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18册,第6706页。

⑤ 释道潜著,高慎涛、张昌红编写:《参寥子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页。

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①以天地“无私”的儒家易理推演“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的道理。约熙宁二年(1069)《祭刘原父文》也说:“惟其至明,以有众无。譬如鉴然,物至而受。罔有不照,斯以为富。”^②这都与空静诗观的重要论点一致。

当然,此类观点与道家思想的关系更为密切。老庄也讲“故常无欲,以观其妙”^③。在苏轼自己的作品中,以绍圣五年(1098)《众妙堂记》较有代表性。该文中说:“……其徒有诵《老子》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予曰:‘妙一而已,容有众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审妙也,虽众可也。’因指洒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复视之,则二人者手若风雨,而步中规矩,盖焕然雾除,霍然云散。予惊叹曰:‘妙盖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斫,信矣。’二人者释技而上,曰:‘子未睹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与道相半,习与空相会,非无挟而径造者也。子亦见夫蜩与鸡乎?夫蜩登木而号,不知止也。夫鸡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与伏也,则无视无听,无饥无渴,默化于荒忽之中,候伺于毫发之间,虽圣智不及也……’”^④先看“妙一而已”,“一”与“众”相对,可以看作我与万物相对,则这一阶段是有我之境;第二阶段是以我放之万物,皆为可观,即“若审妙也,虽众可也”,对其他思想进行吸收,表现在艺术上,是“技与道相半,习与空相会”;第三阶段是无我而万物莫非我者的境界,表现在艺术上,就是“无挟而径造”。其《广州何道士众妙堂》诗表达的意思也如此^⑤。

由此可见,空静诗观乃是苏轼吸收儒、释、道思想观念^⑥,并在自身的诗歌创作中学习、体会、探索、总结出来的,而不能说没有佛学就一定不会产生。与此类似的情况也体现在苏轼诗风上面。作为苏诗艺术风格特色之一的博喻,也并非仅仅来自佛学,而与儒家礼学颇有渊源。

元丰八年(1078)十月,苏轼作有《百步洪二首》,其一云:“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鳧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⑦此诗历来受到激赏^⑧,钱锺书将之定义为“博喻”,其《宋诗选注》解题云:“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⑨那么,苏轼的博喻风格究竟来源于何处呢?

从历史上看,人们对这一问题给出至少三种答案。一是认为来自《庄子》,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二:“惜抱先生曰:‘此诗之妙,诗人无及之者也,惟有《庄子》耳。’余谓此全从《华严》来。”^⑩惜抱先生即姚鼐,他虽是第一种答案,而方东树的看法则是第二种答案,即从佛典而来,同样看法的还有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二云:“‘兔走’四句,从六如来,从韩文‘烛照’‘龟卜’来。”^⑪六如指《金刚经》。尽管钱锺书也指出博喻从《庄子·天运》篇中来,但早从方东树开始,来自《庄子》的说法便受到佛学的挑战,而佛学观点也得到后世研究者的普遍留意与赞同。至于钱先生指出《诗经》中已有此类写法,陈衍所说的韩愈之文,则属于第三种答案,但由于仅仅是诗文内部的承继,而与老释相去甚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钱锺书还说:“上古理论家早已着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这一点上,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⑫“上古理论家”的资料是指《礼记》第十八《学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但钱氏对其重要性的关注不够。通过分析、补充这一点,我们起码可以把第三种答案的重要性提到跟老、释同样的地位上。

①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16册,第5199页。

②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18册,第6998页。

③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④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11册,第1142-1143页。

⑤ 尤其是末句“欲收月魄餐日魂,我自日月谁使吞”,把“我”与“日月”合为一体。

⑥ 事实上,苏轼在吸收各家思想的基础上,已经形成自身的思想,如张志烈就认为苏轼“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张志烈:《诗性智慧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⑦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3册,第1859页。

⑧ 如赵翼《宋金元三家诗选》批语:“六七层譬喻,一气喷出,而不觉其拉杂,岂非奇作?”纪昀《纪评苏诗》卷十七:“只用一‘有如’贯下,便脱去连比之调,一句两比,尤为创格。”

⑨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⑩ 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99页。

⑪ 陈衍:《宋诗精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⑫ 钱锺书:《宋诗选注》,第63页。

首先,博喻一词较早地出现在《礼记》之中,与儒家思想关系密切。《礼记正义·学记》第十八:“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玄注:“博依,广譬喻也。”^①孔颖达疏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者,此教诗法者。诗是乐歌,故次乐也。博,广也。依谓依倚也,谓依附。譬,喻也。若欲学诗,先依倚广博譬喻。若不学广博譬喻,则不能安善其诗。以诗譬喻故也。”^②《学记》又云:“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孔颖达疏:“然后能博喻者,博喻,广晓也。若知四事为主,触类长之,后乃得为广有晓解也。”^③博依与博喻之解释,郑、孔看似不同,实则一致。譬喻者,以其易晓也。故《礼记》之文多譬喻,尤其是博喻。而博喻的关键就在于类比,其云:“古之学者,比物丑类。”孔颖达疏:“比物丑类者,既明学者仍见旧事,又须以时事相比方也。物,事也。言古之学者,比方其事以丑类,谓以同类之事相比方,则事学乃易成。既云古学如斯,则今学岂不然?”《学记》于“比物丑类”后,即加以实践:“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孔颖达疏:“此经论师道之要,以余事譬之。此以下四章,皆上比物丑类也。”^④所云甚是。

而苏轼继承苏洵礼学,对《礼记》极为熟悉,自然受其影响,在诗中也有精妙运用。从礼仪方面来看,如元丰七年(1084)八月《秦少游梦发殡而葬之者》,云是刘发之柩。是岁发首荐,秦以诗贺之,刘涇亦作。因次其韵:“仕而未禄犹宾客,待以纯臣盖非古。馈焉曰献称寡君,岂比公卿相尔汝。”^⑤语出《礼记·檀弓下》“仕而未有禄者”。从礼情方面来看,则更明显,绍圣二年(1095)《游博罗香积寺》,其叙云:“寺去县七里,三山犬牙,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寺下溪水,可作碓磨。若筑塘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轮举四杵也。以属县令林扑,使督成之。”^⑥叶矫然云:“《礼运》云:‘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此四语浑穆广大,未易形容。因忆杜诗‘四邻出耒耜,何必吾家操’,即此意义。又东坡《游博罗香积寺》诗引云:……坡公远谪潮、惠,见溪水可作碓利民,便殷勤督邑令兴事。此亦‘恶其弃于地’,‘不必为己’念头。乃知贤者用心恺惻,两公皆然。岂如今之诗人率尔咏歌哉?”^⑦叶矫然所言不错。绍圣二年(1095)《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其六即云:“力恶不已出,时哉非汝争。”^⑧礼学对苏轼的诗歌构思也有影响。嘉祐五年(1060)《食雉》前面写雄雉好斗,却不能免于与鸡鸭一同烹食的命运。结句却引《礼记·月令》“孟冬,雉入大水为蜃”提醒读者,一旦雉化为蜃,就能吸食海上飞鸟:“谁知化为蜃,海上落飞鸦。”^⑨言下之意,为雉勇于小斗殒命而不得成其大观感到遗憾,立意高远,难怪谭元春评曰:“甚古。”^⑩

其次,学界虽然没有对博喻的统一定义,但经过分析可以发现,苏轼中的博喻,跟佛典中的博喻存在一些不同,而这些不同却跟《礼记》中的博喻较为一致。刘正平说:“譬喻是在进行解释,而理解又必须通过原譬喻语言进行再解释。在此一过程中,理解和解释的关系即如藏识与转识的关系,是处于因果关系的循环链之中的。分喻为解释语言和文本语言提供了某种开放平台,我们已有的知识转化为意相而参与到文本之中而产生新的理解。虽然对于每个喻依的理解,每个人根据各自知识背景的不同会产生差异,但这种差异经过喻依各支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减弱了,之后叠加融合出来的意义更具有理解的共同性。”^⑪这种“共同性”使佛学中的博喻(佛学中称为分喻,如著名的幻法六喻)虽然也起到说理的作用,但更多地带有笼统性,即统一在一个意思之中,笼统不分。因此,尽管刘先生在文章中多次强调分喻的不同喻依“代表不同的意义层面”,但这个意义层面却是根本无法一一分析的,如《如来藏经》中的九喻,刘先生总体分析为“经中以九种譬喻说明如来法身自性清静,虽为无明烦恼所覆,然法身终不为烦恼所染的道理”,细分则只能分到喻体和喻依的层级,“每一个譬喻都有两部分组成,菱花、岩树、不净处等代表世俗的无明烦恼,而佛、蜂蜜、金等代表清净法

① 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299页上栏。

② 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第3299页下栏。

③ 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第3302页上栏。

④ 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第3304页上栏。

⑤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4册,第2665页。

⑥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4536-4537页。

⑦ 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⑧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4556页。

⑨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1册,第159页。

⑩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1册,第160页。

⑪ 刘正平:《佛教譬喻理论研究》,《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92页。

身”^①。而在苏轼的博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分类明确、递进的特点,这与礼学有关。

依然以“雪泥鸿爪”为例。前两句是把人生所到之处比作飞鸿所踏之雪泥,在雪泥之间,鸿飞不定,人于所处之地,不也是漂泊不定吗?这是第一层。紧接着两句,是把视野进一步局限到一个地点,即诗题中的“浍池”,在诗句中则比喻成偶然留下指爪的雪泥,而把自己和苏辙比喻作东西飞之鸿^②,这是第二层。联系最后两句“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实际上诗人是把“往日”之事比作雪泥上的指爪,而把那些没来的时间在空间上展开的不确定性比作不计东西的飞鸿:在同一时间层面,鸿雁确实不计东西,而在季节的变换中,它们才春日北飞,秋季南迁^③,这是第三层。综合这三层的比喻,诗人传达出来的,是对时间中展开的不确定空间的超脱,和在此基础上对可确定往日记忆的珍视(主要通过文学的方式记忆、记录)。如果不理解于此,则不能体味此诗之妙,而出现像吴汝纶“起超隽,后半率”^④的误解。由此再去体味绍圣三年(1096)《迁居》所云“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⑤,会有更深一层的感触。

以上的分析并非要力图证明苏轼博喻来源于礼学,而在于说明其来源之复杂。其实,很多地方有可能并非仅仅来自礼学,如为文分类思想^⑥。而在博喻,也是各有所见,如陈骙《文则》就指出来源于《尚书》《荀子》等书:“六曰博喻,取以为喻,不一而足。《书》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荀子》曰:‘犹以指测河也,犹以戈舂黍也,犹以锥飧壶也。’此类是也。”^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苏轼诗中的博喻风格,来源极其复杂,并非用佛学完全解释得通,还需注意其道家、儒家乃至法家、纵横家等源头,尤其需要充分考虑到他的独创性。从其来源与其发展历程来看,如果没有佛学的启示,苏轼不一定发展不出精彩的博喻风格。因此,佛学在博喻的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是辅助的催发,而非必不可缺的元素。空静诗观也不例外。佛学对诗观与诗风的这种兼性共生关系,其作用可以表述为没有佛学不一定没有此类诗观、诗风,但有了佛学可以使此类诗观、诗风得到更好、更快、更准确的呈现与阐释。

三、诗论与佛理:后天阐释层面的兼性共生

诗佛兼性共生关系不仅包括佛学对诗学的一面,也包括诗学对佛学的一面,而这一面比诗佛的兼性共生更容易被人忽略。在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型日渐成为潮流的今天,这种忽略容易形成一种盲区。只要认真通读作品集,这样客观存在的事实便难以磨灭。诗学对佛学的兼性共生关系主要体现在阐释表达层面,尤其是在诗论与佛理之间,即在作者本人明白某个佛理的基础上,需要用自己擅长的诗论方式阐释出来;或在作者本人明白某个诗论的基础上,需要用他人易懂的佛理来表达或佐证。下面分别论述。

一方面是用作者熟悉的诗论阐发佛理,使之更明白。绍圣二年(1095)《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云:“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曰‘以无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罗汉道,亦曰‘以无所得故而得’。如来与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独舍利弗,至于百工贱技,承蜩意钩,履舄画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虽至于大菩萨,其视如来,犹若天渊然,及其以无所得故而得,则承蜩意钩,履舄画墁,未有不与如来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婴儿生而导之言,稍长而教之书,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声,则语言难于属文,手不能忘笔,则字画难于刻雕。及其相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观之,其神智妙达,不既超然与如来同乎!故《金刚经》曰:一切圣

① 刘正平:《佛教譬喻理论研究》,第90页。

② 时苏轼在凤翔,为西,苏辙在开封,为东。把兄弟比作齐飞或纷飞的鸿雁,苏诗中不乏其例,如嘉祐七年(1062)《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一:“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着行?”(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1册,第252页)师注引七岁女子致其兄《送别》诗“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飞”(冯应榴著,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第123页)则更为明白。

③ 这在苏轼中很多。熙宁七年(1074)《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三:“何人织得相思字,寄与江边北向鸿。”(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2册,第1115页)。又《江城子·别徐州》:“北归鸿,去吴中。”元丰三年(1080)《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4册,第2208页)

④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1册,第188页。

⑤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4746页。

⑥ 如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评曰:“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挠矣。”邹阳辞指其狱中所上书,多比类旧事,如:“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韩非子·难言》也说:“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枚乘《七发》:“于是使博辩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宋书·王微传》:“文辞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四库提要》卷一八九《四六法海》条亦云:“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可见仅此而言,其来源就极为丰富。

⑦ 陈骙著,刘明晖校点:《文则》,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3页。

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以是为技,则技疑神,以是为道,则道疑圣。古之人与人皆学,而独至于是,其必有道矣。”^①文中所举“吾之所知”,实际上就是苏轼的为文(也包括诗等其他技艺)之法,其中“相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便是苏轼的空静诗观,用这种苏轼更擅长的诗论来阐释佛理,自然可以让阐释的过程变得更为简单流畅,从而较好展现出佛理内涵,使读者更易读懂^②。

另一方面,是用佛理更好地阐释诗论。《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③苏轼用书法阐释他的诗论,最后又用司空图的诗论加以映证,想要把自己的诗论阐释清楚。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对司空图的诗论有所更改。^④但我们读后会发现,他强调的重心是,文字乃诗之材料,如梅盐乃饮食之材料,饮食之美不在梅盐上,而诗之美也不在文字上。然而,饮食离不开梅盐,诗也离不开文字。前半部分与司空图之说还较为接近,末尾则与司空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完全相反。可见苏轼在这段话中,想要阐释的诗论其实自己非常明白,但没有合适的表达方式,传统的诗论(如司空图诗论)就算经过改造,也很难完全契合。

苏轼诗论表达的难点在于范畴的确立,他用梅盐与咸酸之外来比喻文字(或文中所云“佳句妙语”)与诗味(即其文中所说“文字之表”,或“其所谓”),这样容易混淆的称谓,不利于意思的准确传达。但在佛理中,他找到一对很好的范畴来表达,即“中边”(或中外),《评韩柳诗》云:“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⑤所谓中边之分,就比原来使用的概念清晰得多。而在“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里,也用“中”来区分。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用作者擅长的诗论来更好地阐释佛理,还是用读者易懂的佛理来更好地阐释诗论,毫无疑问,在作者身上,诗论和佛理都是“了然于心”的,也就是说,在苏轼那里,二者本来不产生关系。然而,在经过这样的关联阐释之后,苏轼创造性地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新的兼性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是后天性的,是在历史语境中发展出来的,而非诗佛关系本身所具有。

结语

结合历史语境,诗佛关系由兼性共生趋向专性共生,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苏轼的诗佛关系研究。经王文浩的辩驳,苏轼诗佛关系研究中的兼性共生关系才得以重新纳入研究者视野。这种兼性共生关系极其复杂,需要结合具体的背景加以探究。一方面,它体现在佛学作为思想资源之一对诗歌观念与诗歌风格的影响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诗论与佛理二者对阐释表达的需要上。前者是诗佛关系中先天性存在的兼性共生关系,后者则是经过苏轼创造性地关联阐释之后,才重新建立起来的兼性共生关系。至于诗佛关系的兼性共生背后是否带有更普遍的规律,需要深入进行后续研究。通过对苏轼诗佛关系的重新审视,可以廓清对诗佛关系的错误认知,为更好地开展后续研究提供较好的讨论环境。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对:刘倩)

①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11册,第1231-1232页。

② 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如熙宁八年(1085)《成都大悲阁记》:“……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镜。人鬼鸟兽,杂陈乎吾前,色声香味,交通乎吾体。心虽不起,而物无不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运,虽未可得见,而理则具矣。彼佛菩萨亦然。”(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11册,第1249-1250页),只不过诗论换成日常经验而已。

③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7598页。

④ 《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与李生论诗书》:“文之难,而诗之难又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醢,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所强调的是韵外之致,但苏轼在引用的时候,不仅把咸酸之物改了,连意思也有不同。

⑤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7549-7550页。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

——论入宋文士南唐历史笔记的撰作

胡 鹏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宋初统一全国,大量南唐文士入宋,他们新的生活环境下创作了一些有关南唐历史的历史笔记。运用历史记忆理论来观照这类文本,会发现私家笔记的写作目的,是为了与《江南录》为代表的官方南唐史所构建的历史记忆进行抗衡。而私家笔记的作者因各自身份认同不一,导致官僚和民间两种视角下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书写也存在诸多不一致的地方。此外,关注笔记作者“写了”什么内容,诚然是探讨其历史记忆歧异的方式之一,通过考察他们“没写”什么,也是探讨其历史记忆重构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私人撰写的南唐历史笔记虽然没有获得官方认可而成为官方历史记忆建构的材料,但其自身具备重要的社会史意义,不应忽视。

关键词:历史记忆;历史书写;南唐史;笔记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48-06

北宋初年削平诸国,混一区宇,大量原属各割据政权的文士入宋,就中又以来自南唐的士人居多。他们或改换门庭、入仕新朝;或高蹈远引、息迹山林,但不论入世还是遁世,故国之思难免会涌上心头。在这些士人创作的笔记作品中,有关南唐的历史笔记占居了很大比重。不同于官方南唐史,私家创作的此类笔记具有明显的历史重构特征,对官史多所反驳。入宋文士们对故国历史进行的独立省思,实际上反映的是对官方历史记忆^①的抗衡。并且,因文士群体身份认同各异,这一群体中不同人对南唐历史的重识与叙述也就存在诸多不一致的地方。

一、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历史记忆的一场争夺战

“集体记忆不仅是一种征服,它也是权力的一个工具和目标。对记忆和传统进行支配的争斗,即操纵记忆的争斗,在社会记忆为口述记忆的社会里或在书面的集体记忆正在形成的社会里最容易被人所掌控。”^②具体到宋初文坛,这种记忆建构的争夺战就突出地表现在入宋诸文士南唐历史笔记对官方纂修南唐史的反动上。

收稿日期:2019-05-20

作者简介:胡鹏,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宋代文学与笔记文学。

^①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学、传播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中用以阐释社会治理、传媒表达、民族认同、文本产生等诸多问题。概言之,所谓的“个人的”记忆(individual memory),其实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是在集体记忆的框架内被唤醒的。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具社会意义的“记忆”的研究逐渐深入,“记忆”正倾向于被区分为三种不同的范畴:第一种是詹姆斯·芬特雷斯(James Fentress)和克里斯·维克汉姆(Chris Wickham)提出的“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第二种是“集体记忆”,“这是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第三种即“历史记忆”,“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这三种记忆范畴都胎息于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其外延范围由大至小,形成一个同心圆结构的理论体系,其内核即“记忆”是在现有社会环境、思想风潮背景条件下对过往历史的重构。参见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雅克·勒高夫著,方仁杰、倪复生译:《历史与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148页。

^② 雅克·勒高夫著,方仁杰、倪复生译:《历史与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

十国林立,南唐因强盛迥出于其他割据政权,成为宋征服南方的最大障碍而备受宋统治者关注,这就促成了宋朝历史上唯一一部官修南唐史书——《江南录》的编纂。太平兴国三年(978),“太宗皇帝欲知前事,命汤悦、徐铉撰成《江南录》十卷”^①。李煜薨,徐铉作《吴王挽词》三首,中有一联云:“一朝人事变,千古信书存”^②,对所著《江南录》颇以信史自矜。然而,书成之后却引来朝野普遍不满。“事多遗落,无年可编,笔削之际,不无高下,当时好事者往往少之。”^③“(汤)悦等南唐故臣,记其目见之事,何其差缪?”^④“忘远取近,率皆疏略。”^⑤“于是,宋廷统治者的不满与宋人尤其是南唐遗民的不忿、史实的‘差缪’,终于使这部先天不足的‘千古信书’逐渐寥落无闻,湮灭于历史的深海之中。”^⑥郑文宝早年虽是徐铉的门生,但仍因不认同该书,而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作《江表志》来进行补正。郑文宝(953—1013)是南唐旧臣,少以父郑彦华荫入仕,迁校书郎。入宋,登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终官陕西转运使。郑氏曾因感慨南唐“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余,史籍荡尽,惜乎前事十不存一”^⑦,而于太平兴国二年作《南唐近事》二卷。此外,专记南唐史事的宋初笔记尚有陈彭年的《江南别录》、史口的《钓矶立谈》^⑧等。

《江南录》是应宋太宗欲观前事的要求奉敕撰写,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入宋诸文士南唐历史笔记则明显属于私史性质。二者之间的紧张对立,表面上是对某些史实记载的相互违戾或人事评判上的背反,实际上是对历史记忆的争夺。《江南录》虽已不存,但从书成之后的评论与引用尚能管窥一二。该书以“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存亡论之”为撰修原则,又因撰修者的个人偏见与政治私心,使得史事的真实性大打折扣^⑨。

汤悦、徐铉作为南唐历史的直接经历者,又在所服务的新政权中掌握着南唐历史建构的话语权,他们必然“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⑩。具体言之,虽然徐、汤二人已经在新朝获得了较高职位,但他们为了标榜自己是忠臣,以此来消解前朝重臣更事新君的内心愧疚,采取了以“五德轮转”“天命归宋”为指导思想的修史策略。这种修史策略明显不符合“实录”要求,却一来通过“为故主隐恶,保存了故主之义”^⑪,二来继续为二人旧时参与党争导致国政不修提供政治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辩护,使得国家话语体系为自己的过往经历背书,从而在历史记忆中维持自己正人君子的历史形象。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南唐后期个别重臣的记载与评价上。

南唐自立国之日起,统治集团内部就存在着北方流寓士人与南方土著士人之间的巨大矛盾。北方士人希冀朝廷出师北伐来实现国家统一,南方士人则多要求南侵邻邦以邀功求赏。自中主李璟始,南北两派矛盾呈现出白热化的激烈态势。这与李璟和李煜的用人观念有关。中主、后主都有着偏狭的地域观,重用南人而轻视北人。元宗曾对北人、右散骑常侍王仲连说:“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之多”^⑫,表达出非常露骨的偏见。中主朝,其亲信查文徽、冯延巳、冯延鲁、魏岑、陈觉等人结交当朝老臣、同为南方土著士人的宋齐丘以为奥援,蠹乱朝纲、沆瀣一气,时人谓之“五鬼”。李煜即位不久,又着手提拔潜邸旧人潘佑、张洎诸人,将他们推向政治权力的核心科层。无休止、无原则的南北两派斗争,导致南方士人群体厚植了情感基础,即便派内鱼龙混杂,正直如徐铉者,也不愿在《江南录》中显曝同为南人的宋齐丘之过。郑文宝在《江表志》中对此大为不满,特意反驳:

徐公撰《江南录》,议者谓之不直,盖不罪宋国老故也。国老当淮甸失律之后,援引门人陈觉、李征

① 郑文宝撰,张剑光、孙励整理:《江表志》,载《全宋笔记》(第1编第2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

② 魏泰撰,燕永成整理:《东轩笔录》,载《全宋笔记》(第2编第8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③ 郑文宝撰,张剑光、孙励整理:《江表志》,第259页。

④ 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76页。

⑤ 马令、陆游撰,濮小南、胡阿祥点校:《南唐书》(两种),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⑥ 陈晓莹:《〈江南录〉:先天不足的“千古信书”》,《史学集刊》2014年第2期,第57页。

⑦ 郑文宝撰,张剑光整理:《南唐近事》,载《全宋笔记》(第1编第2册),第208页。

⑧ 陈尚君先生认为《钓矶立谈》为史虚白之孙史温编次先辈遗稿、记录议论以成书;文中发议论之“叟”似为史虚白之弟侄辈。《〈钓矶立谈〉作者考》,刊于《文史》第四十四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又收入氏撰《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244页。笔者本文所引虞云国、吴爱芬整理《全宋笔记》本《钓矶立谈》的《整理说明》中,对于作者持存疑态度,认为“非出一手”,史事应为史虚白所撰,议论为作序者所为,故题作史口撰。为便于叙述,下文论及《钓矶立谈》作者时径以“史氏”指称。史口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载《全宋笔记》(第1编第4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⑨ 陈晓莹:《〈江南录〉:先天不足的“千古信书”》,第52—56页。

⑩ 柯文(Cohen, P. A.)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译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⑪ 陈晓莹:《〈江南录〉:先天不足的“千古信书”》,第53页。

⑫ 郑文宝撰,张剑光、孙励整理:《江表志》,第264页。

古掌枢密之任,且授其意曰:“天命已去,元宗当深居后苑,国老监国。”元宗诏将行,陈乔草诏,争之而止,国举皆闻。为臣之道,余可知矣。^①

宋齐丘(887—959),少孤好学,后助南唐先主李昇建国。元宗李璟即位,齐丘因参与党争,导致国家方策多受影响,朝政日坏,南唐士人多鄙其晚节。《江南录》却不怪罪齐丘,是南唐遗民难以接受的。

对于潘佑、李平之被诛,也是《江南录》颇受诟病的矛盾焦点之一。潘佑在南唐士人心中是一位直言极谏的名臣。他初因李煜娶小周后的礼制问题与徐铉发生了矛盾。又,张洎与潘佑曾是忘形之交,“其后俱为中书舍人,乃相持”^②。张洎选择与徐铉联手排挤潘佑。潘佑不平,历数后主用人失察,七疏不止,竟称后主李煜: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臣乃者继上表章,凡数万言,词穷理尽,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悻悻,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陛下必以臣为罪,则请赐诛戮,以谢中外。^③

此表言辞激烈,加之张洎推波助澜,惹得李煜大怒。适逢潘佑好友李平改革失败,后主本就对北人李平疑窦丛生,遂将二人收狱,一并诛戮。徐铉在潘李之死事件中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又在《江南录》的撰写中对潘佑“深毁短之”^④,引发南唐士人极大不满。史氏在《钓矶立谈》中云:

叟比闻铉及汤悦奉诏书江南事,居处猥僻,未及见其成书。然妄意深疑徐尚有忤心,或将幸潘之歿,而厚诬潘于泉下。夫佑实疏隽,为人少法度,譬如长松古栢,固自磈砢多节目,乃若趣操必不肯忍为非义也。平居一言之不酬,虽即刎决而不顾。及其当大事、立危议,挺然不回,去古人亦何远之有?后主既已诛佑,而察其无他肠,意甚悔之。是以厚抚其家,语及佑事,则往往投馈,至为作感伤之文。此南州士大夫所共知也。叟诚逆诈贪,书其事,以遗后之人,使正史或出,不能传其谬悠,是亦仁人之用心也。^⑤

这一议论代表了普通士人面对官方历史记忆歪曲史实而奋起揭露真相的努力。“公共记忆通过不同层次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对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个体和集团的记忆,或利用,或弘扬,或篡改,或抹杀,或压抑。”^⑥在对于南唐历史的建构上,官方史学试图通过所掌握的文化霸权来实现对政见不同者历史记忆的压抑甚至抹杀,而历史笔记的作者们顶住了官方文化霸权的压力,表现出对抗和争夺历史记忆话语权的非凡勇气。

二、官方视角与民间视角:不同身份认同下的历史书写

除了上文述及的官方史书与私家笔记之间的紧张对立,不同作者所撰历史笔记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对史实不尽一致的记载与评判。郑文宝在《江表志》中述及元宗时几乎全是颂圣之语。其另一笔记作品《南唐近事》卷二又云: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内宠,宴私击鞠,略无虚日。常乘醉命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进酒,花飞唯歌“南朝天子好风流”一句,如是者数四。上既悟,覆杯大恚,厚赐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孙、陈二主得此一句,固不当有銜壁之辱也。”翌日,罢诸欢宴,留心庶事,图闽吊楚,几致治平。^⑦

文宝此处在述及李璟从谏如流的仁君风范后,特意拈出“图闽吊楚”,置于“几致治平”前,显然认为李璟对王闽、马楚的用兵无可非议,甚至是应当加以褒扬的。但史氏对此却不以为然。先主李昇殂前,曾告诫李璟要睦邻安民,韬光养晦:

(烈祖)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宫凡积兵器缙帛七百余万,吾弃代后,汝善和邻好,以安宗祏为意,不宜袭隋炀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⑧

① 郑文宝撰,张剑光、孙励整理:《江表志》,第268页。

② 佚名编纂,张剑光、孙励整理:《江南余载》,载《全宋笔记》(第1编第2册),第249页。

③ 马令、陆游撰,濮小南、胡阿祥点校:《南唐书》(两种),第312页。

④ 田况撰,储玲玲整理:《儒林公议》,载《全宋笔记》(第1编第5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⑤ 史口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35页。

⑥ 黄东兰:《岳飞庙,创造公共记忆的“场”》,载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⑦ 郑文宝撰,张剑光整理:《南唐近事》,第220页。

⑧ 史口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21页。

李昇并非不愿广土辟疆,成万世之业。但他深知割据江南的不利之处,并具体分析先攻三国的弊端之后,提出交好紧邻的闽、钱塘和楚三个割据政权,使他们充当南唐防止北方来犯的屏障。本国可以借此暗自积蓄力量,伺机北伐。一旦中原底定,南方诸黯弱割据政权自可轻易收服:

是我之存三国,乃外以为蔽障者也。疆场之虞不警于外廷,则宽刑平政得以施之于统内。男不失耒耜,女无废机织,如此数年,国必殷足,兵旅训练,积日而不试,则其气必倍。有如天启其意,而中原忽有变故,朕将投袂而起,为天下倡。倘得遂北平潜窃,宁义旧都,然后拱揖以招诸国,意虽折简可致也,亦何以兵为哉。^①

李昇对后继者能否坚持既定政策并不放心,临终前甚至召李璟登御榻,“啗其指至血出,戒之曰:‘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②元宗即位,改元保大,正是谨遵遗教,力求保守太平之意(“大”即“太”字)。三四年间,除了迅速平定张遇贤叛乱外,并无干戈之举,时人“皆以为守文之良主”^③。然而好景不长:

会元老去位,新进后生用事,争以事业自许,以谓荡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荧惑,移于多口,由是构怨连祸,蹙国之势,遂如削肌。其后宋齐丘复起于迁谪之中,谋为自固,更相唱和,兵结而不得解矣。未及十年,国用耗半。

其后闽土判涣,竟成迁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复变,地不加辟,财乏而不振。会耶律南入,中国大乱,边地连表请归命,而南唐君臣束手,无能延纳者。韩熙载上疏,请乘衅北略,而兵力顿匮,茫洋不可为计,刮疮裹创,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战而失。元宗始自叹恨,厌厌以至于弃代。^④

对于李璟违背遗训,轻启边衅,以致国蹙地削,大势已去,史氏是十分痛心疾首并怨望元宗的,“叟每寤念于中,则不觉为之堕睫”^⑤。他不仅赋诗“风雨揭却屋,浑家醉不知”以讽之,更直指“故知倾国之渐,良由废烈祖之圣训而致然也”^⑥。这与郑文宝的态度大相径庭。之所以在各自撰写的历史中出现歧异的记忆,在于他们所处的群体不同。郑文宝是享受门荫入仕的官宦之子,他所在的群体是南唐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当他依靠社会记忆的框架将回忆唤回脑海中时,这一群体身份必然要求他从维护该群体利益的考量出发来重构过去。即使郑文宝创作其历史笔记时,南唐已经灭亡两年(《南唐近事》)甚至三十五年(《江表志》),他所从属的群体亦不复存在,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依然以南唐官僚集团成员所具有的集体知觉(collective perception),对元宗的评价——这一客体达成某种一致的观念的记忆:颂圣与粉饰。正如哈布瓦赫所指出的:

事实上,即使是在他与这些群体有一定距离的时候,这些群体是不是实际在场,对于他能否继续作为这些群体的一员而继续思考和行事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纵使这些群体没有在场,他也仍然能够回想起那些与这些群体利害相关的判断、价值、人物、行动和事实。^⑦

史载郑文宝入宋后,“南唐故臣皆许录用,文宝独不自言。后主以环卫奉朝请,不纳客谒,文宝乃被蓑荷笠,作渔者以见,宽譬久之。后主叹其忠”^⑧。郑文宝不主动投向新朝,又变装乃得拜谒软禁中的后主,这在鲜蹈礼义的五代士人中,实属难得。由此也可知,至少在后主太平兴国三年(978)薨前,或者迟至郑文宝登进士第(983)前,他一直是以南唐忠臣自居的。这一身份认同影响着他的记忆重构,甚至可以推测认为其直到生命走向终结亦依然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在他过世前三年,还创作了《江表志》这样一部对抗宋朝官方记忆的历史笔记。忠于旧朝,念兹在兹,又怎能多曝先帝之过呢?故其对于先帝的记忆,只能是唤醒留存的睿智英明的一面,另一面穷兵黩武、优容奸佞等的记忆,就会自动被压抑甚至删除了。而对于与官僚政治不太紧密的历史人物的记载,文宝的记录则客观公正了许多,如《南唐近事》卷一载史虚白生平曰:“处士史虚白,北海人也。清泰中,客游江表,卜居于浔阳落星湾,遂有终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⑨这是南唐史籍中关于史虚白事迹最早也最全面的记录之一(另一为《钓矶立谈》中闪烁其词的少量夫子自道),从史源学

① 史□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26页。

② 史□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26页。

③ 史□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21页。

④ 史□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26页。

⑤ 史□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27页。

⑥ 史□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26页。

⑦ 哈布瓦赫(Halbwachs, M.)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⑧ 马令、陆游撰,濮小南、胡阿祥点校:《南唐书》(两种),第326页。

⑨ 郑文宝撰,张剑光整理:《南唐近事》,第210页。

角度看,后之《江南野史》、马令与陆游两种《南唐书》、吴任臣《十国春秋》等关于史虚白绝大部分事迹的记载皆来源于此。虽稍稍传闻异辞,然大体事无遗落。史氏事迹,赖此书以传。

史氏与郑文宝的身份大不相同。不管《钓矶立谈》史料部分的作者(口述者)是史虚白,还是“随先校书避地江表”的史虚白之弟侄辈,他的身份都是在南唐时就已经隐居、唐亡后继续隐居不仕的民间士人,此一“逸民—遗民”的身份归属,造成其历史记忆的唤醒,有赖于民间视角这一社会记忆的框架。史氏在民间视角下的历史笔记创作,作为一种“个人的书面记忆”^①,自然无须受限于官僚身份视角下对历史书写的种种束缚,而完全尊重自己的个体意志,以亲身经历、耳闻目击的丰富感性认识为下笔的凭依,较少受到官方社会记忆框架的规制与支配,表现出更为个性化的价值判断。除上引有关元宗的议论,史氏还曾评价说“叟尝读《汉书》,见班固赞元帝‘优柔’,大率颇似元宗”^②;詈骂宋齐丘“鄙哉,斯人也。鄙哉,斯人也。古语不云乎:‘栋折榱崩,侨将压焉。’抑谓是也夫?”^③史氏承认冯延巳文学富瞻、学问渊博,但话锋一转又指出其“所养不厚,急于功名,持颐竖颊,先意希旨,有如脂膩,其入人肌理也,习久而不自觉。卒使烈祖之业,委靡而不立”^④。史氏钦慕晋王李景遂礼贤下士,乃至叹息曰:“呜呼,九泉而可作也,叟其拥彗于晋邸之门。”^⑤凡此种种,皆是明证。从《钓矶立谈》的文本可以看出,其叙述体制的夹叙夹议,情感内容的鲜明取向,都使得该书在南唐史书中别具一格,历史记忆的歧异之处正是源于历史叙述主体身份差异所导致的视角不同。

记忆的歧异相对而言比较显而易见,而选择性的“忘却”则要隐秘得多。“构建公共记忆的行为同时也伴随着忘却行为,忘却也是记忆的一部分。”^⑥通过考察历史亲历者刻意忘却什么内容,研究者可以探寻历史记忆背后的主体选择及其成因。

前文介绍过,郑文宝因父郑彦华之荫入仕。但在文宝书中,其父身为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高级官员和重要武将,只于卷中和卷下文首处列当朝文武官员时例具姓名而已,未尝一言记其事迹,且不避家讳,着实令人生疑。郑彦华因家居闽地,年轻时入本地福州军伍。闽亡,随节度使李达降吴越。南唐剑州节度使陈海攻福州,郑彦华率兵投降。入南唐后,郑彦华历大小百余战,身被五十余创,积军功渐迁至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使相重位。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宋军加强对南唐的攻势,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后主诏彦华领水军万人迎战于慈湖峡,天德都虞候杜真率步兵万人出战。李煜亲自为二将践行,并戒之曰:“水陆两军相表里,则吾事济矣。”^⑦宋唐两军步兵率先接敌,杜真以所部力战,郑彦华作为南唐一方唯一援军却拥兵不救,坐视杜真大败。“金陵闻之丧气,遂闭垒自守,以至国破,亦不能正彦华之罪矣。”^⑧可以说,郑彦华是南唐灭国的罪人,文宝对此是十分避忌的。由此,一直秉持忠臣身份认同的文宝对于其父在唐亡过程中的行径,自然不会苟同。既不能秉笔直书,又不愿曲笔矫饰,唯有选择性遗忘是文宝可作之选择。而同样忠于南唐的史氏,对郑彦华则取鲜明的批评态度。在《钓矶立谈》中,他记载了多为史家所忽略的郑彦华指挥的另一次军事行动:

先是江南夙将并以殂歿,主兵者多新进后生,大臣皆嬖娶取容,帟幄筹议,自相踳驳。其间轻佻者日幸兵戈之兴,以为功名可图。张遇、郑彦华不请于朝,遽以轻兵北袭建安军,又欲火滁州之郭,皆不克而返。上流镇守,迎旗奔溃,王师不血刃而傅城下。^⑨

除了坐视杜真陷阵,郑彦华还轻举妄动,擅自出兵攻击重兵屯守的长江前沿阵地建安军(今江苏仪征),甚至要孤军深入滁州(今属安徽)。从其用兵方向判断,郑彦华先是寻求与宋水军主力决战,后又欲攻击宋陆军侧翼。但金陵左近的守军此时已减员严重,不宜偏师孤注一掷,犯敌锋锐;正宜收缩防线,保存有生力量以构筑环形防御圈,与长江上下游尚存兵力呼应,准备实施“中心开花”战术。但郑彦华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冒险行动,不仅无功而返,更导致兵力虚耗,最终上游守军望风而溃,金陵守军也无力挫敌,宋军得以顺利兵临

① 雅克·勒高夫著,方仁杰、倪复生译:《历史与记忆》,第96页。

② 史口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29页。

③ 史口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24页。

④ 史口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27页。

⑤ 史口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40页。

⑥ 黄东兰:《岳飞庙,创造公共记忆的“场”》,第173页。

⑦ 马令、陆游撰,濮小南、胡阿祥点校:《南唐书》(两种),第326页。

⑧ 马令、陆游撰,濮小南、胡阿祥点校:《南唐书》(两种),第326页。

⑨ 史口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35页。

城下。在战术上,郑彦华作为金陵守军将领,应负战事失利的领导责任。由此,史氏对郑彦华取批评态度,自然是再正常不过了。

上文曾指出,史氏在《钓矶立谈》中闪烁其词地夫子自道个别事件。有意思的是,史氏也刻意失载史虚白部分事迹,从而令“个人的书面记忆”出现断裂,客观上形成了“忘却”的效果。《江南野史》卷八“史虚白”条云:“闻宋齐邱^①总相府事,虚白乃放言谓人曰:‘彼可代而相矣。’齐邱闻而恨之。”^②心胸褊狭的宋齐丘因此试图让史虚白当众出丑,但未成功。在得知史虚白持北伐的观点之后,宋齐丘看出他的论点肯定与李昇休养生息的政策不合,遂别有用心地将史虚白引荐给李昇。史虚白向李昇进言称:“今君据有江淮,摘煮山海,人庶丰阜。京洛之地,君家先业,今且乱离,人思旧德,君苟复之,易若屈指。”^③建言果然不被李昇接受,而只是署之为州郡从事,聊以羁縻而已。史虚白“耻其初言失,因褒衣博带,纵楫南游”^④。陆游《南唐书》亦因袭此说。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一方面,史氏在《钓矶立谈》中对宋齐丘鲜有正面评价,难保没有因与宋齐丘的交恶而掺杂个人意气在内;另一方面,史氏在比较了李璟连年征战导致国土日蹙、后主李煜一蹶不振以致亡国的血泪教训后,更是对先主李昇休养生息的国策使得“江表五十年间,父不哭子,兄不丧弟,四封之内,安恬舒嬉,虽流离侨寓之人,亦获案堵,弗夭弗横,以得及真人之期”盛赞不已,不禁感叹:“吁!烈祖为有大造于斯土也明矣。”^⑤这与初渡江游说李昇兴师北伐时的史虚白,不啻判若两人。自以初言失为耻,又想掩盖与宋齐丘的矛盾,免受著史不公之讥,以这样的心态写作历史笔记,史氏刻意回避这一史实,就不难理解了。

三、结语

历史笔记是北宋初期笔记作品中最主要的一类,就中又以有关南唐国史者居多。多年以来,研究者大多从此类笔记中寻章摘句,或证史实之是非,或考人物之轶事,或辑散失之诗文,而对著者何以如此撰作进行研究的并不多。历史记忆理论的运用,使得研究者对于历史笔记的考察,增添了一种新的、科学的方法,以及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视角,这有助于从表面的“是什么”进而探讨背后的“为什么”。通过对大量文本的细读,我们能够发现笔记作者们为了对抗由权力掌控的历史书写,而自觉肩负起了普及社会记忆的重担。所谓为防止“时移事往,将就芜没”而“粗以存其梗概”^⑥，“与正史差异者，并存而录之，则别传、外传比也”^⑦，“虽非经纬之作，庶勉后进子孙，俾希仰前事，亦丝麻中营蒯也”^⑧。这样一副重担，不仅仅是对他们自认为的“真实的”历史的重识与记录，更是对曾经鲜活存在过的、不被官方历史记忆所认可、所传扬的人与事的尊重。从这一点上来说，南唐入宋文士的历史笔记撰作自有其重要的社会史价值，不应等闲视之。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对:刘倩)

① 此书宋齐丘之名因避讳改“丘”为“邱”，殆因整理者所采底本《豫章丛书》本系据清代藏书家陈鱣精钞本刊印，而清代自雍正三年谕避孔子名讳，并加卩为邱。说详（清）叶名澧《桥西杂记》“避孔子讳”条、（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三“孔子讳宜改读音”条。

② 龙袞撰，张剑光整理：《江南野史》，载《全宋笔记》（第1编第3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③ 龙袞撰，张剑光整理：《江南野史》，第209页。

④ 龙袞撰，张剑光整理：《江南野史》，第209页。

⑤ 史□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22页。

⑥ 史□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钓矶立谈》，第215页。

⑦ 张齐贤撰，俞钢整理：《洛阳缙绅旧闻记》，载《全宋笔记》（第1编第2册），第147页。

⑧ 孙光宪撰，俞钢整理：《北梦琐言》，载《全宋笔记》（第1编第1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国家公祭、和平文化与南京和平城市建设探讨

卢立菊¹, 付启元²

(1. 南京孙中山纪念馆 研究部, 江苏 南京 210014; 2.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08)

摘 要:国家公祭的意义在于以史为鉴, 珍爱和平, 世界各国对战争死难者开展的国家公祭活动都彰显和平的主题。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涵丰富的和平思想,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南京作为国家公祭举办地, 应充分发挥本土和平文化资源优势, 在传播中国和平理念、发挥国际和平城市功能方面做出独特贡献。

关键词:国家公祭; 中国和平文化; 和平城市; 南京

中图分类号:K2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54-04

随着我国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和国家公祭仪式的举行, 相关研究一时成为社会热点。笔者以中国知网等学术网站为权威论文搜索工具, 发现目前以报纸和杂志为载体发表的相关论文即有六百余篇。所讨论者多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追溯国家公祭日设立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论述设立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的必要性; 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阐述国家公祭日设立的过程、意义及社会影响。如徐立刚的《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的普世价值》等文认为国家公祭将个人记忆上升到社会记忆, 强化民族凝聚力, 警醒世人反思民族悲剧成因, 维护世界和平^①; 三是从新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关注公祭日的纪念形式, 解析其现实教育意义。又如张国松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化与制度化研究》等文认为公祭日的设立完成了仪式化和制度化的建构, 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得以传承和固化^②。总体来看, 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和国家公祭日制度仪式的研究。本文试图在宏观视野下将国家纪念、中国和平文化与南京和平城市建设结合起来进行阐述。

一、和平主题: 纪念活动的文化内涵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全球范围内伤亡惨重的世界战争给各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 为追求和平, 纪念在战争中伤亡的死难民众, 一些主要参战国纷纷设立国家公祭日, 增强民众对战争灾难历史的集体记忆。目前, 在国际上与二战有关的相关纪念日主要有联合国设立的犹太人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日等。2005 年, 第 60 届联大将每年的 1 月 27 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这一天也被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设立为纳粹大屠杀遇害者纪念日。国内外在举行国家纪念仪式祭奠战争死难者, 弘扬和平主题方面存在一些共性。相关国家非常重视对于历史事件的纪念, 纪念日活动规模规格普遍较高。例如, 每年纳粹大屠杀纪念日, 以色列总统和总理都会出席在耶路撒冷市郊的大屠杀纪念馆华沙广场举行的集会。从纪念日头天傍晚太阳落山至早晨太阳升起前, 除饭店和宾馆外, 所有商店、饭馆、酒吧、影院和歌舞厅等娱乐场所一律停业。在纪念日上午 10 点, 全国范围内鸣汽笛两分钟, 所有车辆停止运行, 行人止步, 向大屠杀遇难者致哀。同时, 以色列广播和电视台停止正常的节目, 以便播放有关在二战中纳粹德国领导人希特勒残害犹太人的纪录片和电影。德国、波兰等国家

收稿日期: 2018-08-23

作者简介:卢立菊, 南京孙中山纪念馆研究部主任, 副研究馆员; 付启元, 南京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创新型城市研究院研究员。

① 徐立刚:《论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设立的普世价值》,《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 年第 2 辑。

② 张国松:《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化与制度化研究》,《档案与建设》2016 年第 11 期。

领导人也在纪念日发表讲话或到现场参加专题纪念活动。中国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把“逢五”“逢十”举行的中央纪念仪式扩展到每年都举行,有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家影响力。为了纪念曾经发生过重大民族灾难而设立的国家公祭日,是以国家纪念的形式来祭奠在战争中死难的同胞,提醒世人不要忘记曾经的战争灾难。这些纪念日的最大价值就是让侵略者和受害者及其后人不忘历史,珍视和平。

国家纪念日活动大都在某一城市举行,纪念日所在城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二战期间的相关“殉难”城市都有它的受难日,这个受难日或者是一天,或者是一段时间,这种特定的时间,就成为该市和平时时期重要的纪念日。战争与杀戮在城市留下的遗址、遗迹是和平教育的生动教材。如奥斯维辛、考文垂、广岛等城市完整保留了战时遭到破坏的代表性建筑物,较好地发挥了战争遗迹的功能。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心圆顶楼分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英国考文垂市刻意保留了被炸弹炸过的圣迈克大教堂的旧址,并在此竖起一个用烧焦的大教堂梁柱做成的十字架。波兰通过国会立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马伊旦奈克集中营等5个集中营遗址建成国家级的博物馆,为举办国家纪念活动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看,利用相关纪念日举办国家纪念活动祭奠战争或屠杀死难者,大多宣传和平主题。国家公祭的目的—是缅怀历史,不忘过去;二是展望未来,更好地面对现实。以国家公祭的形式奠祭,体现了国家政治的平民化、世俗化,反映了对生命的敬畏,对和平的追求。以国家名义进行纪念与公祭,其世界意义在于,能促使人类历史记忆长久保持,共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维护世界和平正义,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

二、和平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转换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随着祭祀仪式上升到国家层面,祭祀的功能也不断地得到丰富,从祭拜祖先到人伦教化,再到追求天下之和,今天的祭祀郑重地表达了和平的意愿。“和”文化也随着国家祀典的隆重举行以及广而告之,而不断演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核心理念,贯穿于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民族国家关系中。

(一) 中国“和”文化的传承发展

历代以来,和平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之一,“和”文化是古代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主要体现在儒、道、墨三家学说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内向防御型的和平文化,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色彩,体现为整体和谐的价值指向。中国历史上防御的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一般不将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常道”和“正道”。千百年来,和为贵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思想主线。近代以来,中国战乱频仍,和平文化传统一度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代替,但传统和平理念仍得以延续和发展。康有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和”思想,提出了“三世说”、大同说、中和论等和平思想。孙中山继承了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和”思想,并吸收部分西方学说,重新诠释大同思想与儒家伦理秩序观,形成了大同世界、和平互助、王道思想等和平思想。这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家对“和”的内涵及实现条件的认识不断深入,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与历史进步性。

中国传统和平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和平理论创新的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理念,以及改革开放后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确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平发展、求同存异、和谐社会等理论都是对传统和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和”文化,他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谐、和睦的坚定理念。”^①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是对中国传统“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二) 中国“和”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和平思想,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和平性格的重要精神元素,为我们建立中国特色和平学,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挖掘和研究中国传统和平理念,对内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对外服务于国家和平发展战略,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扩展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有利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共同发展

^①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5月15日, <http://www.xinhuanet.com/>.

和繁荣。中国传统和平理念的现代价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为文化自信提供实践土壤。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和”文化资源,在实践中加以拓展和应用,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与国家软实力,对推进社会和谐、政治和谐、生态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要意义。二是为中国和平发展奠定理论支撑。作为爱好和平的世界大国,应充分利用历史上丰富的和平思想文化遗产,建构莫基于中国传统“和”思想文化特色的和平学理论体系,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有益贡献。三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基础。中国传统和平思想,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和为贵、泛爱众的处世哲学,兼容并包、博大宽厚的和合思想,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等在当今时代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以宏观视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顺应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的“和”思想传承创新体系,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和平文化资源需要进行现代转换,以充分发挥其时代价值。要以整体性的历史眼光,将传统“和”文化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甄别分析,赋予其新时代的意义,使其适应新时代精神和新文化发展趋向。一是确立传统“和”文化现代转换的方法原则。坚持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努力实现以“和”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使中华传统“和”文化与时代实际相结合,通过“新的综合”“新的创造”,推进传统“和”文化的当代发展。二是建立传统“和”文化现代转换的有效机制。建立政府与学界互动机制。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发展创新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帮助,更要寻求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构建国内国际文化交流机制。探讨本民族文化之间,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如何保持文化发展活力、解决文化交流与融通中的矛盾与分歧。健全教育传播机制。加强“和”文化的教育与普及推广,推进传统“和”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提升“和”文化的国内外影响力。三是建构文化本土性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吸取哲学、历史学、管理学、传播学、和平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横向分析和纵向分析相结合等方法,多视角、多层面透视和解析中国传统“和”文化。创建中国特色的“和”学模型与理论体系,在学术话语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① 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系统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建构中国特色的和平学,为人类解决暴力冲突提供富有启迪的智慧。

三、和平理念:南京和平城市建设的新路径

南京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大屠杀事件的发生地,备受世界瞩目。长期以来,南京一直致力于和平城市建设。2017年3月,南京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9月4日,经国际和平城市协会批准,南京成为全球第169个“国际和平城市”,也是中国首个加入这一协会的城市。^② 南京在国内外的和平思想研究、和平理念传播与和平城市建设方面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南京作为国家公祭的举办地,应充分挖掘中国传统和平文化资源,积极弘扬中国和平理念,加强中国和平学研究、教育与交流,推进和平设施、和平平台、和平外交、和平传播建设,充分发挥南京和平城市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全方位提升南京和平城市形象。成立城市形象领导小组与和平形象提升专业委员会,建立和平形象传播的动态评价机制、传播效果监测评估机制。设立“和平城市形象文化海外推广工程”,提升和平形象走出去工作的全局性、独特性、前瞻性。既要开展城市形象的对外传播,又要注重对内传播;既要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又要积极发挥网络的舆论领袖作用。加强民间组织国际交往,进一步支持和鼓励民间文化机构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升对外交流的水平,重点培育一批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表现突出的优秀民间文化组织和民间文艺品牌,充分发挥他们在和平形象传播中的作用。

二是深化和平学研究,为和平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平学是二战后形成并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的一门新学科。我国和平学学科发展相对滞后,总体上仍停留在对外国和平学翻译引进的阶段,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因此要加强中国和平学研究,深入研究中国“和”文化的传承发展与中国和平学理论体系建设问题。研究国外和平学理论,批判性地借鉴国外一些和平学理论。如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格老秀斯的国际法理论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和平学者研究了冲突理论、暴力与非暴力理论、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 蒋芳、郑文静:《南京成为第169座“国际和平城市”》,人民网2017年9月10日,<http://www.people.com.cn/>。

和平教育理论、世界共同体理论等,促进了和平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占领传播制高点,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首先把握和平形象传播新趋势,整合传统、新兴媒体,境内、境外媒体,鼓励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挖掘梳理和平教育资源,分析对外文化形象传播受众。悉心研究国外观众的文化形象传播需求和接受方式,探索和发展文化传播与交流新形式,让外国人产生对中国和平形象的亲近感。与驻华使领馆、华人华侨文化团体、海外留学生团体等合作,探索建立长期追踪国外形象传播新趋势的研究机制,构建对外传播新媒体矩阵体系,建立包括境外社交媒体平台的互联网传播集群,鼓励中国传媒集团通过入股、并购海外频道、栏目,形成传播中国文化的窗口。其次是推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维护并积极宣传南京乃至我国的国家形象,根本上解决在国际传播和国际舆论中的不利地位,需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把国际舆论环境纳入国际安全环境的视野,把推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以及塑造和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纳入我国的国际战略体系,统一规划、合理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再就是以“媒体+”拓展形象传播广度。加强各类各方媒体互动,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形态的传播优势,融合实现最佳传播效果。促进境内外媒体的互动,实行“央视媒体+地方媒体+国际媒体”的境内外媒体的组合策略,提升和平城市形象传播效度。积极发挥网络人际传播的力量,传播南京和平城市形象,利用“自媒体”加大网络议程设置力度,在自媒体发起和平形象传播议题,促发和平形象的传播。最后是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探索对外传播规律和方法,善于运用国际潮流表达,实现与国际受众的“无缝对接”。运用国际化的叙述风格表达内容,做好“中国文化国际表达”,打通交流的话语体系,增加对中国正面形象的报道与言说。加强对外传播,特别是互联网传播内容生产,以“内容+”拓展和平形象的维度,充分利用和平资源,创作和平主题歌曲、影视剧、动漫等文艺作品,不断增强吸引力、传播力。

四是发挥和平城市功能,积极开展公共外交。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把“国际和平城市”创建作为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以英国考文垂、日本广岛以及德国德累斯顿等为代表的城市,积极利用自身“殉难城”的条件及资源,推广国际和平城市的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南京作为四大殉难城市之一,具有厚实的和平城市文化基础,在和平城市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作为国家公祭的举办地,南京举行了2018年的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向纪念活动致贺信,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南京应明确“和平之城”的文化定位,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承担和平文化使者的历史使命。就国家层面而言,要以国家公祭为统揽,以平台构建为抓手,以机制建设为支撑,以交流传播为路径,重点加强“和平组织、和平学术、和平理念、和平活动、和平价值、和平遗址”六位一体建设,使南京国际和平城市形象在世界上获得较大认同。要建立多维度的国际和平城市形象传播阵地,加入国际和平城市联盟,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和平研究二类中心,在和平研究与国际传播方面抢占制高点。充分发挥南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和平问题研究中心”等组织中的应有作用,在国际和平领域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和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和平城市市长论坛、国际青年和平论坛等,积极参与国际和平活动。创设国际和平基金,与国际著名同类基金会开展合作交流。

总之,和平既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理想阶段。21世纪是大发展大融合的时代,“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成为时代的强音,和平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同时,需要在和平学意义上挖掘中国传统和平文化资源,赋予时代内容,寻求国家之间冲突和对抗的和平之路,实现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是研究与弘扬和平文化的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胡晓明)

民国时期私立南京孤儿院的个案研究

蒋 静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各地慈善救助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其中回族慈善团体成为从事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私立南京孤儿院更是民国时期回族慈善事业最具代表性最具广泛影响的慈善团体。私立南京孤儿院经历了建院初期的辉煌、抗战时期的停办、战后的复院重建,其稳定的经费来源、严谨的组织机构、严格的招生工作、优质的教学与生活管理,都是其日常管理运作的重要保障。另孤儿院教养兼施、立法完备、参与者广泛、关注院生长期发展、师生亲如一家的办院特色,使得孤儿院与中国传统慈善团体、民国时期公立慈善团体、早期回族慈善团体相比分别在组织管理上、救济思想上、救济范围上存在诸多进步之处,这些对孤儿院收养的孤儿、当时的回族慈善团体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慈善事业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民国;回族;慈善;私立南京孤儿院

中图分类号:K2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58-09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慈善福利事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其中,民国时期的社会慈善作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重要转型时期,研究成果更是硕果累累。而南京作为民国时期的首都,其地位不言而喻,近年来研究民国时期南京慈善事业的成果亦不在少数。代表性的著作有谭志云的《南京社会救济小史》,^①论文有王晓燕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事业考察(1927—1949)》^②,马真、于德孔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救济机构述略》^③,等等。由于民国时期南京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其中也不乏对某一慈善机构的专门研究,如王萌的《民国时期南京市立救济院研究》^④就是对当时南京最大的公立救济院的专门研究。但是,除公立慈善机构以外,许多私立慈善机构在民国时期的慈善事业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本文的私立南京孤儿院,虽然也在部分著作和论文中有所提及,如王云骏的《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⑤陈新兴的《民国时期南京市的社会救济(1927—1937)》^⑥等,缺乏专门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另外,民国时期的回族慈善团体也在南京慈善事业中有一定社会影响,如伍贻业的《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⑦、兰天祥的《20 世纪上半叶回族慈善团体研究》^⑧等,这些著作中虽有提及私立南京孤儿院是回族慈善团体,但缺乏对两者之间联系的具体阐述。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私立南京孤儿院为个案,从相关档案资料入手,重现私立南京孤儿院的历史面貌。

一、民国时期私立南京孤儿院的创建与发展历程

私立南京孤儿院是由著名回族慈善家、工商界进步人士陈经畬、杨叔平两位先生于 1932 年开始着手筹

收稿日期:2019-03-14

作者简介:蒋静,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① 谭志云:《南京社会救济小史》,南京出版社 2013 年版。

② 王晓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事业考察(1927—1949)》,东北师范大学 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 马真,于德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救济机构述略》,《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 第 6 期。

④ 王萌:《民国时期南京市立救济院研究》,南京大学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 王云骏:《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⑥ 陈新兴:《民国时期南京市的社会救济(1927—1937)》,南京师范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 伍贻业:《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南京伊斯兰教协会 1999 年版。

⑧ 兰天祥:《20 世纪上半叶回族慈善团体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

建至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2 年移交人民政府,经历了整整 20 个年头。在这 20 年里,孤儿院经历了建院初期的辉煌,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被迫停办,又经历了复院后的重新繁荣,直到被人民政府接管,可以说是饱经风霜。孤儿院短短 20 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建院初期,私立南京孤儿院是陈经畬、杨叔平两位先生于 1932 年开始筹建的,由于资金匮乏,他们主要是通过捐献自己的家产来兴办孤儿院。他们用这些钱买下了南京北郊原名为“白骨山”“鬼神坛”的生熟荒地 60 余亩,山地 30 余亩。请著名学者魏家骅先生重新定名,改“白骨山”为“北固山”,“鬼神坛”为“归仁塘”,并以“老者安之,少年怀之”的意思把该地定名为“安怀村”^①。经过艰难而曲折的准备,孤儿院从 1933 年 6 月开始建造院舍,于 1934 年 6 月正式竣工。院舍为“田”字型平房院落式建筑,中心为大礼堂,四周为院生学习、生活劳作场所。布局合理,设施齐全,被孤儿誉为“安乐窝”^②。建成后的孤儿院包括教室、宿舍、大礼堂、诊疗室、工艺室、图书馆、饭厅、浴室、盥洗室、厨房、豆腐作坊、厕所、保管室、家族瞻望室、娱乐室、体育馆等共计一百余间,还有花圃、菜圃、果木园、苗圃、运动场、鱼塘、牧场及各种运动器械等等。1934 年 7 月孤儿院正式对外接收院生。孤儿院采取德育、文化和技能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先后培养了多名孤儿。孤儿院建成后即成立董事会,将资金移交董事会妥善保管和使用。董事会的董事们多是当时的政教要员和社会名流,其中很多人都来自于回族(见表 1)。另外,当时孤儿院的教职员工中也有部分来自于回族。

表 1 私立南京孤儿院初建时部分董事一览表^{③④}

姓名	民族	职别	经历
仇继恒		董事长	前咨议局副议长
伍崇学	回		南京市教育设计委员会委员
金嗣芬	回		财政部科员
甘铉			前南京总商会常务委员
李清淦		交际主任	南京市立一中校长
周仁华		秘书主任	南京市立大行宫小学校长
黄月轩		稽核主任	南京市商会委员
潘启宜			南京市典业同业工会主席
马殿臣	回		南京市回教公会常务理事
马俭余	回		清真董事会主席崇穆小学校长
杨世深	回		南京市回教公会常务理事仁和祥绸布号经理
顾春涛			顾春记营造厂主
陈庆春	回		
陈经畬	回	院长	
杨叔平	回	院务主任	
马成骧	回		
黄伯炎			

其次是战后复院阶段,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因日机轰炸孤儿院被迫停办。“首都沦陷后,本院四周,成为敝人仓库,加之难童遍地,遂徇地方人士之请求,将破败之院舍,暂作收容难童之所。”^⑤此期间,孤儿院借作伤兵医院、难民容身处,根本难以正常收容、教养孤儿。在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孤儿院院舍大部分被毁,所余房屋也被日军占为仓库。所以孤儿院只能将孤儿遣散,移送后方。原有百余名孤儿有家长者由家长领回,48 名较大孤儿分别送至汉口孤儿院和苏北泰县继续教养,50 名年幼孤儿由南京红十字会暂养。^⑥直至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孤儿院才得以重新召开董事会,筹措商议复院之事,并将残破院舍,稍加整理,同时购置院具和儿童生活用具。于 1946 年 4 月 1 日正式复院,陈经畬先生任孤儿院董事长,杨叔平先生

① 王云骏:《南京百年城市史 1912—2012》(社会管理卷),南京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29 页。
② 陈安吉,陆纪林:《南京百年风云 1840—1949》,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8 页。
③ 伍贻业:《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南京伊斯兰教协会出版 1999 年版,第 302 页。
④ 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私立南京孤儿院第一届报告概况》,全宗号:1001,目录号:5,案卷号:188。
⑤ 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私立南京孤儿院第一届报告概况》。
⑥ 南京下关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下关区志》,方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74 页。

任院长,开始收容孤儿。

复院后,由于收容的孤儿人数越来越多,院生一度达近 200 名,原有院舍又有许多遭到破坏,远远不能满足孤儿的需求,孤儿院不得不增建院舍,并请了大量工人对孤儿院的原有房屋进行了修复。

但复院后的私立南京孤儿院,受资金等种种原因的限制,其发展仍然是举步维艰,院址的扩充、院舍的恢复、资金的筹措等等,都需要社会人士的帮助。当然,善后救济总署也会定期向孤儿院分配物资。

最后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移交人民政府接管。陈经畬、杨叔平两位先生于 1950 年决定将“人民事业,交给人民”,开始努力修复,恢复旧观,编造院产清册,申请人民政府接管。1951 年,董事长陈经畬先生在北京开会时,正式向南京市市长柯庆施提出申请,希望将孤儿院交由政府接管。随后,孤儿院董事会又向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南京市分会提出申请,并请求与南京儿童院合并。

1952 年 8 月 20 日,杨叔平先生在其堂兄也是孤儿院董事杨泽棣先生的陪同下,携带了全部的账簿、房产证明、地产证明等等,前往南京市民政局内救济分会,向李世军和武荣昌两位同志办理移交手续。至此,私立南京孤儿院正式移交给人民政府并与南京儿童院合并,由杨叔平先生担任儿童院院长,赵英杰先生担任副院长。

综上所述,私立南京孤儿院从 1934 年正式招收孤儿至 1952 年结束历时 18 年,三个阶段先后收养孤儿共计 500 余名孤儿。很多孤儿长大成人后都有所成就,国内外各种团体也曾多次去该院参观访问。

二、民国时期私立南京孤儿院的管理运作

(一) 经费来源

私立南京孤儿院是民间财团自费创办的慈善救济团体。而事实上要创办任何一种类型的慈善机构,首先面临的重大难题就是经费问题。1915 年陈经畬在参观汉口孤儿院时感触颇深,自愿捐银一千两,募得“义顺成商号”银一千两,并以“预悯堂”为户名存放生息。又从 1916 年起,陈经畬先生和“义顺成”每年都捐银三百两存入“预悯堂”,截止到 1931 年,本金加利息累计已达到 6 万余元,^①可供解决开办慈善事业的经费问题。而陈经畬先生的好朋友杨叔平先生也为创办私立南京孤儿院做出了巨大牺牲,自愿捐献了个人资产 3.5 万元,并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义顺成鞋帽百货店”的职务和私人经营的一切企业,全心投入到孤儿院的建设和日常工作中。陈经畬和杨叔平两位先生在筹办孤儿院之前,曾先后到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山东等省市切实考察各种慈善事业。返回后经过讨论,认为丧失父母无家可归的孤儿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是目前最急切要解决的,才最终决定在南京创办孤儿院。故孤儿院初期的院舍、机械设备、生活用品等基本都是以陈杨二位先生的个人资产筹备的。

当然,陈杨两位先生还通过募捐等各种方式向社会人士为孤儿院募集资金。陈经畬先生曾募得“汉昌肥皂厂银”8700 元,民国二十三年,又募得隐名者银 20550 元,加上杨叔平先生捐献的 3.5 万元等等,总计筹得 137800 元,^②全部资金都交由董事会妥善保管和使用。建院后,孤儿院的日常经费主要依靠资金购置的房地产租金、本院农产品收入以及社会慈善人士及慈善团体的捐助。陈杨两位先生日常分工明确,陈经畬先生主要负责筹集孤儿院平时经费,而杨叔平先生则主要负责主持院务。

(二) 组织机构

私立南京孤儿院院舍于 1934 年 6 月完工,1934 年 7 月孤儿院正式开始收养孤儿。该院由董事会管理,将所有财产移交董事会核收保管,该院董事会的第一任董事长是金陵名绅仇继恒先生。另外,孤儿院还选聘了董事 25 人至 29 人,组成董事会,作为孤儿院的立法监察机关。

孤儿院选聘的董事大多身居要职,且以近代工商业者以及进步人士居多,在机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另外,孤儿院还设院长一人,主持该院一切院务,由陈经畬先生担任。设院务主任一人,依据院长指令,管理全院大小事务,由杨叔平先生担任。1935 年后,陈经畬先生因为商务繁重,故辞去了孤儿院院长一职,改由杨叔平先生担任院长,自己则作为孤儿院董事。偌大的孤儿院不可能只由杨院长一人打理,院内还设有四部:总务部,负责办理一切文书、经济、庶务事宜;教导部,负责办理一切教务保育事宜;工艺部,负责办理一切实

^① 杨荣良,朱淮宁:《南京民族宗教志》,南京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45 页。

^② 杨荣良,朱淮宁:《南京民族宗教志》,第 346 页。

用工艺、家事工艺、厂务等事宜;农艺部,负责办理一切园艺作物、森林畜牧场务等事宜。^① 四部各设部长一人,分管各部事务。另外,在部下又分设若干股,各股设股长一人,分别负责院中具体事务。

(三) 招生工作

私立南京孤儿院在招生范围上,能够广泛地接受各种孤儿,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宗教。所以孤儿院收养的孤儿有回族的,有汉族的,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有伊斯兰教信徒,也有基督教信徒、佛教信徒等其他宗教信仰者。在孤儿院的收养细则中就有具体规定,“收养8—12岁丧失父母、不分民族、宗教之贫苦男孤儿。”^② 开院后就收养了男孤儿94名,后来增至121名。

另外,孤儿院在招生管理上十分严格,孤儿在入院前必须先由介绍人填写一份“请求收养书”,再经院方查明核实后,保证人填写一份“保证书”,接受审查,审查通过的孤儿还要接受体检,体检合格者方能入院。进入孤儿院后还会接受摄影、问话、沐浴、更衣、发给生活用品、常规指导等一系列流程。这些环节都结束后,才算完成整个招生工作,孤儿们在院内进行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四) 教学管理

孤儿院秉持着“收养丧失怙恃贫无告之孤儿兼授以普通学识与生活技能俾得自立”^③ 为宗旨。意思就是以收养那些失去父母,贫苦而无处诉说、无所依靠的孤儿,教授他们普通学识和生活技能使得他们日后能够在社会上自立。所以孤儿院在1946年复院后的目标除了恢复原有状况外,便是更加注重教养工作中的实验与园地生产,培养院生成为民主社会实际工作中的重要人物。故对院生的教养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入院前四年进行纯粹国民教养,接下来两年进行国民教育兼职业陶冶,再下面三年进行职业教育。^④

私立南京孤儿院以“健、勤、诚、朴”作为院训,“健”即指“身心健全”;“勤”即是指“手脑并用”;“诚”即指“言行一致”;“朴”即是指“起居简朴”。^⑤ 希望孤儿院的孩子能够从小做起,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孩子们的独立自主能力,并对收养的孤儿实行现代教育,希望他们进入社会以后也能做到自力更生,有所作为。全院学生也按照院训分为健、勤、诚、朴四个班级。教学内容上,除了采用一般小学课本以外,还设有劳动课,通常就是教授织布、制鞋、理发、缝纫,等等。对于孤儿普通知识的教授,主要以当时的初级小学课程为标准,但也会按照实际情况稍作改变;而对于孤儿生活工作技能的训练,则分为农艺和工艺二组,农艺包括园艺作物、畜牧业等各种类型,工艺包括土木、藤竹、印刷、家事工艺等各种类型。总之,可供孤儿学习的生活工作技能多种多样。

在学制方面,按年龄分班,实行两种教学,并特设园艺班。孤儿院12岁以下的院生为“普通班”,白天以学习文化为主,12岁以上的院生为“专工班”,白天都要参加劳动,由技师传授指导。^⑥ 晚上院生基本都学习文化知识,按照文化程度分班上。院生半耕半读,有利于从小培养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的良好品德,为他们以后能够独立步入社会生活打下一个良好基础。院生们一般到16岁,完成相应的必修课,学习的普通知识和生活技能能够达到自立后,再由院方根据个人情况分别介绍进入工商业界作为实习生或者担任其他职务,抑或经院领导推荐准予升学继续深造。该院成立后至1952年止,前后收养孤儿500余名,其中有不少人都成为了社会的栋梁之材。

(五) 生活管理

在孤儿院的生活管理上,一日三餐,早饭多是白粥,午饭和晚饭以素食为主,每隔几天会加牛肉一盘。衣着方面,一年四季的衣服从上衣到裤子再到鞋一应俱全。床是双层铁床,床上被子、床褥、枕头齐全,夏天还备有凉席和蚊帐。孤儿院固定每周大扫除一次。杨叔平院长的女儿曾写文说到她眼中看到的孤儿院的教室、饭厅、浴室及盥洗室等设施,“课堂内阳光充足又很宽敞;饭厅中各就各位,井井有条;院生个个都是红润的小脸、结实的身体。盥洗室中,面盆、漱口杯、毛巾等都有编号,放在固定的地方,秩序井然。”^⑦ 这些细节无疑都反映了孤儿院良好的管理水平。另外,学生在课外时间,会按照自己的年龄、能力,去参加院内的一些

① 王倩,巩志娟,姚恩博:《1927—1937年南京民间慈善活动述略》,《石家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② 杨荣良,朱淮宁:《南京民族宗教志》,第346页。

③ 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私立南京孤儿院第一届报告概况》,全宗号:1001,目录号:5,案卷号:188。

④ 《私立南京孤儿院第一届报告概况》,全宗号:1001,目录号:5,案卷号:188。

⑤ 《私立南京孤儿院第一届报告概况》,全宗号:1001,目录号:5,案卷号:188。

⑥ 王云骏:《百年南京城市史1912—2012》(社会管理卷),第330页。

⑦ 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社会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405页。

工艺和农艺活动,比如去菜地摘菜、拔草等,去鱼塘捉鱼捉虾,去工艺室学习缝纫、制鞋、理发等等。孩子们既能在这些劳动中的得到成长,又能满足孤儿院在衣食上的需求。

为了给予院生更好的照顾,孤儿院还请了护工专门照料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白天为他们准备了一日三餐,晚上为他们盖被和唤尿。孤儿院还设有医疗室,并且聘请了专业的医护人员,为生病的孩子提供治疗,病情严重者则会被及时地转院治疗,送外治疗时孤儿院会派专门的护理人员随行,悉心照顾病中的孩子,直至康复返院为止。

三、民国时期私立南京孤儿院的办院特色

(一) 教养兼施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救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重养轻教,中国传统社会救济面比较窄,主要就是“鳏、寡、孤、独”四民,即老而无妻、老而无夫、幼而无父、老而无子四类人。根据这些救济对象的特点,传统社会救济通常把施衣、施粥等仅仅只能勉强提供温饱的救济方式作为经常性的救济办法。而事实上这种“重养轻教”的救济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这些被救济者,反而会助长他们的惰性和依赖心理,使得他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另外,再加上传统社会救济机构管理不善,缺乏公开透明机制,使得中国传统救济事业徘徊不前。这里笔者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慈善机构并非是受难者和不幸者的“保险公司”,它不可能一直保障这些人的未来生活,所以“重养轻教”的救济方式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教养”一词拆而论之,所谓“养”就是慈善救济。慈善救济的基本内容就是保障生存,提供生活救助,维持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需要,使其不至挨饿受冻而死。^①所谓“教”,就是慈善教育。慈善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教育那些社会上的孤儿弃婴。慈善机构仅提供“养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担负施教的责任,使得他们得以有能力独立生存。^②所以,慈善救济机构除了建立养育院,保障其食宿温饱外,更应教授他们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便于他们将来长大成人后能够自谋生计,有所作为。私立南京孤儿院接受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救助理念和教育思想,坚持实行“带经而锄、教养兼施、可以为农、可以为士”的方针,^③即在保障孤儿院院生基本生活的基础上,使其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并对其进行职业培训,让他们最终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生存。孤儿院也凭借“教养兼施”的理念使得许多孤儿成人后有所成就,成为社会的栋梁。

(二) 制度完备

私立南京孤儿院建院后董事会便颁布了一系列的章程,例如《行政组织规程草案》《私立南京孤儿院收养孤儿细则》《私立南京孤儿院章程》等等,制定了详细的收养流程,进一步规范了孤儿院的收容工作程序。另外,该院的《行政组织规程草案》中明确规定了每周一次的院务会议及每两周一次的各部会议这两项例会制度。^④这条规定严格遵照了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监督慈善团体法》及《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规则》两部法规,可见该院在开展救济工作的过程中充分地重视与借鉴政府慈善救济法规,促使私立南京孤儿院的慈善救济事业向着更为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向迈进。

(三) 参与者广泛

孤儿院的创立者陈经畬先生和杨叔平先生为了把孤儿院建设得更好,在社会上广泛寻求援助。董事会中除了有来自南京的进步人士,也有来自上海、汉口等地的著名人士作为董事;这些董事中有回族,也有非回族;有在上层社会能起到号召作用的著名人士,也有工商界实业家。教职员工中,各地各族各阶层人士皆是兼收并蓄。由于陈经畬、杨叔平两位先生自幼失学,对办教育两人并不是很在行。但是,在筹办过程中两人得到了一些著名教育家的同情和支持。如杨叔平先生即经常去向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教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接受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孤儿院的教育方针的制定可以说就是以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在人力上陶行知先生也会为孤儿院给予支援,经常介绍教师去任教。又如当时著名教育家时任南京市立一中校长李清悚先生,他会经常参加孤儿院董事会议并任董事,给予具体指导。孤儿院的教育工作也这样一步步完善起来。在这些具有教育革新精神的专家的支持下,私立南京孤儿院成为一个生气勃勃、具有

① 黄鸿山:《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

② 周秋光:《民国时期社会慈善事业研究刍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③ 杨荣良,朱淮宁:《南京民族宗教志》,第346页。

④ 陈新兴:《民国时期南京市的社会救济(1927—1937)》。

特殊性的新型慈幼教育团体。

此外,孤儿院作为当时首都的一项模范慈善救济事业,还曾受到联合国、驻华使节和外国慈善团体的关注,经常会派代表团前来参观,双方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孤儿院一度成为南京救济事业的一个对外宣传交流窗口。可见,孤儿院参与者之广泛。

(四) 关注院生长期发展

私立南京孤儿院不仅仅是对尚在院内的孤儿提供最好的教育和照顾,孤儿院更加关注的是院生的长期发展。院生的毕业去向一般分为两种,其一,大部分院生毕业以后,院方会给他们介绍工作。即使是在孤儿离开孤儿院以后,孤儿院仍然负保护之责任,直至孤儿院认为他们有真正自立能力时为止。其二,对于那些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院生,孤儿院还会辅导他们参加中学、大学的入学考试,给予他们升学的机会,让他们得以继续深造学习。甚至其中一些院生的升学费用都是杨叔平院长私人提供的。总之,院生在毕业以后的生活及工作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乃至政治上的迫害,孤儿院都会尽力给予帮助。如孤儿院的毕业院生孙道章先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大学停发公费,陈经畬先生得知消息后当即去信,表示支持他的行为并愿意资助他完成学业。后来孙道章被捕,杨叔平院长通过多方奔走,救他出狱。新中国成立后孙道章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始终没有忘记孤儿院对自己的恩情,多次去信给杨院长告知自己的近况。^①

正是由于孤儿院对孤儿们的长期关怀之心,自始至终地为孤儿们“保驾护航”,这才造就了孤儿院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而他们也始终不忘保持一颗对孤儿院的感恩之心。以至在 1984 年,孤儿院建院 50 周年之际,当年师生,仍从全国各地云集南京,济济一堂,共同缅怀孤儿院的养育之恩。

(五) 管理秩序井然,师生亲如一家

孤儿院采取陶行知先生先进的教育思想,文化教育与技术教育并重,管理科学,院中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充分发挥民主精神,师生亲如一家。

孤儿院全院教师员工都与孤儿们同吃同住,杨叔平院长更是以身作则,事必躬亲,视孤儿如己出。杨院长经常会夜里查宿舍,看见孩子们睡沉了都会踹被子,便会细心地为孩子们把被子盖好,但又发现这样冬天很易着凉致病,便为孩子们定制了棉肚兜御寒。孩子们若生病,杨院长比任何人都着急,会叮嘱厨师为孩子特意准备适合的三餐,并多次前来询问孩子的病情,直至康复为止。曾在首都孤儿教养院工作过的教师张汝梅同志在来到私立南京孤儿院工作后,比较了两个孤儿院的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首都孤儿教养院收容的孤儿虽然多,但孤儿生活往往苦不堪言,院内卫生环境脏乱,职工不足,甚至有时生病的孤儿都无人照料。而私立南京孤儿院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生活管理井然有序,师生亲如家人,可谓是孤儿生活与学习的乐园。^②正是孤儿院这种秩序井然的管理水平以及师生间亲如一家的和谐的氛围,孤儿院才能越办越好,成为民国时期慈善救济事业的榜样。

四、民国时期私立南京孤儿院的总体评价

(一) 私立南京孤儿院的进步之处

1. 组织管理上——与中国传统慈善团体对比

与中国传统慈善团体相比较,私立南京孤儿院在组织管理上明显存在较大优势,首先表现在慈善团体的制度化建设上,中国传统慈善团体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往往都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要求而建立的,在慈善组织管理制度上缺乏明确而科学的意识,这显然已不能适应现代慈善发展需求了。虽然传统的慈善重视人伦道德,帮助弱者的救济初衷很好,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慈善救济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不能或缺。这是保障慈善组织健康运行,慈善事业规范、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慈善事业的制度化建设,其核心内容便是完善自我管理与发展机制,提高自我治理能力。上文已提到过孤儿院的立法完备,建院之初就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强化自身制度化建设,健全孤儿院内部规章制度,强化法律意识,督促孤儿院自身依法运行。只有加强慈善救济组织的制度化建设,慈善救济组织才能得以科学合理地管理运行。

其次表现在慈善救济组织的管理透明度上。中国传统慈善团体由于缺乏系统的制度化建设,致使其在

^① 喻秋江:《陈经畬:实现报国夙愿》,《世纪行》2010 年第 5 期。

^②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民族出版 2009 年版,第 107 页。

实际运作管理上出现很多问题,比如管理混乱、用人不当、救助不到位、民众质疑等等问题。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即使每逢大荒大灾过后,朝廷都会大量拨款用于赈灾,但这些拨款真正用于灾民身上的可谓少之又少,大多都被某些腐败官员私吞了。这就说明中国传统慈善团体在管理上存在不够公正透明,缺乏社会公信力的问题。社会公信力关系到一个慈善救济组织能否取得公众信任,能否得以长期发展。只有一个透明度高、公信力强,为社会大众所信任的慈善机构才能最大程度地吸纳社会资源,才能保障慈善救济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因此,慈善救济组织必须强化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督。在建院之初就设立了董事会,作为孤儿院的立法监察机关,决定并监督孤儿院内大小一切事务。孤儿院董事众多,来源也十分广泛,他们都对孤儿院起到了监督检查的作用。慈善救济组织运作要想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不仅要做好内部监督,还必须要自觉接受来自于外部的政府与社会公众的监督。在慈善事业运作过程中,财务问题可以说是最敏感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对于慈善资金的来源、使用、管理及其他用途必须要做到公开透明。私立南京孤儿院对于一切经费都是交由董事会全权处理,每一笔费用的支出都要在董事会上向董事们汇报善款使用的情况,制定相关账目,接受孤儿院和政府社会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慈善救济组织的良好形象,增加公众的信任程度,并形成有利于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促成慈善救济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2. 救济思想上——与民国时期公立慈善团体对比

私立慈善团体因其自身的独立自主性、开放性,不同于公立慈善团体需要考虑多方面问题,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救济思想上表现得更为先进。私立南京孤儿院作为民国时期民间慈善团体的代表更是如此,主要表现在私立南京孤儿院始终坚持积极救济的思想。“积极救济”是相对于“消极救济”而言的,消极救济多是一种政府追求社会公平的工具,通常是给予受助者经济或者物质上的援助,仅仅是为了维持受助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其基本生存能力。而积极救济在除了给予受助者基本生存需求之外,更多的是帮助他们提高自我生存能力。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提供的物质帮助再多再好都只是暂时的,必须从根本上教会他们必要的生存技能。但是民国时期南京市内大部分公立慈善团体,其救济内容仍属于消极救济,且耗资巨大,效果又不够显著。而私立南京孤儿院这所慈善团体从成立开始就奉行教养兼施、积极救济的思想,为南京市民间救济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①秉承着积极救济的宗旨,在如此教养兼施的院内学习生活直至毕业,既保障了这些孤儿的基本生活需求,又教会了他们一门谋生的技能。这些孤儿步入社会后,不仅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反而更加积极地为社会发展做贡献。这才是当时南京慈善救济事业真正的榜样。

3. 救济范围上——与早期回族慈善团体对比

回族慈善传统历史悠久,且回族人民非常注重家庭、家族观念,故早期的回族慈善团体活动范围并不大,救济对象范围也比较窄。到了清末民初时期,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回族慈善团体的救济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族内救济到族外救济、从血缘救济到地缘救济、从家族组织救济到自发团体救济。私立南京孤儿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院虽是在南京建立的回族慈善团体,但其招收的孤儿却是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孤儿院都会接管。且私立南京孤儿院作为一个针对性救助孤儿这一特殊群体的慈善团体,也体现其比之早期回族慈善团体的进步之处。关注和关心弱势群体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早期回族慈善团体受到家族血缘的限制,对特殊群体的救助并不到位。民国时期,回族慈善团体逐渐摆脱了这一限制,救助地域不断扩大,救助机构不断增多,救助对象范围也就得到不断扩充。除了南京孤儿院外,还有救婴会、妇孺救济会等等,帮助了当时很多的弱势群体。此举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回族社会的进步,进一步扩大回族慈善团体的救助范围。

(二) 私立南京孤儿院的不足之处

私立南京孤儿院值得借鉴的地方很多,但它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私立南京孤儿院初期规定收养儿童必须满足“父母具无,确无依靠之男孤儿,其年龄在8岁以上,12岁以下”的条件才能申请入院。首先,对于这条规定中孤儿院只接受8—12岁的孤儿,笔者认为此项规定有失偏颇,上文已经提过,受资金限制等原因的影响,孤儿院的入院条件是较为苛刻的。不仅有年龄限制,还有设有介绍人和保证人制度的限制。虽然此乃孤儿院的无奈之举,但不可否认这也是使孤儿院能够接纳帮助的孤儿受到了一定局限。现代法律规定,18岁成年,而18岁以下的孩子都属于未成年人,他们尚不具有独立生活独

^① 陈新兴:《民国时期南京市的社会救济(1927—1937)》。

自生存的能力。孤儿院不接受8岁以下,12岁以上的孤儿规定显然是不合理的。8岁以下的孤儿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智诸方面都还太弱小太稚嫩,他们什么道理都还不懂,他们更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而12岁以上的孤儿心智可能已稍显成熟,但他们毕竟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还是不能够完全独立。所以笔者认为孤儿院应扩大接纳孤儿的年龄范围,不应作出过多限制,这样才能更有效更广泛地帮助更多孤苦无依的孤儿们。其次,对于孤儿院只接受男孤儿的规定明显是不合理的,还存在着旧社会男女不平等、重男轻女的陋习。私立南京孤儿院作为近代社会的新型慈善团体理所当然应早应破除这陋习,但或许是因陈杨两位老先生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未能破除这陋习实为遗憾之处。现代社会追求的是男女平等,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男女本就应该是平等的。正是因为旧社会存在着诸多的重男轻女现象,所以相对而言才会有更多的女孤儿被抛弃,孤儿院才更应该接受女孤儿而不是仅仅接受男孤儿。这样才真正符合孤儿院救济孤儿、帮助孤儿的初衷。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导致孤儿院设置如此苛刻的入院条件的根源——孤儿院的资金来源问题。孤儿院的资金来源十分有限,孤儿院虽然也接受一些社会团体和社会人士的募捐,但大多数资金还是来源于陈经畬、杨叔平两位先生的个人捐款。但两位先生的私人资产终归是有限的。所以杨叔平先生一心管理孤儿院,陈经畬先生则常年要为孤儿院的经费问题奔走各地,筹集资金。即使这样孤儿院的资金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资金的严重缺乏最终也导致孤儿院管理运行上受到诸多限制。且私立南京孤儿院即使是在这样的境地下,仍然不愿向政府请求任何资助。这主要是因为民国时期蒋介石政府强调回族只是“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只有回民和回教,没有回族的政治言论。”^①回族慈善团体为了表示对蒋介石政府这一言论的抗议,故不愿与政府有过多接触,自然也不愿接受政府的援助。所以对于孤儿院的这一行为笔者也能表示理解,但却不能完全赞同。政府无论是在公共慈善救济事业还是民间慈善救济事业中都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政府救济具备其自身依靠的行政手段以及强大号召力的优势,这是民间救济所不具备的。孤儿院没有能够真正充分地发挥在孤儿救济事业中的巨大作用是导致孤儿院因资金问题举步维艰的一大重要原因。所以孤儿院应该积极向当时的南京市政府请求援助,加强与政府的沟通联系,与政府救济紧紧相结合。且当时的市政有关部门也并非对孤儿院的善行善为完全无动于衷,在1934年11月,私立南京孤儿院就获得了南京社会局颁发的“慈善第壹号”的证书,^②并接受过各类慈善团体的参观交流,这里面既包括政府公立慈善团体,也包括了民间私立的慈善团体。陈经畬先生也因创办私立南京孤儿院的事迹受到当时政府的嘉奖,被授予了“褒”字奖章一枚。^③因此,无论是政府救济还是民间救济都是社会慈善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应相辅相成,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

(三) 私立南京孤儿院的影响

1. 私立南京孤儿院对孤儿的影响

孤儿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弱势群体,理应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关爱。对于孤儿院的孤儿而言,自幼丧父丧母的不幸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留下巨大的创伤。不幸的经历使他们的内心更为敏感和脆弱,更加迫切地需要关心和爱护。在孤儿院成立之时朱子桥将军曾给孤儿院题字曰“如保赤子,不愧青天。”^④“赤子”原意就是指刚出生的婴儿,保护好这些纯真善良的孩子就是为民族的未来、祖国的未来多增添一份希望,这样的伟大事业自然无愧于青天。中国有句古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私立南京孤儿院就很好地贯彻了这句话,抚养教育这些孤儿就如同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从身到心,从他们的角度出发,真正考虑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成长。

私立南京孤儿院从1934年建院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共收养了孤儿300余名,并先后在和平门和安怀村设立了两所小学,供孤儿和周围贫困儿童免费求学,在籍儿童300余名。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复院后即收养孤儿162名,该院规模不断修葺后,收养孤儿一度达200余名,直至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管,总计收养孤儿500余名,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为了教师、医生、工程师、军官和农艺师等等。孤儿院的能力和资源十分有限,它无法帮助社会上所有的孤儿,无法改变所有人的命运,但它却改变了这一批孤儿的命运,使他们学有所长,学有所成,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之才。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很多当年的孤

① 兰天祥:《20世纪上半叶回族慈善团体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② 杨荣良,朱淮宁:《南京民族宗教志》,第346页。

③ 郑勉之:《陈经畬》,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④ 《私立南京孤儿院第一届报告概况》,全宗号:1001,目录号:5,案卷号:188。

儿回到孤儿院原址,一起高唱那首歌给孩子们的生活增加无尽乐趣,激励他们不断成长的院歌,“钟山巍巍,江水泱泱,日出东方,朝气扬……北固山,归仁塘,是快乐的家乡”,^①追忆当初在孤儿院的时光。

2. 私立南京孤儿院对回族慈善团体的影响

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救国成为世纪之交的主流思潮,‘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宗教救国’、‘科学救国’等口号成为近代回族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也是回族社团的宗旨与任务。”^②故民国时期,回族各界社会人士深受“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大力通过发展工商业积累兴办慈善团体的资金,建立学校兴办回族教育事业。陈经畬先生也受此思想影响,参与开办了义顺成鞋帽百货店,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便开始在宁、汉两地广泛兴办慈善、慈幼教育事业。同时,陈经畬先生和杨叔平先生都是出生于南京的具有浓厚伊斯兰教氛围的回族家庭。两人从小受到伊斯兰教教义“周济孤贫,慈善为怀”的影响,自小便看遍社会上的苦难,自身经历更是坚定了两位先生创办孤儿院的决心,使得两位先生对于创办私立南京孤儿院的事如此不遗余力。

两位先生创办的私立南京孤儿院可谓是回族慈善团体的榜样,它扩大了回族慈善团体的影响,推动了回族慈善团体的发展壮大。私立南京孤儿院作为民国时期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回族慈善团体,它所采用的许多先进管理经验成为很多回族慈善团体借鉴学习的范本,很多慈善团体都前来参观学习。而其创办者陈经畬和杨叔平先生都是当时回族的著名人士,在创办“私立南京孤儿院”的慈幼事业中,两位先生艰苦奋斗,声誉卓著。他们不但拯救了于饥寒交迫中的贫苦孤儿,而且教养他们,使他们学有所成。这对于提高回民对慈善团体的关注度,吸引更多的知名人士参与到慈善救济事业中,扩大回族慈善团体的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回族慈善团体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使得民国时期的回族慈善团体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建立起来,不仅仅帮助回民,也帮助其他民族人民,这有利于增强回族本民族团结,促进回族社会稳定,加强回族与其他民族的联系与交流。

3. 私立南京孤儿院对新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新中国初期对于社会慈善事业的变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建一批新兴的社会慈善机构,另一方面就是接收、调整、改造一批民国时期建立的社会慈善机构。^③ 陈经畬、杨叔平二位先生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清明,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社会秩序也渐渐稳定,社会主义慈善与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两位先生深切意识到培养教育人才关系到国家建设事业的前途命运,个人的力量是难以胜任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从小从旧社会过来的,对新的教养制度缺乏学习,不甚了解,无法全面顾及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于是两位先生主动响应国家的号召,自愿将私立南京孤儿院交给人民政府接管。这无疑对于新中国调整旧的慈善机关、改造旧的慈善团体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另外,私立南京孤儿院对新中国慈善事业特别是慈幼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刚刚过去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上的孤儿越来越多,新中国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关注孤儿问题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孤儿的未来直接关系到国家、社会的发展,不允许我们有丝毫忽视。私立南京孤儿院无论是从制度建设、具体章程、教学思想到教养目标、教养内容、教养方法等等方面,都可谓是当时慈幼事业中的楷模。私立南京孤儿院为此后建立的很多孤儿院、儿童院都提供了范本,这些孤儿院、儿童院在学习借鉴私立南京孤儿院的优秀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管理运行状况,不断创新,为这些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与学习环境,更好地帮助他们成长。可见,私立南京孤儿院为新中国的慈幼事业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胡晓明)

① 伍贻业:《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第306页。

② 马艾:《近代回族社团研究》,宁夏大学2014年博士毕业论文。

③ 王子今,刘悦斌,常宗虎:《中国社会福利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

句法变异:生成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的交汇点

方小兵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要:句法变异是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也是社会语言学变异学派的一个研究短板。生成语言学起初不承认语言变异现象,但是随着最简方案和优选论的引入及句法研究视野逐渐扩大,生成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现象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以句法变异为核心的社会句法学成为两个学派整合的平台,未来合作的重点领域有:儿童语言习得、句法演变及语法化、语言类型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双方的结合有助于句法变异研究的深入和句法理论框架的完善。

关键词:句法变异;社会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语法化;社会句法学

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67-06

变异(variation)是“语言项目在实际话语中存在的差异”^①。语言变异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在一些学者眼中甚至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内容。^②语言变异的研究曾经是变异学派的“专利”,以语言变异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语言学家因而常被称为变异学派(variationists)。然而近年来,随着生成语言学相关理论的演进,语言变异已成为生成学派和变异学派两个学派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成了双方对话的窗口和合作的平台。社会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在句法变异方面的合作不但推进了句法理论不断完善,也对相邻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语言变异观:从分歧重重到逐渐靠拢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有序异质体”(orderly heterogeneity)^③。因为其“有序”,故具有可学性;因为其“异质”,故而有变异。各类社会群体在头脑中都储存了句法变项的各类变式,在表达时会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其中的某个变式。选择的结果就是语言环境、语体风格和说话者社会特征的呈现。语言正因为有了选择机制,才真正具备了交际功能。人们通过语言变异区分说话者,说话者也通过变异形式传递意义、场合、身份等多种信息。一成不变的句法结构将使语言失去其社会表征功能。变异是语言结构的本质特征,而正确理解和表达各种变式是内在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and Johnson)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书名,仿拟出《我们赖以生存的变异》(*Variation We Live By*)之类的表述。^④

尽管人们每天都在下意识地运用语言变异,但是对语言变异现象的研究却总是被消极看待或有意回避。生成语言学者更是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区中的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认为变异不属于

收稿日期:2019-05-18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规划观及其中国实践研究”(16YJA740009)。

作者简介:方小兵,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句法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规划。

①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② Chambers, J. K., Studying Language Variation: An Informal Epistemology, In J. K. Chambers, P. Trudgill & N. Schilling-Estes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Malden, MA: Blackwell, 2002.

③ Weinreich, U., W. Labov and S. Herzog,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In W. P. Makiel and Yakov Lehmann (eds.),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8.

④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语言系统,而只是语言运用(performance)中临时产生的,对语言变异研究非常排斥,甚至将社会语言学收集变异形式的研究工作视作“收集蝴蝶标本”(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①

生成语言学的最初框架是标准理论(ST)和扩充式标准理论(EST)。在该阶段,转换前后的句子,如主动句和被动句,是具有同一底层形式的不同变体,底层形式是“核心句”(kernel sentence),通过运用一系列转换规则,生成表层形式。拉波夫(Labov)借用了这一方法,推出了“变项规则分析法”(variable rule),用来研究语言变异。但生成句法到了管约论阶段,所有的规则都归并为一条:Move α ,其操作受到各种原则的限制,如邻接原则、空语类原则等。由于原则是绝对的、不可更改的,生成句法与变异研究越走越远。

从管约论发展而来的原则与参数理论(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heory)则认为,语言与语言的相异缘于参数设定的不同,而参数大多是二分的(binary)。参数理论本身就承认跨语言的、普遍语法内的句法变异。^②但对于同一语言系统内的句法变异,生成句法仍然缺乏相关理论。

后来,乔姆斯基等人^③提出了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在此影响下,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也从音系层面进入句法领域的运用。渐渐地,生成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从跨语言的宏观参数变异(macroparametric variation)研究,发展出语言内部的微观参数变异(microparametric variation)研究。研究人员开始关注非标准语中的句法变异现象,试图用统一的理论框架解释各类语言变异现象。21世纪以来,优选论和最简方案理论框架下的句法变异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④

随着生成学派对语言变异现象的观念转变,要求将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和生成学派的变异研究整合起来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1987年芝加哥语言学会(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年会的主题就是讨论两个学派的合作,会后还出版了名为*Parasession on Variation and Linguistic Theory*的会议论文集。^⑤

1994年,帕普拉克(Poplack)和塔利亚蒙特(Tagliamonte)^⑥指导渥太华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的两位成员 Meechan 和 Fole 撰写了一篇研究英语句法变异的论文 *On Resolving Disagreement-linguistic Theory and Variation —There's Bridges*,试图整合句法理论与变异理论。其副标题“*There's Bridges*”也很有意思:既是英语存在句中典型的变异现象(主谓一致),又暗示了生成学派和变异学派之间存在着“句法变异”这座“桥梁”。

2003年,第二届欧洲语言变异国际研讨会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召开,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句法与变异:融合生物语言学与社会科学》。^⑦该书对句法变异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句法变异已经不再是社会语言学的专利,而是逐渐演变成21世纪的一个热门话题,并指出“本论文集的出版是未来‘社会句法学’(social syntax)发展的里程碑”。

二、句法变异合作研究的价值

与语音及词汇变异一样,句法变异是语言变异的重要表现形式。沃尔夫拉姆(Wolfram)^⑧甚至认为“句法变异的分层比语音变异的分层更为显著”。但是,如果不对句法变异现象进行全面收集整理,并按照变异特征进行有效的分类,然后进行量化统计分析,那么一些句法现象就会永远难以摸清。^⑨由于传统的变异研究更多地见于语音层面,“在涉及到句法及形态层面的分析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⑩。还有学者指出,句法变异研究之所以一直以来没有太大的进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句法变项(syntactic variable)的确立标准仍不明确”^⑪。很明显,社会语言学的句法变异研究在前进过程中遇到了瓶颈,需要与其他学科紧密合作才能解决那些棘手的问题,逐渐认识到变异研究价值的生成语言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双方在句法变异研究

①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

② Wilson, J. & A. Henry, Parameter Setting in a Socially Realistic Linguistics, *Language in Society*, 1998(27), pp. 1-21.

③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④ Green, Lisa, Syntactic Variation. In Robert Bayley and Ceil Lucas (eds.),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Theorie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⑤ Beals, et al. (eds.), *CLS30: The Parasession on Variation in Linguistic Theory*, Chicago: CLS, 1994.

⑥ Meechan, M. and M. Foley, On Resolving Disagreement: Linguistic Theory and Variation—There's Bridges,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1994(6), pp. 63-85.

⑦ Cornips, L. & K. Corrigan, *Syntax and Variation: Reconciling the Biological and the Social*, Amsterdam: Benjamins, 2005.

⑧ Wolfram, W., *A Sociolinguistic Description of Detroit Negro Speech*,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1969.

⑨ Tagliamonte, S. A., *Analysing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⑩ Fasold, R.,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Oxford: Blackwell, 1999.

⑪ 蔡冰:《句法变项的确立标准:以汉语程度副词为例》,《外语研究》2008年第6期,第15-21页。

领域携手合作,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揭示句法变异特征,另一方面有助于句法理论的完善。

(一) 更好地揭示句法变异特征

句法变项的界定是句法变异研究中的一个难题。拉波夫(Labov)^①认为语言变项是“一组表达相同语义的不同语言形式”,变项必须满足底层结构的同一性与意义的对等性。然而这一定义基于原先的语音变异研究,在扩展到句法层面时,该定义就遇到了各种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语言中的句法变项不像语音变项那样频繁,而且句法变异更容易受到内部语言因素的制约,或者取决于风格和语境问题。^②

句法层面一些交替出现的语言形式不见得以同样的方式生成,也很难被确定为表达完全相同的语义内容,其中大多存在语义、语用或语言风格上的细微差异。此外,由于句法因素所产生的结构更抽象,因而不“太可见”,因此说话者对它们的意识也较低。句法结构通常不像语音因素那样具有社会识别功能,因为在语言的延伸中,一个给定的句法变量根本不会出现,因此不会给说话者一个关于对话者的语言归属的线索。目前,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句法变项的确立标准,到底是按照形式标准,还是语义标准或功能标准,或者三者兼顾,仍未达成一致意见。^③

变异研究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区分词法变异和句法变异。如有人认为“登陆上海”“抢滩南京”“上场两名外籍球员”等表达方式是现代汉语中新出现的,属于句法变异。蔡冰则以“狂、超、巨、暴”四个新兴程度副词为例,探讨了现代汉语中的句法变异现象。^④这种类型的变异到底属于词法还是句法?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为此,柯劳克(Kroch)^⑤提出了“形态—句法变异”(morphosyntactic variation)概念,对两者不再区分。塔利亚蒙特(Tagliamonte)^⑥2012年出版的变异研究专著也将 syntactic variation 和 morphosyntactic variation 视为同义术语。词法与句法的关系是“一场历经35年的争论”,词法—句法界面的界定需要形式句法理论有所作为。^⑦

一般认为,句法变项的界定必须在句法理论框架内完成。社会语言学关于变项的定义是从生成语言学借用的,其中存在的问题是生成语言学自带的(embedding problem),解决的办法也需要从生成语言学出发。^⑧变异研究需要句法理论的指导,因为对一个变项的满意的句法特征描写是懂得如何考察一个变项的前提条件,也是了解变项在说话者语法中具体位置的必要条件。变异学派应该采用形式语言学的理论,发现更有效的手段确定哪些变式与句法因素相关,哪些没有关系。^⑨

(二) 有助于句法理论的完善

大量的句法变异研究案例证实,句法变异研究是句法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完善句法理论。生成语言学可以从基于使用的语法模式中获益。运用变异研究的方法,可以发现一些平时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句法现象,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如英语中的双情态动词句:

例1 We might should be thinking this way.

生成句法经典的分析框架不允许有双情态动词出现,因为IP下面的I位置无法容纳。然而这类表达在英语口语中十分常见,尤其在某些方言中。变异学者为此提出了更加合理的分析框架。基于新框架的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句法结构理论的研究,而且对相近的语法体系的微变异研究提供了证据。

一个真正有解释力的句法理论必须面对大量充满变异的真实的语言数据。书案式的研究和纯粹的形式推导固然可以形成大量的理论和规则,但如果直接面对纷繁变幻的语言现象,那些理论和语法规则似乎都不能成立了。斯帕斯(Speas)^⑩对原则与参数理论中12个所谓的“不可违反原则”进行了分析,发现所有的“不可违反原则”都会在某些语言中找到反例。这些实际案例符合人们的语感,然而违反了生成语言学的相关

① Labov, W.,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p. 118.

② Collins, P., *Grammatical Change in English World-Wid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③ 蔡冰:《句法变项的确立标准:以汉语程度副词为例》,《外语研究》2008年第6期,第15-21页。

④ 蔡冰:《句法变项的确立标准:以汉语程度副词为例》,第15-21页。

⑤ Kroch, A. S., *Morphosyntactic Variation*. In Beals, et al (ed.), *CLS30: The Parasession on Variation in Linguistic Theory*, Chicago: CLS, 1994.

⑥ Tagliamonte, S. A.,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Change,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2.

⑦ 李亚非:《论语言学研究中的分析与综合》,《中国语文》2006年第3期,第195-205页。

⑧ Tagliamonte, S. A., *Analysing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⑨ Sells, Peter, John Rickford and Thomas Wasow, Variation in negative inversion in AAVE: An Optimality Theoretic Approach. In Jennifer Arnold, et al (eds.),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Data, Theory, and Analysis*, Stanford, C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CSLI), 1996, p. 173.

⑩ Speas, M., Optimality Theory and Syntax: Null Pronouns and Control. In D. Archangeli & D. T. Langendoen (eds.), *Optimality Theory: An Overview*, Oxford: Blackwell, 1997.

原则,只能说明原则自身存在问题。通过对原则作各种各样的补充说明来解释例外现象,会让原则丧失原则性,也会妨碍语言学理论的完善。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凡是毫无例外的、绝对性的语法规则,都是以忽略一部分语言事实为代价的、抽象的规则,其对应的现实世界中的语言表现并不是整齐划一的。^①

生成学派的 David Adger 和变异学派的 Jennifer Smith 共同撰写的论文《变异与最简方案》,就很好地体现了两个流派的合作。^② 他们认为生成句法的最简方案理论非常适合处理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问题,提出句法变式实际上带有不同的语法特征和形态特征,但具有相同语义的词汇项,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同样的意义。科尼普斯(Cornips)和科里根(Corrigan)^③认为,生成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是互补的,社会语言学的任务是描写和解释言语社区中变异的模式,而生成语言学则从理论上揭示这些变异可以允许的范围。因此,两派结合,可以更好地说明句法变异的特征:句法变异既受社会因素的激发和驱动,也受语法内在特质的限制。

三、未来合作的重点领域

在句法变异研究中,社会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可以在以下四个领域进行合作:儿童语言习得、句法演变及语法化、语言类型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一) 儿童语言习得

生成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句法现象(即充满变异的句法结构),儿童是如何在碎片化的语言习得过程中顺利习得句法规则的?

生成语言学非常重视语言习得,认为每个人都有语言习得机制(LAD),儿童学习语言的能力是一种“语言本能”。语言习得中的刺激贫乏(poverty of stimulus)则是生成语言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语言天赋论的基础。比较而言,变异学派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够。一方面,要把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发展性错误(development errors)和真正的变异(genuine variability)完全区分开来,还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变异学派通常要选择大量的被试,而每个被试需要收集长时间的语料,然而这项调查对婴幼儿比较困难。除了沉默寡言外,有的只是电报式语言,尽管可以传递信息,但难以形成完整的、可供分析的句法结构。

儿童是在充满句法变异的言语社区中成长起来的,研究句法变异对于语言习得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如美国黑人儿童在家里听到的是 a 式,在电视上听到的是 b 式,他该选择什么样的参数进行设定?

例 2 a. I ain't got no money. (双重否定句;negative concord)

b. I haven't got any money.

例 3 a. I feel like I ø fourteen. (系词删略;copula deletion)

b. I feel like I am fourteen.

生成语言学认为,儿童可以在普遍语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语言输入,选择不同的句法形式来进行参数设置。柯劳克(Kroch)^④特别指出,面对各种竞争的句法系统,儿童只能习得其中的一套系统,其他的系统是在成长过程中以系统借用的形式(system borrowing)学会的。换言之,句法本身是不存在变异的。

而变异学派则认为,儿童在习得语言的句法系统是通过不同成年人的语法输出语料,因此这个习得机制必须能整合各种句法变异形式。变异学派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儿童语言习得中,参数的设置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多个参数设置的按钮同时开启”。在语言社会化过程中,儿童必须了解和掌握句法变异,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言语社区成员,特别是对各种变式在使用场景和使用频率方面的敏感性。^⑤ 基于对贝尔法斯特儿童语言习得的调查,亨利(Henry)^⑥发现,儿童很早就可以习得许多变项形式以及这些形式的社会分布。

拉波夫(Labov)^⑦提出“规则系统的习得”和“言语社区规范的习得”都很重要,只有对变项规则进行研

① 徐大明:《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② Adger, D. and J. Smith, Variation and the Minimalist Program. In Cornips, L. and K. Corrigan (eds.), *Syntax and Variation: Reconciling the Biological and the Social*, Amsterdam: Benjamins, 2005.

③ Cornips, L. & K. Corrigan, *Syntax and Variation: Reconciling the Biological and the Social*, Amsterdam: Benjamins, 2005.

④ Kroch, A. S., Morphosyntactic variation. In Beals et al (ed.), *CLS30: The Parasession on Variation in Linguistic Theory* 180-201. Chicago: CLS, 1994.

⑤ 方小兵:《句法变异的研究价值及存在的困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 年第 5 期,第 88-92 页。

⑥ Henry, A., Variation and Syntactic Theory. In J. C. Chambers, P. Trudgill & N. Schilling-Estes (eds.),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2002, pp. 278-279.

⑦ Labov, W., Contraction, Deletion and Inherent Variability of the English Copula, *Language*, 1969(45), pp. 715-762.

究,才能完整回答这两方面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为,句法变异在儿童语言习得中的功能将是生成学派和变异学派未来的重要合作研究领域,儿童句法变异的研究成果会对这个领域做出贡献。^①

(二) 句法演变及语法化

句法变异的研究价值还体现在它可以发现句法的历史演变和推测未来的发展。语言是一个活的、动态的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的系统”(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不存在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句法规则。语言变化的扩散也从来都不会百分之百完成,一些现在所谓的例外其实是曾经的标准形式的残留。在英国和美国的所谓标准英语中,完成时的助动词是 have (HAVE-perfect) 形式,但是在世界英语 (World Englishes) 范围中,be (BE-perfect) 形式表示完成时并不是一个罕见现象。BE-perfect 并非新出现的句法变异形式,相反它是旧式标准英语句法的残存,只不过在英美语法体系的演变中逐渐消失了。这是对过去的回顾,如果对未来进行展望,当前世界各地(包括英美加澳西这些白人英语国家)的一些句法变异形式,虽然还只是非标准用法,但根据其使用频率、使用阶层、扩散程度推测,很可能就会发展演变成未来的标准形式。^② 例如,目前英语中现在完成时和一般现在时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模糊,常常可以相互借用。美式英语中有时用“just + 一般过去时”来表示最近的过去;一般过去时表示经历式完成体;现在完成时也加上表示确切时间的状语:

例 4 a. Sorry, Bill's not in. He just went out.

b. Were you ever in London?

c. Some of us have been to New York years ago.

由于差别正在逐渐缩小,不少语言学家预计两者很可能最终会融合。可以说,这是一个“进行中的变化”(change in progress),是正在标准化的非标准英语。语言的历时变化就产生和体现在语言的共时变异中,因此,句法变异研究可以为句法演变研究提供非常坚实的理论和语料基础。同时,社会语言学认为所有的语法规则都是以概率形式存在的,所以非常重视实地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句法变项的使用情况,出现场合、频率及使用者的特征,对获取的语料进行量化统计分析,以概率的形式呈现其社会分布。然后进行相关分析,将分布与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关联起来,揭示出起作用的各种相关因素的不同作用值和影响力。

语法化研究是近年来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在语法化研究中,语言的概率性被视为语法化本质特征。“语法化过程中,候选项相对于其他竞争候选项的使用频率越高,其发生语法化的概率就越大”。^③ 在这一点上,语法化研究与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观点相当一致。

一般认为,语法化是一个历时的渐变过程,属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范畴。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生成语言学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语法化现象。生成学派之所以涉足语法化研究,是因为许多句法现象就是语法化的结果。同时,各种句法变式的传播、运用和竞争,反过来会对语法化的进程产生影响,或者推动巩固其发展,定型成新的句法结构;或者维持其演变速度,在语言中形成并存的结构;或者延缓停止其发展,在语言中形成旧式或残留形式。生成语言学基于语言本体,从原则和参数视角,通过语法化研究解释共时平面上句法变异,推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结合;社会语言学基于语言使用者,从语言社会分布视角,通过语法化研究观察语言的变异与变化。将生成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与成果结合起来,可以为语法化理论发展提供有益的补充和修正。

(三) 语言类型学

从类型学角度看,如果仅仅基于书面标准语形式,英语与日耳曼语族中的许多语言特征相差很大,存在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如 do-support 以及存在句中的主位一致问题。为了解释这些“例外”,生成语言学起初一般会修订规则和各种参数,通过繁琐的操作提高理论阐释力。变异学派指出,如果不以书面标准语的句法规则作为唯一的参照,充分考虑英语句法的变异性,结合自然口语、各地方言、混合语的句法变异,英语语法的可分析程度反而更高,模型更加整齐,与诸语言在参数设置上的一致性更加明显。换句话说,从类型学的视角看,非标准英语变体要比标准英语变体“表现好”,更加自然,更符合跨语言的一般模式。

例如,在标准英语的关系从句中有这样一条规则:关系代词作宾语时可省略,而作主语时不可省略。这一点从

^① Cornips, L. & K. Corrigan, *Syntax and Variation: Reconciling the Biological and the Social*, Amsterdam: Benjamins, 2005.

^② 方小兵:《句法变异的研究价值及存在的困境》,第 88-92 页。

^③ Hopper, P. & E. C.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类型学看来,确实有些怪异。基南(Keenan)和科姆里(Comrie)^①曾经提出了类型学研究中著名的“名词词组可及性层级假设”(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Hierarchy):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旁格>属格>比较宾语。也就是说,主语应该最不受约束,是最容易被关系化而形成关系从句的,因为主语位于最左边的位置,可及性最高。可是标准英语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反而比主语更自由,这就违反了人类语言的普遍层级规则。大多数非标准英语则对所有的关系代词一视同仁,这更符合一般的类型学原则。^②又如,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标准英语的反身代词构成表征了两个不同的类型语言,其内部结构的代词部分有的是宾格(如 himself, themselves),有的是所有格(如 myself, yourself)。相较而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非标准英语在词法上呈现了一致性和规则性,在第三人称中也统一使用所有格名词,如 hisself 或 theirselves,与第一和第二人称反身代词的内部结构相同。

语言类型学研究涉及多种语言,其中不乏一些“较原始的”的书面语尚不发达,甚至没有文字形式的语言。变异学派在处理这些语言现象时,通常会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在普遍语法(UG)一般原则和语言类型学通用规则的指导下,将某一语言的各类变体(包括地域变体、社会变体、风格变体)全部纳入考察范围,找出特定语言的变异规则,从而构建出简洁且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更好地解释语言中的各类变异现象。

(四) 语料库语言学

亨利(Henry)^③曾经指出,生成学派的内省语料(introspective data)不如诱导语料(elicited data)可靠,更不如自发语料(spontaneous data)能反映语言本质。所谓说话人的自然语感其实是研究者自己的语感,而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对标准语偏爱有加;而且自然语感其实常常受周围环境和本人心理的影响,有时会产生误导。社会语言学的变语配对实验(matched guise)也证明了所谓的直觉具有一定的欺骗性。通过对英语存在句主谓一致中的句法变异进行语料库分析,可以证实这一点。

例5 There's three books on the table.

生成语法认为存在句中的 there 仅仅是虚主语(expletive there),其语义和句法特征来源于后面的名词组,通过特征的移动完成特征核查。由于特征移动不一定导致词汇项的移动,因此谓语动词在形式上与后面的名词组一致。乔姆斯基在《最简方案》一书中指出,上面句子中的 there's 仅仅是 there are 的一个低层次替代物(low-level substitution),没有句法能产性。^④

但变异学派通过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在现实语料中,以 there's 引导的存在结构后面既可以带单数名词组,也可以带复数名词组,其使用频率要比 there is 和 there are 两者的和还要高。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这一社会因素对 there's 使用频率具有显著性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使用频率越低。而生成学派之所以坚持认为存在句式中的 Be 必须与后面的 NP 保持数的一致,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自省式语料,而自省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索宾(Sobin)^⑤甚至宣称,不与后面名词组保持数一致,才是存在句的自然状态,而标准语中的“向后一致”是非自然语料,是后天语言教育的后果,是涂抹在自然语料上的“语法病毒”(grammatical virus)。

有鉴于此,一些生成学派成员已经开始尝试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收集语料,研究句法系统所体现的变异,探讨引起变异的外部因素,如态度、动机、年龄和性别因素等。^⑥而变异学派提倡的口语语料库,更成为了生成学派进行句法比较和分析的有力工具。米切(Meechan)和福莱(Foley)^⑦也指出,生成学派经常用“?”“??”和“*”来标示自省语料的可接受程度,然而这种方法仅仅从研究者自身的角度出发,只有一个维度,没有考虑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语料库语言学基于对大量真实语料的定量分析,通过概率统计方法得出结论,可以有效揭示句法变异的具体体现,进而对句法变异做出描写与解释。目前,各种类型的语料库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语言变异研究,为丰富句法变异研究成果做出了贡献,反过来也促进了语料库语言学自身的发展。

(责任编辑:魏 静)

① Keenan, E. and B. Comrie, 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and Universal Grammar, *Linguistic Inquiry*, 1977(8), pp. 63-99.

② Kortmann, B., Syntactic Variation in English: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 Handbook of English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 619.

③ Henry, A., Variation and Syntactic Theory. In J. C. Chambers, P. Trudgill & N. Schilling-Estes (eds.),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2002, pp. 278-279.

④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⑤ Sobin, N., Agreement, Default Rules, and Grammatical Viruses, *Linguistic Inquiry*, 1997(28), pp. 318-343.

⑥ Romaine, S., Variation in Language and Gender. In J. Holmes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 London: Blackwell, 2003, p. 410.

⑦ Meechan, M. and M. Foley, On Resolving Disagreement: Linguistic Theory and Variation—There's Bridges,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1994(6), pp. 63-85.

大学英语水平考试写作提示语可比性研究

姜子芸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该文旨在研究大学英语水平考试两类作文提示语的可比性。使用浙江大学 1289 名考生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检验不同作文提示语产生的分数差异是否显著。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Coh-Metrix3.0 提取其中 160 名考生的作文文本特征,包括句法复杂度、词汇复杂度和文本衔接三个维度,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来判断两类提示语产生的文本特征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1)图表提示语的考生作文成绩比文字提示语的考生成绩低;(2)图表提示语的二语可读性指数和词汇多样性比文字提示语的更高,词汇熟悉度更低。两类提示语在文本衔接上没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自动评分;写作提示语;可比性;Coh-Metrix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73-05

可比性(comparability)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广泛而言它指的是两种特质属于同一个类别,因此二者之间存在可以比较的平台。但在教育测量及其相关的研究中,可比性的概念更具体地指相等性(equivalence),如考试的可比性指历次考试里相同水平的考生群体应获得相同分数。随着产出型技能(productive skills)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写作考试的提示语也越发多样化,若不同的提示语考查不同的写作构念,那么它们就无法在同一写作考试中交替使用。因此,写作提示语的可比性是进行写作测试效度验证(validation)和确保考试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写作提示语的可比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研究旨在对大学英语水平考试作文部分的写作提示语进行可比性研究,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文本处理工具 Coh-Metrix3.0^①对文本进行自动分析,搜集充分和有效的效度证据,检验写作考试是否公平,从而进一步提高考试的公正公平。

一、研究背景

在教育测量领域,可比性最早广泛应用于考试大纲和课程大纲的研究中。研究方法包括统计分析、专家判断和问卷调查等,主要目的是检验在不同的考试中是否体现相同的课程标准或考试大纲。早期的可比性定义较为笼统,因而 Elliott^②指出大部分的定义都缺乏具体的情境,他呼吁学者应该将可比性的定义具体化。Newton^③将评分标准的可比性定义为得分相同的学生可以有相等的可观察到的能力特征。此外,不同考试之间的可比性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影响范围最广的是 Bachman 等人^④对当时应用最广泛的两种英语水平考试,即剑桥第一英语证书考试(FCE)和托福考试(TOEFL)进行了可比性研究,这一研究对托福机考和网考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可比性研究对于考试的改革和教育测量质量的提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写作测试研究中,可比性研究是写作测试效度验证的重要环节,通过研究可比性可以搜集到外推证据

收稿日期:2019-03-25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网络的认知诊断语言测试模型建构及其反驳作用研究”(15NDJC139YB)。

作者简介:姜子芸,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测试和二语习得。

① Graesser, Arthur C., et al., Coh-Metrix: Analysis of Text on Cohesion and Language,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 Computers*, 36(2), 2004, pp. 193-202.

② Elliott Gill, *A Guide to Comparability Terminology and Methods*, Research Matters: A Cambridge Assessment Publication, 2011, pp. 9-19.

③ Newton Paul E., *Contrasting Conceptions of Comparability*, *Research Papers in Education*, 25(3), 2010, pp. 285-292.

④ Bachman, Lyle F., Fred Davidson, and Katherine Rya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mparability of Two Tests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1995.

(extrapolation)从而验证写作构念。自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TS)开发了效度验证框架^①之后,多个研究团队围绕着托福写作的效度验证展开了可比性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 Riazi^②对20名学生的托福网考作文和课程论文进行的可比性研究。Riazi使用Coh-Metrix提取了考生的托福作文文本和学术作业的26种文本特征,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文本特征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Riazi的研究样本量较小,研究结果不具有推广性。Liosa和Malone^③收集了103位学生的托福作文和课程作业进行可比性研究,他们让受过训练的评分员参照分项评分量表对五个写作质量的维度进行判断。显然,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研究结果会受到评分员评分的不稳定性和测量误差的影响,从而造成较大的偏差。Bridgeman等人^④收集了近18000名考生的作文,对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的不同类型的写作提示语进行了可比性研究,但他们未能获得真实考试的数据,而是对学生进行模拟施测。更重要的是,Bridgeman等人的分析只关注了作文分数的可比性,却没有结合考生的文本来分析写作文本的质量和特征是否存在可比性。

除了国外的研究以外,国内仅有较少的研究涉及可比性。陈颖^⑤将写作提示语的可比性称为等同性,对30名本科生的两次200字左右的作文提取了流利度、复杂度和准确度三个维度的文本特征,并对这些特征进行统计分析,从而研究不同写作提示语对学生文本特征的影响,收集可比性证据。然而该研究在文本特征的选择上缺乏合理性和代表性。如流利度仅由文本长度体现,但是流利度还受到语言错误或句法复杂度等其他语言特征的影响。此外,较小的样本量和文本计算指标导致了该研究结果可能缺乏可靠性和普遍性。邹玉梅和刘春燕^⑥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四种写作提示语作为因变量,收集了60名英语专业大三学生的作文,使用Coh-Metrix进行分析,从而研究不同提示语对考生写作文本特征的影响。但是这一研究并未采用真实的考试数据,英语专业大学生也并不符合四级考试针对的考生群体。

综合以上梳理,我们发现迄今为止已发表的文献中没有通过分析真实、大规模的考试数据对同一考试的不同写作提示语进行可比性研究,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将写作提示语的可比性定义为不同写作提示语可以让相等能力的考生获得相等的分数,并且能够产生相等的文本特征。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图表提示语和文字提示语的考生作文能否产生相等的分数?(2)图表提示语和文字提示语的考生作文能否产生相等的文本特征?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材料和被试

本研究以浙江大学英语水平考试作文部分为研究材料。浙江大学英语水平考试(以下简称“水平考试”)是非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前必须通过的考试,该考试一年两次,每年考生人数约为8000人,因此是大规模的高风险考试(high-stakes test)。水平考试作文部分要求考生在30分钟内完成一篇至少160字的作文,每场考试会有多个作文题目出现,随机分发给考生。在水平考试题库中,有两种类型的作文提示语,一类是图表提示语,另一类是文字提示语。图表提示语指的是考生需要简要描述图表内容并对相应主题进行讨论和分析,文字提示语则要求考生基于一个作文提纲进行写作。作文部分的总分为20分,及格线分数为12分,所有学生的作文分数由阅卷老师和水果英语自动评分系统相结合得出。本研究采用2018年的水平考试真实考试数据,选取图表提示语和文字提示语各一篇作文,共有1289位浙大本科生考了这两篇作文,因此研究共收集到1289篇考生作文。

(二) 数据收集方法

研究使用Coh-Metrix3.0提取考生作文的文本特征。Coh-Metrix是性能稳定和功能强大的文本分析工

① Chapelle, Carol A., Mary K. Enright, and Joan M. Jamieson, eds, *Building a Validity Argument for the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Routledge, 2011.

② Riazi, A. Mehdi, Comparing Writing Performance in TOEFL-iBT and Academic Assignments: An Exploration of Textual Features, *Assessing Writing*, (28), 2016, pp. 15–27.

③ Liosa, Lorena, and Margaret E. Malone, Comparability of Students' Writing Performance on TOEFL iBT and in Required University Writing Courses, *Language Testing*, 36(2), 2018, pp. 235–263.

④ Bridgeman, Brent, Catherine Trapani, and Jennifer Bivens-Tatum, Comparability of Essay Question Variants, *Assessing Writing*, 16(4), 2011, pp. 237–255.

⑤ 陈颖:《写作任务的等同性:写作任务对作文文本语言特征的影响》,《山东外语教学》2008年第3期,第61–66页。

⑥ 邹玉梅,刘春燕:《大学英语考试中写作提示类型对学习写作表现的影响研究》,《外语测试与教学》2018年第4期,第45–55页。

具,它于 2002 年至 2011 年间由美国孟菲斯大学的多个学科背景的研究团队共同开发、完善和测试,至今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使用该软件来提取文本和口语的特征,广泛运用于自然语言处理、二语习得、教育测量与评价等领域。该工具综合了自然语言处理、计算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可以自动地对文本的表层和深层特征进行量化。^① 网络版 Coh-Metrix3.0 可以自动处理 15000 词以内的单个文本,能够报道出输入文本的 106 项指标,从这些指标中人们可以从不同维度深入了解文本的特征,这些维度包括了描述性统计量和基础计数、指称衔接、潜语义分析、词汇多样性、句法复杂度、关联词使用、文本可读性等 11 个模块的内容。基于以往研究,本文选取能够反映出考生文本的句法复杂度(7 个指标)、词汇复杂度(9 个指标)和连贯性(10 个指标)三个方面共 26 个指标。

(三)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对每类提示语的考生作文随机抽选 80 个文本,提取特征后用 SPSS25.0 进行基础的数据分析。首先,对考生的考试分数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数据基本情况。然后,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来分析两个提示语产生的作文分数的差异是否显著。最后,使用 Coh-Metrix3.0 提取所有文本的文本特征,将结果汇总整理后导入 SPSS25.0,并且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来判断两类提示语产生的文本特征的差异是否显著。

三、结果与讨论

(一) 考试分数

考生在两类作文提示语下获得的分数如表 1 所示,偏度和峰度在 ± 2 内表明两类提示语所产生的作文分数都属于正态分布。考生在文字提示语(12.89 分)获得的分数比图表提示语(12.42 分)高了 0.47 分,说明考生根据图表提示语完成的作文获得的分数更低一些。此外,从最低分和最高分来看,图表提示语考出的最低分(6.84 分)比文字提示语(5.02 分)高 1.82 分。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1287) = 4.001, p = 0.00 < 0.5$),效应量较小($d = 0.12$)。这说明两种提示语得出的考试分数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但是差异较小,这一研究结果与 Lee 和 Anderson^② 的研究相似,发现作文提示语缺乏分数的可比性。Lee 和 Anderson 研究了同一种写作提示语的三种话题类型与学生专业背景的交互作用,他们发现了话题会对学生的作文分数产生影响。而本研究结果则进一步证实了提示语类型也会对学生的作文分数产生影响,且图表提示语的题目难度更大,对于低水平的考生来说更有挑战性。分数产生差异的可能原因是教师在教学中对图表作文的指导不够充分,学生阅读的文本中包含图表的比例较少,课后作业也以记叙文和议论文为主,较少练习如何结合图表和相关内容进行写作。因此,在今后的大学英语课程中,写作指导要考虑不同的提示语和任务要求,全面提升考生的写作技能。

表 1 考生作文分数的描述性数据

提示语类型	数量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值(标准差)	偏度	峰度
文字提示语	489	6.84	18.44	12.89(1.75)	-0.32	0.3
图表提示语	800	5.02	18.39	12.42(1.89)	-0.54	1.395

(二) 文本特征

选择能反映出考生文本的句法复杂度(7 个指标)、词汇多样性(9 个指标)和连贯性(10 个指标)三方面共 26 个指标,从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中发现有 4 个指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词汇多样性、词汇熟悉度和上下文义关系属于词汇多样性的范畴,而 Coh-Metrix 二语可读性属于句法复杂度的范畴。两类提示语在语篇衔接这一类指标中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句法复杂度上的差异较小,而在词汇复杂度上的差异较大(见表 2)。

1. 句法复杂度

本研究选择的句法复杂度指标包括可读性,即 Flesch 和 Coh-Metrix 二语可读性指数,这两个可读性指数的计算方式是基于词长(单词音节的平均数)和句子长度(每个句子的单词的平均值)的,所以在统计分析时

① 杜慧颖,蔡金亭:《基于 Coh-Metrix 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议论文写作质量预测模型研究》,《现代外语》2013 年第 3 期,第 293-300 页。
② Lee, Hee-Kyung, and Carolyn Anderson, Validity and Topic Generality of a Writing Performance Test, *Language Testing*, 24(3), 2007, pp. 307-330.

我们排除了单词长度和句子长度这两个变量。此外,句法复杂度的指标还包括了左嵌入性(每个句子中主动词前的平均单词数)、每个名词短语的平均修饰符数、相邻和全部句子的句法相似度以及被动式密度。在这 7 个指标中,Coh-Metrix 二语可读性有显著差异($F(158) = 0.737, p = 0.00 < 0.5$),与以往单一的可读性公式不同,这一指标可以体现出词汇、句法和语篇衔接方面的困难,该指标越小则反映出文本复杂程度越高。二语可读性指标是单词和句子长度的函数,这一结果也可以体现出考生使用相同长度的单词和句子的模式是有显著差异的。表 2 显示出图表提示语(24.3294)比文字提示语(27.5903)的作文的二语可读性指标更低,说明图表提示语的作文文本的单词和句子模式的复杂度更高。综合 7 项指标的结果来看,尽管考生的作文在句法复杂度的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图表提示语和文字提示语的考生作文的句法复杂度是相当的,具有可比性。

表 2 显著差异的文本特征

指标	提示语类型	均值	标准差
Coh-Metrix 二语可读性	文字提示语	27.5903	4.77525
	图表提示语	24.3294	5.37444
词汇多样性	文字提示语	63.6242	16.66348
	图表提示语	78.0762	27.90438
实词熟悉度	文字提示语	587.5866	4.85463
	图表提示语	584.2841	5.57036
上下文关系	文字提示语	5.7628	0.61936
	图表提示语	6.168	0.54963

这一研究结果与 Cumming 等人^①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发现综合写作可以诱导出更复杂的文本,主要在词汇和句法层面。然而,这一结果与邹玉梅和刘春燕^②的研究结果不同,他们认为图表提示语会限制考生的写作内容,因为考生主观认为可描述的东西较少,因此产生的句法结构相对简单。结合水平考试的具体考试内容和考生文本,本文认为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图表提示语要求考生描述图表并论述相关现象,提供了更多信息,因而考生作文的句法复杂度更高,并且较之文字描述语,图表提示语在内容上给了考生更多依据的线索,并不会限制考生的写作内容。

2. 词汇复杂度

词汇复杂度的 9 个指标涉及到词汇多样性,词频,词语具体性和普遍性。Coh-Metrix 包括了词汇多样性方面的四种指标,包括实词的类符/形符比、所有词语的类符/形符比、所有词汇的多样性以及所有词语的文本词汇多样性指标。其中,所有词语的文本词汇多样性和类符/形符比不同,它和文本长度无关,并且不受文本类型的影响。对于词频这一指标,CELEX(Center for Lexical Information,即词汇信息中心)是包括 1790 万词的语料库,它指的是实词和所有词汇使用频率的平均值,因此 CELEX 指标能够体现出文本中使用的单词的频率级别。词汇复杂度的指标还包括实词的熟悉程度(基于人对单词的非抽象程度进行的主观判断),实词的具体性,可映性的均值(指的是人的心理对单词构建的心理图式的容易程度),等等。

在词汇复杂度的 9 个指标中有 3 个指标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两类作文提示语在词汇多样性上存在显著差异($F(158) = 6.269, p = 0.00 < 0.05$),这一结果体现出图表提示语的作文词汇比文字提示语更为多样。第二,两类作文提示语在词汇熟悉度指标上也存在显著差异($F(158) = 1.211, p = 0.00 < 0.05$),熟悉度指的是成年人对单词的熟悉程度,一个句子中有更多的词汇,人们对这个句子的加工就会更快。Crossley 和 McNamara^③对二语写作文本的分析结果显示实词熟悉度是可以预测作文质量的一个指标,即实词熟悉度与作文分数存在相关性。该指标体现出文字提示语(587.5866)的考生作文用词比图表提示语(584.2841)更熟悉。第三个存在显著差异的指标是上下文关系($F(158) = 1.166, p = 0.00 < 0.05$)。上下文词体现了一种一般

① Cumming, Alister, et al., Differences in Written Discourse in Independent and Integrated Prototype Tasks for Next Generation TOEFL, *Assessing Writing*, 10(1), 2005, pp. 5 - 43.
② 邹玉梅,刘春燕:《大学英语考试中写作提示类型对学习写作表现的影响研究》,第 45 - 55 页。
③ Crossley, Scott A., and Danielle S. McNamara, Predicting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Proficiency: The Roles of Cohesion and Linguistic Sophistic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35(2), 2012, pp. 115 - 135.

与具体的关系,处于上位的词是一般性概念,处于下位的词是具体性概念,其词义包含在处于上位的词范畴之内。越高的文本上下义指标能体现出文章整体用词更为具体,该指标越低则表现出用词越抽象。以往研究发现该指标能够反映出文本用词的准确性,此外,一个文本的上下义指标越高,其词汇就更为多样、词汇复杂程度更高、表述更清晰,具有更多上位词的单词往往更准确地表达意义。^① 因此相比于文字提示语(5.7628)而言,图表提示语的考生作文词汇上下义指标(6.168)更高,即图表提示语的用词更为具体。图表提示语和文字提示语在词汇多样性、实词熟悉度和上下义这3个指标的显著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图表提示语给了考生更多可以利用的写作信息,在考生进行加工并产出的过程中,多元的信息让他们的作文词汇比文字提示语的更多样、更具体。文字提示语仅仅要求考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论述,考生仅能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进行写作,所以产出的单词比图表提示语的考生熟悉度更高,但在词汇的多样性和具体程度上就有些逊色。

3. 文本衔接

我们选择的10个文本衔接的指标包括名词重叠、主题重叠、词干重叠、所有句子的实词重复度的平均值、潜语义分析、相邻句子的重叠、既有信息和新信息的潜语义分析、连接词(全部)的出现率、因果连接词的出现率、逻辑连接词的出现率和因果动词的出现率。观点重叠指标测量的是两个句子共享常用的主题的频率,如名词、代词和名词短语。潜语义分析指数报告了语义共同参照,它通过计算文本片段的语义相似性来追踪意义在不同话语间的重叠和转换。两类提示语在语篇衔接这一类指标中不存在显著差异,Crossley和McNamara^②对不同年级的香港高中生的英语作文的文本特征进行了研究,并试图通过建模分析来用文本特征预测二语学生的英语水平,他们的研究发现了水平较高的学生所写的作文并不是在文本衔接上更为连贯,这一发现与本研究的发现相同。邹玉梅和刘春燕的研究发现图表类作文会让二语学习者用更多的指称词汇,因为提示语要求他们描写图表,从而使得词干重叠率和实词重叠率较高,从而使得文本的衔接度更高。但在本研究中,这一结果并未体现。基于10个文本衔接指标都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考生在文本提示语和图表提示语的作文具有同样的衔接特征。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浙大英语水平考试的真实考试数据对写作提示语的可比性进行了研究,从考生的考试分数和Coh-Metrix3.0提取的文本特征两个角度收集了浙大英语水平考试写作部分作文提示语的可比性证据。研究发现,考生在图表提示语获得的分数比文字提示语的更低,两类提示语的作文的句法复杂度和衔接特征相同,但是图表提示语的词汇多样性更高。综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水平考试可以考虑对不同写作提示语的报道分数进行微调,但如何进行微调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本研究还发现可以对图表作文提示语的写作考试的构念进行更为明晰的界定和划分。因此,本文对于保证浙大英语水平考试的公平性有重要意义。此外,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教师在教学时应充分考虑作文提示语对学生文本特征产生的影响,多指导图表提示语的写作,并指导学生强化在文字提示语上的词汇多样性练习,使用更为具体的词汇,避免内容空泛。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针对的提示语数量较少,受考试保密性影响,本研究未能获得更多的作文提示语和考生数据,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对不同的图表提示语进行组内关系的细化研究。此外,本文未能收集到考生的性别和专业等数据,未能分析出不同的提示语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因此将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从考生角度搜集可比性证据,还可以对考生采用有声思维法了解其对提示语特征的想法。最后,本文重点关注了考生的分数和文本特征,而没有涉及考生的语法错误、作文的字数等特征。未来研究可以探究如何综合各个维度的可比性,如何将可比性研究与写作评分标准相结合。

(责任编辑:魏 静)

^① Guo, Liang, Scott A. Crossley, and Danielle S. McNamara, Predicting Human Judgments of Essay Quality in Both Integrated and Independent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Samples: A Comparison Study, *Assessing Writing*, 18(3), 2013, pp. 218-238.

^② Crossley, Scott A., and Danielle S. McNamara, Predicting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Proficiency: The Roles of Cohesion and Linguistic Sophistication, pp. 115-135.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习语性特征探析

苏妮娜

(厦门医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以中国大学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COLSEC)为基础,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的习语性从词汇语法形式和功能特征两方面进行研究,旨在从新角度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篇的习语性特征。研究表明:与英语本族语者相比,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篇的习语性呈现出习语表达式使用形式单一、功能型习语表达式使用不足的特点,与本族语者的习惯表达范式存在显著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语口语语篇的自然度、地道性和准确性均有待提高。

关键词:习语性;习语表达式;语料库;英语口语语篇

中图分类号:H3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78-05

对英语语言的语料分析表明了语言的词汇化性质与“流利性,自然度,习语性和合适度是紧密相关的”^①。国内外学者对于词汇学的研究和探索从未停止。研究者们运用语料库方法对口语中的词汇使用展开调查与研究,他们运用语料库技术,从大量语言事实中研究词块,为口语语篇分析开辟了新视角。^{②③④⑤⑥}卫乃兴^⑦对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COLSEC)^⑧做的初始研究涉及了学生英语口语中的部分词块及其特征。甄凤超^⑨基于 COLSEC 语料库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块知识与外语口语交际的流利度、准确性及恰当性的相关性。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语料库的分析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的词块,而对整个语篇的特性研究却不多见。本研究拟运用语料库的方法,在习语表达式(idiomatic expressions)形式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中使用的习语表达式进行研究分析,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的习语性特征,以管窥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篇的自然度、地道性和准确性,揭示其特点和不足,以期对英语教学提供启示。

一、文献综述

(一) 习语性的定义和特征

事实上,习语性是一种程度问题,不同程度的习语性与不同类型的习语表达式相关联。使用多重标准可以让研究者筛选出那些不具有习语性的形式而保留那些具有一种或多种习语特性的形式。例如,Makkai^⑩使用了五个标准:形态组成可否分解、可否进行字面对等翻译、歧义程度、语义的不可预测性和组合性。

收稿日期:2019-04-11

作者简介:苏妮娜,厦门医学院公共课教学部英语教研室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语料库语言学。

① Sinclair, J.,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2.

② 许家金,许宗瑞:《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中的互动话语词块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437-443 页。

③ 卫乃兴:《中国学生英语口语的短语学特征研究——COLSEC 语料库的词块证据分析》,《现代外语》2007 年第 3 期,第 280-291 页。

④ Leilei, *Use of Idioms in Chinese EFL Learners' Spoken English: Evidence from SECCL and COLSEC*, 《中国英语教学》,2008 年第 6 期,第 82-90 页。

⑤ 邓耀臣:《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产出中程式化序列使用型式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 年第 3 期,第 60-65 页。

⑥ 郑李卉,肖忠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口语搭配行为: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 年第 4 期,第 29-36 页。

⑦ 卫乃兴:《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初始研究》,《现代外语》2004 年第 2 期,第 140-149 页。

⑧ 杨惠中,卫乃兴:《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建设与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⑨ 甄凤超:《“语块”与外语口语流利度、准确性及恰当性的相关研究——基于 COLSEC 语料库的实证研究》,《中国外语教育》2009 年第 4 期,第 14-24 页。

⑩ Makkai, A., *Idiom Structure in English*, *Janua Linguarum Series Major* 48. The Hague: Mouton, 1972, p. 112.

由此可见,习语性是一个连续体上的不同单位。本研究倾向于采用以下定义:(1)它是本族语者对词语表达的选择^①(native-like selection of expression);(2)它是高于语法规则和词语之外的语言特性。^②因此,必须指出对习语性的研究和对习语的研究应该区分开来。从狭义上说,习语性主要是词汇层面的、学习者通常所理解的习语表达。从广义上来看,习语性是一种使语言自然流畅,为本族语者所接受的语言特性。

(二) 习语表达式的界定和分类

习语性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性,是由其词汇语法单位来实现和体现的。Maria Wiktorsson^③认为习语性与本族语者所使用的多词组合式的储存和使用相关。Wray^④也探究了本族语者语言的习语性特点,认为具有习语性也就是拥有一种说话时的偏好方式,主要依赖于词汇使用方面所储存的程式性语串(formulaic sequences),而不只是使用习语。Sinclair在提出“习语原则”时,举了“of course”作为例子,说明了这样的语言单位可以被当作单一的词项。有些语言单位形式上完全固定如 fancy seeing you here; Nice to see you,可以超越语法构造过程。有些形式上则是半固定的预制性语块,如 in some cases; in some instances。有些词汇是固定的,词汇语义上则是有变化的,如: it is not in his nature to……; it was hardly in her nature to……。由于研究的视角和重点不同,这些类型的语言单位在文献资料中被称为词组(lexical phrases)、多词组合式(multiword units)、固定词组(fixed phrases)、程式性词组(formulaic phrases)、语块(chunks)、预制性语块(pre-assembled chunks)等,尽管术语的使用不同,研究者研究的语言现象却是相同的,都是具有习语性的语言表达。毫无疑问,这种概念上的重复是存在的,有些术语用于描述相同的现象,而有些跨不同领域的术语并不总是指相同的东西,因此,很难选择其中一个来全面概括、清晰界定习语性这种语言现象。此外,不同术语的使用也是与不同程度的习语性相联系,而习语(idiom)仅是众多组成语言的多词单位中的一种。语言的习语性不仅是靠使用习语得来,还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程式性语言单位。为了避免混乱,本文使用“习语表达式”(idiomatic expressions)作为术语来指那些实现和体现语言习语性的词汇—语法单位。

对习语表达式的分类主要有词汇语法上的形式分类和功能分类。本研究中习语表达式的分类将根据 Fernando^⑤提出的分类框架,从形式上分为两大类,即习语和习惯性搭配。习语具体又可分为纯习语(pure idioms)、半习语(semi-idioms)、原义习语(literal idioms)。这类词组组合被描述为“习语原则”的实现形式。习语性的级阶性和程度性也在这类多词组合式中体现出来,在习语中表现较强,在搭配中表现相对弱些。具体分类可见表1。

此外,习语表达式的作用与 Halliday^⑥对语言的语义构成模式相联系,即习语表达式从语篇功能上可分为三类:概念型习语表达式、人际型习语表达式和语篇型习语表达式。比如“bread and butter(生计)”是概念型习语性表达式,因为它组成了一个信息包,是一个特定的经验表征,与相邻语境中的其他信息包一起传达信息,因此能够表达信息内容,经验现象包括知觉、评价和情感等体验,或是描绘信息本质特点。如 spill the beans, have blood on one's hands, be in a pickle, a red herring, a lounge lizard, green with envy, a lump in one's throat, etc. to be exact /precise 等都属于概念型习语表达式。另一方面,“bless you”传达出愉快的信号,“go to hell”传达着矛盾冲突,它们表明了说话人双方的一种人际交流,是人际型习语表达式。人际型习语表达式主要完成交际互动功能或是描述信息本质的特点。在交际互动功能中,它们能够发起对话,维持对话和结束对话,并且与礼貌用语紧密相关。比如 tell you what, never mind, you're telling me, You're kidding/joking, guess what, as a matter of fact, cut the cackle, get to the point, I dare say, mind you 等。再比如“in sum”表明语篇的结尾,“on the contrary”表示对之前论断的否定,这些则是语篇型习语表达式。语篇型习语表达式能够确保语篇的衔接组织,使语篇的语义单位清晰连贯,如 on the contrary, far from, no wonder, in addition to,

① Pawley, A. and Syder, F. H., *Two Puzzles for Linguistic Theory: Nativelike Selection and Nativelike Fluency*, In Richards, J. C. and Schmidt, R. W. (ed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Longman, 1983.

② Fillmore, C., Kay, P., O'Connor, M.,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Language*, 1988: 64, pp. 501 - 538.

③ Wiktorsson, M., *Learning Idiomaticity: A Corpus-Based Study of Idiomatic Expressions in Learners Written Production*, Lund: Lun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 Wray, A., *Idiomaticity in An L2: linguistic Processing as A Predictor of Success*, *Paper Submitted for Proceedings of 2005 IATEFL Conference*, 2005:1, pp. 134 - 140.

⑤ Fernando, C., *Idioms and Idiomati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5.

⑥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what's more, in the first place, last but not least 等。

表 1 习语表达式的形式分类

习语 (idiom)	习惯性搭配 (habitual collocation)
I 纯习语 (pure idioms) red herring, spick and span, smell a rat, the coast is clear, have/get/cold feet, etc.	I 限制性的变化,字面上可半推断 explode a myth/theory/notion/idea/belief, catch the post/mail, etc.
II 半习语 (semi-idioms) drop names, catch fire, foot the bill, blue film/story/joke/gag/comedian etc.	II 限制性的变化,字面上可推断 Addled brains/eggs, in-the-not-too distant past/future, for certain/sure, etc.
III 原义习语 (literal idioms) 不可变化 on foot, in sum, in the meantime, on the contrary, arm in arm, for example/instance etc. 限制性的变化 for example/instance, in order that/to, opt in favor of/for, happy/merry Christmas, etc.	III 非限制性变化,字面上可半推断 catch a bus/plane/ferry/train, etc. by dint of hard work/patience/repetition, etc. IV 非限制性变化,字面上可推断 beautiful/lovely, etc. sweet woman, smooth/plump, etc. glowing/rosy cheeks, etc.
IV 原义习语 (literal idioms) 限制性变化,可选择替换成分 abstain(from), (even) worse, worse(still), develop (from) (into)	V 非限制性变化,字面上可推断,可替换成分 shrug (one's shoulders), nod (one's head), clap (one's hands), etc.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1)与本族语者相比,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篇中的习语表达式使用形式上有何特点?(2)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口语产出中的习语表达式在功能上有何不同?(3)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篇的习语性特征与自然度、地道性和准确性的关系如何?通过回答以上问题,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篇的习语性特征。

(二) 研究语料

本研究选取的观察语料来自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COLSEC),该语料库的语料来源为 2000—2004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部分的实景音像资料。COLSEC 设计库容为 723299 词次,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特征最具代表性的语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的真实语料。另外,以 ICE-GB-Spoken 为参照语料库。ICE-GB-Spoken 是“国际英语语料库”英国部分的口语子库,该部分可视为一个取样较均衡的通用型口语语料库,库容达 619900 词次,与 COLSEC 相比,库容相当,具有较高可比性。为了清晰有效地揭示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习语性的特征,本研究还将参照 Liu^① 所列举的美国口语中常用的 302 个习语表达式,考察在 COLSEC 中的习语表达式使用情况。

(三) 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计算机自动提取的定量分析和研究者手动甄别的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了计算 COLSEC 中各类习语表达式的出现频次,本研究将通过索引软件 AntConc 3.2.1,并采用 Word-smith Tools 的 Word list 功能,对 COLSEC 的词频信息进行计算和提取。此外,结合人工进一步分析,借助“频数特征、语言直觉、内部结构分析”等标准对习语表达式进一步分析识别。

三、结果与讨论

1. 定量分析

为了更好地对比两个语料库中习语表达式频次分布情况,词频出现以每 10 万词的比例分配。由表 2 可知,在 COLSEC 语料库中,两大类别的习语表达式中,习惯性搭配的出现频次占了习语表达式总频次的

① Liu, D.,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Spoken American English Idioms :A Corpus Analy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TESOL Quarterly*, 2003: 37/4, pp. 671 - 700 .

90.3%, 份额最大。习语类别里纯习语占的比重最少(1.73%), 原义习语比重相对多些(3.46%)。这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中, 习惯性搭配是最主要的话语构筑材料, 学习者对不同形式的习语表达式使用能力较弱, 纯习语使用能力最弱, 半习语次之。相比之下, 本族语者的各类习语使用比重均大于中国英语学习者, 习惯性搭配的使用也是居多, 占 87.88%。

表 2 不同形式习语表达式在 COLSEC 和 ICE-GB-Spoken 中的频次分布情况

Types of Idiomatic Expressions		COLSEC		ICE-GB-Spoken	
		Frequency	Percentage (%)	Frequency	Percentage (%)
Idioms	Pure idioms	398	1.73	603	1.92
	Semi-idioms	796	3.46	1041	3.31
	Literal idioms	1038	4.51	2167	6.89
Collocations		20760	90.3	27625	87.88
Total		22992	100	31436	100

表 3 不同功能型习语表达式在 COLSEC 和 ICE-GB-Spoken 中的频次分布情况

Types of Idiomatic Expressions		COLSEC		ICE-GB-Spoken	
		Frequency	Percentage(%)	Frequency	Percentage(%)
Ideational Idiomatic Expressions		496	2.64	897	4.50
Interpersonal Idiomatic Expressions		8743	46.49	10064	50.49
Textual Idiomatic Expressions		9568	50.87	8973	45.01
Total		18807	100	19934	100

由表 3 可见,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这三种功能型习语表达式使用中, 对人际型和语篇型习语表达式使用相对多些, 占比分别达到了 46.49% 和 50.87%, 而概念型习语表达式使用偏少, 这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一定程度上懂得利用习语表达式作为会话的技巧和策略, 如礼貌表达等, 并且能掌握口语语篇的衔接组织方式, 但在信息内容、经验现象等方面用习语表达式来表达相对薄弱。与本族语者相比, 尚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学习者口头话语能力逊色于本族语者。值得注意的是, 在两个语料库中, 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语篇衔接型习语表达式上多于本族语者, 这可能与口语考试的准备充分有关。

2. 定性分析

Liu 根据现代美国三大口语语料库的索引结果, 列出了美国口语中最常用的 302 个习语表达式。根据其使用频率, 每百万形符里出现 50 次以上的为高频; 每百万形符里出现 11—49 次的为中高频; 每百万形符里出现 2—10 次的为中低频。根据 Liu 的频率划分标准, 我们将中国学习者习语表达式使用情况分为: 正常使用(appropriate use)、过度使用(overuse)、少用(underuse) 和零使用(zero use)。研究考察了美国口语中常用的习语表达式在 COLSEC 中的使用情况, 如表 4:

表 4 COLSEC 中正常使用、过度使用和少用的习语表达式

Proper use	of course, as/so far as, in order to/that, first of all, in fact, according to, no matter, after all, as soon as, as if, in time, on the whole, in detail, as a matter of fact, in advance, with regard to, in case, on time, for sb's sake, get in sb's way, up to date, above all, for good, etc
Overuse	on the other hand, to the/some extent, as for, in common, in public, in the long/short run/term, in sb's view, in the/sb's eyes of
Underuse	as to, as well, at all, as well as, as long as/so long as, in a/some way, by the way, in terms of, in a/some sense of/ that, so far, in other words, in general, kind of, in favor of, for sure/certain, in charge(of), in effect

由此可见, 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的习语表达式中习惯性搭配居多, 且语篇型习语表达式居多, 这与应试准备有关, 考试型的口语产出中, 学生会有意识地增强搭配的使用和语篇衔接手段的词汇表达。

中国英语学习者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低频使用的习语表达式掌握不好, 而本族语者常用的习语表达式, 他们则少用甚至不使用。例如, kind of 这个习语表达式在美国英语口语中是属于高频使用的表达, 意思为

“somewhat”,为本族语者常用,这个表达在 COLSEC 中使用频次是 445 次,但是在 COLSEC 中仅有一两次的使用意思是“somewhat”, sort of 在 COLSEC 中出现了 6 次,却没有一次的使用意思是“somewhat”。

3. 讨论

基于语料库数据,本研究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检验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的习语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1)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习语表达式的使用种类上较为单一,偏向于习惯性搭配的使用比重较大,习语则相对较少。

(2) 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口语词汇表达偏离本族语者的标准。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功能型习语表达式中,语篇型习语表达式和人际型习语表达式使用明显多于概念型习语表达式,与本族语者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3) 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习语表达式知识直接影响口语交际的自然度、准确性和地道性。这与甄凤超的研究不谋而合。

究其原因,主要问题在于中国英语学习者没有掌握好本族语者口语中常用的习语表达式,尤其是那些纯正的习语,因此他们不会使用本族语者常用的大多数习语。Pawley & Syder 区分了母语式流利(native-like fluency)和母语式选择(native-like selection)。母语式流利指的是本族语者流利产出自发连贯的语篇的能力;母语式选择指的是本族语者习惯性地通过既合乎语法又符合母语表达方式来表达意思的能力,也就是说如何从语法正确的释义范围中选择一个自然和习惯用法的句子。语言的本质是惯例化的,这使语言表现得像“原生的,或者更像习惯用语”^①。因此,习语性就成为双语系统熟练程度的优秀指标。然而,尽管二语学习者能够建立起母语式的语法准确性,他们却不会像本族语者那样选择或使用相似的习语表达式。上述观点似乎可以解释本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习语表达式情况的原因。中国学习者可以相当流利地使用英语,有些人甚至达到了母语的流利程度,然而,至少从口语习语表达式的使用情况来看,他们与 Pawley & Syder 定义的母语式选择相去甚远。换句话说,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的表现和使用上非常流利,但是不具有习语性,不够地道,自然度不够。为了提高表达的自然度、地道性和准确性,有效实现交际目的,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其对习语性语言的敏感度,使其掌握习语性语言的使用。^②

四、结论

综上,本研究以 COLSEC 语料库为基础,采用基于语料库的对比分析研究方法,从习语表达式的形式和功能两方面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中的习语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中习语表达式使用形式单一,口语语篇的习语性不强,直接影响了口语表达的自然度、地道性和准确性,在今后的口语教学中需要重视。需要注意的是,COLSEC 的语料是选自口语测试,因此考生的表现与学习者自发的交谈或交流有很大的差异。此外,语料收集的时间、语料库的大小、任务类型以及考试主题也会影响本研究的结果。尽管语料库技术提取分析习语表达式的方法还不成熟,制约着全面分析学习者口语语料的习语性特征,但是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的习语性特征,对于英语口语教学具有一定启示。在口语教学中不仅要促进学生学习符合语法规则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能够使用自然地、能为本族语者所接受的语言。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词汇教学法,为学生提供语境对具有习语性的语言结构进行大量练习,使学生在获得语言运用的熟练性,提高语言地道性和准确性。

(责任编辑:魏 静)

^① Yorio. C., *Idiomatcity As An indicator of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K. Hylltenstam & L. K. Obler(eds.), *Bilingualism across a Lifespan: Aspects of Acquisition, Maturity and L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5-72.

^② 苏妮娜:《从习语性角度探究英语口语语篇的自然度》,《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第 389-392 页。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的自我指称 与身份建构

戴俊红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1)

摘 要:通过收集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语料,分析作者自称语使用特点以及建构的身份类型,并与英国学术英语写作语料库(BAWE)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学生的第一人称自称语使用频次远远低于英语本族语者,而第三人称以及无生命抽象主体指称的使用频次则远远高于英语本族语者。中国学生倾向于使用集合性的第一人称复数构建观点持有者的身份,其第三人称、无生命抽象主体指称主要建构了研究者的身份,而英语本族语者则主要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构建研究者身份和观点持有者身份。

关键词:自我指称;身份建构;学位论文;BAWE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83-06

学术写作是作者陈述其研究目的和方法,论述其研究发现,并阐述研究意义的文字。传统观念认为,学术写作应使用客观的语言表达,避免作者对语篇的主观介入,文中应多使用名词化的表达和被动结构^①,许多学术英语写作教材及写作手册中也建议要谨慎使用第一人称代词,避免表露个人身份。

然而近十多年来的研究发现,权威学术语篇中的语言不再是完全客观的表述,许多学者在写作中会使用第一人称代词。^{②③④}学术文本中作者身份的隐藏或凸显会影响读者对文本的印象及对文本的理解。学术语篇是作者与读者交流的重要场所,作者通过选定特定的话语和表达方式来陈述研究目的、描述研究过程、分析研究结果、表达观点立场,构建自己的学术身份。^⑤作者在学术语篇中如何选用合适的话语资源构建自己的学术身份,也是作者学术语用能力的体现。^⑥作者在学术语篇中建构自己的身份能增强语篇的可读性,增加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目前有关学术语篇中作者身份建构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有学术写作经验的作者,如硕士生、博士生及有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经验的学者专家,而对学术新手的相关研究较为少见。本科毕业论文通常是学生首次尝试学术写作,了解掌握学术语体是他们学会学术写作的重要环节。因此,研究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的自我指称和身份建构,了解学生在学术写作起步阶段是否具有身份意识,对论文写作指导、写作指南编写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19-04-11

基金项目:2018年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18SWC-04);南京晓庄学院青年专项(2016NXY29)。

作者简介:戴俊红,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二语习得及外语教学。

① Duenas, P., 'I/we focus on...':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Self-mention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Research Articles,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6), 2007, pp. 143-162.

② Hyland, K., Humble Servants of Discipline? Self-mention in Research Article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 (3), 2001, pp. 207-226.

③ Tang, R. & S. John, The "I" in Identity: Exploring Writer Identity in Student Academic Writing Through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Vol 18 (S), 1999, pp. 23-39.

④ Hyland, K., Authority and Invisibility: Authorial Identity in Academic Writing, *Journal of Pragmatics*, (34), 2002, pp. 1091-1112.

⑤ 陈新仁:《语用身份:动态选择与话语建构》,《外语研究》2013年第4期,第27-32页。

⑥ 孙莉:《中国硕士学位论文英文摘要的语用身份建构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年第5期,第15-21页。

一、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国内对学术写作中作者身份建构的研究不断增多。研究主要聚焦作者自称语及其身份建构,如孙莉^①研究了中国硕士学位论文英文摘要的语用身份建构,通过与国际学者的英文摘要对比,发现中国学生较少建构对话者身份。吴格奇^②通过对比 SSCI 收录的英文论文和 CSSCI 收录的中文论文,发现英文论文中作者主要建构了研究者身份和话语建构者身份,而中文论文中作者主要建构了研究者身份。杨欣然^③对比了我国高校硕士生的学术写作与北美学生的学术写作,发现中国学生的作者身份相对“隐性”并缺乏权威。于涛^④分析了英语学术写作语料库(BAWE)中不同学科、不同性别作者写作中的自我指称和身份建构,研究发现 I 作为向导者的出现频率,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有显著差异,而性别对 I 的使用频率和功能影响不大。李民、肖雁^⑤通过对比中国作者的英语论文语料库和英语本族语者语料库,发现中国作者倾向于使用 we 来凸显其团体属性,而英语本族语者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单数来强调其研究的独特和新颖。柳淑芬^⑥对比了国内核心期刊和国外权威期刊的论文摘要,发现国内刊物中的作者参与度偏低,而英美作者的参与度较高。

综上所述,学术写作中的作者身份建构已成为学术语篇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者们发现中国作者在学术语篇中较少建构对话者身份,较多建构研究者的身份;中国作者倾向于使用表示团体属性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而英语本族语者倾向于使用强调研究独特性的第一人称单数。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大多选自国内外权威期刊中的摘要、英语论文、英语本族语者的学术写作以及高校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论文,这些语篇的作者英语水平相对较高,有比较丰富的学术写作经验。目前对本科生(学术新手)论文写作中自称语使用特点、身份建构类型的研究较少。对于大部分本科生来说,毕业论文是他们首次尝试学术论文写作,毕业论文的写作语体、话语风格等对他们日后的学术写作具有重要影响。不少本科生毕业后会进入硕士阶段的学习,或是到科研机构从事科研工作,成为今后学术研究的主力,并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因此,有必要了解本科生在学术写作起步阶段是否具有文体意识和身份意识,并加以正确的指导。分析本科生毕业论文中自称语的使用特点、身份建构的类型,并与英语母语者的学术文本作对比,对本科生论文写作和写作指导都有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自建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语料,分析学术新手论文中的自称语使用特点以及身份建构类型,并将其与英国学术英语语料库(BAWE)作对比,找出异同,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而更有效地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

二、理论基础

“身份”一词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核心概念,随着西方哲学从本质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身份不再是固有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建构的。学术写作中的作者身份是指作者作为学术团体中的成员,在写作中的自我定位。^⑦在学术语篇中,作者通过自我指称的选择反映其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自己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自己的学术身份。^⑧

自我指称是作者根据需求而建构语用身份特征的语用行为。在语篇中最直接地揭示作者身份的自我指称是第一人称代词,除此之外还有间接隐性的方式。自称语既包括第一人称代词(I, me, we, us, my, our),也包括第三人称代词(the writer, the author 等)以及无生命抽象主体词语(the paper, the article, this study

① 孙莉:《中国硕士学位论文英文摘要的语用身份建构研究》,第15-21页。

② 吴格奇:《学术论文作者自称与身份构建——一项基于语料库的英汉对比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6-11页。

③ 杨欣然:《二语学术写作中的自我指称与作者身份建构》,《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年第4期,第50-56页。

④ 于涛:《英国本科生学术写作重的自我指称与身份建构》,《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11期,第15-21页。

⑤ 李民,肖雁:《英语学术语篇互动性研究——以第一人称代词及其构建的作者身份为例》,《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18-23页。

⑥ 柳淑芬:《中英文论文摘要中作者的自称语与身份建构》,《当代修辞学》2011年第4期,第85-88页。

⑦ 邓鹏鸣:《二语论文讨论与结语章节写作中学术身份的建构:中国社科博士生个案研究》,《中国应用语言学》2012年第3期,第301-323,381页。

⑧ Kuo, C., The Use of Personal Pronoun: Role Relationship in Scientific Journal Articles,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 18, (2), 1999, pp. 121-138.

等)。Ivanic^①提出作者身份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由生平自我、语篇自我和作者自我三部分组成。柳淑芬^②在Ivanic的基础上,总结出构建作者身份所采用的自称语形式。第一种语言手段是作者参与度最高的第一人称代词,如I, me, my, mine, we, us, our,使用第一人称作者参与度最高;第二种是第三人称作者指称,如the author, the writer,使用第三人称作者参与度低于第一人称;第三种语言手段为无生命、非人称的抽象主体,如the paper, the study, the article等,作者参与度最低。Hyland^③认为,作者通过无生命、非人称的抽象主体的表述方式,把责任转交给了无生命的评价主体。这三种自称语共同构建了参与度由高到低的多重作者身份。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作者身份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如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身份表征分为个体表征、人际表征和群体表征。^④Tracy^⑤从交际互动的视角把身份区分为主要身份、互动身份、个人身份和关系身份。Tse和Hyland^⑥通过分析建构陈述者的话语资源,将建构陈述者身份的主体分为抽象主体、生命主体和隐藏主体三类。孙莉^⑦在参照Tse和Hyland对主体特征的分类框架基础上,将作者本人(I, the writer, the author等),其他研究者(the researchers)和研究对象(the participants, the subjects)归为生命主体;“it”和“there be”结构作主体的归为隐藏主体;除了生命主体和隐藏主体之外的主体归为抽象主体,例如the study, the paper, the findings, the results等。

本研究将分析学术语篇中作者参与度的高低,以及作者的自我指称所建构的不同身份,因此本研究采用Flottum按指称的特点对作者身份分类的方法,将身份分为研究者(researcher)、话语构建者(discourse constructor)、观点持有者(arguer)、评论者(evaluator)。^⑧通过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或抽象主体与表示研究的动词连用,作者构建其研究者身份,如we analyze, we examine, the writer analyzes;通过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或抽象主体与篇章结构构建的动词连用,作者凸显其话语建构者的身份,如this part of the paper focuses on, I will discuss;通过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或抽象主体与表示持有观点的动词连用时,作者强调自己的贡献、对研究结果的责任,及作者强调自己观点持有者的身份,如I argue that, I hold that, we believe that;通过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或抽象主体与表达评价或个人情感的词连用,构建自己评论者的身份,如we feel surprised that。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研究选择南京某高校2017届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学位论文为研究语料。从中随机抽取了30篇论文,去除中英文封面、目录、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以及致谢部分后,转换成txt格式,共131822个字符。对比语料选择的是英国学术英语写作语料库(BAWE),该语料库由华威大学、雷丁大学和布鲁克斯大学(Universities of Warwick, Reading and Oxford Brookes)在2004—2007年间创建。该语料包含人文、生命科学、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四大学科,35个子学科,由本科生及研究生所写的论文组成,共包含2761篇论文,其中1953篇由英语本族语学生所写。BAWE适合用AntConc或WordSmith作词汇索引分析,本研究从BAWE人文学科中随机选取由本族语者所写的学术文本30篇作为对比语料,其中包括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方向,共91917个字符。

通过AntConc 3.2.2的Concordance功能检索第一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作者指称、无生命非人称的抽象主体,分别计算两个语料中这三种自我指称方式出现的原始频次和标准频次(每万字),分析两种语料库指称方式及其异同。研究拟考察以下两个问题:

(1) 中国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自称语有何使用特点?与英语母语者自称语的使用存在哪些

① Ivanic, R., *Writing and Identity: The Discours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Academic Writ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8.

② 柳淑芬:《中英文论文摘要中作者的自称语与身份建构》,第85—88页。

③ Hyland, K., *Authority and Invisibility: Authorial Identity in Academic Writing*, *Journal of Pragmatics*, (34), 2002, pp. 1091—1112.

④ Brewer, Marilyn B., Gardner, Wendi, Who is this “we”? 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 Re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1996, pp. 83—93.

⑤ Tracy, K., *Everyday Talk: Building and Reflecting Identiti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2.

⑥ Tse, P. & K. Hyland, Hooking the Reader: A Corpus Study of Evaluative that in Abstract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 2005, pp. 123—139.

⑦ 孙莉:《中国硕士学位论文英文摘要的语用身份建构研究》,第15—21页。

⑧ Flottum, K. T. Kinn & T. Dahl, “We now report on……” versus “Let us now see how……”: Author roles and interaction with readers in research articles // K. Hyland & M. Bondi. *Academic Discourse across Discipline*. Bern: Peter Lang, 2006, pp. 203—204.

异同？

(2) 中国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的自称语构建了哪些身份类型？与英语母语者学术语篇中的身份建构存在哪些异同？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自称语使用数量及标准频次对比

笔者通过 AntConc 3.2.2 的 Concordance 检索功能分别检索了两个语料中的各个作者自称语,手动逐一剔出了例句、引文、标题等中不符合本文研究对象的自称语,并对各类自称语按照研究者、话语建构者、观点持有者、评论者的分类标准进行了分类。两个语料中的自称语数量以及标准频次见表 1。

表 1 自称语使用数量及标准频次对比

自称语		英语本族语者(BAWE)		中国英语专业本科生	
		使用数量	标准频次(每万字)	使用数量	标准频次(每万字)
第一人称	we	228	24. 80	211	16. 01
	us	64	6. 96	36	2. 73
	our	112	12. 18	38	2. 88
	I	182	19. 79	6	0. 46
	my	50	5. 44	6	0. 46
	me	19	2. 07	0	0
	总数	655	71. 24	297	22. 54
第三人称	the writer	0	0	18	1. 37
	the author	0	0	19	1. 44
	总数	0	0	37	2. 81
	the paper	1	0. 11	7	0. 53
无生命、抽象主体	this paper	0	0	35	2. 66
	this study	17	1. 85	11	0. 83
	this thesis	0	0	16	1. 21
	this research	2	0. 22	2	0. 15
	this article	0	0	7	0. 53
	总数	20	2. 18	78	5. 92

由表 1 可见,中国英语专业本科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第一人称自称语的使用频次(22.54 个/万字)远远少于英语本族语者(71.24 个/万字),而中国学生第三人称作者指称以及无生命抽象主体指称的使用频次(分别为 2.81 个/万字及 5.92 个/万字)则明显高于英语本族语者(分别为 0 个/万字及 2.18 个/万字)。中国学生在第一人称作者指称中第一人称复数 we 的使用频次(16.01 个/万字)远远高出人称代词单数 I 的使用频次(0.46 个/万字)。

在学术论文写作中,使用第三人称作者指称或是抽象主体使文章显得更加客观,更容易被编辑和读者接受。同时,使用抽象主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间接、隐性地表露自己,构建较低风险的作者身份。

中国学生论文写作中极少使用第一人称单数,而多用第一人称复数作自我指称,这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有关,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使得作者不太愿意突出自我,显得更加谦虚谨慎。^① 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作为自我指称,可以强调观点的大众性和普遍性,降低作者观点不被读者接受的风险。

Myers^② 认为,在科技论文写作中,由于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大,话语社群比个人的权威性强,在作者与读者人际互动时,显性作者参与可能是一种面子威胁。当作者提出新观点时,可能被视为是否定前人的观点,从而威胁到其他研究人员的面子,因此使用抽象主体既可以减弱对读者面子的威胁,又能让自己的观点被认可。

① Hyland, K., Humble Servants of Discipline? Self-mention in Research Article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 (3), 2001, pp. 207-226.
② Myers, G., The Pragmatics of Politeness in Scientific Articles. *Applied Linguistics*, 10, (1), 1989, pp. 1-35.

中国学生毕业论文中较多使用第三人称和无生命抽象主体来代替第一人称自称语,还与论文指导老师的观念以及学术论文写作指导书籍有关。大部分老师在指导学生论文写作时都强调学术论文的客观性,强调要用第三人称或无生命抽象主体来代替第一人称。但是,片面追求文章的客观性,容易忽视文章的可读性和互动性。

学术语篇是作者与读者交流的重要场所,作者通过与读者的交流构建自己的学术身份。过少使用第一人称自称语,而过多地使用第三人称或抽象主体会降低文章的可读性,影响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削弱作者在该学术领域的权威性,进而影响作者学术身份的建构。

(二) 学术论文中的身份建构类型对比

学术语篇中作者的自我指称方式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这些指称也同时构建了作者不同的身份,起到不同的交际效果。笔者根据 Flottum 的指称特点分类标准,对两个语料中作者建构的身份进行了分类。^① 例如,在“Therefo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herence between sentences and paragraphs.”中,作者通过第一人称复数“we”与“should do”连用,提出“我们应关注句与句之间、小节与小节之间的连贯”的观点,构建了观点持有者的身份。在“In this section, the author will make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Three-Dimension Transformation in subtitle translation of the film Wolf Warriors I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中,第三人称“the author”与篇章结构词“in this section”“make a systematic study”连用,构建话语建构者身份。在“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ideology of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中,作者通过抽象、无生命自称语“the paper”与表示研究的动词“focus on”连用,构建研究者身份。在“The author agrees with the opinion that English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is a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fun in the form of interesting games.”中,第三人称代词“the author”与表示评价的动词“agree with”连用,构建评价者的身份。两个语料中各类身份类型的统计结果对比见表2。

表2 学术论文中的身份建构类型对比

	研究者身份		话语建构者身份		观点持有者身份		评论者身份	
	BAWE	中国学生	BAWE	中国学生	BAWE	中国学生	BAWE	中国学生
第一人称	256	58	27	4	347	232	25	3
	39.08%	19.53%	4.12%	1.35%	52.98%	78.11%	3.82%	1.01%
第三人称	0	27	0	7	0	2	0	1
	0	72.97%	0	18.9%	0	5.41%	0	2.7%
无生命、抽象主体	19	74	1	3	0	0	0	1
	95%	94.87%	5%	3.85%	0	0	0	1.28%

由此可见,中国学生论文中第一人称自我指称主要构建了观点持有者的身份(占78.11%),英语本族语者论文中第一人称自我指称主要构建了观点持有者(占52.98%)和研究者的身份(占39.08%)。与表1结合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学生在构建观点持有者身份时所使用的绝大部分是第一人称复数 we,us,our(占95%以上),例如 as we all know……,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we should use free translation……, we must correctly understand……, it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it is easier for us to understand……使用“包含性”的第一人称代词,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观里,用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来表达,既不用作者本人出场,又能提高观点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在学术论文中用第一人称复数来假设知识共享、理解一致,可以增强作者观点的可信度,但同时也说明他们缺乏学术自信。英国学生在建构观点持有者身份时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单数(约占40%)。以个人主义为价值趋向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价值和個人责任,这种价值观念也体现在他们的学术写作中。

中国学生的第三人称自我指称主要建构了研究者的身份(占72.97%),如 the author attempts to study……, the author will use……,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e writer delivers questionnaires……。中国学生的无生命、抽象主体自称也主要建构了研究者身份(约占95%),例如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is paper aims to

① Flottum, K. T. Kinn & T. Dahl, “We now report on……” versus “Let us now see how……”: Author Roles and Interaction with Readers in Research Articles // K. Hyland & M. Bondi. Academic Discourse across Discipline. Bern: Peter Lang, 2006, pp. 203-204.

……, this paper analyzes……这一现象与中国学生所接受的指导相关,大多数教学资料、论文写作指南,包括论文指导老师,都认为学术论文应具有客观性,避免主观性的表达。然而,片面追求学术论文的客观性不但会降低论文的可读性,还会影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阅读互动和观点交流。追求客观性不是学术论文的唯一目标,互动性也是学术语篇的主要特征之一。^① 学术论文是作者构建学术身份的重要场所,过多使用第三人称或是无生命抽象主体自称,会降低作者的学术自信。

(三) 讨论

上述关于中国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与 BAWE 中的自我指称与身份建构对比分析显示:中国学生在学术写作中表现出相对“隐形的作者身份”,这一结论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②③④⑤} 受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和“与人为谦”价值观的影响,作者更倾向于间接、隐形地表露自己,而避免高调张扬。隐形的作者身份既能降低对读者面子的威胁,又能建构较低风险的作者身份。

英语专业本科生在毕业论文中主要通过第一人称复数 we,而不是第一人称单数 I,来建构观点持有者的身份,通过强调观点的大众性和普遍性,来提高自身观点的被接受程度。受传统师生角色定位的影响,学术新手将自己想象成谦逊的学习者,而将指导老师、论文评阅老师以及读者想象成权威人士。这一现象也与论文指导老师固有的观念以及学术写作教材的指导有关,他们往往过于强调学术语篇的客观性,而忽视了学术语篇的可读性和互动性,忽略了作者学术身份的建构。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中国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自称语的使用特点以及自称语所建构的身份,并与英国学术英语写作语料库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学生的第一人称自称语使用频次远远低于英语本族语者,中国学生的第三人称作者指称以及无生命抽象主体指称的使用频次则远远高于英语本族语者。中国学生倾向于使用集合性的复数第一人称 we 来构建观点持有者的身份;中国学生的第三人称指称,无生命、抽象主体指称主要建构了研究者的身份;而英语本族语者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单数 I,构建研究者身份和观点持有者身份。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在学术论文写作中,我们不应片面追求客观性而忽略了论文的互动性和可读性;在构建学术身份时应转变观念,尽量尝试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减少第三人称以及无生命抽象主体指称的使用,树立学术自信,建构自己的学术身份;学术新手在做研究时,应多阅读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了解最新的学术语体和学术风格,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论文指导老师要多与国外学者交流沟通,阅读国际刊物英文文献,把握本学科前沿学术写作的话语风格,从而达到国际刊物发表论文的要求,进而更好地指导学术新手的论文写作。

(责任编辑:魏 静)

① 李民,肖雁:《英语学术语篇互动性研究——以第一人称代词及其构建的作者身份为例》,第18-23页。

② Hyland, K., Authority and Invisibility: Authorial Identity in Academic Writing, *Journal of Pragmatics*, (34), 2002, pp. 1091-1112.

③ 杨欣然:《二语学术写作中的自我指称与作者身份建构》,第50-56页。

④ 柳淑芬:《中英文论文摘要中作者的自称语与身份建构》,第85-88页。

⑤ 徐昉:《中国学生英语学术写作中身份语块的语料库研究》,《外语研究》2011年第3期,第57-63页。

兼顾人居环境的古村落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评价

——以南京漆桥村为例

徐菁

(南京晓庄学院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7)

摘要: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古村落旅游成为休闲旅游的一种重要选择,其可持续发展问题倍受关注。该文以南京市漆桥村为研究对象,借助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兼顾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将指标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旅游资源和人居环境4个子系统,并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走访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利用SPSS计算可持续发展分值。研究表明:该区经济发展子系统得分最低,处于非可持续发展阶段,资源和环境子系统处于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社会子系统得分最高,处于可持续发展初级阶段;漆桥村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分为53.3506,尚处于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文章认为,漆桥村存在老龄化严重、旅游产品匮乏以及配套设施不健全的问题,需要通过挖掘当地文化内涵和加强旅游宣传等措施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古村落旅游;层次分析法;可持续性评价;南京市漆桥村

中图分类号:F59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89-06

一、引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作为新兴行业受到广泛关注和大力发展,但过快的发展脚步也衍生出许多不利于旅游可持续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人们对于大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心态,导致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没有节制,故为延长旅游业发展寿命,重视可持续旅游十分必要。可持续旅游是依据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提出来的。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社会的经济发展以不能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为前提^①,世界旅游组织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提出:可持续旅游发展是在保障和增强未来旅游业发展机会的同时,满足当代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发展需求^②。古村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一种选择,保留了我国自农耕文明以来大量文化精髓,城市化进程中仍有居住功能,在处理旅游与环境的关系中,具有较强代表性。作为一种传统的人居空间,古村落往往具备自然山水环境的融合,恬淡抒情的村居生活,以及礼制睦族的风尚等特征,也成为“人居文化学”“人居环境学”“人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对象^③。目前学术界对古村落旅游并未有一个严格的定义,研究也常把其归于乡村旅游中。为了明确论文研究主旨,本文将古村落旅游定义为乡村旅游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旅游者在较为偏远地区的传统乡村停留并体验乡村人居模式的旅游活动^④。

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古村落研究的重要方面。卢松等通过构建古村落旅游发展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安徽宏村的可持续发展状态^⑤。刘沛林等利用层次分析法探讨旅游业对北京市门头沟区爨底下村的

收稿日期:2019-03-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01131)和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6SJD790012)。

作者简介:徐菁,南京晓庄学院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旅游学。E-mail:xujing2431@163.com。

① 高峻,刘世栋:《可持续旅游与环境管理:理论·案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② 孙浩捷:《丝绸之路旅游可持续性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③ 刘沛林:《古村落——独特的人居文化空间》,《人文地理》1998年第1期,第34-37页。

④ 夏林根:《乡村旅游概论》,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5页。

⑤ 卢松,陈思屹等:《古村落旅游可持续性评估的初步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旅游学刊》2010年第1期,第17-25页。

乡村传承作用^①。Ammar 等人通过对马来西亚分布于不同地区的五个寄宿村庄进行实地考察,分析数据得出乡村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助于确保社区的恢复力^②。Geoffrey Wall 以巴厘岛地区的 8 个古村落为研究对象,实地调查当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感知,发现大多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是持较为肯定的态度,且这种态度会随着古村落旅游业发展而变化^③,进而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李卫华等以陕西党家村为目的,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当地居民进行了调查分析得出当地居民认为旅游业为其在各方面带来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且会因为经济水平等发展而产生感知变化^④,从而减弱古村落旅游的可持续性。

笔者认为,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是指将与目标层次相关联的一系列指标划分为多个标准层,标准层下又包含详细的目标要素,并通过设定指标权重和函数分析的方法对要素进行分析,多用于旅游业的相关研究中。例如,通过 AHP 构建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分析农业、乡村、生态等不同旅游主体的发展状况^{⑤⑥⑦},或借助 AHP 设计调查问卷,研究特定人群对旅游发展的感知^⑧,还有研究借助层次分析法和 BP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的竞争力^⑨。

综上所述,旅游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但是以往的古村落旅游发展可持续性评价主要从经济、资源的角度,而忽视了本地人居环境的影响。为此,本文以南京市古村落漆桥村为例,借助层次分析法,对当地居民和游客进行问卷调查,构造兼顾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从 4 个子系统方面评价研究区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

二、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区域

漆桥村地处苏皖两省交界处,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漆桥镇(N 31°22'40.82",E 118°59'14.02"),下辖 6 个自然村,共有村民四千余人,被誉为是“金陵第一古村落”。漆桥村历史悠久,最远可以追溯到元朝,当时的漆桥村被称为“南陵”。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漆桥村已成为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历史文化名村,也因孔子的 54 代子孙文显公南迁时在此落脚,成为了仅次于山东曲阜的“世界第二大孔子后裔聚集地”。

(二) 研究方法

根据国内外有关旅游评价的相关研究以及《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并通过实地考察、专家访谈等方式确定漆桥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准则层是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 4 个子系统,共内含 27 个指标层。其中经济子系统是指通过发展古村落旅游为当地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社会子系统是指古村落社区居民在发展古村落旅游业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游客在古村落旅游中所反馈的信息对当地旅游业发展产生的影响;资源子系统是指古村落所拥有的旅游资源,以及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程度;环境子系统是指古村落所处的生态环境现状,以及给游客的旅游体验环境。

1. 可持续性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采用美国运筹学家 T. L. Saaty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提出的层次分析法^⑩来确定古村落可持续性评价指标的各项权重。

通过构建判断矩阵比较同一层次两两元素之间相较于上一层次的相对重要性(见表 1),对这些数值进

① 刘沛林,于海波:《旅游开发中的古村落乡村行传承评价——以北京市门头沟区爨底下村为例》,《地理科学》2012 年第 11 期,第 1304-1310 页。

② Ahmad Fitri Amir, Ammar Abd Ghapar, Salamiah A. Jamal, Khairun Najiah Ahmad,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A study on community resilience for rural tourism in Malaysia,”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 pp. 116-122.

③ Geoffrey Wall, “Perspective on tourism in Selected Balinese Village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Spring 1996, pp. 123-137.

④ 李卫华,赵振斌等:《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综合感知及差异分析——以陕西韩城党家村为例》,《旅游科学》2006 年第 6 期,第 52-58 页。

⑤ 王飞,王建国:《基于 AHP-FCE 模型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指标体系的研究》,《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第 41-45 页。

⑥ 赵国华:《九龙谷森林公园生态旅游发展战略研究——基于 SWOT-AHP 分析》,《林业经济》2017 年第 10 期,第 104-107 页。

⑦ 陈瑞萍:《基于 AHP 的农业生态旅游产业开发体系的研究——以广东省为例》,《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 年第 8 期,第 198-203 页。

⑧ 陈惠芳,张佳鑫,张玟:《基于 AHP 的残障人士旅游体验研究——以南京市为例》,《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7 年第 7 期,第 62-64 页。

⑨ 徐知渊,吕昌河:《长三角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综合比较研究——基于 AHP 法与 BP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 年第 S1 期,第 237-240 页。

⑩ 吴净:《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以青岛为例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3 年第 10 期,第 64-70 页。

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见(1)式:当 $CR < 0.1$ 时,我们认为其一致性良好;当 $CR \geq 0.1$ 时,则为一致性程度不好,需要进行调整直至具备良好一致性,其中 RI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参考数据如表2。

表1 判断矩阵标度法

标度	含义
1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3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5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7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9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极端重要
2,4,6,8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若因素 b_i 与 b_j 相比,则判断值为 $b_{ji} = 1/b_{ij}$

$$CR = \frac{\lambda_{\max} - n}{(n - 1) \cdot RI}$$

(1)

表2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表

标度	1	2	3	4	5	6	7	8	9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根据专家征询法得到各指标值的具体分值,通过判断矩阵和随机一致性检验进行相应的调整,最终得到各项评价指标体系相对于上一层因素的权重以及相对于目标层的总排序权重(详见表3)。

表3 漆桥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指标层 C	权重	总排序权重
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 A	经济发展子系统 B1 (0.3008)	居民人均收入 C1	0.3069	0.0923
		特色旅游产品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 C2	0.0615	0.0185
		酒店、餐饮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 C3	0.1454	0.0437
		游客人均消费水平 C4	0.3283	0.0987
		游客平均停留天数 C5	0.1580	0.0475
	社会发展子系统 B2 (0.1344)	居民对古村落旅游发展态度 C6	0.2197	0.0295
		居民的参与程度 C7	0.0476	0.0064
		居民人均受教育程度 C8	0.0845	0.0114
		居民的环保意识 C9	0.2510	0.0337
		游客满意度 C10	0.1176	0.0158
	旅游资源子系统 B3 (0.1026)	游客重游意愿 C11	0.0870	0.0117
		游客的环保意识 C12	0.1926	0.0259
		旅游资源的传承度 C13	0.2382	0.0244
		旅游资源的丰富度 C14	0.1106	0.0114
		旅游资源的稀有性 C15	0.0570	0.0058
	人居环境子系统 B4 (0.4621)	旅游资源的保护程度 C16	0.2704	0.0278
		旅游发展对当地文化产生的影响程度 C17	0.0511	0.0052
		节庆活动丰富度 C18	0.0430	0.0044
		周边旅游资源的差异性和同质性 C19	0.0815	0.0084
		古村落主体建筑中现代化建筑比重 C20	0.1483	0.0152
		水体环境质量 C21	0.1672	0.0773
		空气环境质量 C22	0.0751	0.0347
		古村落绿化覆盖率 C23	0.1111	0.0513
		生物多样性程度 C24	0.1178	0.0544
		污染处理能力 C25	0.2697	0.1246
		噪声污染指数 C26	0.0517	0.0239
		生态宣传和教育力度 C27	0.2074	0.0958

2. 可持续性评价函数的构建

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来构造可持续发展评价函数见(2)式,对漆桥村旅游发展可持续性进行更直观的评价。(2)式中 S 为总得分, C_j 为第 j 项评价指标所得分数, W_j 为第 j 项评价指标所对应的权重, B_i 为四大准则层对应的权重, m 为准则层个数, n 为指标层个数。

$$S = \sum_{i=1}^m (\sum_{j=1}^n C_j \times W_j) B_i$$

(2)

对最终得到的分数 S 参照目前较为成熟的可持续性发展水平划分准则^①,并结合漆桥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其划分为非可持续发展阶段、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和可持续发展成熟阶段,具体评分标准如表 4。

表 4 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评判标准

综合评价值 S	0 - 40(含 40)	40 - 60(含 60)	60 - 80(含 80)	> 80 分
评判标准	非可持续发展阶段	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	可持续发展初级阶段	可持续发展成熟阶段

3. 调查问卷的设计

针对游客和居民分别设计调查问卷,共有两个组块。第一组块是基本信息部分,包括游客或居民的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第二组块是漆桥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关部分,针对游客设计旅游花费、旅游感知等问题,针对居民则设计旅游对自身影响等问题,所有问题均通过选项的方式给出,分别是 A - E 五个选项。在第一组块中,A - E 并无等级之差,只是五个不同的选项,在第二组块中 A 选项代表最好的层次,E 选项代表最差的层次。对 A - E 选项分别赋分,A 选项为 80—100 分,B 选项为 60—80 分,以此类推,E 选项为 0—20 分。将最终的问卷调查结果结合式(2)即可得到漆桥村社会、经济、资源、环境 4 个子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阶段。

三、研究结果

(一) 漆桥村旅游发展可持续性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采用实地发放调查问卷和线上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线上问卷从 2018 年 4 月 29 日开始到 2018 年 5 月 3 日结束,主要针对南京地区居民作为游客对漆桥村的感受;线下问卷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 日,分为面向游客和面向社区居民两种。最终得到共计 200 份问卷,去掉 11 份无效问卷,有效率为 94.5%。

利用 SPSS 软件对所得的问卷数据进行录入统计,根据表 3 的各项评价指标赋值权重,得到各项指标评价得分,再根据式(2)对漆桥村旅游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计算(见表 5)。最终总分为 $S = 53.3506$,说明漆桥村目前处于“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子系统权重占总权重的 1/3,说明该层次对古村落可持续性的贡献较大,但通过计算得到该层次的 S 得分为 37.0623,处于“非可持续性发展阶段”,制约了整体的发展水平。根据实地调研和问卷数据所得说明:一方面游客在景区内的消费很低,虽然景区物价整体较为亲民,但因种类有限,并不能很好地调动游客的购买欲望,加之景区所能游览的区域很小,无法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游客在当地缺乏过夜的意愿,使得漆桥村的住宿餐饮发展水平远低于周边景区;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在景区的旅游参与度过低,旅游经济并未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没有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居民也无法仅通过旅游业获得相应的生活保障,导致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较差。

社会发展子系统的 S 得分为 74.1074,处于“可持续发展初期阶段”,是 4 个子系统得分最高的,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通过实地走访,发现研究区当地居民大多是老年人,年轻人基本选择外出前往更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而老人在进行旅游相关从业时普遍缺乏创新和宣传意识,且当地居民大多受教育程度偏低,与漆桥村应有的儒家文化以及多数居民都是孔姓居民所应有的文化程度大相径庭,使得整个景区文化氛围欠缺。

旅游资源子系统得分为 57.7814,处于“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漆桥村作为世界第二大孔子后裔聚集地,拥有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如何开发和保护更为重要。研究结果显示,漆桥村对于本地旅游资源的传承相对较好,旅游业发展也有助于本地文化的宣传推广,但对于现有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仍不够充分,漆桥村拥有区别于周边景区的儒家文化的旅游资源,而景区针对该旅游资源所开发出来的旅游产品和项目缺乏多样性,使得游客即便置身于漆桥村中也不能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文化气息。笔者认为,漆桥村在开发利用的同时对其保护措施也不容忽视,需要挖掘漆桥村与周边高淳国际慢城等景区所不同的旅游资源,形成差异化和独特性,体现景区不可替代性,从而来促进漆桥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① 胡田翠:《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架研究》,《现代经济》2007 年第 10 期,第 36 - 38 页。

表 5 漆桥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得分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指标层 C	总排序权重	赋值分值	评价得分
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 A	经济发展子系统 B1 (0.3008)	居民人均收入 C1	0.0923	41.11	3.7950
		特色旅游产品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 C2	0.0185	22.48	0.4157
		酒店、餐饮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 C3	0.0437	41.68	1.8231
		游客人均消费水平 C4	0.0987	38.99	3.8502
		游客平均停留天数 C5	0.0475	26.62	1.2653
	社会发展子系统 B2 (0.1344)	居民对古村落旅游发展态度 C6	0.0295	85.56	2.5266
		居民的参与程度 C7	0.0064	53.36	0.0413
		居民人均受教育程度 C8	0.0114	41.07	0.4668
		居民的环保意识 C9	0.0337	81.12	2.7374
		游客满意度 C10	0.0158	70.76	1.1183
		游客重游意愿 C11	0.0117	63.60	0.7441
		游客的环保意识 C12	0.0259	79.04	2.0469
	旅游资源子系统 B3 (0.1026)	旅游资源的传承度 C13	0.0244	61.64	1.5069
		旅游资源的丰富度 C14	0.0114	58.74	0.6669
		旅游资源的稀有性 C15	0.0058	58.08	0.3397
		旅游资源的保护程度 C16	0.0278	61.64	1.7110
		旅游发展对当地文化产生的影响程度 C17	0.0052	69.04	0.3618
		节庆活动丰富度 C18	0.0044	53.17	0.2346
		周边旅游资源的差异性和同质性 C19	0.0084	40.02	0.3348
		古村落主体建筑中现代化建筑比重 C20	0.0152	50.94	0.7756
	人居环境子系统 B4 (0.4621)	水体环境质量 C21	0.0773	58.77	4.5417
		空气环境质量 C22	0.0347	64.23	2.2294
		古村落绿化覆盖率 C23	0.0513	65.80	3.3779
		生物多样性程度 C24	0.0544	54.18	2.9496
		污染处理能力 C25	0.1246	56.44	7.0328
		噪声污染指数 C26	0.0239	51.97	1.2416
		生态宣传和教育力度 C27	0.0958	51.30	4.9155

人居环境子系统得分 56.8915,该分数处于“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该子系统是 4 个子系统中权重最高的,占到 0.4621,从而决定了环境对于漆桥村实现旅游发展可持续性起着重大作用。根据可持续评价水平得分显示,漆桥村的整体水质、绿化覆盖率、污染处理能力相对较好,得到大多数游客和居民认可,这也为该地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由于其生物多样性等有所欠缺,限制了其发展,同时对于古村落生态宣传和教育以及其他环境治理净化方面仍可以加大投资,以创造更好的旅游环境。

(二) 漆桥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建议

1. 漆桥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a) 古村落居民老龄化问题严重、受教育程度低

在进行实地调研过程中很明显的可以发现,古村落内居民大多为老年人,人口组成趋于老龄化,居民受教育程度也普遍偏低。这一现象大大限制了古村落旅游业发展。大多老年人由于思想固化,不重视发展旅游业这一新兴行业,甚至存在一些抵触心理。即使是参与到旅游业发展中,往往也缺乏年轻人的创新意识,不能为古村落旅游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此外,因居民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这将直接影响到对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接受程度。

(b) 古村落旅游产品匮乏

在漆桥老街游览时不难看出,老街两边的店面以及所拥有的旅游产品都是比较老旧的,所售卖的产品也缺乏创意,即使老街内有儒家文化展示区,但景区缺少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在特色旅游纪念品和商品开发上也没有太大特色,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游客在景区内基本除了餐饮消费,没有其他旅游产品消费。这一系列现象大大降低了旅游者游览满意度。

(c) 配套设施不健全

前往漆桥村旅游的游客组成大多为南京及周边地区居民,大多都是半日游或是一日游,即使是有过夜游客,住宿地点一般在周边其他景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古村落配套设施,例如餐馆、宾馆等不够健全。另外,其旅游活动等也不够丰富,使得景区可游览性降低,游客缺乏长期停留的意愿。

2. 发展建议

针对当地旅游可持续性四大层次的得分情况,结合现阶段存在的具体问题,从宣传保护、文化内涵、景区建设方面提出相关建议。首先,在宣传保护层面上,古村落由于所拥有的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性,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但往往又具有脆弱性的特点,无论是其生态环境,还是建筑遗产、文化内涵等都容易受到破坏,在进行旅游宣传时要注重提倡可持续发展,如适当应用新媒体,借助举办旅游节庆等活动提高景区知名度,同时设计一些能够延长游客停留时间的项目,如举办夜间“万家灯火”展,在一些特定的节日举办猜灯谜、篝火晚会等节目,可邀请网络红人参与现场活动并进行直播,将景区内富有特色的地方打造为“南京旅游必去的打卡地”之一,实现白天观景+夜间活动的双重发展目标,试图从根本上提升游客停留意愿,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其次是在景区文化内涵层面,作为世界第二大孔子后裔集聚地,拥有着浓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旅游产品开发时,要保证一个文化核心——“儒家文化”,坚决避免千篇一律的乡村旅游产品泛滥,尽可能地进行原创旅游产品开发,在节假日时可以开设“儒家文化大讲堂”,邀请当地文化水平较高的人进行本地文化讲解,同时设计部分“有奖问答”形式的游客互动环节;最后一点是在景区配套设施的建设上,为避免漆桥村成为旅游“二次目的地”,并努力成为游客旅游的“首发地”,在景区建设方面应着重打造富有特色的住宿品牌,提升住宿吸引力,如建设儒家文化住宿区,整个住宿区参照儒家文化进行建设,对房间内分主题装修,不同的主题代表着一个儒家典故,在进行景区整体营销时,也要着重突出对住宿吸引物的宣传。

四、结论与不足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地调研等形式,借助层次分析法,建立兼顾人居环境的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南京漆桥村旅游发展现状,对漆桥村旅游发展进行了可持续性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 漆桥村旅游发展总体处于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其中经济因素处于非可持续发展阶段,是四大因素中处于可持续发展程度相对最低的。而社会因素处于可持续发展初级阶段,为可持续发展较好的。资源和环境因素都处于潜在可持续发展阶段。

2. 漆桥村可持续发展水平低是由多方面引起的,经济方面配套设施建设以及投资限制导致游客游览兴致不高,且旅游产品多样性欠缺。社会上居民趋于老龄化,且受教育水平较低,非常不利于旅游可持续发展。资源上漆桥村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很欠缺,旅游项目和产品单一。环境上地处南京郊区保护较好,但相关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不够完善,且居民的文化程度限制了人们的保护环境意识以及所能做的贡献。

3. 针对漆桥村景区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实现白天观景+夜间活动双重发展目标,从根本上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开展“儒家文化大讲堂”等有利于宣传文化内涵的活动,并在景区旅游产品的设计上拒绝千篇一律,设计具有景区特色的纪念品;建设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儒家文化住宿区”,对不同房间以“儒家典故”为主题进行装修。

(二) 研究不足

可持续旅游是一个复杂且备受关注的研究方向,笔者在撰写论文过程中虽然根据前人研究方法,对漆桥村旅游发展可持续性做出了评价,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一方面,在研究方法选取上有限。本论文主要采用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权重,其中专家的主观成分较多,并不能理性准确地对漆桥村旅游发展可持续性做出评价;另一方面,在实际调研方面,因为当地居民老年人居多,受教育程度较低,对本地居民获取数据较为困难,数量有限,缺乏代表性,导致所得出的结论受到限制。故在今后景区可持续性的研究中,应该重视构建客观评价指标,寻求新的方法设计评价权重,在问卷调研上,将尽可能增加调研时间,通过访谈加问卷的方式获得当地居民的看法。

(责任编辑:叶 玲)

酒店业正反向电子商务融合应用研究

王小波^{1,2}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6; 2. 南京晓庄学院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1)

摘 要:酒店业正向电子商务主要是消费者结合网络通过给定的信息预订酒店服务,酒店主导消费者。酒店业反向电子商务则是消费者出价、提需求,酒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回应,此种情况消费者主导酒店。酒店业可以通过正反向电子商务的融合应用,打通信息数据共享平台,更精准地掌握消费者需求,打造淡旺季均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业务模式。

关键词:酒店业;正向电子商务;反向电子商务;电子商务融合应用

中图分类号:F7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095-05

电子商务从诞生至今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2018 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31.63 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 8.5%;网络零售额 9.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9%。^①截至 2018 年 6 月,在线旅行预订用户规模达到 3.93 亿人次,较 2017 年末增长 1707 万,增长率为 4.5%。在网上预订酒店和旅游度假产品的网民分别占比 20.5% 和 9.3%。其中,手机预订机票、酒店、火车票或旅游度假产品的网民规模达到 2.99 亿人次,较 2016 年底增长率为 14.2%。^②以上数据大部分是通过正向电子商务 B2C 模式实现的,这说明酒店业电子商务发展比重已经越来越高。

另外一种网络消费模式反向电子商务 C2B 伴随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提升,也得到了更多的应用,如个性化发型、个性化服饰、个性化汽车……此类产品可以依托 C2B 平台倾力打造。C2B 模式加强了厂商渠道和消费者之间的紧密度,创造了价值增量,消费者的利益得到增长,为企业打开了通向未来全新商业生态的窗口。笔者认为,酒店业的反向电子商务 C2B 将会给该行业带来新的契机。

张亚等^③认为 C2B 电子商务模式逐渐被感知,交易的控制权从端移到端,创建消费者与企业全新的分工与协作体系,并从 C2B 的流程特征方面分析,预测该模式的发展趋势。C2B 作为一种集聚发展潜力的模式:王碧云^④认为 C2B 也极大地增强了网络在消费市场的主角位置,通过探讨 C2B 模式的发展、C2B 模式中消费者购买的影响因素等给出了推动 C2B 消费模式的发展建议;戴国良^⑤强调 C2B 首先发展群体定制,其次发展个人定制,先定制价格,然后定制产品,最后将发展为混合型。石金^⑥明确电子商务在中国酒店业的发展速度十分迅猛,电子商务给予酒店业的市场业务开拓更多元的形式,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同时也给酒店业带来一次机遇和挑战,未来酒店业的发展以及改革必定依靠电子商务。总之,酒店业电子商务存在价值就是让消费者特别是旅游旺季出行的消费者通过网络订购酒店及服务、完成网上支付,省心的同时也节省了大量宝贵时间,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消费者在信息多元化时期可以凭借足不出户的网络渠道了解全球酒店信

收稿日期:2019-01-10

修回日期:2019-06-30

基金项目:南京市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培育学科)学科(宁教高师[2017]7号)项目。

作者简介:王小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南京晓庄学院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博弈论与电子商务的机制运用、物联网运营安全、管理决策与分析。

①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2018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9 年 5 月。

② 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8 年 7 月发布。

③ 张亚等:《C2B 电子商务模式分析研究》,《电子商务》2014 年第 2 期,第 17-18 页。

④ 王碧云:《C2B 模式中消费者购买影响因素研究》,《电子商务》2015 年第 9 期,第 55-56 页,第 67 页。

⑤ 戴国良:《C2B 电子商务的概念、商业模型与演进路径》,《商业时代》2013 年第 17 期,第 53-54 页。

⑥ 石金:《浅析电子商务在中国酒店业的应》,《现代经济信息》2015 年第 2 期,第 353-354 页。

息,然后再进行预订,方便且快捷。目前,酒店业的电子商务 B2C 与 C2B 的融合应用有待提升。

一、正向电子商务和反向电子商务

正向电子商务(B2C,即 Business-to-Customer 的缩写)通常是指在全球各地的买卖双方借助开放的网络环境不谋面地进行各种商贸活动,即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商务活动;也可理解为在互联网、企业内网和增值网上以电子交易方式进行交易活动和相关服务的活动,是传统商业活动各环节的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电子商务,如企业与企业间(B2B)、企业与消费者间(B2C)的电子商务。

反向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一种新的模式,是相对传统电子商务而言的,从字面上理解就是 C2B 即 Customer to Business,起源于 1998 年美国人 Jay Walker 创建的 Priceline 旅游网站的消费者自定价系统。^① Priceline 模式的核心是通过聚合分散分布但数量庞大的用户形成一个强大的采购集团,以此来改变 B2C 模式中用户一对一出价的弱势地位,使之享受到以大批发商的价格购买单件商品的利益。C2B 模式中所有渠道的各个企业都是以消费者为核心,为其量身定做,消费者预先提出自己的需求并参与设计与生产,最终的产品、价格等都彰显个性化。基于该模式的应用还有 Cafepress 公司、Zazzle 和 Threadless 等。

反向电子商务的本质是由于互联网时代开始注重人性化,带来消费者主动权的释放,既不是简单的团购,也不是对 B2C 模式的补充,而是在消费者和商家关系平等基础上更加高效的电子商务模式。反向电子商务在强调个性化的同时逐渐规模化,因此有“互联网化的精益生产模式”之称。反向电子商务是互联网、市场和消费者三方进化的产物,是全新思维全新环境中出现的新商业模式。

对于消费者来说,基于 C2B 模式的电子商务好处是以“汇聚需求”模式取代了“汇聚供应商”模式,将购物的主导权交给了消费者。对于企业而言,基于 C2B 模式电子商务的好处是促进了企业结构的变革,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企业可直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量产,降低了成本。同时,拉近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联系。^{②③}

如果说传统酒店业电子商务是把线下预订行为搬到线上,而反向酒店业电子商务则是消费者主动参与电子商务的很多环节。该模式更加考验酒店对整个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同时促进产业演化成生态系统。酒店业在明确消费者需求的情况下改进自己的酒店布局及服务理念,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降低淡季酒店房间的空房率。

二、酒店业应用电子商务现状

(一) 国内涉足酒店业的旅游网站类型

电子商务在酒店行业中的应用不断发展,新技术、新创新不断涌现,如网上预订酒店、团购酒店等。中国旅游酒店业协会和北京金旅雅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携手推动“金旅工程”,后又推出“中国旅游酒店网”。

目前国内旅游网站涉足酒店业的有四类:一是政府系统的旅游网站。如国家旅游局拨专款建立的中国旅游网。二是专业旅游网站。如春秋旅游网、中国旅游信息网、携程旅行网、中国酒店预订网等。这些网站会涉及到饭店的预订商业运作。三是综合网站的旅游频道。如网易、搜狐等。这类网站一般只对酒店进行一些简单的介绍。四是酒店自己创建的网站。例如,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昆仑酒店、大连万达国际酒店等。

(二) 目前酒店业应用电子商务的主要形式

B2B 模式。B2B 模式是电子商务中历史最长、发展最完善的商业模式,它的利润来源于相对低廉的信息成本带来的各种费用的下降,以及供应链和价值链整合的益处。酒店利用互联网,与旅行社、旅行代理商、航空公司、银行系统、交通运输等部门展开的业务即为 B2B 模式。该模式电子商务的普遍做法为酒店通过本身专线方式与全球定位系统联机,利用其提供的接口与旅行社开展接待商务往来、与航空公司进行机票订购及出售的在线交易等。

① 关伟伟等:《C2B 电子商务模式解析》,《观察》2015 年第 1 期,第 25-26 页。

② 戴国良:《C2B 电子商务的概念、商业模式与演进路径》,第 53-54 页。

③ 王晓平:《电子商务业务模式的发展与探讨》,《物流技术》2010 年第 11 期,第 42-44 页。

B2C 模式。B2C 模式即商家对消费者,也就是通常说的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商业零售模式。该模式的电子商务是投入较大的一个领域。酒店通过网络在线与客人进行旅游产品的预订和宣传、了解消费者信息。它们出售的主要商品有:客房、餐饮娱乐、旅游产品。

C2B 模式。C2B 模式作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一种新型模式,如果能更好地应用于酒店业,并且和酒店业正向电子商务融合应用,对提升酒店的品牌和管理都会是极佳的选择。尤其在信息数据共享方面,可以从不同角度整合消费者的消费水准和消费习惯。

三、酒店业反向电子商务的运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一) 酒店业反向电子商务的运作模式

以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为基础的酒店预订模式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酒店电子商务模式和流程已不能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酒店并不是只要采用电子商务就可以事半功倍,必须要对环境和酒店自身进行分析,灵活运用电子商务模式才能提高酒店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提升酒店的服务质量。因此,反向电子商务应运而生。

酒店业反向电子商务的始祖是前文提到的 Priceline 模式(见图 1)。该模式因为其独创的“用户出价模式”大受价格敏感性用户以及旅游淡季的酒店、航空公司等欢迎。另外,在 AppStore 上线的名为“酒店控”的终端,也非常受欢迎。该终端的应用方式为:用户给出一个价格,30 分钟内由酒店来回应,如果有酒店同意接受该价钱,则预订成功,之后获得酒店名称和详细地址等信息,且该预订不能更改和退款。用户也可以选择星级、地区、入住时间等,如果用户出价过低,则预订失败,用户每天只能出价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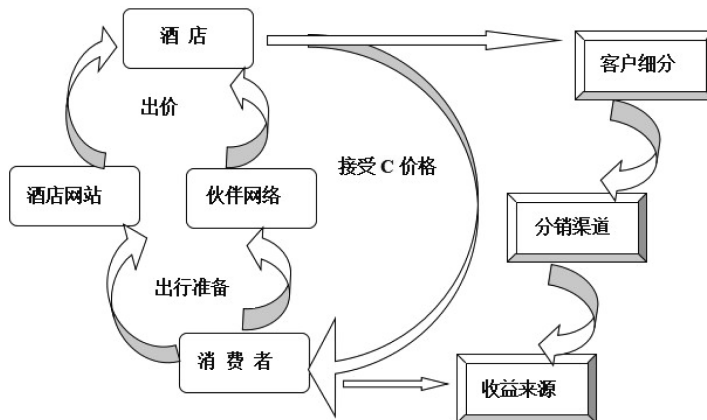


图 1 酒店业反向电子商务的运作模式

目前,酒店业的反向电子商务是消费者给出自己的需求,包括内部环境、外部环境、有无 WiFi 等,该情况下,消费者给出的相关价格是低于酒店正常营业的价位,网站上酒店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接受该消费者的请求。第一时间响应该消费者请求的酒店即拥有该单生意,随即将酒店的详细信息诸如酒店地址、成交价格、联系电话等发送给该消费者,且交易双方不得随意变更。消费者的付费方式可以选择网上支付或到店支付。

(二) 影响酒店业反向电子商务运作模式的因素

1. 消费者的喜好度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驱动消费者购买决定的十大因素,分别是地理位置、品牌和声誉、外部和公共区域、价格、服务效率、客房设计、人际服务、市场营销、餐饮服务、质量标准。这些因素基本上可以归属为正反向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喜好度。消费者的喜好度是判断产品品质的外部线索,并且决定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这些喜好度最终可以概括为酒店价格、在线评论和酒店的服务质量。在同类型酒店中,酒店是否能接受消费者给出的价格影响消费者后期再次选择该酒店的频次;完全网络化的前提下,在线评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消费者对酒店或服务的满意度,是消费者线上选择酒店或酒店接受出价后消费者是否愿意入住的重要依据;而服务质量就是消费者体验后对于产品的认知评价,这个喜好度不仅决定消费者是否通过 B2C 方式选择酒店的重要因素,也是消费者通过 C2B 方式决定是否认可接受出价酒店的重要因素。

2. 消费者的需求

(1) 一致性。消费者无论是通过正向或反向电子商务方式预约的酒店,都希望最终获得的服务能与自己最初约定的保持一致。消费者结合自己的消费层次在网上看中自己喜欢的房型后,给出合理范围内的价格等待酒店响应,如果接受出价的酒店既想让消费者入住,又不愿意以网上给出的房型将该房型出售,消费者必然不满意,进而引发一系列坏的连锁影响。因此,消费者希望酒店最终分配给自己的房型和网上给出的

房型要保持一致。

(2) 及时沟通。无论哪种方式,针对酒店价格、酒店房型、酒店提供的其他服务等出现的问题,消费者需要和酒店客服及时沟通,客服应耐心解答消费者提出的任何疑问,直到消费者满意为止,而非一味地推托或找任何借口。

消费者在入住期间若对出现的价格、房型等问题有所不满,希望酒店能在第一时间给出反馈并快速采取补救措施。消费者在提出自己的诉求时,也希望酒店客服人员能真正专注倾听,结合实际情况第一时间平息自己不满的情绪,即使当时解决不了,酒店随后安排专门人员解决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让消费者在满意度上有较大的提升。

(3) 特色服务。主动出价的消费者在某种意义上会更注重酒店的特色,如房间的装饰、用品的独特性和质感等。消费者在淡季选择酒店的时候更关注酒店的装饰亮点和房间的独特性,更倾向选择注重房间的个性化布局的酒店,消费者对能够在众多大众化的产品中脱颖而出的酒店念念不忘,也会带动周围朋友去该酒店消费。除了房间的独特性外,消费者也会关注酒店的经营项目或服务方式是否也有独特性。因为有了反向电子商务消费者得到的特色服务,直接预订的正向消费者也会受到影响,虽然无法提出自己的需求,但可以结合网上评价去选择相应酒店,满足自己的个性化需求。

3. 酒店的定位

(1) 产品定位。酒店为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即是酒店的产品定位。酒店通过产品定位可以明确自己的位置和目的,同时可以准确找到自己的经营特色和范围。不可为了吸引消费者,让自己的产品过于多元化,否则容易失去自身的特色。要充分考虑反向电子商务消费者的层次和水平。

(2) 形象定位。酒店以哪种形象面对目标市场就是酒店的形象定位,包括酒店的视觉形象和心理形象,酒店的视觉形象包括酒店的建筑外观、酒店的名称、酒店的标志(店徽)、酒店的标准字体及字体标准颜色等,心理形象包括酒店的档次和星级等。酒店的形象定位对于消费者尤其是反向电子商务消费者选择尤为重要,消费者的出价除了结合自己消费水平外,会根据酒店的形象来报出合理价格。

四、正反向电子商务融合应用带给酒店业的新契机

(一) 正反向消费者融合的信息更精准更多元

正向电子商务模式下,消费者通过酒店投放在合作的旅游网站平台进行预订,消费者按正常流程在酒店的官方网站选定房间,房间的价格、条件等都是固定的,消费者提供的相关信息也是模式化的,主要包含在酒店的流程式记录中,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工作单位等,深度的信息包括消费能力、消费频次等;消费者的需求信息通过所住酒店的档次已经锁定,通过选择的房型进一步确定其消费层次和水平。反向电子商务模式下,作为主导的消费者不仅可以出价,甚至能够提出自己的特色需求,在这些特色需求中包含的信息更加具体化和个性化,如超越年龄的兴趣和消费习惯、同一年龄段不同的服务需求、同一个消费者不同时间段的消费能力等。两种模式下的信息可以融合应用(见图2),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加工、过滤,采用聚类、分类等智能方法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进行识别(如价格敏感、内部环境要求、外部环境要求等),接着提取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兴趣、需求情况,然后将正反向电子商务模式下收集的消费者信息建成匹配的信息库来调整酒店的建设与改进,通过个性化需求,确定酒店部分房间的设计方案、成本价格核算。这些需求、定制信息实时地存储于信息数据库中。

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信息一方面通过酒店的初步加工、交互过程去获得消费者需求、偏好信息,这些信息经过酒店处理也存储于信息数据库中。同时,正向电子商务价值链和反向电子商务价值链在不同时期相互提取,正向电子商务价值链上的每一个价值增值活动都可以通过收集、组织、挑选、合成和分配五个加工步骤再次为反向电子商务价值链上的信息数据提供帮助。同理,正向电子商务价值链上每一个价值活动所需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反向电子商务价值链来获得,反向电子商务价值链并不仅仅包括信息的增值活动,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为消费者“重新创造个性化服务”的活动。反向电子商务价值链为消费者在淡季提供更优服务的同时也给酒店业开辟了一块全新的竞争领域,从而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竞争。

(二) 酒店管理更具特色

酒店业正反向电子商务的融合应用,让酒店的经营模式随着淡旺季随意变化和切换,更灵活更高效,收益更高。酒店可以根据旅游的时段选择适合自己的经营方式。无论消费者或是酒店都清楚,在旅游的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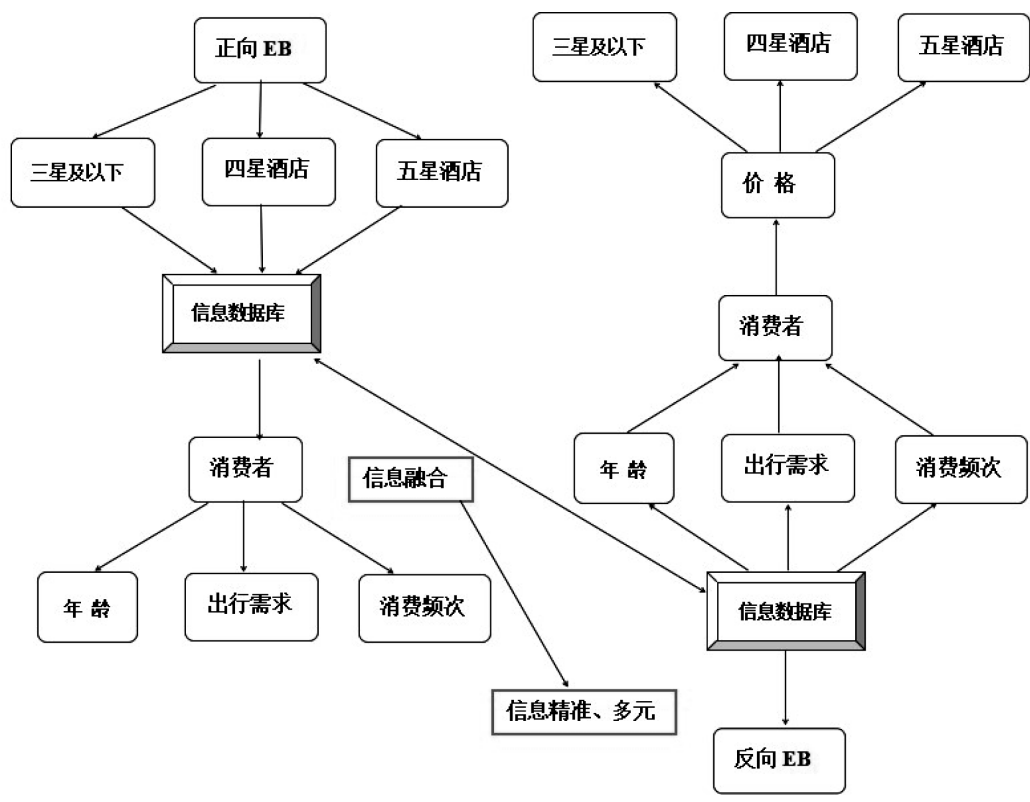


图2 正反向电子商务信息融合

时间,好到五星级酒店低至普通的宾馆都是供不应求的,在此情况下,酒店选择反向电子商务的经营模式很难满足消费者需求,故在旅游旺季酒店可以按正常的模式即正向电子商务进行经营,消费者按正常流程在酒店的官方网站选定房间,房间的价格、条件等都是固定的,消费者只要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房源即可。酒店也可以选择旅游网站平台进行合作,在此类网站上提供少量可以以团购的方式即比市场价格较低的房型供消费者选择,以此增加吸引力。而在旅游淡季,出行的人员相对较少,若酒店继续采用正向电子商务模式经营,此时酒店房间供大于求,空房率比例较高,如果通过反向电子商务模式接受客户给出的低价格、高享受的房型,空房率较之前会得到改善。

酒店通过正反向电子商务的融合更好地注重消费者的消费细节,根据消费者的身体状况、口味、习惯等在他们住宿期间给予更好的服务,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增加自己的潜在客户群。同时可以根据信息库中的融合信息全面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在满足消费者基本需求的同时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提高消费者满意度。结合不同模式下消费者的需求,酒店也可以尝试创新的方式去吸引消费者,比如机器人叫醒和送餐、智能化房间设备管理、更加可靠的物联网安防设备等。这种融合下的应用方式相辅相成,个性化需求的应用在大众化消费者中也会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效果。酒店最终的特色经营管理更加鲜明、更吸引消费者眼球。

五、总结

酒店业电子商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酒店将自己各种档次的客房发布在官网或与旅游网合作的网站,在某些时段推出优惠房源,这种正向的电子商务酒店处于主动地位,而消费者处于被动地位;为了迎合消费者需求,酒店可以推出反向电子商务,反向电子商务是酒店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确定是否有相关的客房或服务再做出应答,该模式下,消费者处于主动地位,而酒店处于被动地位,也更体现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酒店如果能将正向电子商务和反向电子商务很好的结合,并通过正反向电子商务融合应用,最终真正实现以消费者为中心、服务人性化、管理柔性化的互联网+的发展态势。

(责任编辑:叶 玲)

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魏洁云,刘桐彤,陈 夏,赵节昌,杨 琳

(徐州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摘 要:旅游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联系紧密相互促进。以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测算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与相关影响因素关联度。研究认为:江苏省旅游发展与各影响因素指标间有着良好的关联性,特别表现为与地区生产总值关联度最高;其次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与旅游业从业人员数灰色关联度最小。因此江苏省需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完善旅游企业接待服务设施,完善市内交通网络,加强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以提升江苏旅游产业关联效应,并促进江苏经济持续增长。

关键词: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100-07

江苏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指出旅游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给江苏省旅游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旅游随之兴起,而大众旅游带来的新机遇将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需求,催生更为庞大、更为多样化的旅游市场。

江苏省是我国的经济大省,也是旅游大省,旅游业的地位越发凸显。本文将重点放在研究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上,分析出所选定因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这有利于找到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发现当前旅游发展中的问题,从而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和完善,促进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起初,国外学者对旅游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对目的地经济等影响,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旅游乘数理论、投入产出模型、一般均衡模型等^{①②③},但对旅游经济增长本身的研究甚少。笔者发现,国外学者研究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主要着手于游客需求影响因素^④。随后,Tosun C 对土耳其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针

收稿日期:2019-01-15

基金项目:江苏省文化科研课题“文旅融合背景下传统饮食文化资源产业价值提升利用研究”(18YB13);四川省教育厅川菜发展研究中心规划项目“中国优秀传统饮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研究”(CC18W21)“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利用研究”(CCIPW22);徐州工程学院课题“非遗传统工艺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研究”(XKY2018109)。

作者简介:魏洁云,徐州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旅游经济。Email:weijy360@163.com。刘桐彤,徐州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学生,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经济。

① Archer B H. The Value of Multipliers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Tourism Management*, 1982, (3), pp. 236-241.

② Ahlert G. Estimat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n Increase in Inbound Tourism on the German Economy Using TSA Result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8, 47(2), pp. 225-234.

③ Dwyer L, Forsyth P, Spurr R. Assessing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Events: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6, 45(1), pp. 59-66.

④ Taylor S A, Baker T L. An 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Quality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s, *Journal of Retailing*, 1994, 70(2), pp. 163-178.

对旅游经济增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问题进行了探讨^①。Chiokoh 研究了韩国入境旅游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韩国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入境旅游的发展,但是入境旅游并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②。Antonio Juan Brion 等多变量的因子分析法,研究哥斯达黎加和穆尔西亚地区乡村旅游对当地经济增长和需求的影响,认为哥斯达黎加和穆尔西亚地区的乡村旅游的需求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③。总之,国外学者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是从研究影响游客需求因素入手,采用面板数据或截面数据,构建模型,研究旅游市场时空变化和主要相关影响因素,进而分析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Massidda 等分析意大利游客流向的时空变化趋势,发现北方游客更加关注旅游文化性,而南方游客更加关注经济性。Seetaram 研究发现旅游价格水平、工资水平是影响目的地和替代目的地选择的主要原因^④。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旅游业发展是否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我国大部分学者把经济发展研究对象明确化,比如研究旅游业对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贡献率、旅游业对就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贡献率等方面。2005 年以后,国内学者们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多。旅游资源禀赋是影响旅游产业的主要因素,资源差异直接造成旅游经济水平和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性。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为旅游资源、交通区位、基础设施、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等。汪德根(2011)研究发现国内旅游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而入境旅游受到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可达性影响较大^⑤。孙鼎新(2014)对京津冀 13 个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增长定量分析发现,交通可达性对各城市旅游发展影响显著,应从交通基础条件全面完善入手提升旅游发展^⑥。桂蓉在探究旅游经济增长因素时,建立非线性主成分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计算各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分析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因素及其之间存在的差异^⑦。张众(2013)采用旅客周转量、A 级景区数、旅行社总数、旅游就业人数等 13 个指标构建河南旅游经济增长的指标体系,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张祥(2012)以海南省的旅游饭店数、邮政服务水平和政府影响力、进出口贸易总额、金融服务便利程度和三星及以上饭店数为灰色关联分析比较序列,研究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⑧。吴利采用灰色关联法,研究发现旅游发展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星级饭店个数等指标关联性最强。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要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条件、物质资源条件、交通资源条件、信息金融服务条件以及宏观经济条件^⑨,同时地区生产总值、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文化旅游产业的影响显著^⑩。

(三) 国内外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学术界的这些研究揭示了旅游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对深化旅游经济发展认识,完善区域旅游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不同的区域,旅游经济增长与相关影响因素存在不同的关联,区域旅游经济政策要根据各省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来规划和促进发展。当前对于旅游经济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都是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重点放在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上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由于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所选指标具有代表性,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比性等原因,所选择的指标体系也各有不同。笔者认为不管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测量指标体系上,入境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或者旅游总收入都可以作为旅游经济增长测量指标;关于研究与旅游业紧密相关的交通、旅游需求等影响因素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对于影响因素个数的选择,有的是单个的,有的是多个;在研究对象上,选择某一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地区位特点和实际情况研究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差异;在研究方法上,多数对影响因子进行量化处理,或者利用弹性系数、灰色关联度等指标,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

① Cevat Tosun, D. J. a. Y. Tourism Growth,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Turkey,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3, 34 (5), pp. 45 - 55.

② Oh, C. O.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o Economic Growth in the Korean Economy,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1), pp. 78 - 85.

③ SA Raza, N Shah. Tourism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does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Exist in Top Tourist Arrival Countri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2), pp. 1 - 11.

④ 王阳阳:《甘肃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兰州财经大学 2018 年硕士论文。

⑤ 汪德根,陈田:《中国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空间分析》,《地理科学》2011 年第 5 期,第 19 - 27 页。

⑥ 孙鼎新:《高铁对京津冀旅游交通可达性及旅游经济联系影响的研究》,燕山大学 2014 年硕士论文。

⑦ 周方围:《甘肃省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西北师范大学 2014 年硕士论文。

⑧ 张祥:《海南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海南大学 2012 年硕士论文。

⑨ 李妍:《基于灰色相关模型的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 年第 9 期,第 97 - 102 页。

⑩ 李丹,许丽君:《宁夏文化旅游产业灰色关联度分析》,《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14 - 19 页。

探讨。由于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者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间接近的程度,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更适合实证分析各个影响因素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大小。针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很少,因此有必要展开研究。

二、灰色关联分析法

1982年邓聚龙教授创立了灰色系统理论,这种方法以所研究因素的数据序列为基础,运用数学方法研究他们之间的集合对应关系,所研究因素的序列曲线的变化趋势相似度越高,则两者间的关联度越大。通常,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其中,参考序列反映系统的行为特征,比较序列是对系统的行为产生影响的序列。

第二步:无量纲化。在实际分析时,各个序列的数据可能存在量纲不同,不方便直接进行比较的问题。为了便于比较,需要对数据进无量纲化处理。

在同一序列中,每一个数据分别去除以该序列的首个数据就得到无量纲化序列。对序列数据进行初值化处理之后增长趋势会更加明显。通常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序列大多呈稳定增长趋势,这时便可选择对数据进行初值化处理。

第三步:数据无量纲处理后,分别计算各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差序列。

第四步:求极差。

第五步:计算关联系数。

第六步:求灰色关联度。

最后,对关联度进行比较排序,分析出各比较序列对参照序列的影响程度的强弱。

三、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由于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者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间接近的程度,按发展的趋势来分析,对样本量的大小没有太高要求,分析时也不需要典型的分布规律,而且分析的结果一般与定性分析相吻合,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

(一)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1. 指标选取

在指标选取上,考虑以下几个因素: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众多,在符合旅游经济增长规律的基础上,要求所选指标具有代表性,能正确反映与本文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将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看作一个系统问题,用多个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比性,应考虑所选指标的相关数据在实际是否可以获得,且是否准确。同时也要求选取的指标在含义、统计口径和时空上要统一和具有可比性。

因此,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选择旅游收入、星级饭店数、江苏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收入等指标,研究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旅游收入直接体现旅游经济增长情况,因此本文在模型分析中采取广义口径,用旅游总收入作为旅游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因为旅游饭店数据统计并没有统一的口径,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所以论文选取了星级饭店数来代替旅游饭店数。

将旅游总收入 X_0 作为参考序列,将旅游经济增长的 7 个影响因素作为比较序列。星级饭店数(家) X_1 和旅行社总数(家) X_2 用来反映接待服务设施情况,旅游从业人员数(万人) X_3 用来反映劳动力投入情况,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亿元) X_4 用来反映技术进步情况,游客周转量(亿人 km) X_5 用来反映交通通达性,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X_6 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X_7 用来反映宏观经济因素。

2. 数据来源

本文江苏省 2007—2016 年各项指标数据的时间序列全部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江苏旅游政务网,其中 2013 年和 2016 年旅游业从业人数数据缺失,采用的是插值法求得,具体见表 1。

3. 数据整理

本文选取 2007—2016 年江苏省相关指标的数据进行建模分析,整理后的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7—2016 年旅游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相关指标的数据统计

年份	X ₀	X ₁	X ₂	X ₃	X ₄	X ₅	X ₆	X ₇
2007	2827	850	1582	151273	430	1596	26018	16378
2008	3268	895	1661	158641	585	1766	30982	18680
2009	3796	944	1704	160903	717	1423	34457	20552
2010	4685	902	1857	149820	858	1604	41425	22944
2011	5613	893	1986	140154	1072	1778	49910	26341
2012	6553	890	2117	138288	1288	1950	54058	29677
2013	7195	970	2204	139478	1487	1451	59753	31585
2014	8145	873	2251	196265	1653	1551	65088	34346
2015	9050	791	2336	170637	1801	1566	70116	37173
2016	10264	696	2469	145009	2027	1592	76086	40152

数据来源:2008—2017 年江苏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江苏旅游年度报告。

(二) 建立模型与计算

1. 无量纲化

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2 2007—2016 年旅游增长影响因素相关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结果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X ₀	1.0000	1.1560	1.3428	1.6572	1.9855	2.3180	2.5451	2.8811	3.2013	3.6307
X ₁	1.0000	1.0529	1.1106	1.0612	1.0506	1.0471	1.1412	1.0271	0.9306	0.8188
X ₂	1.0000	1.0499	1.0771	1.1738	1.2554	1.3382	1.3932	1.4229	1.4766	1.5607
X ₃	1.0000	1.0487	1.0637	0.9904	0.9265	0.9142	0.9220	1.2974	1.1280	0.9586
X ₄	1.0000	1.3605	1.6674	1.9953	2.4930	2.9953	3.4581	3.8442	4.1884	4.7140
X ₅	1.0000	1.1065	0.8916	1.0050	1.1140	1.2218	0.9091	0.9718	0.9812	0.9975
X ₆	1.0000	1.1908	1.3244	1.5922	1.9183	2.0777	2.2966	2.5017	2.6949	2.9244
X ₇	1.0000	1.1406	1.2549	1.4009	1.6083	1.8120	1.9285	2.0971	2.2697	2.4516

2. 灰色关联度系数的计算。

第一步,计算差序列(见表 3)。

表 3 2007—2016 年旅游增长影响因素相关指标的差序列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X ₁	0.0000	0.1031	0.2322	0.5961	0.9349	1.2709	1.4039	1.8541	2.2707	2.8119
X ₂	0.0000	0.1061	0.2656	0.4834	0.7301	0.9798	1.1519	1.4583	1.7247	2.0700
X ₃	0.0000	0.1073	0.2791	0.6668	1.0590	1.4038	1.6231	1.5837	2.0733	2.6721
X ₄	0.0000	0.2045	0.3247	0.3381	0.5075	0.6773	0.9130	0.9630	0.9871	1.0832
X ₅	0.0000	0.0495	0.4512	0.6522	0.8715	1.0962	1.6360	1.9093	2.2201	2.6332
X ₆	0.0000	0.0348	0.0184	0.0651	0.0672	0.2403	0.2485	0.3795	0.5064	0.7063
X ₇	0.0000	0.0154	0.0879	0.2563	0.3772	0.5060	0.6166	0.7841	0.9316	1.1791

第二步,计算极差。

极差最大值:2.8119,极差最小值:0.0000

第三步,求关联度系数。计算结果见表 4。

表 4 2007—2016 年旅游增长影响因素相关指标的关联度系数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X_1	1.0000	0.9317	0.8583	0.7023	0.6006	0.5252	0.5004	0.4313	0.3824	0.3333
X_2	1.0000	0.9299	0.8411	0.7441	0.6582	0.5893	0.5497	0.4909	0.4491	0.4045
X_3	1.0000	0.9291	0.8344	0.6783	0.5704	0.5004	0.4642	0.4703	0.4041	0.3448
X_4	1.0000	0.8730	0.8124	0.8061	0.7348	0.6749	0.6063	0.5935	0.5875	0.5648
X_5	1.0000	0.9660	0.7571	0.6831	0.6173	0.5619	0.4622	0.4241	0.3877	0.3481
X_6	1.0000	0.9758	0.9871	0.9558	0.9544	0.8540	0.8498	0.7875	0.7352	0.6656
X_7	1.0000	0.9891	0.9412	0.8458	0.7885	0.7353	0.6951	0.6420	0.6015	0.5439

3.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

由计算结果可得关联度矩阵:

$$R = [0.6265 \ 0.6657 \ 0.6196 \ 0.7253 \ 0.6207 \ 0.8765 \ 0.7782]^T$$

4. 灰色关联度排序

由上面得出的关联度矩阵可以看出,所选取的 7 个指标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排名为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旅行社总数>星级饭店数>游客周转量>旅游业从业人员数。

(三) 影响因素综合分析

通过对关联度的计算及关联状态分析,所得灰色关联度值均大于 0.5,表明论文中所选取的 7 个影响因素的指标用于分析研究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具有相对科学性和合理性。

1. 宏观经济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两个指标来分析宏观经济环境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地区生产总值关联度最高,为 0.8765。2003 年江苏省 GDP 为 26018 亿元,到 2017 年江苏省 GDP 高达 76086 亿元,名义上增长了 1.92 倍。2018 年江苏省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2595.4 亿元,与广东省一同率先迈入“9 万亿元人民币俱乐部”,江苏省 GDP 全国第二。2018 年中国大陆城市 GDP 百强榜单显示,江苏省苏州市排名第 7,南京市排名第 11,无锡排名第 14,南通排名第 20,常州排名第 29,徐州排名第 33,其余 7 个城市全部进入 100 名之内。江苏省 2018 年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了 11.5 万元,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人均 GDP 突破 10 万元的省份。江苏旅游业年度报告披露,江苏省 2017 年度旅游业总收入 11662.18 亿元,旅游业增加值 5195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 6.0%,占比逐年上升。可见地区生产总值与旅游经济增长关联非常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灰色关联度为 0.7782,排在第二位。2018 年度江苏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096 元,增长 8.8%。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居民出游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居民出游人数多少受可支配收入影响较大。2017 年度江苏省接待国内游客 7.43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9.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1307.51 亿元,同比增长 13.6%。因此,江苏省必须着重关注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没有强大的宏观经济作支撑,很难发展旅游经济。

2. 技术进步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析结果显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和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为 0.7253,排在第三位,这说明江苏省旅游经济的增长受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技术进步是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很大。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这种驱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所以接下来旅游业的发展应该持续增加科学技术的应用,推动旅游业的服务创新。江苏一贯重视开展客情舆情监测工作,推进智慧旅游建设,增加了游客互联网线上行为分析和银联消费数据分析,推进 3A 级以上景区数据对接工作,推动自媒体平台建设。可见,技术进步有利于增强其与旅游经济增长关联度。

3. 接待服务设施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星级饭店数、旅行社总数与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分别为 0.6265、0.6657,排在第五位、第四位,由此可知,星级饭店数、旅行社数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相对较小。截至 2017 年底,全省旅游星级饭店数为 649 家,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和二星级分别为 86 家、162 家、311 家和 90 家。随着休闲度假新需求的兴起,星级饭店面临设备设施改造和转型发展难题,部分星级酒店不能达到旅游度假饭店评选标准,功能服务

不够完善。江苏省旅行社和星级饭店数量众多,结构不合理,信息化水平不高,布局上较为分散,传统管理方式难以满足信息化、网络化需要。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者呈现出更显著的个性化需求,现有旅行社和星级饭店无法完全满足旅游者的实际需要。而住宿在旅游收入中占 17.5%,餐饮占比 17.3%,而购物占比 24.3%,餐饮加住宿之和超过购物消费占比,可见星级饭店等接待服务设施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如果进一步完善接待服务设施,将会进一步增强其对旅游经济增长关联度。

4. 交通通达性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旅游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中,交通通达性是影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管是在到达旅游的目的地之前还是在到达旅游目的地之后,便利的交通条件都是旅游可进入性的先决条件。交通通达性是指到达一地方的容易程度,它可以用空间距离、旅行时间、旅途距离或运输费用等来衡量,本文用游客周转量来衡量交通便利条件,旅客周转量越大,表明交通通达性就越好。从统计数据来看,长途交通在人均花费构成上占比 13.5%,市内交通只占 1.6%。

游客周转量与旅游总收入的灰色关联度为 0.6207,排在第六位,这说明江苏省旅游总收入与交通通达性的关联较大,但在所选择的 7 个影响因素中相对较小,证实了旅游交通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江苏省交通网络已经相对完善,但旅游活动的特性决定了其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需求,加速实现“时空压缩”的交通运输业十分必要,所以江苏省仍然需要进一步增强市内旅游交通的通达性。尽管城市间飞机、高铁或动车等交通便利通达性好,但是由于城市内拥堵导致游客很多时间浪费在路上,导致游客在旅游景区游玩时间减少,也会减少游客游览景区数量。建议开辟旅游专用交通线路,解决市内交通拥堵问题,可以进一步增加景区游客周转量,体现更好交通通达性,进而影响其与旅游经济增长关联性。

5. 劳动力投入对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显示,旅游业从业人员数与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是 0.6196,排第七位,关联度最小,这反映出目前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与促进旅游经济的增长的关联不大,说明江苏省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水平有待提高,需要将旅游产业从业人员转化为智力密集型人才。只有提高专业人才素质,提倡科技成果转化,才能进一步提高旅游业从业人员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随着乡村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游、康养旅游等旅游新业态发展,旅游业从业人员面临转型发展,即不断增强自身知识技能,满足新兴旅游市场发展要求,加强导游资格考试和高级导游考试,完善行业网络培训课程,推进“金牌导游”培养项目。事实上,局部地区旅游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和旅游行业培训不能跟上旅游经济增长发展需要。

四、对策建议

(一)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推进区域旅游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与旅游经济的关联度最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第二,说明了江苏省旅游经济增长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密切。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还被誉为最具潜力的“朝阳产业”。旅游业涉及“食、住、行、游、购、娱”六大消费领域,在释放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发展等方面优势明显,完全符合新常态下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和特征。加快发展旅游业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

所以,江苏省要想加快旅游业的发展,就必须摆正江苏省地区经济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占据的位置,不断推进地区经济发展以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首先,地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地区各项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的完善,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其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就越多。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生理和安全需求解决之后,人们就会进一步产生精神文化的需求,而旅游作为高级的精神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的选择。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为居民外出旅游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最后,通过地区经济增长极大地促进旅游投资、旅游出口等,为区域旅游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二)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激励旅游业技术创新与进步

旅游科技创新是旅游业领域内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是指旅游业应用和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中,技术创新的使用已经渗透到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不但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还能改变供需结构,创造了看得见的收益。我们认为,技术创新与进步在旅游市场竞争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抓住

技术创新的契机,就有可能成为旅游市场的赢家。因此,必须重视技术创新在当前的旅游市场中的重要作用。

旅游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抓住市场机遇,加大旅游科技投入,以信息科技为重点突破,将最新的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到旅游服务中,重点开发旅游创意产品,迎合旅游者猎奇心理,满足个性化旅游需求,从而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提升旅游业整体科技水平。例如饭店业的锦江集团管理模式;电子商务领域的去哪儿网、淘宝旅行网,集飞机票、火车票、景区门票、餐饮住宿预订为一体;共和航空公司合作的中青旅和上海春秋的网络拓展整合模式等,都是利用信息技术为旅游产业集聚创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三) 完善旅游企业接待服务设施,加强企业协作

作为直接为旅游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企业,其经营水平、规模、服务质量水平都影响着旅游者对当地旅游业的评价。其中旅行社和旅游饭店是最基本的旅游接待服务设施。现阶段江苏省星级饭店和旅行社的发展大都以中小企业为主,没有形成行业一体化,服务一体化。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有各自的发展优势,在发展策略上应各有侧重。例如扶持培育旅游龙头企业,走科学管理、网络化发展的经营道路,鼓励企业综合品牌的建立,积极推介知名品牌,提升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培育本土龙头企业的同时,引进和培育外来的带动性强的大企业和大品牌,使其尽快适应本土环境,充分融入到江苏旅游产业的建设中。

旅游企业集团有着强大的聚合力和规模优势,因此,应加快江苏省旅游企业的集团化发展,促进不同旅游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形成以股份公司为主体,集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产品供给、旅游服务为一体的集团化发展体系。鼓励发展潜力大的旅游企业发行股票,上市融资,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动力。

(四) 加强交通设施建设,继续完善市内交通网络

作为旅游业三大支柱之一的旅游交通,是旅游者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先决条件。旅游交通的便利程度,不仅对旅游资源的开发产生影响,还影响着旅游者的旅游质量和旅游体验。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江苏省应该坚持统筹规划,继续完善整体大交通网络体系。从公路、铁路和航空三种路线一齐着手,健全高速公路旅游交通网,加快高速铁路网建设,积极发展民用航空,引导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布局相结合,为境外和境内游客来江苏旅游提供更加便捷的旅游通道与更加舒适的交通服务。健全景区内交通路线规划,景区内加大对扫码公共自行车的投放规模和投放数量,打破景点交通“最后一公里”的限制,增强景区的可进入性,构建“快进-慢游”交通网络。

(五) 重视旅游人力资源开发,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

现代旅游业竞争中旅游人才的竞争不可忽视,旅游人才是旅游发展的智力支撑,必须重视旅游人力资源的开发。首先要注重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例如江苏省旅游资源丰富,特别注重人文资源的开发,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对旅游人才的文化素质要求较高。但很多企业为了节省开支,在旅游从业人员招聘时往往选择了聘用工资要求低,服务水平低的人员,这就降低了江苏省整体的旅游专业队伍的素质水平。未来应该进一步推进全省旅游行业培训,改善办学模式,举办旅游饭店管理人员培训班、中高级旅游管理人才培训班、旅游风情小镇培训班、智慧旅游培训班等,组建旅游专家咨询服务团等,促进旅游从业人员知识更新换代才能满足现代旅游业发展需求。其次要重视旅游后备人力资源的开发。当今的旅游业需要创意和创新,应该由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产业过渡,这就要求江苏省要不断加强旅游后备人力资源的开发。政府要大力开发旅游教育新机制,加大教育的投入,发挥社会各类旅游院校和培训机构在江苏省旅游人才的培养方面的主力作用,科学合理地进行旅游后备人员的开发和建设。构建旅游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组建更多旅游职业学院,申报旅游类职业院校示范专业点,打造国家全域旅游人才培养基地。

(责任编辑:叶 玲)

实践与创新: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转型取向

熊忠辉

(南京晓庄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要:以信息化智能化为表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得社会化生产中的众多行业出现跨界融合的趋势,并重构着“网络社会结构”,从而促使新闻传播业态向更加广义的信息文化传播服务业态转型。社会化生产的这些变化要求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优化类型结构,培养人才的创新思维和实践应用能力,以更好地为国家战略和社会多元需求服务。为此,新闻传播本科教育需要大力培养全媒化复合型人才,要采取更加健康而开放的机制,推进“实践育人、协同育人、平台育人”的建设步伐。

关键词:跨界融合;创新思维;平台+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107-05

2018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简称“新时代高教40条”),对加强本科教育提出了系统指导意见,着力要求“高等教育要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文件特别指出,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和行业创新发展,新闻传播学科更应深化协同育人机制,深化宣传部门与高校共建。

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投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要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各类人才,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突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培养更多创新人才、高素质人才。这个讲话立足时代大背景,为本科教育改革提供了指针。

具体到新闻传播本科教育,应该进行哪些变革?今天,我们只有力图站在时代发展的全局和历史来审视这个话题,才有可能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新闻传播这“一域”的具体,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更加全面深入理解新闻传播本科教育变革的几个根本问题。

一、跨界、融合:新闻传播环境的新变化新发展

从全世界的发展角度来看,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①正潮涌而来。以信息和数据的生产、供应、管理等服务为纽带,人工智能芯片、深度学习、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被应用到各行各业,并通过知识、技术创新、产品、市场、模式、平台乃至生态等方面的创新,促使互联网产业化、产业企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互联网和智能化给行业间深度融合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原来行业间的清晰边界正在逐渐消失,以技术应用和模式转型为表征的“跨界、融合”几成共识,“专业、深度、共享、利他”的新业态正在逐步形成。

收稿日期:2019-05-22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京晓庄学院高层次培育项目“融合媒体内容生产创新研究”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熊忠辉,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特聘院长,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媒介发展。

^① 2013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推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这种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量信息技术等技术为突破口的工业革命,是对人类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的新发展,继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全面实现人工智能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一起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参见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彼得·马什:《新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1. 跨界、融合、竞合成为社会化生产的常态

深度融合不仅带来相关应用技术的行业内部空间联系的优化重组,也改变着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外部联系。任何一个时代的行业结构都是一定需求结构、技术水平和资源结构的综合反映,并在这些因素变动的影响下不断演变。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各个行业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供应以及把产品或服务带入市场的行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跨界和融合。

为顺应这种变化趋势,诸多生产性机构在内部率先变革,打破传统组织架构,打造“平台+个人模式”,以用户体验为核心,致力于为用户提供透明、高效、公开的信息化、智能化系统。几乎所有的技术开发与应用,都以用户体验为核心,这种体验不是传统工业时代那种基于人的原生需求而生产的,新的技术通过创新驱动,开发出新的需求、新的体验,引领人与社会产生新的发展动力、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改变着社会运行的结构。

换言之,这种信息化、智能化的工业化无疑是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重要推进元素,其作用表现为“引发、重塑、颠覆、重构、改变”^①。第四次智能化工业革命将改变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重塑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竞争力的位置,这种重塑将颠覆很多传统的产业形态、生产或组织方式,进而重构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更有甚者,新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将出现。

在这场工业革命中,一切社会化生产包括新闻资讯文化娱乐的生产,传统时代那种形态和领域鲜明分立的局面都将被打破,一个“跨界、融合、竞合”的生产方式正在凸显出来。

2. 新闻传播正在重组、重构“社会结构”

对于新闻传播行业来说,原来价值链一体化、全产业链或产业链较长的业态、生产组织面临变革,需要主动打破原有价值链一体化经营模式,将产业链或价值链的纵向或横向的某个环节甚至全部环节进行分化独立,推进新业态、新生产组织的创新、转型升级。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复合应用所产生的智媒体,通过智能化工具对新闻“策、写、编、发”全流程的渗透,正在构建起一个用户与信息智能化匹配连接的媒体生态系统。这样的“策、写、编、发”业务,已经迥异于媒介形态分立时代的具体方式和做法。几乎一切社会组织,无论是生产性企业、流通性商业、服务性行业,还是大大小小的治理型政府机构、智囊辅助型科研院所,其信息的生发、发布和交流,无不借助于当前流行的各种传播工具。

尤其重要的是,以网络等新传播技术创新应用为发展驱动元素,一个“结社基础上的组织化社会”——网络社会已经显形,它跨越现实世界的区隔,将旨趣相同的人们聚合起来,形成线上线下的社区或社群,重塑着“社区住民”的信息消费全过程的习惯和方式,并进而改造他们的价值观念。

对基于行政和地理区划而流行的21世纪前后的传统报纸、电视来说,这个变化所生发出的“融合”进程,恰好体现了受众层面历史性地形成的“超流动性”——一个网络化结构下社会信息传播交流的新状态。因此,“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②。正是理解这一点,“学习小组”“侠客岛”“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一批中央级新媒体,以人民为中心,下功夫研究受众需求和兴趣,以终端导向上游、由需求导向供给,结合传统媒体和网络的多重优势,探索新时代的传播路径。

3. 新闻传播正在成为“百姓日用之道”

明代王守仁与“泰州学派”王艮曾经提出过“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意思是老百姓需要的、贴近人民的,才能称为儒家的圣人之道。虽然他们的思想是为当时的封建王朝服务的,但也说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国家、社会等领域发展所产生的新事物新理论,不能高高在上脱离群众,那些受到广大群众喜欢的实践和应用,就是充满生命力的“道”,能够有利于社会和国家治理。

就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所诞生的计算机、数字、信息和智能等高端技术来说,它们在新闻传播类行业中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日益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新闻传播不再仅仅是党的“喉舌”“舆论工具”,也是党“服务”人民和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从行业层面看,传统的新闻传播服务逐渐渗

^① 吴岩:《新闻传播教育要把握三大趋势》,人民网传媒频道2018年11月10日,<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1110/c14677-30392689.html>.

^② 习近平视察解放军报社讲话时强调,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思想舆论支持。2015年12月27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7981000>.

透到各类信息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各个层面和环节,信息文化生产方式变革几乎理所当然,并且成为包含传统新闻传播在内的泛文化——我们姑且称之为“新新闻传播”发展的重要引擎和不竭动力。

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催生了文化体验和文化消费的革新。移动互联网强势构建了用户的虚拟生活空间,智能化等新技术的媒体化应用制造的沉浸式传播,促使内容创作不断制造新的阅读和视听体验,这些阅读和视听除了对传统媒介的消费进行延伸外,甚至紧密地与日常生活关联在一起,成为社会消费行为的有效组成部分。

行业边界融合、社会结构网络化、新新闻传播日用化,这三大发展形势可谓日新月异。然而迄今为止,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仍然保留了传统大文科的做法以及依据传统媒介形态设立的专业和课程。这种区隔鲜明的专业课程和学科设置,在新闻传播业态处于重组并且保持动态持续状态的情形下,其相对静态的内容教学、实践方式,都毫无意外地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甚至不可逆的滞后性。由此,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转型,需要升级,需要调整教学和实践的内容、形式乃至思维方式。

二、创新思维: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情形新趋势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指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变化的辩证道路,其核心词是“创新”,“创新”是灵魂,目标是引领高等教育增强“综合能力、实践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服务创新发展能力”,方法包括“增强综合素质、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以教学为中心”等。这段话也反映出,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交往的方式和形态的不断变化,无论是世界高等教育还是中国高等教育,其地位作用、类型结构、表现形态都在发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1. 高等教育从服务国家战略向国家、社会多元需求变化

前文提及,历史性地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变化主要由“技术逻辑、商业逻辑和社会逻辑共同决定”,也可以说是技术、需求和结构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在以往传统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社会需求一般是主导因素,技术则是为服务于需求而投入应用,当这一技术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之后,商业资本或社会资本开始持续注入并获得收益,使新的社会生产和交往形态走向规模化并最终与社会结构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而社会需求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国家发展战略指导产生的。

在这样的阶段,高等教育整体上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表现为体系分明的知识传授、相对严格的社会应用计划。传统划分的理工农商医、人文社会等几大学科群,在社会应用中都存在比较紧密的对应领域,其知识体系多是在社会应用基础上总结、传承、发展这样循环出来的,相对泾渭分明。

各国都把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发展平台的基础,是为国家战略发展直接服务的。特别是中国,自恢复高考以来,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最直接表现就是高校招生就业的计划性和强制性。换句话说,高等教育是在国家战略部署之下运行的。但现在全世界正在形成一个共识,高等教育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地位、作用发生了变化,高等教育日益成为国家发展中的引领动力,甚至发挥着火车头的作用。高等教育从国家战略的下游开始走到上游,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大红利。此外,在国家战略之外,社会、企业乃至个体作为发展主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强。

2. 信息化智能化要求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信息化、智能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则与以往不同,它遵从的是以技术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即“技术带动需求、带动结构变化”。比如,数字化、大数据、区块链、VR/AR等关键技术,以及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算法推荐和个性化内容分发,都是由新兴技术直接与商业资本相结合推动发展起来的,在工业信息化、商业金融、智慧城市、通信交往、资讯娱乐、社会治理、教育教学等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日益被广泛而深入应用。

换句话说,信息化、智能化逻辑正在推动原来“总体性”国家战略向国家、社会、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需求转型,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形态。但“现在有哪些新的产业形态源自大学?很多颠覆性技术也并非出自大学”^①,这种发展变化对原来那种体系分立和知识传授型的高等教育提出了调适性要求。这些领域的发展

^① 林露:《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教育如何应对挑战?》,中国青年网2019年1月14日, <http://edu.people.com.cn/n1/2019/0114/c1006-30525075.html>.

需要新的产业形态、新的组织方式。

随着国家、社会等多元主体对高等教育不同需求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全世界的高等教育总体上由精英化进入了大众化、普及化发展阶段。需要警惕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等教育精英化思维,可能会限制中国高等教育顺利进入到普及化阶段。多样化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和转型必须注意的战略大事,很多按照传统行业设置的学科专业,需要加大研究转型发展的方法方式。

3. 创新促进高等教育学校类型结构的优化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相对静态固有的知识讲授虽然还有其必要性,但企业、产业、行业和工业等领域产生和形成的新形态却是变动不居的。因此,高等教育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打造一个创新的教育教学体系 and 实践应用体系,着力培养具有创新思维的新型人才,能够为随时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提供快速灵活的解决方案,这才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技术驱动、多样化需求以及新型的社会结构,对高等学校的类型结构提出了变化要求。高等学校将不再只是北大、清华这种综合性、研究性类型的学校,实践型、应用型大学等多种类型将并存发展。多元类型结构对同一个学科和专业的评价标准将不再一样,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也会存在差异,需要根据学校的实际定位进行设计,达成人才培养目标的质量保证,评估体系等也需要调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推进,中国高等学校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站位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国家战略所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指针。

三、复合、开放、动态:新闻传播本科教育发展的趋势

在新闻传播发展变化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之下,新闻传播本科教育也面临着几个变化,可以用“复合、开放、动态”这几个词语来概括,这是信息化、智能化的本质特征带来的。复合主要指教育教学改革想要达成的目标,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人才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开放主要指办学思路或理念,就是应该怎么办,应该采取哪些不同于传统办学的思路、机制;动态主要指办学的方式方法,是怎样培养人,通过哪些比较具体的措施来执行。

1. 素质要求从传统条块型向全媒化复合型转变

信息化、智能化不仅从硬件上改变了新闻传播的传受端的工作方式,更重要的是通过新的方式把新闻传播普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全媒体、智媒体这样的“融合”新形态,从而改变了传统条块分割的业务模式,提出了复合型业务素质的要求。教育部推行“六卓越一拔尖教育培养计划2.0”,其中的“卓越新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就是聚焦全媒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腾讯企鹅智库2018年对全国19个城市约50多家媒体进行了实地调研,出具了《2019年政务与中小微企业新媒体需求报告》,资料显示,中国媒体融合实践以融媒体中心(或者“中央厨房”)和“N微N端”为标配,以“新闻+政务+服务”的云平台建设为契机,以新闻策、采、编、发全流程再造为核心,以媒体内部考评奖惩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跨越了从起步变为起跑、从势能转化成动能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新闻+政务+服务”的模式,成为党媒融合的主要通道,这种应用已经正在覆盖从中央级媒体到街道资讯发布平台的各级党和政府的治理组织。

此外,报告指出中小企业也是新新闻传播的一大需求主体,它们的需求主要包括:企业文化场景、新媒体场景、线下活动场景、企业办公场景、产品适用场景等设计。其中,新媒体场景主要包含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快手)、微博、QQ空间、H5等内容。

大致可以说,政务型媒体和中小企业的需求,要求当前新闻传播本科人才培养效果向市场和应用靠拢,要求新闻传播本科教育超越传统的“业务能手”培养方式,需要更多关注“策略专家、执行能手、全案专家”的培养。检验新闻传播本科教育好坏的标准,从宏观层面说,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发好中国声音、体现中国特色;从具体层面说,就是要让有人才需求的主体使用满意。在这个现代传媒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具有更为宽泛的意义,需要适应多元服务功能(如社会监测功能、娱乐功能、信息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这些复合型素质的培养,对当前的新闻传播本科教育提出了变革要求。

2. 从闭门办学向开放办学、协同办学转型

从2014年开始,我国媒体全行业进入大转型、大融合、大发展的新阶段。2017—2018年,堪称媒体融合由相“加”迈向相“融”的转折点,由单体融合、各自融合迈向区域融合、整体融合的关键点,由企业云建设迈向媒体云建设的新起点。媒体融合已由形式融合、内容融合升级至以体制机制融合为主要特征的融合3.0时代。

这种以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开发与应用为表征的融合,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发展过程,原有相对静态的知识体系与办学方式不能适应变化。换言之,教育教学要想尽可能紧跟时代变化,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加强与实践前沿的组织进行对接和合作。因此,高等学校不应该是一个自治运行的封闭系统,而应是一个开放性的教育教学平台,是一个建立良好的流动性协作机制的平台,通过协同育人、平台育人最终实现实践育人。高等学校更像是流动型、平台型、网络型的运作组织,需要牢固树立产教融合、政校合作、媒校共建等协作办学的思路,在常规的教学教育之外,建立健全开放办学、协同办学的运作机制。

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简称“新时代高教40条”)指出,健全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实践育人平台建设,是增强本科教育实践应用能力建设的关键点。文件要求高校应该加强与社会用人单位合作,综合运用校内外资源,大力推动与行业部门、企业共同建设实践教育基地,推动社会优质教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内容,构建功能集约、资源共享、开放充分、运作高效的实验教学平台,健全合作共赢、开放共享的实践育人机制。这些精神可谓把正了时代发展和需求之脉。

具体到新闻传播本科教育领域,就是要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和增强实践应用能力的战略,立足多种媒介内容生产制作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目标,提升服务社会文化经济的能力,增强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实践化、应用化,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此,新闻传播本科教育应该围绕“课堂教学+实践创新+协同合作+成果转化”教育教学体系建设,探索“实践育人、协同育人、平台育人”的“平台+”多维育人机制。

3. 从知识传授向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转型

美国大学比较流行的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教育模式,以学生的应用能力培养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构建教育教学的“产出”体系,包括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社会合作、成果孵化。英国大学推行类似于BOE(Business Over Education)的教育教学,新闻传播类专业更加重视“市场应用”,以这个终端反过来引导教育教学,构建的是“市场”标准,许多大学教学采取的是校企合作的开放式教学,教师与学生组成项目组直接承担企业的产品或项目生产任务,同时引进各类孵化器对学生的创意进行孵化培育,突出“在做中学”的知行合一理念。国内只有深圳大学等少部分新闻传播院系比较注重推行“实践是检验教学的主要标准”,在学生实践、毕业设计等方面形成较为完整的做法。

这种教育教学方式方法谋求的是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动态培养,需要通过多种手段“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①。在我国新闻传播及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能力的理解不同。大致说,中国新闻传播经历了“作品—产品—商品”这样一个演变过程。20世纪80、90年代中期的纸媒时代,新闻传播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以“作品+采写”为导向,院校的新闻专业教育呈现出浓厚的人文精英气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电视媒体,电视新闻资讯栏目或者大专题,就超越了相对单一的采写编评的业务环节,更像是众多工种围绕一个核心生产的产品。特别是综艺娱乐类节目,工种的复杂性、综合性和工业化日益鲜明。这个阶段,新闻传播本科教育在多种应用能力的培养质量上开始整体走低。21世纪初至今的网络型智能化媒体发展时期,数字、卫星通信、网络等技术进入图文视音频生产领域,新兴媒体、跨界企业、大公司等以活的技术、活的劳动力和资本为主要配置资源,日益实现超流动,传统媒体的独立性、专业性渐渐被富有连接力的新型公司所取代,传播关系和社会结构重组,传播的消费性、商品性(本文主要指自愿进行交换或购买的行为)日益明显,对消费者的价值需求和行为日益重视。这个阶段,面对全媒化复合型的实践应用创新综合能力的人才培养要求,传统、狭义的新闻传播本科教育整体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不适症。

可以说,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大情怀,到为中小企业代言的现实需求,再到个人自媒体宣推等具体行为,其检验效果无不与市场终端和社会应用直接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是检验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对:刘倩)

^① 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传媒频道,<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21094/>。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实践的“变”与“不变”

——兼谈新闻教育的坚守与变革

蔡之国,张盼盼

(扬州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媒介技术的变革促进了媒介形态的变化和传播方式的更迭,而当下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的交叉叠加冲击,在促发媒介裂变式发展的同时,也使媒体走向融合发展。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实践表现出传播媒介形态、传播主体、信息生产模式及信息呈现样态等“新变”的同时,也呈现出对新闻概念意涵、“内容为王”、新闻专业主义、新闻采访及写作的逻辑等“不变”的坚守,而对“变”与“不变”的规则探寻,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新闻生产实践及新闻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生产实践;“变”与“不变”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112-05

媒介发展史表明,媒介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媒介形态的变化和传播方式的更迭,并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下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等诸多新技术在同一时间的交叉叠加冲击,聚变成强大的媒介变革力量,使当代社会迅速进入传统媒体与多样姿态的新媒体裂变式汇聚或者融合发展的时代,实现着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预想的人类社会生活结构的存在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①。“通过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传播系统,我们将看到新媒介并不是自发地和独立地产生的——他们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渐产生。当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它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②在“过去未去,未来已来”的媒介裂变或融合发展时代,新闻由于能够满足人们对于外界的认知需要而依然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技术的变革而有所降低,正如米切尔·史蒂芬斯在《新闻的历史》中所写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中,人类交换着相似的新闻。不过,在媒介形态聚变、资讯环境愈益复杂的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实践也与时俱进地进行着演进。因此,有必要从“自其变者”和“自其不变者”两个方面去考察新闻生产实践,从而归结出新闻生产实践坚守和演化的规则,以进一步促进我国新闻生产实践及新闻教育的发展。

一、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实践之“变”

“媒介技术和形态的变化,改变并决定着知识的生产者、拥有者,同时也决定着知识的形态以及传播方式。”^③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不但变革着新闻媒介传播的质态,还对新闻传播主体、新闻生产的流程及传播媒介承载的新闻信息等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使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实践较过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

收稿日期:2019-05-21

作者简介:蔡之国,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电视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张盼盼,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研究。

① 尼葛洛庞帝著,胡泳等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② 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③ 陈汝东:《加强认知传播学研究,促进数媒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创新》,载林克勤、严功军主编:《认知传播学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1. 新闻媒介形态之“变”

媒介发展史,也是权力再分配、再赋予的历史。从口语的人际传播到纸质、电子的大众传播再到当下的数字化交互传播,媒介发展变迁都指向了权力的分散和重新赋权。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等的发展催生了新媒体,它不但改变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还以其特有的媒介属性显现出新媒体的力量。罗伯特·洛根曾指出:“互联网使人人获得平等的机会去获取全世界的公开信息。”^①事实并不仅仅如此,新媒体在重新配置人类共享信息权力的同时,还赋予了更为自由、较为平等的传播权力。可以说,数字、网络及通信技术等支撑着的网站新闻、BBS、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移动媒体等诸多媒介新形态,一方面以其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多媒体性、超文本化等媒介特征使媒介受众自由地阅读、转载分享海量性、多媒体化的信息来源,另一方面还借助交互性的自媒体自由、平等地生产、传播新闻信息和表达个人意见,从而在“网民”自由阅读、自由转发、自由表达中实现着新闻信息的增值或增殖。可以说,源于媒介技术变革的网络媒介形态的新变化,在分散权力和赋予权力中不但促使新闻业经历着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还以其产生的巨大能量对社会结构特别是政治结构施加深刻的影响。于是,在自媒体日渐繁盛的同时,加速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汇聚与融合(如中央厨房),强化媒介技术的利用与开发,努力构建具有传播力、影响力的新媒体及媒介融合通道,成为媒介组织努力和发展的方向。

2. 新闻生产主体之“变”

在传统媒介生产环境下,虽然受众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新闻的生产,但无论是规模还是程度都极为有限,新闻生产更多地表现为媒介组织、职业记者的专业化行为。在新媒体生产环境下,不仅媒介组织、职业记者更为强调“用户”思维,并从用户角度进行新闻生产,而且社交媒体的发展在使信息实现双向互动传播的同时还让“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皆可为新闻生产者”成为现实。于是,契诃夫的名言——大狗和小狗都有权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已然成为现实存在,这也使得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实践主体的身份角色日渐多元,新闻内容的类型结构更为多样。虽然说当下的新闻生产实践依然是专业媒介组织和职业记者占居主导地位,但新闻的选择、信息的加工制作及传播已不再是媒介组织的专利,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生产和传播的意愿,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认知意愿和情感倾向选择新闻、建构新闻、传播新闻。事实上,很多重要新闻如东南亚海啸、伦敦地铁爆炸等都是由网民率先报道并引发轰动效应的,这也直接促生了公民新闻的崛起。不仅如此,网民还会借助网络留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对媒介组织传播的新闻进行或纠偏或丰富补充或延伸叙述等另样的新闻“书写”实践,从而影响着受众,改变着社会。由此,媒介组织、社会公众成为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的主体,而“人人皆可成为报道者”的媒介奇观更是让美国学者罗森(Jay Rosen)发出夸张式的赞叹:“公民新闻传播的时代已经到来,传统的大众传媒将被公民新闻所取代。”^②

3. 新闻生产模式之“变”

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模式表现出专业化生产与个人化书写两种模式并存的特征。对专业化生产模式而言,媒介组织需要适应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从“受众在哪儿媒介就在哪儿”以及提高信息采集、传播效能的逻辑思维出发,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进行生产流程的再造,通过前期记者多媒体信息采集、采集后的新闻素材进行“中央厨房式”管理、不同媒体形态的编辑根据各自媒介受众的喜爱及反馈意见对“中央厨房”里的“素材”进行新闻选择和多媒体式讲述、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多平台传播,从而建构起“一次采集、多重加工、多平台发布”的多元互动、协同分享的集约化生产、传播模式,在延伸新闻报道广度的同时,还借助用户意见调整新闻结构和形式,实现媒介产业链的延伸。对个人化新闻生产模式而言,“用户生产内容”的公民新闻虽然还受技术、法律、政策等的制约,但较媒介组织的专业化生产而言,可以更为自由地进行各类新闻的即时书写,并在“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聚效应下,生产着海量化的新闻,满足着社会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专业化媒介组织还注意吸纳“用户生产内容”的公民新闻,如BBC新闻网站首页中设立“Have Your Say”(听你说),CNN新闻网站中建构“I Report”(我来报道)子栏目,从而使专业化生产模式与个人化书写模式表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向。

^① 罗伯特·洛根著,何道宽译:《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② Leonard Witt, “Is Public Journalist Morphing into Public’s Journalist?”, *National Civic Review*, 3, 2004, p. 55.

4. 新闻信息样态之“变”

媒介技术变革引发传播主体的多元性,在使新媒体新闻表现出真伪难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同时,新闻信息的存在样态也表现出新变的特征。伯克利新闻学研究生院院长内尔·亨利(Neil Henry)曾说:“数字时代正使得美国新闻界经历挖去内脏的痛苦,新闻内容和传统的新闻写作标准遭到破坏。”^①我们知道,新闻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其叙事的三个方面——故事(内容)、叙述与话语^②,在数字化时代也因受众主体地位获得前所未有的彰显而表现出“新变”的姿态:在叙事内容上,“使用与满足”理论再次得到强调,于是,关注受众自身利益及关注外界变化的负熵需求的恒久性成为新媒体争夺流量的建构内容;在叙述上,在更为强调新闻标题吸引力书写的同时还从受众角度出发进行新闻主体叙述方式的有效建构成为媒介信息叙述的法则;在话语上,注重运用受众接受的语言,在借助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语言融合使表达更为形象的同时,还强调VR、AR、无人机、H5等新技术语言的应用。事实上,不仅新媒体较传统媒体在叙事上有所变化,而且不同形态的新媒体也表现出叙事的差异性,这都对传统媒体时代现存的新闻样态提出了挑战,以往被戏谑的“我想活在新闻联播里”的新闻报道类型、大行其道的领导讲话及出行新闻、带有强烈主观性和非平衡性的报道等,将在媒介融合语境中得以解构,而从公民意识形态出发进行报道的新闻将会被强化,并成为获取新闻流量、塑造媒介品牌的关键所在。

二、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实践之“不变”

尽管媒介技术变革催生了新闻生产实践的“新变”,但作为能够减少人们对外界认知不确定性的新闻,则又在生产实践中表现出“不变”的规则,甚至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乱花迷人眼”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更表现出对“不变”的吁求。

1. 新闻的概念意涵“不变”

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似乎裹挟着人们走向了“技术为王”“媒介为王”的新闻发展道路,很少有人停下来对新闻传播原点进行反刍式的思考:到底什么是新闻?事实上,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化,新闻的本意就是新近发生的能够满足读者兴趣的事实的报道。无论是徐宝璜先生的“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的概念阐释,还是范长江先生的“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的概念界定,以及徐铸成的“为群众所关心的,对群众有重大影响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就是新闻”的含义理解等,都是从受众角度出发来把握新闻的含义:愈是关注人数多、影响程度深的事实,愈具有报道价值。从此角度出发,传统的新闻界定与当下新媒体强调的流量思维以及用户思维是一致的,甚至说,新媒体表现出来的新闻理念只不过是新闻理念的回归而已。事实上,传统媒体强调的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变动性、时效性、利益性、人性化等新闻评价标准,以及考核方法如发行量、收视率等,与新媒体对点击量、热度、流量等的强调是一致的,都是从受众接受角度进行的考核与强调,只不过传统媒体的衡量较为模糊,而新媒体的考核则相对统计准确而已。因此,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迁,从受众角度进行新闻概念及意涵的把握,是一以贯之的标准,尽管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发生过偏向,但在新媒体生产实践中已经拨乱反正,逐渐重新回归到新闻的本质内涵上来。

2. “内容为王”的理念“不变”

在新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形势下,似乎以往传媒人信奉的“内容为王”的理念逐渐被“渠道为王”、技术占先的观念所动摇,甚至很多专家学者提出“媒介在信息传播中具有第一位的意义”的观点。诚然,媒介技术的变革,使传统媒体流失的优势受众转向了新媒体,甚至一些传统媒介如纸媒等因受众流失过快而举步维艰甚或走向“死亡”,但没有优质的内容作为支撑,再好的媒介平台以及媒介融合方式也无法焕发生命力,自然也无法实现媒介的价值功能,君不见成千上万计的新媒体平台因无优质内容而沦为“僵尸”甚至在竞争中死亡。实际上,媒介形态的变革无法改变人们对高品质新闻内容的需求,高品质的新闻内容仍然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它在聚合注意力、实现新闻价值转换能力等方面已然显现出力量和优势,这在信息过剩、内容雷同、真伪难辨、鱼龙混杂的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尤为如此。因此,“以受众为中心”,生产出满足受众需要的

^① 吴万伟:《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衰落(上)》,《青年记者》2010年第7期,第70页。

^② 蔡之国:《新闻叙事学研究框架的构想》,《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132页。

优质信息,仍然是实现媒介融合或媒介竞争的根本法则,是塑造媒介品牌的强有力武器。

3. 新闻专业主义“不变”

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主要职业规范,尽管学界和业界对其看法不一,态度不一,但其倡导的真实、客观、全面、准确、公正、清晰以及为公众负责的理念,已然成为新闻业界的共识,这不但在传统媒介环境下被奉为圭臬,在新媒介环境下也亟待成为新闻生产实践的一大法则。如果违反新闻专业主义而使新闻走向反面——虚假、主观、片面、模糊、偏向等,则让人无所适从,无法形成对新闻的信任,进而影响受众通过新闻来认知社会的功能发挥,这在人人都有报道权的新媒体环境中更为可怖。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坚守的某些法则,不但在传统媒体社会中适应,在媒介裂变或融合发展的当下,也亟待为全民新闻生产实践的追求,这不仅是技术方面的要求,更应该内化为每个“新闻人”的行为规范。正如韦伯所认为的:“一个人的职业责任,是社会伦理的最特有的本质,是一种个人应当感知到的其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①

4. 新闻采访及写作的思维及规则“不变”

虽然传播媒介形态在变化,虽然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内容、新闻叙述方式及新闻语言发生了一些新变,但新闻采写的基本规则、原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首先,获取新闻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甚或第三手资料的方法,如观察、提问、倾听等,并未因媒介变革或媒介融合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次,新闻“七分采三分写”“采访是写作的前提而写作是采访的完成”等采写理念也没有随媒介的变革发生根本性变化。再有,新闻写作的叙事思维及基本规则也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在叙事思维方面,如过程思维、因果思维、构成思维、点面结合的思维、比较思维等,还是常用的写作思维方式。再如新闻叙事的基本规则,如新闻标题是对新闻事实的浓缩、概括或评论,新闻主体要有逻辑、有条理、交代信息源等的叙述规则,以及新闻话语的客观性、准确性及意义的民族意识形态性等,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事实上,很多新媒体的新闻表现出“复制”传统媒体新闻的特征,即使有所改动,更多的是新闻标题的修改,如2017年在全国轰动一时的重大舆情事件——山东“辱母杀人案”,此新闻首创者《南方周末》只是将报纸内容《刺死辱母者》“复制”到官网,即使引爆舆论的凤凰网和网易APP,也只是对新闻标题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比如凤凰网的标题为《山东:11名涉黑人员当儿子面侮辱其母1人被刺死》,网易的标题为《母亲欠债遭11人凌辱 儿子目睹后刺死1人被判无期》,而其新闻主体内容并未作实质性修改。由此可见,优质新闻书写的规则并未因媒介形态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革。诚如学者范以锦在《新闻叙事的“变”与不变》中所认为的,“不管不同媒体中的叙事作品的视角、文本结构、叙述的语境有怎样的变化,其叙事的基本规则、原理、内涵、本质都不能缺失”^②。不仅如此,尽管新媒体使用了如无人机、VR、AR、H5等新技术,但新技术的使用只是丰富了新闻文本的形式,使新闻叙事角度更多、更为形象和全面而已,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新闻叙事的思维逻辑和表现规则。

三、“变”与“不变”中的新闻教育

厘清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生产实践的“变”与“不变”,并以此为依据冷静地“度量”我国新闻教育课程的设置与现实新闻生产实践的“距离”,可以在坚守与变革中促进新闻教育的调适,提高新闻教育的成效,努力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优秀新闻专业人才。

1. 在坚守中“以不变应万变”

综观我国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尽管各院系不尽完全相同,但大都将恪守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具备宽厚的人文知识、熟悉新闻理论及知识、具有批判和创新思维、掌握采(访)写(作)摄(影、像)编(文字编辑、影视编辑)评(论)传(播)及计算机应用等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并围绕这一培养目标进行课程的建构设置与教学实践。可以说,培养目标的确立及相关课程的设置,如能完全发挥成效的话,则培养的学生基本能够较好地满足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人才需求。事实上,媒介变革引发的人才需求并未脱离现有新闻教育的窠臼,媒介变革更多地表现为技术逻辑和平台逻辑的转变,新闻生产的基本原理、规则及技能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更多的是内容生产的重新塑形,因此,我国现有新闻院系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进行的新闻教育课程设置并不需要作出过大的调整 and 变化。不过,从现有新闻课程教学的成效来看,我国新闻教育还存在一

^① 马克斯·韦伯著,黄宪启等译:《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9页。

^② 范以锦:《新闻叙事的“变”与“不变”》,《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6期,第1页。

些缺憾,在对受众心理及接受兴趣的了解、多媒体新闻采访技能的运用、新闻叙事的逻辑建构及叙事技巧以及文字、图片、影像、编辑等技能的融合运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这需要通过融通学界和业界的师资建设、加强学校与媒体或其他学校的结盟、强化学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特别是媒介融合报道的训练、强化一(两)专多能的人才培养要求等方面不断提升教学成效,从而在把握受众的基础上实现新闻生产实践所需各项技能的提升,进而以“以不变应万变”的教育姿态应对未来媒介形态的变革。

2. 在调适中“与时俱进”

媒介技术的变革,主要拓展了媒介传播通道及新闻呈现方式,这需要在坚守新闻本质内涵及叙事规则同时,与时俱进地增加相关课程的设置,不断提高运用新媒介及新技术生产新闻的能力,可以在调适中促进新闻教育与现实需要的“对接”。为此,一方面要增加媒介新形态研究的课程,让学生与时俱进地掌握媒介新形态的传播特征及新闻生产新规则;另一方面,要适当增加一些新技术如无人机、VR、AR及3D技术等课程的教学,提高学生更全面、更形象、更易得地还原和呈现事实现场的技术使用能力。事实上,新技术让新闻更显可视化、形象性,让新闻更贴近受众。比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数说命运共同体》就是采用最先进的数据可视化技术——首次使用卫星定位跟踪系统数据、首次使用数据库对接可视化技术、首次用可视化形象描摹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分布等,较为形象、直观地带领受众认知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个方面的情况;再如《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采用人脸识别、融合成像、H5等技术,帮助受众生成自己的虚拟“军装照”,引发刷屏效应,创造出10亿+的浏览量及1.5亿+的累计访客量等。虽然说这些新技术的运用并非是新闻传播的常态,但对其巧妙使用能够为新闻的传播增添动能。事实上,新技术不断出现,并贯穿于新闻生产实践的全过程,在给人以新奇感的同时也促进了更大范围的传播。为此,在招生方式上,新闻教育不应该局限于文科生,还应该从理工科甚或其他学科汲取人才,不断增强新闻+其他学科的融通发展,多方面提升学生的科技教育、设计与运用能力。

结束语

对新闻生产实践而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交叉叠加促发的媒介变革,是权力的分散和重新赋权,虽然表现出“新变”的特质,但更多的是平台创新下“受众为中心”“内容为王”等“不变”新闻传播理念的回归与强调。事实上,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媒介如何变革,技术如何更迭,生产出满足受众需要的优质信息,是新闻生产实践的“初心”,也是新闻教育的最终指向。为此,我们应该在媒介裂变或融合发展的新闻生产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发问:我们生产的信息受众能够接收到吗?我们生产的新闻信息会受受众欢迎吗?唯有每每如此发问并在受众反馈中不断提升新闻品质,才能生产出高流量、高点击率的新闻,进而形成品牌化的媒介传播形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也是当下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目标及最终旨归。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对:刘倩)

新闻传播本科教育教学体系的变革与创新

初滢滢

(南京晓庄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要:媒介融合发展使传媒格局产生变化,传播观念、媒介功能和媒介素养等也随之改变,传媒实践的改变使得传媒市场对人才需求类型、人才素养和能力有新的要求。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变革,既要考虑在教学内容中加入新媒体技术,又要考虑整个课程的框架与整个行业的内涵与外延相适应。新闻传播本科教育教学体系的变革与创新,要深入探讨新闻传播课程体系、实践体系和评价体系这几个方面如何有机结合,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闻传播教育教学生态系统。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创新;变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117-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具体目标,强调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①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战略和全局高度,多次就为什么必须融合发展、怎样融合发展、融合发展的目标路径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论述和全面指导。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由此可见,我国媒介融合有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同时我国的媒体行业面临着整体格局的变化,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教学体系改革的探讨较为笼统,对实际教学缺乏指导性。很多学者认为媒介融合是技术的融合,提倡培养“全能型”的新闻人才。但全能型是否仅指让新闻人才掌握所有的媒体技术?新闻传播学科具有实践性、交叉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特征,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关键字是“合”,既要考虑在教学内容中加入新媒体技术,又要考虑整个课程的框架与整个行业的内涵与外延相适应,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重新界定。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教学的变革,需要从课程体系、实践体系和评价体系构成这几个方面着手,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教学生态系统。

一、新闻传播专业本科课程体系建设

1997年,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在数字化空间里,信息可以极快地进行无限距离的传播。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媒体的广泛开发,数字媒体越来越趋于功能融合的状态。现在,数字媒体所构筑出来的形态就是“媒介融合”的形态。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闻传播者和受众不再是截然分离的,其定位有互换和重合的部分。人人都可以作为自媒体来传播信息,同时可以作为受众获得信息。传统媒体意义上的受众在某些时刻成为了传播者,打破了专业媒体人才可成为传播者的限制。

1. 新闻传播专业创新课程体系的发展方向

收稿日期:2019-05-20

作者简介:初滢滢,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广播电视编导、新媒体。

^① 李雪昆、赵新乐:《〈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审议通过引业界关注——媒体深度融合热潮将至》,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政府网站 2014 年 8 月 20 日, <http://www.gapp.gov.cn/news/1656/223719.shtml>.

“后信息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所有商品都可以订购,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人们普遍认为,个人化是窄播的延伸,其受众从大众到较小和更小的群体,最后终于只针对个人。”^①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说到“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

媒介融合下的新闻传播具有互动性、开放性、多媒体和全球化等特质,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手段多样化,公众在信息传播方面由被动变为主动并具有影响力。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新媒体从分众传播逐渐演进为个性化传播,内容形式产生演变,强调信息传播定制化,通过个性化传播的发展来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这对传统媒体造成十分严峻的挑战和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需及时把脉当下新闻传播领域的个性化传播趋势,制定出能够适应个性化传播的人才培养策略。

同时,在融媒体时代,媒介壁垒逐渐打破,媒介差异慢慢减少,基于某种媒介进行专业设置的做法难以适应媒介融合时代发展需求,难以培养出顺应时代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在新闻人才培养方面应加强新旧媒体融合运用能力的培养,为传统媒体机构和新媒体机构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应用型、复合型新闻人才,提高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整体竞争力。

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需要新闻人才的培养作出突破,不仅是教授学生使用先进的传播工具,或是对数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与发布,更重要的是要求未来的新闻人具备对传播内容进行重构与再认识的素养。因此,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个性化的新闻人才更需要具有强烈的导向意识,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样才能成为具有全球化视野、掌握融媒体传播规律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2. 建立跨专业融合型专业课程体系

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媒体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冲击,移动传媒的发展一方面让受众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同时也改变了其身份,大众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可亲自参与制作与传播新闻。同时互联网技术也让新兴媒体可利用多种渠道对丰富的信息内容进行快速传播。在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不仅是新兴媒体,传统媒体也需要能运用新媒体技术的人才。

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课程建设对于新媒体领域的涉及较少,或有涉及也是偏重于新媒体技术而缺少内容的教学,与行业的实际需求相脱节。媒介融合要求新闻人才不仅要了解与掌握新媒体技术,更需要其掌握较为全面的新闻传播技能。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新闻媒体工作方式、传播方式和媒体间的合作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变化。新技术确实是推动媒介融合的动力,但只是媒介融合的一部分,新闻人只掌握单一的传播技术或是只掌握新的传播技术都无法应对融媒体传播环境的变化。

因此,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建设需要多学科、多媒体交叉融合,可以利用高校丰富的资源,实现跨学科教育。融媒体时代需要综合能力强的新闻人才,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既需要掌握本专业知识,也需要掌握其他专业的知识。但是,学科知识的融合、多学科或者跨学科教学并不是让学生掌握越多的跨专业知识越好。在跨学科教学中往往会出现课程设置错综复杂,课程之间缺乏关联,不仅让学生无法有效构成知识体系,可能还会迷失学习方向。样样都学,事事不精,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相背离。

目前,新闻传播学教学的模块可以分为“理论型”“实务型”和“艺术创意型”,不同院校可根据自身课程资源在课程设置上对不同的模块各有侧重,重要的是各模块之间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体系,真正做到多学科、多媒体的交叉融合,让学生构建完善的新闻传播知识体系,兼备传播、分析和策划等各种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需要。

3. 构建动态应用型课程体系

“单向传播时代,舆论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新传播生态下的受众参与,则使得舆论真正变成一个动态场域。不同立场、不同背景的网民在互动中形成一个个不同的意见群落。这也使得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引导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充满各种不确定性……”^②应对这些挑战,新闻人才的培养更要突显其专业性,需要培养具有创新新闻传播思维、能适应新闻传播方式变化的专业人才,不仅懂技术,还能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维护新闻学的权威话语权。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人才,需要掌握多媒体技能,但更多的是需要新闻人形成跨媒体的思维方式,对新闻题材的报道可以采用多种媒体手段,既能继承传统媒体的技能与思维,也

^① 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

^② 万小广:《媒体融合新论》,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改造,建立起跨媒体的整合性思维。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课程体系也需要构建一个动态生态系统,重点在于使学生具有良好的思考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丰富的实践经验和 Learning 新技术的能力。相比其他的人文学科专业,新闻传播专业更注重实践教学,特别是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不能只是单一的知识传授。传统的新闻传播专业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不能满足行业的实际需求,其主要问题在于专业课程缺乏实践性和针对性,专业课程之间缺乏关联性和逻辑性,导致教学内容与行业前沿脱节。

媒介融合使传媒专业不断细化,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专业的教学模式也应顺势变革。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应该包括不断更新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以及新媒体时代下的各种新技术,课程内容应该将传统媒体传播信息方式和新技术、新知识有机结合,整合课程资源,进一步形成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闻传播业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二、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实践体系

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要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的“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的思想。地方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要适应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满足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指出,当前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难,就业质量低,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十分缺乏,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不能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因此,应当适当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特别是地方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更要注重应用性和实践性,既要有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又要有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训练。

1. 培养技术应用创新能力

“与高职专教育主要培养操作性人才不同,应用型本科教育需要遵循本科人才培养的教育规律,培养学生具有较宽广的理论基础,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能和不断创新的能力。”^①在培养应用型新闻人才时不可忽视理论素养的培养。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与新闻传播相关的概念层出不穷。就现阶段看,如果新闻人对“媒介融合”的概念与发展态势没有一个清晰正确的认知,将无法应对媒介融合下新的新闻传播环境与传播方式。因此,未来合格的新闻人才必须要加强新闻专业理论素养的培养,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将重要的新概念传递给学生。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学校在制定新闻传播专业建设与整体发展规划时,应突出时代性,培养“懂传播、懂技术、懂设计”,具有综合素质的新闻人才。新闻工作需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基于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工作者,需要能写作、会采访、会拍摄、会剪辑等。但是不是具备了这些专业技术就一定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2017年12月26日,新华社在第五届中国新兴媒体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上,推出了第一条 MGC(机器生产内容)视频新闻——《新华社发布国内首条 MGC 视频新闻,媒体大脑来了!》,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与媒体间的融合将更加深入全面。“媒体大脑”平台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工智能已经应用于新闻业。从发展趋势上看,新闻传播业的人工智能时代也已到来。人工智能与媒体间的融合,新闻信息由传统的人工采编转变为机器挖掘,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采编的流程。新闻价值通过算法判断,新闻播发也通过算法进行选择分发或推送。这对未来的新闻人才提出了挑战,如何在这些新技术不断诞生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生存优势,值得每位新闻传播专业的教育者认真思考。

“全媒体”的新闻人才需要掌握新媒体的相关技术,但现代传播技术更新换代速度相当快,学校教育很难跟上技术更新的步伐,面面俱到学习难度相当大。“在媒介和传播研究领域,一个常见的术语是‘再媒介化’(remediation)。它通常是指新媒体从旧媒介中获得部分的形式和内容,有时也继承了后者中一种具体的理论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②因此,对于“全能型”新闻人才的界定,不仅要掌握新媒体技术,还需要了解掌握传统媒体的传播技术;不是要掌握所有的信息和资讯的传播技术,而是应该具备不断探索和学习新事物的

① 王晓红主编:《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② 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能力,在原有的知识结构基础上,能够比其他人更快地掌握一项知识或者技能。新时代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不仅需要掌握新的传播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迎接新事物的学习能力。

2. 创建实践教学平台

目前,高校新闻学专业的专业课程设置普遍存在理论课程较多,实践课程少的现象。即使有实践课程,实践课程与课程之间往往缺少关联,在一个学期内,学生除了要学习理论课程,还要完成几门实践课程的作业与考核,因时间与精力所限,无法高质量完成实践作业,实践课程的目标达成度不高。

传统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一般要求学生掌握某一种传播媒介的技能,学生掌握单一的媒介技术也可以应对实际的工作需要。但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入,新的媒介技术也在不断更新。要求新闻人才掌握的传播技术和技能也越来越多,新闻人才必须掌握各种新的媒介技术才能适应当今跨媒介新闻生产和传播的需要。

因此,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实践课程的内容不应该单一化,应该包含运用不同媒介进行新闻表达的技术,应该让学生了解一些前沿的传播科技,比如数据挖掘、人工智能以及虚拟新闻等相关技术。在构建新闻传播专业综合实践课程体系时,应加强融媒体技术的教学,让学生体验并掌握相关的融媒体技术,跟进传播实践的需要。同时还需要加强实践课程之间的关联,学生能够运用融媒体技术完成新闻策划、采集、写作以及制作的整个流程,将新闻生产实践的各项知识技能有效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3. 建立实践应用动态机制

我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大部分课程是以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的,基本按照“传递—接受”的模式完成。老师侧重各类知识的讲解,而学生则是被动接受,学生的创新性思维难以得到发展。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改革,应把学生放在主体位置,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拥有更强的新闻学思维 and 实际创新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下的竞争环境。

在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设计中,通过与当地的企事业单位相结合,建立校企合作、校内外实训基地,采取工学结合的方式,充分开发课程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一定的激励机制,使学生始终保持较高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对学生的评价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评价学生的职业能力与创新思维能力。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课程体系中,课程内容不再是单向度的传授关系,而是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让媒体人、业界专家成为学生的职业导师,学校与资深媒体人共同进行课程设计,搭建学界与业界交流的桥梁。以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为例,学院与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区委宣传部以及腾讯网等媒体合作搭建教学平台,将实践教学成果与政府部门以及各企事业单位的要求紧密结合,实现学生作业向作品和产品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教师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可以激发学生创作热情,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

与地方区域特色相结合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培养机制,建立创新实践教学平台,可以进一步深化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开发,以及实践体系的专业化发展。融媒体下的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在国内传媒教育领域中的参考书很少,与各地方、各区域相结合,实行产学研协同创新培养机制,可以加强实践性、个性化的教学教材建设。同时,学校与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的项目合作还可以培养学生团队精神。通过实践平台使学生的作品产业化,直接服务于社会和传媒机构,还可将学生作品放到新媒体实践平台,以作品的关注度和点击量为考核标准。这种与地方区域特色相结合的培养机制,既能够实现教学向生产力的转化,又可以有效检验教学效果。

三、建立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评价体系

目前,在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中存在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相脱离的现象。现有的师资队伍主要以学者型的教师为主,普遍缺乏行业经验和业绩,致使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脱轨。在实践内容的教学方面,对于学生的实践环节缺少合理的评价机制,使实践环节流于形式。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应该注重实践,但目前无论是考试还是最后的毕业设计都不能体现学生对实践内容的把握。

以媒介融合为背景,新闻传播专业的相关院校可以建立融合新闻传媒各工种为一体的联合式工作室,采取多元化的评估方式,重视过程性考核,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水平。这种教学与实践相互结合的评价方式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实践技术,在未来的媒介融合中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

1. 以项目为载体,创建新型实践考核模式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创新型学习模式应以项目为载体,老师引领学生建立项目组来进行实践教学活动,与传媒领域相关行业、政府相关部门合作参与或举办各种与新闻传播专业相关的比赛。同时学校通过和行业内各部门合作搭建校内外实践实训平台,以有效地促进合作、再创作的良性循环,丰富实践教学手段,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各方面专业能力都能够得到有效训练。

创新型教学模式体现在模块化教学和分阶段培养模式上。可以根据学生兴趣以及专业要求分为各种工作小组,如纪录片小组、短视频小组、新媒体小组等。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具体的分工可以打破媒体类型的局限,如按照新闻生产流程设置相应的工作室。通过建立工作室承接具体的项目,在实战过程中强化学生创意与实践能力的训练。小组成员分阶段共同完成相应的项目,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学生业务能力进一步提升,逐步建立起全媒体意识,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行业竞争。

2. 以竞赛促实践,建立新型考核机制

新闻传播专业实践性很强,在教学中应积极调动各方资源,让学生参加各种与专业相关的赛事,了解行业前沿动态,明确行业真正需求的人才要求。近几年,国家教育部及其下属的部分部门和地方企事业单位,相继组织开展了与“媒介融合”相关的专业比赛。参与这些竞赛,能促进学生与外校资源的交流。建立“以赛促教”的教学考核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保障下,可以积极调动学生的参与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竞赛中来。

新型的考核机制应对学生的综合素养、专业技能、创作成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根据应用型学科的特点和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本着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尺度的准则,依据知识相似点的原则进行项目划分,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重组,加大实践教学内容的比重,成绩考核可以通过学生参加竞赛的情况进行评定。以竞赛的方式,学生组成项目团队完成相应的作品,专业教师和媒体从业者共同对学生团队创作的作品进行评价。学生团队和团队之间也可以进行相互评价,做到客观、公正、综合地评定个人成绩。建立新型的考核机制,应重视学生在专业领域中的独特见解以及创新意识,以行业内的竞赛为推动,促使学生主动将作品设计与行业动态相结合,确保选题的价值,在表达个性思想的同时,也能确保其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

3. 以应用为导向,建立教学效果检验机制

新闻传播专业可以有效地实施以项目任务为驱动,以项目应用为检验标准的教学考核模式。依据新闻传播专业的特点进行实践项目选择,以实际工作任务作为载体,以项目最终在企事业单位的应用为检验标准,真正做到在做中学、做中教,教学做合一。

这一教学检验机制的建立,可通过新闻传播学院与当地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合作,获得相应的政策、资金与人才的支持。如,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与南京建邺区委宣传部签订合作协议,南京建邺区委宣传部将在基础设施、师资力量和政策导向等方面给新闻传播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以支持,为学院提供与专业对应的实践项目,通过各种项目带动学生的实践,保证了学生专业实践的高质与高效。

以应用为导向建立教学检验机制,可以提升新闻传播专业与市场的契合度,可充分满足企事业单位对于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学院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共建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将学生与老师的共创成果与相关企业对接、合作、转化为可供实施的项目,使高校与企事业单位共创价值,通过各自的资源和要素彼此进行有效对接和整合,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合作创新中,实现教学与实践共赢的动态融合过程。

综上所述,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要形成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创新培养机制,需要树立精品意识,坚持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和实践建设三者紧密结合。在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中应注重与专业领域的新技术、新实践手段发展保持同步,做到课程体系、实践内容与评价体系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当下媒介发展现状和学科研究现状。

媒介融合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还是要有扎实的新闻学基础,离不开新闻道德的约束和新闻价值的判断,离不开深厚的传统新闻传播教育做后盾。媒介融合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无论在人才培养目标还是在课程体系的设定上都离不开最基本的新闻素养的培养,需要培养既懂技术,又有政治觉悟、大局观念、伦理精神和专业意识的全媒化卓越新闻人才。

(责任编辑:钟玖英 校对:刘倩)

在文本细读中重塑清代《论语》学研究新格局

宋 钢

(南京晓庄学院 图书馆,江苏 南京 211171)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9)04-0122-02

文本细读是 20 世纪 40 年代英美新批评流派的重要范畴。所谓“细读”,实为“细评”,即评论者在仔细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对作品的结构、反讽、比喻、夸张等隐含的文本意义作出全面的评价。文本细读因强调对作品本身的描述和评价,为现代文本理论奠定了基础,拥有强大的与时俱进的生命力。80 年代传入中国后,对文学批评、文学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本细读以文本为中心这一特点决定了文本细读的有关理论、方法与经学研究具有某种先天性的关联。因为经学的载体是文本,经学注疏、训诂、传承、创新等无法离开文本。中国古代的经学研究虽然没有建构文本细读的形上理论,但却有着最丰富、最具体的文本细读实践。经学研究成果从哪里来,只能从阅读、理解、分析经典文本及诠释文本的艰苦劳动中来,文本永远是第一性的,文本细读是经学研究的基本保障。

近年来,柳宏教授的《论语》诠释研究主要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梳理和总结有清一代《论语》学研究的脉络、特点与成就。继 2008 年出版《清代〈论语〉诠释史论》后,近期又推出《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新作紧扣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文本,从一本本《论语》学文本细读中揭示不同地域学派的共性特点和个性差异,改变了学术界有关既有判断,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将清代《论语》诠释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第一,在文本细读中,捕捉地域学人的生命律动和卓异个性。

经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无疑存在区别,这种差异主要源自两者的目标期待。文学研究的根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水平,深化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诗意感受与认知把握;而经学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们的人格操守和理想追求,提高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人生体验中如何创造和谐的环境、准确地定位角色、积极地经世进取。质言之,文学文本的阅读,永远是美好的“心灵远游”,研究主体可以体验到作家情感的律动和个性的张扬,它是一个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世界。而经学文本的阅读,在当代则表现为艰难的“精神苦旅”,原因在于它更多的是枯燥的训诂和繁琐的考据,目标指向理性的审视与意义的分析。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绝对,在对经学与文学文本的解读中,往往既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也不乏相互融通的边界。

在清代地域学人的文本细读中,我们同样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经学家张扬的个性,卓异的风采。细读程廷祚《论语说》,其解《述而篇》“加我数年”时云:“愚尝雪后山行,路甚险滑,偶至冰雪稀少处,车前与人忽呼曰‘易行矣!’车后者戒曰‘即使易行,汝亦以难行视之,则可保无事耳!’愚闻之悚然,悟全《易》之理皆在于是,迺言信不可忽也。观夫子此章之言,乃知古圣人设卦词,皆为人人事。而设彼以术数图象求诸幽渺者,不亦异乎?”雪后山行,须臾不忘经义,可见其痴迷执著之情。细读赵良猷《论语注参》,从其“语自有味”“最有趣味”“此节极好”“此说极好”“此说最好”“此论破千古之惑,是《路史》中议论之最纯正者”“论自新警”“论自明豁”等极具个性化的按语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诠释主体解经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和创造参与。反之,没有毛奇龄《论语稽求篇》的文本细读,就不可能发现毛氏好名争胜、傲睨一世的独特个性和纵横博辨、富有生气的

收稿日期:2019-03-18

作者简介:宋钢,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

诠释风格;没有江声《论语俟质》的文本细读,就无法了解其生平不作楷书、与人往来书札皆作古篆的嗜好,其“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篆,人非笑之亦不顾也”的偏执令人击节叹赏。凡此,不在文本细读中体验、涵咏,不对文本深入审视、细致分析,很难捕捉到地域学人如此丰富多彩的鲜明个性,无法体验到《论语》诠释注家拥抱文本的生命律动。

第二,在文本细读中,纠偏学术界固有认识和判断。

学术史上,有关先期学术成果或一些大家做出的判断,往往长期垄断学术界,有些虽在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的驱动下作出某种深化或调整,但大多形成稳固判断,习惯成自然地久居“学术交椅”,学术界奉若神明而很少质疑。《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一书在文本细读中,往往可以抛开先验的模式、既定的经验、权威的观点,作出理性客观的分析与审视。比如,学术史上常常将刘恭冕纳入常州学派,但在细读刘恭冕《何休注论论语述》的文本后,将会发现:第一,刘恭冕并不盲从尊奉常州今文派之注解,完全采取客观公允、实事求是之态度。当褒则褒,当贬则贬,当是则从,当非则斥。毫无今文家穿凿之倾向。第二,刘恭冕在治经思想上体现出兼采融合的特点,不分古今,不别汉宋。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被刘恭冕引用较多者,不是今文派,而是古文家。第三,刘恭冕之诠释方法亦与常州今文派不同。主要运用考据学之方法。引证博洽,考据翔实。如直接训诂文字者就有两条。即第21条“公羊昭12年”辑出:“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后指出“此引‘毋意’,谓意度之也。意与億同义。”第46条“公羊僖4年”辑出“敏则有功。”后指出:“徐彦《疏》云:‘敏,审也。’”此外,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及诸多注家的解说,援引的文献有《春秋繁露》《白虎通》《盐铁论》《史记》《汉书》《后汉书》《礼记》《左传》《五经异义》《韩诗内传》《拜经日记》等,涉及的注家包括刘逢禄、宋翔凤、戴望及郑玄、许慎、包咸、刘向、李善、徐彦、臧庸、江永、包慎言等。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否定前人的既有判断,刘恭冕的主要方法是辑录和考据,主要倾向是不主一家,实事求是,具有扬州学派会通博洽的典型特征。故将刘氏纳入常州学派十分牵强。可见,只有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才可纠偏既有的学术陈见,才能形成科学客观的理解与认知,产生准确深刻的观点与判断。故而,没有文本细读,绝不可能产生有说服力、公信力的学术新见。

第三,在文本细读中,彰显新问题,揭示新特点。

文学研究和经学研究有一个亘古不变的铁律,即两者都必须抓住文本。然文学研究可以从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去阐述,有时候离文本远一点问题不大。但经学研究有其特殊性,绝对离不开文本本身。经学由经典文本和经典诠释文本两部分共同构成,诠释文本既包括对原典加以诠释的文本,还包括对诠释文本再进行诠释的诠释文本。而且,经学研究的文本细读,涉及到文献、版本、校勘、辨伪、考据、义理,其细读需要细致入微,精雕细刻,爬梳剔抉,考镜源流。再者,经学研究方法深深植根于细读基础之上,如经内互证需要对经典了然于胸、烂熟于心;而以经证经、以史证经,则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源和丰厚的学术功力。因此,经学研究的文本细读任务更加艰巨,要求更加严格,素养更加全面。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见微知著,减少空洞的总体分析和笼统的宏观描述。如学术界通常认为吴派最专,皖派最精,然鲜有深入的分析 and 具体的阐述。《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通过文本细读,不仅高度概括出吴派专于尊汉求古、专于训诂文字、专于钩沉辑佚,皖派精于名物、精于训诂、精于古注的特色,还精辟指出:第一,吴派的学术宗旨是一尊汉经,但在其具体治经实践中并不完全纯粹,并非彻底践行“凡汉皆好、凡古必真”的治学理念,此在惠栋《论语古义》中虽未见端倪,但在江声《论语注参》中则偶见对古说的大胆批评;第二,吴派《论语》诠释实践中,其“不主一家”的倾向,“实事求是”的态度,模糊了吴皖两派的学术界限,这似乎让人看到了皖派的雏形。这一现象十分有趣,亦十分重要,这既为吴皖两派合流的学术观点提供了依据,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吴派向皖派演进的轨迹;第三,吴皖两派均能坚守汉学,但吴派多“株守汉儒”而“不敢出入”,抱定“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而皖派则能跳出“汉界”,做到“实事求是,不主一家”,并能从训诂通义理,突破旧学,提出己见。

总之,《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从文本细读切入,打破标签式理解、概念化判断,呈现出有别于传统看法的新观点、新形态和新问题,为清代《论语》诠释吹来新风,输入活水,大大拓展了《论语》学研究的空间与视野,进而为传统经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与借鉴。

(责任编辑:胡晓明)

A New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 Shi's Poetry and Buddhism

GUAN Peng-f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1171, China)

Abstract: The trend from facultative symbiosis to obligate symbiosis, to a certain extent, obscu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 Shi's poetry and Buddhism. Until Wang Wengao refuted this trend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right track. This facultative symbiosis is extremely complex. On the one hand, it is reflected in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as one of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on the poetic view and poetic styl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need of both interpretation and expression. The former is congenital existence, while the latter is newly built up by Su Shi. Through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the erroneous cognition of the study can be clarified.

Key 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Buddhism; facultative symbiosis; Su Shi

Syntactic Variation: An Intersection of Generative Linguistics and Sociolinguistics

FANG Xiao-b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1171, China)

Abstract: Syntactic variation is a ubiquitous linguistic phenomenon, and also a weak point in the research of the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school. Generative linguistics refuses to recognize language variation at first, bu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inimalist programme and optimization theory and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syntactic research,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variation in generative linguistics has gradually changed. Social syntax, with syntactic variation as the core, has become a platfor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schools. Future cooperation will focus on children's language acquisition, grammaticaliz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corpus linguistic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school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study of syntactic vari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yntax.

Key words: syntactic variation; sociolinguistics; generative linguistics; grammaticalization; social syntax

A Corpus-Based Study on Idiomaticity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Spoken Discourse

SU Ni-n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Xiamen Medical College, Xiamen 361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rpus of COLSEC,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diomaticity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spoken discourse from two aspects: lexical grammatical form and functional feat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Chinese EFL learners are insufficient in the use of idiomatic expressions in terms of lexico-grammar and function, and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native speakers' idiomatic expressions. To some extent, it reflects that the naturalness, idiomaticity and accuracy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spoken discourse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This research provides implications for the teaching of spoken English.

Key words: idiomaticity; idiomatic expressions; corpus; spoken English discourse